

Л. МАДЪЯР
ОЧЕРКИ
ПО
ЭКОНОМИКЕ
КИТАЯ

蕭亞爾松
徐公達

書碼 ^{DK}
(三三四)

中國

經濟大綱

馬札亞爾著
徐公達譯

中國經濟大綱

新生命書局發行

序 言

馬札亞爾這本小冊子是審慎研究工作的成果。這工作由於一種完全客觀性質的情形，即在中國沒有任何可靠和完備的統計而發生着極端的困難。龐大的中國之各個區域簡直就是獨立的經濟和政治的單位；這一事實在其思想上的表現即在於中國沒有關於全國之一般的統計，甚至於沒有關於整個國民經濟之純粹記載的材料。作者為要在經濟基礎上得到自己的結論，於是就不得不依單個部門去搜集統計材料來解說中國國民經濟發展之單獨的例證了。沒有前人的研究，他自己不得不痛下一番準備的工夫；如果作者有一種可能在現成的系統化的及一般的材料上來引證，那麼，結果這本書便不至堆滿統計記載的材料，無論我們願意與否，在這本書的一般計劃上理論的分析與許多實際材料比較起來，總沒有佔着重要地位。因此，本書的特色，即在於可以供作中國

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之研究的濫觴。

只有農村經濟是個例外。專論農村經濟的幾章，比之在邏輯上從農村經濟之優越作用所得出的結論來說（在中國一般經濟中起着農業的優越作用），未免太過簡單，太過草率。要說明這一點，就是作者已經出版了一本特別對於中國農村經濟貢獻的著作，並且也是爲着避免重複；讀者要想詳細的認識這一問題，必須在上述的那本書中去找尋一切必要的材料。（馬札亞爾關於中國農村經濟一書已由神州國光社出版，譯名：中國農村經濟研究——譯者註）

曾經引起繼續不斷的爭論之「亞西亞生產方法」問題，與馬札亞爾上述的那本書的發表是聯系的，故在這本書中未曾提到。

我們僅僅要指出以下各點：從馬札亞爾自己關於農村經濟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以完全明確的文字說，假使馬克思由「亞西亞生產方法」一術語所決定的那種社會形式（就是說，國家是一切土地的所有者，地租是交納國家之惟一的貢稅）於中國在特定的時候也存在過的話，那麼，在現時由這種生產方法所殘留下來的也不過是在整個領土內之國家所有權的法律機能形式中的遺跡罷了。然而，這種機能自身並沒有引起任何現實的效果，因爲土地在中國與在歐洲完全一樣，這

是私有財產的對象。亞西亞生產方法如果在中國歷史上佔有位置，則在現時業已沒有這種社會制度的成份了。

本書是違反我們「殖民地叢書部」之一般綱領的，牠沒有把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鬭爭的情形描寫出來。雖然，中國革命之全世界歷史的意義如是偉大，並且在這個問題上存在有許多文獻，但那些文獻足可以給我們一種簡略的大綱。因此，我很同意於作者企圖在最後一章作「中國革命前途的嘗試」——在這一重要問題上，這個大膽的嘗試直到今天還沒有弄得十分清楚明白。

伐爾加 (E. Varga)

中國經濟大綱

著者序言

我們以爲這本「中國經濟」的著作會使讀者在許多地方感到失望。

共產學院殖民地叢書部曾提出過三個任務：（一）分析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在外資侵入前之社會經濟制度；（二）分析外資影響及在帝國主義侵入後在這些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中之社會經濟制度上之資本主義的發展；（三）分析這些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這本書中，我們對這些問題沒有給與全部答案。我們沒有提到在外資侵入前之中國社會制度，其所以未如此者，有些是因爲過去的殘餘和餘孽尙貫通於今日全境經濟之中，有些僅僅是因爲「死的制度附着了活的制度」。我們不預備分析中國之民族解放運動，以及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教訓和下一階段的革命鬭爭。關於這些問題已經搜集了許多材料及許多著作，但是

不能說，在半殖民地的中國之最偉大的和最主要的革命運動的教訓已經充分地整理了；這個任務到現在尚未解決——沒有最後解決。中國革命的教訓對於印度革命那簡直是一顆燦爛的明星，即對於正在發展着大革命搏戰的南洋羣島、阿刺伯諸國、埃及、黑人諸區、拉丁美洲及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亦復如是。對於中國革命教訓愈是慎重的研究，此刻則愈能應用這些教訓到新的高漲中的中國革命上去。

在這本書中，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分析現代中國的經濟條件。我們希望讀者注意到與該問題的解決相連系的巨大困難。許多問題——關於工業的命運，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時期殖民地國家之大工業及國內市場的發展——差不多都已研究過了。我們僅僅研究這種問題，即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社會經濟制度之影響。在中國研究這些問題，因十分缺乏可靠的統計材料而感受到巨大的困難和紛亂。這本書最基本的缺陷我們以為是對土地問題的研究過於簡單——對這問題僅僅研究了最一般的和粗率的特點。在這裏僅僅將「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中之某些重要點給了簡略的說明。關於鐵路的发展及幣制問題也只給了梗概的說明。如果在沙發諾夫所著之中國歷史中的階級及階級鬥爭（這本書在基本論理上我們是不能同意的）中讀者可以找到許多有關於過

去中國社會制度之有價值的指示，那麼，在康脫洛維赤所著之中國的外資與鐵路及史坦所著之中國財政危機概論中也可以找到有關於中國鐵路狀況及財政狀況之許多有價值的實際材料。

在這本書中，我們以後不說到亞西亞生產方法問題者，是因為這個問題與問題的設問有連系，並且應用到中國時，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會引起不少的爭論。我們預備最近在別個地方來分析這個問題。我們承認我們在「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中之錯誤，在那裏我們未曾充分地注意到中國歷史中之各時期及各區域中之封建化的過程。我們不從理論上提出這個問題，毫無疑義的這是錯誤，雖然我們在具體事實的研究有條理的記載中也曾指出這些過程。我們會認為，至今仍認為我們關於亞西亞生產方法問題，關於東方社會問題的設問完全是正確的，馬克思關於東方社會的學說應用於中國過去歷史完全有根據的。關於這些問題的爭論，不成問題的能說明牠。我們打算在最近的將來將這些爭論問題用正面意見給那些折衷的及不正確的概念以批評。

所以在這本書中，關於中國城市經濟的分析有很特色的嘗試，而對於農村經濟則只是簡約地提到了牠的主要問題。我們沒有說到中國工人階級之狀況的問題，也未說到工人運動之發生和發展，因為這些問題讀者可以在其他著作中找着的。

馬札亞爾 (L. Madjar)

關於中國的基本材料

中國沒有正確的統計。近來南京政府僅僅想在某幾省中重新作一點出來。找正確的統計材料，簡直是非常困難。

中國郵政局在一九二六年擬定中國人口爲四八五、五〇八、三三八人，海關擬計爲四四五、八〇七、〇〇〇人。另一種統計認爲中國只有三二〇、三五〇、〇〇〇人。居留中國之外僑爲三四六、八八三人。領土爲四、二七八、三四七方里。鐵路長度一種統計爲一六、六八三基羅米突，另一種統計——一一、〇〇〇基羅米突。郵件在一九二五年爲五六五、〇〇〇、七〇三。內外債爲二、三八六、六〇八、三〇九元。

論到中國之經濟狀況，與美國比較起來或許不無趣味。美國駐華商業代辦阿爾諾德 (I. Ar

hold, Same Bigger in China Problems, Shanghai, 1928)說..

美國

中國

中國對於美國之百分比

(以千為單位)

人口	100,000	400,000	—
領土(方里)	3,743	4,278	—
鐵路(里)	250	7	二·七
電線(里)	1,850	84	四·三
電話(里)	17,000	100	〇·六
產煤(噸)	585,000	25,000	四·一
鋼鐵之消費(百分比)	99·四	〇·六	〇·六
燕麥生產(斗)	115,000	20,000	一七·四
小麥生產(斗)	800,000	300,000	三七·五
米的生產(升)	34,000	800,000	二三五·三

棉的生產(擔)	一五、〇〇〇	二、五〇〇	一四・三
紡機數	六五〇	二九	四・四
錠數	三七、〇〇〇	三、五〇〇	八・六
電力(克羅瓦特)	一四、〇〇〇	二五〇	一・八
對外貿易(元)	九、〇〇〇	一、三〇〇	一・一
汽車	二二、〇〇〇	二二	〇・一
郵政分局	五一	一一	一八・八
石鋪路	五〇〇	五	一・〇

我們知道，這些統計中屬於中國的部份自然不是完全對的。它在根本上完全正確的反映出巨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及巨大的半殖民地國家之生產力的發展。

中國經濟大綱目錄

伐爾加序言

著者序言

關於中國的基本材料

第一章 中國農村經濟……………一

一 中國的農業區域……………一

二 中國農村經濟的特點……………五

三 農業危機的根源……………七

第二章 中國土地制度……………一

一 土地所有權·····	一三
二 佃租的關係·····	一七
三 農村經濟中的僱傭勞動·····	二一
四 農民之賦稅的剝削·····	二二
五 農民之高利貸的剝削·····	二三
六 農民之商業的剝削·····	二五
七 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	二七
八 過渡的與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	二九
九 帝國主義與中國農村經濟·····	三〇
一〇 農村中之階級的分化·····	三三
一一 中國的農業危機·····	三八
一二 土地問題與各階級·····	三九

第三章	中國行會手工業的命運	四三
第四章	手工工廠的發展	一〇一
第五章	家庭工業與手工藝	一四三
第六章	中國大機器工業的發展	一五七
第七章	中國產業發展的指數	二一七
一	戰後工業危機的來源	二一七
二	煤炭工業	二二五
三	五金工業	二二九
四	礦工業	二三五
五	電力的設置與工業化	二三八
六	紡織工業	二四一

七 絲織工業·····	二四七
八 幾個間接的指數·····	二五三
九 中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地位·····	二六一
十 最近的前途·····	二六五

第八章 世界經濟體系中之中國·····二八一

一 中國爲一潛伏的市場·····	二八一
二 中國爲銷售市場與原料泉源·····	二八三
三 中國爲資本輸出的範圍·····	二九四
四 中國的國際債款·····	二九七
五 開採工業中的外國資本·····	三〇二
六 輕工業中之外國資本·····	三〇八
七 中國的利息率·····	三一二

八	中國的壟斷·····	三二五
九	中國的利潤率·····	三二三
一〇	在中國的外國銀行·····	三四六
一一	列強在中國的利益·····	三五〇
一二	從中國輸出勞働力·····	三六〇
一三	中國貿易業及支付的比差·····	三七〇
第九章	城市與鄉村·····	三八一
第十章	中國革命的前途·····	四一三
一	帝國主義侵入前的社會結構之特徵·····	四一五
二	資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對於中國是無意義·····	四二三
三	普魯士發展的道路在中國不能有地位·····	四二四
四	基瑪爾發展的道路對於中國不可能·····	四二八

五 中國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	四三一
六 目下的中國.....	四三四
七 中國唯一可能的道路——非資本主義的發展.....	四三九

「互助合作生產方法的特徵」

「于國家所有適用一種制稅制個人地租採取一種賦稅的形式」

「分隊多數合作社都是各自獨立的小社會」

「所有農業社會事業的承擔者水利的專家者統帥着那些各自獨立的小社會再制及權使由此形

第一章 中國農村經濟

第一節 中國的農業區域

從農村經濟生產的前提出發，按照一般的及概略的特點，中國可以分成以下的區域：

一、華南及華中。這些區域之農業生產的重要前提是水之供給的人工調劑。這些地方若沒有人工灌溉，則農村經濟便不能存在，因為雨水不能充分保證對於一般重要農作之通常發達之水分需要。這些區域中主要農作物是米。米是主要的食物，比之世界上其他各國之用小麥、燕麥、大麥、玉蜀黍更多。米在其成熟上需要多量的水，比之任何一種農作物需水都多。人工灌溉之必需是以農業區依傍江河湖沿為前提。人工灌溉之必需是以灌溉系統之建立為前提。而灌溉系統的建立，又只在獲得中央或省政府、農村公社、大企業之贊助才能實現。

在水源私有的條件下，人工灌溉之必需將水租範疇包括於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的研究中。同

時，「土地資本」具有特別的意義，是結合於土地上的長期工程的（運河、水池等等）。這些工程本屬於基本的資本範疇，但此資本之利息則落於地主之手，甚至，灌溉系統由於國家與社會在農村經濟生產中合作的結果之場合下亦歸地主所有。在土地私有與已發展的商品貨幣關係——已有農村經濟生產品之中等市場價格的形成的條件下，人工灌溉之必需對於等差地租形成之影響極大。地質之好壞及距市場之遠近，以等差地租觀點看來有極大之意義，距水源之遠近及取水之便利與否亦復如是。至於水，其質量對於植物之肥力及化學成份亦應計算到。人工灌溉特別適宜於綿密的低平土地，而在山地及丘陵區域甚至高原中則遠不一樣。低平地及高原地因為土地資本範疇，亦即固定資本。以土地而論，農業區分佈之基礎在於傍近江河湖沿；以水而論，中國的江河以其天然的及地理的條件有異常迅速的變動，依照農村經濟的觀點看來，調理河流以及與洪水鬭爭——治水——具有極大的意義，因為在中國洪水常常為害於農村經濟。在調理河流及治水的工作中，中國的國家有一個很主要的公益機能。調理河流及預防洪水工程的設立，築堤、築堰等等都須國家自覺的去作。沒有這個，便不能保證農村經濟之年年豐收，甚至沒有這個，統治階級便不能保證年年的剝削。

人工灌溉是一方面，氣候及地理條件是另一方面，因為如此，中國各地的收穫便不同，有的二收（華中）、三收（廣東），有的地方則一年四收。米及其他農作物之早熟成爲華中及華南農業之特點。濕地，即灌溉地爲此種農業之基礎。旱地，即非灌溉地則只有一收。收穫對於地租當然有影響。人工灌溉既提高收穫到二三次，則地租當然亦隨着提高。耕地收穫之一、二、三及四次，是與地租之高低相適應的。地租高便鞏固了地主階級之經濟的、甚至政治的權威。

人工灌溉既爲農業生產之重要條件，那麼，在某種社會關係之下，水權關係往往會改變土地關係。灌溉系統及水源在一個地方成爲國家的財產。在別一個地方則成爲農村公社的財產。多數情形，灌溉系統及水源是爲地主所有。有的場合，也有個別資本家、股份公司及合作社以有限責任，組織灌溉的。在有些地方，城市的有勢力的人就是灌溉的組織者。有時，僧院佔有灌溉系統。近來省政府及公共委員也幫助創立灌溉系統。有時灌溉系統屬於合作社。灌溉系統所屬之人，亦即水源所屬之人，問題是在誰人收集水租，——是國家則爲稅，是地主、資本家、股份公司則爲地租，或者農村公社則爲役，或者維持灌溉系統的租稅。

二、華北（河北、河南、山東之一部，安徽、山西、陝西）爲一特別區域。此區之基本特點

是其森林地帶及從森林品質上所產生的特性。森林不僅是非常之豐饒，而且是一種自熟的地產。但森林品質之優良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才能表現出來，即是如果有多量雨水經過毛細管的作用能夠保證下層土壤與地面之適當的溝通。在過去歷史上，氣候條件是否保證了森林區以必需的雨量這一問題，尚是一個爭論問題。但無可爭論的就是不僅現在，即最近數十年來，甚至一百年來華北的雨量是異常之不充分，落雨異常之不規則。因此，在這些區域中，人工灌溉也就成了必要。自然華北與華南比較起來，人工灌溉的作用要輕得多。

然而，森林不僅是自熟的地產。同時，森林是非常鬆動的地產，非常容易洗滌的地產，能夠在河之兩岸保留着粘土。這是說明在森林區中與洪水鬪爭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和意義（黃河）。在森林區中創設防備洪水的建築乃為農村經濟再生產及不間斷之特別重要的前提。

同時，森林區的特點命定了森林區之道路的敷設和保持是異常的困難。

在森林區中，堤和堰之建築和保持，或者道路之建築和保持只有廣大的合作才能達到。

對於森林區域的特點，不是稻，而是稷、蕎麥、高粱為其基本的農作物和基本的種植物。

森林之自熟的性質註定在這些區域之中，肥料在通常的氣候條件之下，并不像在中國中部和

南部起着那樣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氣候變遷時，則肥料仍成爲開發農村經濟的要素。

在華北，一塊耕地，一般地通例是二年三收。

三、滿洲與內蒙古。按照牠們的氣候和地質條件而言，都可以說是一個特別區域，而與蘇聯

遠東頗爲類似。灌溉在此地只對於某幾種特別農作物（米、桑樹）起着作用。主要的農作食品是高粱和小麥。主要的農作商品是黃豆。

四、新疆——中國的土爾基斯坦。這是一個沙草經濟區域。在此區域內，土著的沙草經濟與遊牧經濟相結合。灌溉制度在此地起着極大的作用。爲使灌溉的水道不至閉塞，常常將牠引導到地下去。

第二節 中國農村經濟的特點

一、中國農村經濟之重要的特徵就在於全國之決定的區域中都必須自覺的調劑水利。我們已經簡略地說明了社會經濟的後果，是由中國社會制度和歷史發展的過程產生出來的。

二、一方面與相對的豐收（人工灌溉之結果）相連系的，另一方面與一塊耕地在一年中之二收

或三收相連系的肥料，在中國農村經濟中實起着特別重大的作用。爲要達到肥料的目的利用一切廢物，人類的糞、尿、灰土、柴灰、葦、樹木、畜糞、豆餅等等。礦物肥料只起着細小的作用。設法改善土地的貧瘠是中國農民之主要的任務。卓越的巧妙的播種法之應用，集合含有窒素的農作物——污穢的農作物之應用，都是爲了達到此種目的。

三、除掉中國幾個特別區域（蒙古、山西的回民區，陝西、雲南、新疆）畜牧并非中國農村經濟的特殊部門。僅僅只有牧豬和養雞較爲重要，但就一般和整個地說來亦只起着次要的作用。肉類和乳類不是廣大人民之食物。毛和皮不是廣大人民之着物。牛乳經濟，正確地說是沒有的。牧場、獵場沒有起着重要的作用。北方的馬、驢、騾，南方的牛、水牛、野牛都是主要的耕作獸。此外，在地方的運輸上，牲畜的作用，相對地說并未佔着重要地位。

四、雖然，一般的和整個的都正確的採用播種法，雖然一般的和整個的都正確的使用肥田料以肥土地，但中國農村經濟之生產工具仍是異常落後。農村經濟的生產工具都是陳舊的原始的。農村的犁尙不會爲新機器犁所代替。僅僅滿洲的幾個主要區域採用了新犁。農業化學很少使用。灌溉工具多半是舊式的輓轆。同時，在埃及、印度、南洋羣島、日本、高麗等地方則已建立了新

的灌溉系統，使用大機器，而在中國仍是使用古舊的工具。同時，在埃及、印度等地方人工灌溉的過程是利用新機器、水動力、電動力、煤發動機，而在中國多半仍是使用古舊的技術、舊式的灌溉器具、人力車輪，僅僅只有長江兩岸有二三地方採用電力發動機取水。同時，有些專門的農業手術——如灌溉、播種、收穫、污穢農作物之滌滌、肥田（不是肥田，而是肥植物）——要求大量的手工勞動。甚至在交通上亦採取大量的人工勞動（苦力）。耐勞乃為中國農村經濟之特點。

第三節 農業危機的根源

現在中國農村經濟存在着極深刻的危機。農村經濟的生產力不是增長，而是衰落，再生產不是擴大，而是縮小，以致農業一落千丈。這是對着中國本部而言，至於滿洲和內蒙古則不然，在這些地方現在正是加重殖民地化的過程，耕地擴大，生產力提高，雖然在某些省份（奉天、察哈爾、綏遠）已經開始了衰退的過程。危機的原因可以歸結如下：

一、隨着內戰而發生了國家機關的解體，隨着軍閥戰爭而發生了各省政府的解體，并且同時也盡量地發生灌溉系統的解體與瓦解。地主、官僚、高利貸者、將軍們霸佔着水源，并以之作爲

剝削的工具。有時農業生產繁盛之區一朝變爲澤國。灌溉之區一朝變成旱地或澇地，或者完全不能耕種。耕地和收穫逐見減少。隨着農民的流離失所便是農村公社或血族公社之完全喪失了灌溉組織的作用。舊的灌溉系統瓦解了，新的尚未建立起來。

二、在城市與農村之間，不等價之交換的市場關係更其尖銳的擴大和加深了。城市以不等價從農村中吸取大量的農業生產品。同時盡量地擴大對外商業，以致農業生產品更其大量地爲國外市場所吸收。雖然最近數年來，食品（米、麥粉、小麥）的輸入增加不已，但拿中國全部對外商業的平準看來，農業生產品的入口與出口都是被動的。中國把自己的豐饒土地出賣。中國農地的減少更其增大了。改良土地荒蕪完全沒有進行。礦質肥料的入口和生產并不能抵補這種種損失。許多區域正經過土地荒蕪之急劇的過程。以前肥沃之區現在也變成了荒涼之地，地租、捐稅、高利貸、商業都是損害農村經濟之生產力和收穫的。

三、中國境內（除掉滿洲、湖南的南部、福建及四川的西部）森林的絕滅在全世界上達到無可比擬的程度。這說明耕地不僅要供給民以食糧，不僅要供給住民以衣着，并且還要供給燃料。國內森林的絕滅引起了氣候的變動，及雨水降落之不規則。森林的絕滅，一方面促成經常的旱魃，

另一方面招致洪水氾濫。全國森林的絕滅加速了土地的通氣和洗滌，並且在多雨的場合容易招致水災。森林的稀少或完全缺乏，以至家庭工業的建立，農業工具的生產非常困難。以農村經濟發展的觀點出發，全國造林是重要任務之一。而造林是以大資本的投入、廣大的合作、森林的儲藏和保護為前提，——一言以蔽之，這個任務的實現，僅僅只有中央或省政府的幫助才能達到。個別的經濟或個別的社團都是無力解決造林問題的。而且大地主資產階級政府并不曾注意關於全國造林問題。

四、牧場及水漕的缺乏，以致根本上用耕地飼養耕獸。耕地的零碎和分散，以致牲畜的使用極不經濟。肉不是大量的食品并且拿來屠殺而不使用的牲畜，大多是已經無用的牲畜而與壯健的牲畜分開飼養的。於是發生牲畜退化的過程。在游牧區域中交換關係的發展引起了牲畜流行病的傳播。要想預防這種流行病，僅僅只有國家自覺的干涉才有可能。地主資產階級的國家對於這種社會公益機能並沒有很好的和有計劃的來執行。

五、交換關係及商業技術農作物的發展引起了各種時疫和植物病之廣大的傳播。預防這種種災害和時疫的流行，同樣要有廣大的集體活動。由於蝗蟲和豆蟲引起天災一天天的擴大，蠶生病

便會損害養蠶業。即是在想改良種子的那些地方，植物（棉花、落花生）也是很快地生長起來。在這些區域以內，農業佔優勢在今日的中國尚談不到。

六、全國主要的農業區域，都是分佈在江河的兩岸，河的調理及預防水災的建築之創立與維持，隨國家的分裂而愈趨於破壞。每次遇上水災，總是蒙了不少的損失，破壞了灌溉系統，使廣大的區域成爲澤國。

七、天然的窮困加倍了。難民帶有廣大羣衆的性質。過去，國家、各省及公社都建有大倉庫，儲存許多糧食以備災荒。這種倉庫由官吏保管，在飢荒時，官吏、高利貸、投機家以此作人工的調劑糧食價之工具，而獲到大利。倉庫制度趨於破壞了。因爲交通之不甚發達，以致往災區運糧極其困難。飢荒不僅毀滅人類的生命，而且也殃及於牲畜，甚至往往發生這種情形，即許多農戶沒有方法進行新的播種。飢荒的結果，以致大多數的區域越出了農村經濟的常軌，耕地成了荒地。

這些農業危機之事實的根源，當然不是從自然條件中，而是從中國之社會關係中找出來的。

第二章 中國土地制度

我們既不承認中國官場統計的價值和可靠，所以也就不想去分析那種官場統計。一切統計材料、一切觀察、一切農民運動的經驗、一切革命教訓都證明，土地問題是中國之最根本而且最主要的問題。

操在地主手中之全部土地，在華南各省約佔六〇—七〇%，在華中各省約佔五〇—六〇%。在河南與陝西約五〇%，山東約佔三〇—四〇%，湖北約佔一〇—三〇%，所有這些土地都是地主的私產。在滿洲與內蒙古，地主的土地約佔各省全部土地之五〇—七〇%。

我們不預備在這裏對於土地分配是否封建殘餘的問題，以及對於一般中國歷史上的社會制度之爭論問題作詳細的敘述。我們以為，專就中國本部各區而言，地主和農民間土地的分配不是封建制度的殘餘，即是商業高利貸資本對於農民土地之影響的結果。一般說來，地主依其歷史和社會的淵源看來并非出身於封建主，如像在歐洲許多國家中過去和現在所有的那樣。商人、高利貸

者、官僚、紳士既已掌握了農民的土地亦即成爲地主。這絕不是抹殺中國歷史上的各時代（例如宋、元、明之朝統治的末葉）在中國所發生之封建轉變的過程。這絕不是說在滿清時代，在中國本部的其他區域不會創造過純粹的封建關係（旗地）。這絕不是說在現在中國本部的其他區域沒有存在封建關係，或者沒有發生封建轉變的過程——封建關係形成的過程。在蒙古區的內蒙古就存在着封建關係，亦即發生着封建轉變的過程。封建關係在許多部落——原始住民中間頗佔優勢。但就中國本部各區而言，土地的分配與其說是封建殘餘，無甯說是商人、高利貸者、紳士、官吏對於農民的土地之殘酷的掠奪。僅僅在中國本部的其他區域中可以指出土地分配中之封建關係的殘餘。如像歐洲那種將農民束縛於土地之上的封建農奴制的關係，并不起任何嚴重的作用，并且也不是現在甚至過去土地制度之主要的基礎。

然而，這絕不是說在中國土地制度中沒有資本主義前期的殘餘和遺跡。反之，我們認定，在中國土地制度中同樣有前期社會形態——封建制度延續的歷史時期——之固有的殘餘和遺跡。同時，這絕不是說在中國的佃租關係就是資本主義的關係，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係就是取得絕對地租和等差地租的地主與取得利潤的佃農企業家——取得自己資本的利息和企業所得并剝削那爲他

所支付工資的僱傭勞動者的企業家——之間的關係。恰恰相反！我們認爲，列甯關於半封建關係的定義可以全部的和充分的應用到中國佃租關係上去。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敘述之下，在農民崩潰的過程中只有極少數的佃農分化爲佃農企業家。

對於土地所有權和佃租關係之形式和內容的具體分析，都須整個地和充分地來確定我們的概念。

第一節 土地所有權

假使要來考察一切土地所有權和土地的佔有形式，那麼，可以將中國土地所有權分成如下的形式：

加冕地，屬於過去清朝的。這種土地在滿州里還存在。牠的比重是極微弱的。

皇命領地，屬於皇帝宗室的。這種土地現業已取消。

旗地，屬於勝利者的滿族。在這種土地上，勝利者的滿族與中國農民——直接生產者——之間的關係是純粹的封建關係。滿清的旗地在中國本部業已取消。旗地在內蒙古與蒙古區域內尚有

極大的意義。在那裏已經形成了，或者在蒙古王侯一方面與佛教的寺院之間，另一方面與衆人的牧畜業之間正在經過封建關係形成的過程。

寺院土地，屬於佛教寺院，間或屬於道院，這些土地經過許多佃戶和副佃戶，或者直接地租佃給農民。

機關與書院的土地，屬於各機關和各書院。在此地的關係也和寺院土地上的關係一樣。國有土地，屬於國家。這一類的土地是：尙沒有人耕種過的荒地；由河水氾濫或灌溉系統的破壞而形成的蘆草地；由河岸泥土的堆積而形成的沖積地。

公社土地，屬於個別的農村公社。在這種土地上收穫燃料、乾草等等。屬於這一類的有：古代廟宇的土地，屬於古代的祭祠和神廟，這種土地由於出佃而獲得的收入在名義上是用作保護祭祠、神廟，或者作為維持農村公社的費用，而實際這種收入盡為紳士所攫取。

宗族或氏族的土地。這種土地在華南各省（廣東、廣西、福建、貴州）起着極重要的作用。這種土地屬於各個宗族。這種土地不僅出佃給族間的人，并且也出佃給族外的人。土地的管理權形式上是操在宗族會議的手裏。這種土地的收入形式上應是遂行宗族一般的目的（維持學校、維

持道路，宗族祭祀、補助族人、維持宗祠、維持灌溉系統等等）；實際上宗族土地的收入是爲紳士所霸佔。

土人的公社土地。土人在有些地方還保持着宗族的所有權，或近似公社的所有權。在許多場合，土人保有封建的關係，甚至有些地方還保有奴隸所有制的關係。

軍事的屯地。這種土地僅存在於西南邊境，戍邊的官吏或士兵可以自由墾植。

祖先祠堂的土地，屬於個別家族或宗族，是預先指定用以維持祖先祠堂的。

私人佔有的土地，屬於地主或農民。

私人佔有的土地是一切有用的和可耕種的土地之最大部分。一切土地所有權的種類在與私人佔有的比較中僅僅只有氏族土地（在南方）和旗地（在內蒙古）起着相當重要的作用。

然而我們看見，私人佔有的土地並不是在其純粹資產階級的形相中顯示出土地所有權的特殊面目，——在中國許多部分，私人土地所有權都被各種資本主義前期的殘餘和遺跡所蒙蔽。就我們知道的：

一、共有土地在華中許多省份中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共有土地之下，地底屬於地主，

豐饒的地面屬於農民——副佔有者。地主和農民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生產物。這個比例不僅在各別地方有變更，甚至在同一鄉村中也有不同；

二、永佃制在華南許多省份中有莫大的意義。在永佃制之下，地主取得收成的一定部份，但沒有權利將佃戶從土地趕開。佃戶有權利轉佃或出賣自己的租佃權。下面的情形也是私人土地所有權的一種限制，這就是在中國許多部份中，存在於土地買賣領域內的習慣——

a. 以無定期取贖之取贖權出賣土地；

b. 以定期取贖權出賣土地。

一切這些土地所有權之資本主義前期的形式，及一切私人土地所有權的限制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雖然一切這些所有權形式的資本從屬於其自身。但對於資本主義關係自由發展之基本障礙是包含於農民與地主間土地分配之中，是包含於佃租關係之中，這種關係即由地主土地之歷史發展的行程中創造出來。地主從大多數的佃農身上榨取地租，不僅是從租金的字義本身榨取，并且也吸取資本利息，甚至吸取企業家所得和一部份工資。

第二節 佃租關係

中國存在着各種形式的佃租關係和各種形式的地租。

勞役地租起着比較不大的作用。在地主與代種者間的關係中，還存有勞役制的殘餘。按照季節，在建造或修理房屋或其他工作的場合，佃戶須在地主家裏義務地工作幾天（每年中三天到六天）。在滿州金和內蒙古之殖民區域，當田野工作猛烈而感受工手缺乏時，勞役便有極重大的意義，在每年中有時達到六〇—七〇天。

生產物地租是中國地租之主要形式，就常情而論，牠達到全部收成的五〇—七〇%。牠不僅僅限於主要部份，往往徵收到全部收成。此外，佃戶還須義務地將其經濟的副產物（鵝、菓子、蔬菜、魚、肉）致送若干給地主。生產物地租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能夠掩蔽資本主義的關係。如果佃戶在有中等的市場價格和存在中等利潤率之下，以自然生產品支付地主以地租及支付工人以工資之後，還剩餘多量生產物隱蔽着利息和企業所得，那麼，生產物地租，依其經濟內容來說，可以掩蔽資本主義的關係。在美國、法國，生產物地租多數場合は依其資本主義之內容的。

在中國，生產物地租與資本主義內容的比重極其微弱。多數場合生產物地租就是奴役地租，顯示着資本主義前期的佃租關係，隱蔽了苛刻的佃租，暴露了從貧困而來之一切佃租的特點。如果應用「累積年租」(Years purchase)一概念(這概念是說經過若干年包括着地價的地租)到中國，那麼，在中國「累積年租」正相當於五——二——一六年，就像在英國「累積年租」表現二〇——二五年一樣，生產物地租及特殊的奴役地租在中國都隨着「共有土地」制、永佃制、分地的品質和位置、灌溉的條件、以及階級及力量相互關係等等的不同而表現着無限的參支。晚近以來，開始盛行一種所謂生產物之「固定地租」。在固定地租之下，完全不管收成如何，須付出一定量的生產物作租金。這種制度多數是與押金聯系着。在押金制度之下，佃戶必須拿一定額的貨幣作為支付固定地租的保證。

貨幣地租視為生產物地租之轉變的形式。照着商品貨幣關係發展的程度，在專門化的農業區域中，主要當着價格表示低落傾向時就開始盛行這類近於城市的地租形式。貨幣形式并不限定地租之經濟的性質和內容，如像資本主義的地主那樣，在貨幣形式中，地主從佃戶身上不僅收取地租，并且收取利息，如有可能，還得剝奪一部份工資、地租，依其內容而論，尙是資本主義前期

的。這類地租形式往往與押金制度聯系着。

分收經濟。地主預先供給佃戶一部份固定的或流通的資本（農業經濟的工具、牲畜、種子、肥料等等）佃戶自己有一部份資本。收成依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地主除地租之外還取得與自己資本相適應的一部份利潤。這種佃租關係的形式是達到資本主義關係的過渡形式。在滿州里是特別廣佈。

資本主義的地租。佃戶僅僅支付地租，而資本的利潤則留給他們。在這種場合，佃戶便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企業家。在中國，資本主義佃租的比重非常微弱。富農多半起着出佃土地的作用，起着租佃土地之企業家的作用的很少。一般的地租形式通常是以剝削僱傭勞動為前提，在那裏佃戶企業家自己可以參加生產行程。

這種租佃關係的形式，在中國以各種各色的形態存在於無限的變革和極參差的結合之中。

奴役僱工制，是一種變態的租佃關係之特殊形式。僱農組合「租佃」土地，地主供給他們以全部固定和流通資本，并須先供給僱農一定量的生產物以維持他們的生活。在僱農組合收穫之後，就在所應取得的工資中，扣除收成的一部份以清償預支費。然而，這類地租與其說是租佃的關

係，無甯說是僱傭勞動的關係之爲愈。

代種制是租佃關係之主要的而且優越的形式。

在地主與佃戶的關係中間尙混雜着許多資本主義前期的殘餘：

在歉收場合下的減低租金乃是資本主義前期的「家長制」之殘餘。

超經濟的勒逼，也起着顯著的作用，在許多省份（廣東、江西）中存在有懶租的佃戶的監獄。

地主有自己的民團（鄉村警察），如果佃戶不支付佃租，民團便殺戮他和拘捕他。在租金遲繳的場合下，地主同樣要禁押佃戶的子女或妻子。

負債的佃奴制在許多省份（廣東、山東、土人區域內等等）中同樣佔有地位。直接生產者與生產的土地和工具一樣，彷彿就是地主的財產之一部份；地主供給他爲困苦生存所必需的收成之最少部份。這與租佃關係頗相類似，負債奴隸只去管理經濟，而不寄居在地主家中。在四川西部各區所保存的那種奴隸，就像古希臘的與羅馬的 *Peasantium* 一樣。

存在於中國幾個特別區域內的收割窮人的麥穗權，同樣是資本主義前期的殘餘。

第三節 農村經濟中的僱傭勞動

隨着富農經濟的發生而表現出來的生產工具的落後，農村經濟的特殊性，各種專門化的農業技術（灌溉，各種植物的肥料，米的播種，茶、棉花、桑葉等等的採集）以及農民的瓦解都是以中國農村經濟應用多量的僱傭勞動為前提。農村經濟的工人可以分爲三個種類：

固定的僱工，通常是按年受僱，靠主人的食糧養活，收入的大部份是自然物的貨金和小部份貨幣形式的貨金。在固定的僱工中間有不少負債奴隸（印度有六百萬以上），這種負債奴隸就其性質而言不能算做工人。

季節的僱工，是按一—二—三—四月受僱的。

日工。在按日工作中剝削大量婦女和兒童的勞動。

在農村經濟勞動緊張的時節，往往不僅中農，甚至連貧農也應用僱傭勞動進行各種活動，同樣的不僅貧農，如果可能，就連中農自己也以工人的性質受僱。應用僱傭勞動，在中國的條件下并非一定是富農經濟之無條件的標誌。鄉村貧農甚至一部份中農份子都會在工資的形式中儲蓄自

已收入的一部份。苦力應當看做特殊的種類；這種苦力主要是從事於運輸，但他們是以夫役的性質而出現。

第四節 農民之賦稅的剝削

凡仍舊保持農民的所有權的地方，那裏便以捐稅榨取的方法代替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中國從來就附屬於純粹東方的暴虐政治，那裏國家可算做地租的最高所有者，那種捐稅與地租是一致的，即是說那裏不存在與土地地租形式相差別的任何捐稅。在中國，這種關係似乎不會崩潰，似乎土地的私有權并不堅固，在土地佔有者對農民的關係上，地稅主要是與地租一致，地稅在經濟上與地租有同一的內容，因為地主資產階級的國家是以土地的最高所有者的資格去搶奪地租的。國家的瓦解和分裂、內戰、軍閥制度在最近期間既加深了這一問題，同樣在過去和現在租賃上的交納捐稅制度也是加緊了這問題的。

在印度的某些區域內，在那裏英國的勝利者曾經創造出一副農民所有權的諷刺畫，同時還保存了這樣關係的殘餘，即在這種關係之下，國家是代表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地稅在中國許多省份

中一年總是徵收的幾次，依其經濟意義而論，甚至高過於地租。

與地租一起的，農民同樣受着強迫勞動方法的剝削。在過去對農民的強迫勞動，主要的是用以築堤和造堰，以及對堤和堰的保護，創立灌溉系統，進行社會工作（運河、長城、道路）。現時的強迫勞動，頗為特色，是用作軍閥軍隊的勤務兵。把農民拉到軍隊中去，為的是拖曳包囊、輜重、武裝、軍火。

壟斷（鹽和鴉片烟）及勒種烟苗同樣可算做地主資產階級政府對於農民剝削之一種。無數的錢糧、消費稅、印花稅等等，歸根結蒂是架到農民身上。在這種鴉片栽種，甚至在勒逼耕種和對鴉片壟斷之下，南京僅僅只限於口頭上廢除。

維持軍閥和軍隊的自然品貢稅，維持軍隊的牲畜之徵收，同樣起着極大的作用，特別是在發生軍事行動的省份內。

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及政府在他們身上所榨取的租稅，無疑地是資本主義前期的剝削方式。

第五節 農民之高利貸的剝削

高利貸資本在中國鄉村生活中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這種資本差不多經常地以各種各色的形式與商業資本結合着。商業高利貸資本破壞農民、小手工業者，但往往也破壞到地主。從另一方面，地主往往同時起着高利貸者的作用，恰如商人和高利貸者往往起着地主的作用一樣，亦即同時成爲地主。

高利貸的利息依地方和時間而有差別；從二四%——二〇〇——三〇〇%不等。高利貸往往由高利貸債務之自然品形式而更加煩苛。這在商業技術農作物方面大有特殊意義。這方面的高利貸往往與特種的高利貸結構交相錯綜和結合起來。在特種農作物的栽種條件下，高利貸者借債給農民，而生產物須與事先所約定的低價出賣給高利貸者。恰恰是這個握住了貧農經濟（中農經濟也不少）的高利貸窒塞了農民進到城市市場的出路。高度的捐稅、牲畜的流行病、天災、人禍、祭祀、歉收、徵發——所有這些情形都是縮小了經濟之通常的再生產，而將農民推到高利貸者的掌握之中。同時，與城市中的錢莊和當舖一起動作的獨立高利貸一樣的鄉村中的獨立高利貸者是居第一位的。

外國資本在鄉村中往往起着與商業高利貸資本同樣的作用。茶商、棉商、絲商及一部分烟商

即是實行着這種手段。外國銀行幫助外國商人，外國商人幫助中國城市商人，城市商人經過許多仲介人而幫助鄉村商人，而鄉村商人則將高利貸的結構與農民生產者牢牢地啣接起來。高利貸是土地集中到貨幣資本家手裏之最有力的槓桿。與地主、商人、官吏一起的富農同樣也起着高利貸者的作用。

第六節 農民之商業的剝削

中國的農村經濟已經不是自然經濟。中國的農民立於主要商品生產者的地位，他的經濟立於主要商品貨幣的地位。按照我們審慎搜集的著名的材料，農民經濟的商品性任何地方都不低於四〇%。農民出賣自己的生產物於市場不少於四〇%，並且在市場幫助之下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少於四〇%。不管中國的運輸如何不發達，但在栽種部門上之各區的專門化，依栽種部門之全國的地方化，境內農業勞動的分工是可以觀察到的。就已有的而論，有棉花的種植區、茶的栽種區、烟草的種植區、桑樹的栽種區、落花生的種植區以及各種油子等等的區域。滿州里在大豆的栽種上已是專門化了。非常明顯，這在主要的尺度上助長了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雖然有許多地

方在整塊或部分的土地上由於兩倍和二倍的收成給了食品的栽種與商品的栽種以可能的劃分。在專門的栽種區域內，農村經濟的商品性達到六〇——七〇%。不待說，貧農及富農經濟比起中農經濟來更帶商品性。

然而，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是在積壓着資本主義前期殘餘的土地制度的條件下，高利貸資本大量發展的條件下，運輸不很發達的條件下，各地市場間不甚聯繫的條件下，及帝國主義統治的條件下而發生的。這就是說，鄉村市場上的價格，依照每年的收成而有非常強烈的變化、高漲以及低落。這就是說，鄉村市場的價格，依照每年的季節有非常強烈的變化（在收成之前價格之猛烈的提高，收成之後價格之猛烈的低降）。由於這種種情形，結果在鄉村與城市的價格之間夾雜着極大的參差。由於這種種情形，結果在運輸、捐稅、消費稅、印花稅及一切其他錢糧上的耗費構成了農業生產品的大部份價格之不平衡。同時，由於運輸、捐稅等等的耗費，以致從城市供給到鄉村的工業製造品的價格之過度的增大。在這裏還應該加上，鄉村以地租、捐稅、高利貸利息的形式讓與城市的農村生產品的主要部份差不多沒有一切的等價。此外，城市的商業資本組織商會，按照散漫的農民經濟關係訂立種種價格。所有這些情形、從農民的立場看來尙是受着高利

貸的重荷。

所有這一切情形，說明了商業利潤之極大的高度，及農民在商業利潤的形式中所受的剝削。

地租、捐稅、高利貸利息、商業利潤，——所有這些乃是對於農民經濟剝削之基本的諸形式。這些剝削方式，不待說，依照多種形相而落到各等級的農民頭上來。富農，他如果租佃土地，也得支付地租。在國家機關的貪污之下，捐稅是倒行逆施的。富農支付的捐稅比較貧農少得多。高利貸是打擊貧農。富農自己也可做高利貸者。富農有可能居奇自己的生產物以待高價，貧農不得不緊接着收成之後的低價中出賣自己的生產物，而在收成前的高價中購買食糧。

此外，地租的高度與佃戶的經濟權力成爲比例。我們知道一種事實，即富農爲一塊耕地所支付的租金比之貧農要低三倍。富農支付實際的地租，而貧農則支付義務的地租。

第七節 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

商業和高利貸資本對於農民經濟的剝削在任何種社會主義前期形態之下及任何種社會主義前期生產方法之下都會存在。在亞洲式的生產方法之下，在東方社會之下，國家霸佔了生產物的大

部份。在封建社會之下，地主霸佔了地租。但中國的農民同樣還遭受了資本主義的剝削。與僱農和苦力一塊的貧農和一部份中農份子是以僱傭勞動者、季節工人和日工的性質受剝削的。在鄉村貧農份子的收入上，工資起着極大的作用。

在近代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領域內對於農民的剝削應當看做剝削之新的資本主義方式。供應農民經濟自身消費的舊式農民家庭工業完全崩潰了，破壞了，牠的地位被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所佔據。固然，在中國許多家庭工業部門於太古時代就依市場而生產，例如養蠶業。紡作及棉花紡織品同樣生產於農民經濟之中，剩餘的就拿到市場上去。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幫助了農民家庭工業轉變為近代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及許多的新的家庭工業部門的發展。紡作與織作在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中佔了重要地位。織蓆和縫紉、織草帽和刺繡、絨線手織物的和鈕扣的工業、扇子、玩具、髮網及紙炮等等的製造都是近代家庭工業之最主要的部門。在這下面，存在着家庭工業對於商業資本屈服之一切形式，即是家庭或者依市場而工作，經過仲介人而出賣家庭工業的製造品，或者依定貨而工作，由商人供給符合於定貨的原料及生產機器和工具的資金。工廠及手工工廠的發展，一部份侵害到外國商品的輸入，一部份刺激了家庭工業各個部門的生活。工廠紡品的輸入

及其生產雖然破壞了舊式的家庭紡作，但却給與了家庭織作的發展以推動。織作工業的發展及織品的輸入傷殘了家庭織作。對外貿易的增長給與了扇子、草帽等等製造的發展以推動，但外國的競爭却損害了牠們的生產。外國的需要發展了髮網的製造，而式樣的改變却毀壞了牠。

家庭工業的收入，在鄉村貧農與富農份子的經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八節 過渡的與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

從社會經濟關係的立場看來，以讓渡牲畜及租借農業工具的方法來剝削鄉村貧農份子具有莫大的意義。鄉村貧農，一般說來，不是自備耕獸，而是從地主或富農那裏租借。在各個地方，地主都圈養着許多耕獸，用以出租給貧農。如經濟的衰落和散碎，如牧場的完全缺乏，要貧農對牲畜之合理的利用簡直是不可能。對牲畜的保養同樣非常昂貴。所以貧農還不如去租借牲畜，這已經不是說，他對於自己的經濟不能獲得牲畜。同樣這是對於農業工具而言，而尤其是對於昂貴的工具而言，水車、犁、鎚子、搗米的和榨油的器具以及一般的生產工具都集中在地主和富農手裏。貧農迫不得已，惟有在地主和富農那裏去租借牠們。往往貧農從富農的水井中汲水來灌溉自

己的土地，租借的束縛條件與其說近於資本主義的關係，毋甯說近於高利貸的關係。貧農支付牲畜、工具或水的租金往往是到富農經濟上去服役。

第九節 帝國主義與中國農村經濟

帝國主義在中國設計剝削的機關和方法，便發展、加深和擴大了地主對農民之捐稅的、高利貸的和資本主義的剝削，爲要很好地榨取中國農村經濟，牠必要大批商品。同時，帝國主義盡量地在中國農村經濟中引起了深刻的變化，發展了并加深了商品貨幣的關係，擴大了內部市場。外國或中國資本不會在中國創立何種主要的種植經濟，——這在許多其他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國家中已有地位，僅僅在海南島有過橡皮的種植。種植形式的大經濟（葡萄園、亞麻的栽種）可以說寥寥無幾。

到今日，外資在農業中的深入已成爲固定的障礙，如果將傳教師、日本僑民在疏遠的中東路所估買的土地一概不加計算，那麼，在這關係上外資任何作用都不起了。在滿州里的英國搗米作坊，各種烟草工廠和蒸溜作坊都有土地，并將這些土地出佃給適合於特定作坊原料的栽種和出賣

條件下的農民。但現在是說單獨的場合，而不是說某一些現存的經濟現象。

外國資本對於農村經濟的直接影響如下：

一、外國資本的輸入，引起了罌粟（鴉片！）栽種的盛行。

二、外國資本給了絲業發展以最有力的推動。外國競爭的結果引起了中國絲業之急劇的危機。

三、外國資本幫助了中國種茶的發展，但在錫南、爪哇、日本、印度大規模的茶種植的發展却引起了種茶的衰落與急劇的危機。

四、外國生產品的輸入破壞了，或引起了許多栽種的衰落，例如印度藍及其他染料的植物，甘蔗的衰落，在某些限度內可說亞麻、乾草等等也是衰落的。

五、對外貿易及農村經濟生產物輸出的增進引起了許多農作物之迅速的擴大，尤其是油子。

滿州里的大豆、河南的胡麻、山東的落花生，在某些限度內也可說，滿州里的棉與米都是屬於這類標本的實例。

六、外國（正確地說，也有中國的）工業的發展，幫助了內部市場的發展。在這裏佔有主要地

位的是爲外國資本深入所限制的鐵路的敷設、造船業的發展。這情形推進了農業生產的地方化和專門化，接着便影響了內部市場的擴大。鐵道的敷設，是殖民地化之最有力的因子。

七、農民家庭工業與農村經濟的分立，傷害了或破壞了農民的紡作與織作，轉變農民家庭工業的各部門爲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以及建立新的家庭工業部門是外國資本深入之重要結果之一。

八、以緊縛着中國的戰爭、軍餉的資助、國際借款、關稅攫取、壟斷(鹽)、消費稅(酒，在某限度內烟草也有稅)爲媒介，外國資本便助長了附加稅的增加，并將自然品的貢稅轉變爲貨幣的捐稅。

九、在農村經濟工具的，灌溉工具的，礦質肥料的，應用於改良種子和其他農事的以及比較時式的絲業方法的輸入意義上，外國資本的影響非常微弱。

十、外國工廠(正確地說，也有中國的工廠)消化一定量的勞動力。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僑民，在固定的或臨時的工作上同樣在各省的鄉村生活中有莫大的影響。

十一、帝國主義的影響，引起了中國金融幣制的崩壞、銀價的跌落、無任何保證的紙幣的盛行，及其本身不斷再生產之變態的過程。

十二、以低度資本有機構成的中國農村經濟與以高度資本有機構成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交換，是不等價的交換，因而引起中國農村經濟之巨大的經濟和農事的虧折。

十三、帝國主義鼓動軍閥戰爭和內戰，并由戰爭連帶地引起了破壞和損失。

十四、帝國主義與農民的階級敵人結成政治聯盟以反對革命運動。帝國主義擁護地主、高利貸者、商人、官吏、紳士、買辦以反對農民。

很明顯，我們在此地，僅僅注意了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農村經濟影響之最明顯的徵象。很明顯，帝國主義對於銀行、工業、城市和鄉村手工業的影響，以及在一般上對於城市經濟條件的影響，都直接地從鄉村和農業經濟中反映了出來。

無疑地，帝國主義一部份引起了，一部份加速了中國農村經濟之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在同一時間內，帝國主義却助長了足以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某些因子的建立。

第十節 農村中之階級的分化

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是中國鄉村中之基本的而且決絕的階級的矛盾。

在中國，歐洲式的大地主相對的少。在土地佔有中地主佔優勢。土地佔有與商業和高利貸資本有密切的聯繫。我們在此地將中國土地所有權的發生和發展及其歷史根源問題，完全擱在一邊。這類問題，在過去已經被馬克思當做特殊問題提出過。在現時，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往往合爲一人；地租轉變爲商業高利貸資本；商業利潤和高利貸利息既都投入於土地之中，因而成爲地租的來源。不僅大資產階級，甚至中產階級和一部份小資產階級份子也都與土地佔有聯系着。就因爲這種情形，於是加強了土地鬪爭之極端的尖銳性。就因爲這種情形，我們才預言，在一切城市階級中惟有無產階級能夠領導農民爲土地鬪爭。

無疑地，地主階級取得從農民身上所榨取的剩餘生產物的大部份。但是同樣無可置疑地，在歷史上有過一種國家，在那裏，國家取得剩餘生產物的大部份，中國就屬於這一類的國家，在這個國家內，還保持着這些關係的殘餘和遺跡。我們不會說到，在民族所有權的領域內，族長霸佔了多數族人的地租。但在農民所有權的領域內，軍閥、債主、官吏、紳士和土豪用捐稅的名義搶奪地租。在中國這一類地租的受領者不盡屬地主階級，劣紳和土豪也應當加上去。不是偶然地，中國農民運動的基本口號：「打倒地主、土豪、劣紳」！不是偶然地，在中國農民運動中提出「三

不」的口號——不交租，不納稅，不還債。完全不是偶然地，「改組派」——「資產階級政黨的左翼」於一九二九年的決議案上，關於政綱問題指出小地主「屬於各種各式的階級層；例如，多數的鄉村商人和工業家、城市的小商人、手工業者、知識份子及自由職業者在鄉村中都有土地，即是說他們自身就是小地主。」完全不是偶然地，資產階級之最「左」翼僅僅說要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他們也是絕對的和相對的少！）並且爲要「有限制的沒收」來反對小地主的沒收，而放棄減租的口號。

在土地關係中的資本主義前期殘餘、強盜式的捐稅、高利貸、一部份的天災、徵發以及土匪都足以遲緩鄉村階級的分化。全部中國農民，一般說來，已經化爲富農、中農、貧農和僱農。我們無論拿那一種觀點來研究農民之社會的集團——耕地、不動產和動產、應用僱傭勞動、生產物的分量、收入——這些集團的面目便會暴露出來。我們無論抓住那一種農民之形式的種類——農民私有者、半佃戶的半私有者、佃戶——我們便可在所有這些形式的種類中，發現出農民的四個基本的社會集團。在這裏我們看見，下層社會份子，——貧農和僱農——組成全體農民之最廣大的數量。富農組成農民的最小部份並且是在便利於市場關係發展之經濟的和政治的條件下發展起

來的。我們應當指出一種極端重要的情形，即中國的富農與其說租佃土地，毋甯說是出佃土地、牲畜、家財；中國富農與其說剝削僱傭勞動，毋甯說從是事於高利貸；中國富農與其經營資本主義經濟，毋甯說是從事於奴隸的剝削。階級鬭爭不僅行於地主階級與農民之間，並且也行於農民自己內部。不僅爲地主的土地而鬭爭，並且也爲誰個應得這土地而鬭爭。

農民的僱農和貧農份子的主要部份生活於低下的中國生計之最下等。不管他們的收入之主要部份成爲工資，或者收入由家庭工業和拾荒的職業（搜集廢物和燃料，搬運重擔，在榨油的、製糖的、磚瓦的手工工業上工作，某些地方在漁業上工作及其他鹽場上工作等等）而來，而這些農民份子之經濟上的和社會上的地位，與其說接近於歐洲鄉村中之半無產者份子，毋甯說接近於游民。

在中國鄉村中與這些社會集團一起的還存在有絕對和相對都十分重要的一種社會集團，這種集團沒有私有的或租佃的土地。在這集團中僅僅只有比較不多的份子可以說是屬於在農村經濟中從事於僱傭勞動的僱工。我們以爲，在鄉村無產者的社會集團中苦力的比重較大於僱工的比重。然而除去苦力和僱工之外，還存有十分重要的游民集團，這集團僅僅偶然地作工，按日的作工。

印度這類份子依其統計約在二千二百萬以上。我們不知道，在中國鄉村中養活着多少游民，但他們的數量不一定會少過印度。按照鄉村中工業和資本主義大企業的不發展，對於這些游民除像殖民地移民、土匪、投入軍閥的僱傭軍隊外便沒有其他達到生存的可能。國家工業發展的制動機，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及中國的土地制度，另一方面是其整個社會關係，結果在中國與在印度一樣，無論個別的大城市（上海、香港、奉天、大連等等）如何增大，很難說鄉村人口絕跡和城市人口相對的增加。實際上，在中國由於中小城市人口的減少而發生了鄉村人口之相對增加的過程，如像以前印度一樣，發生了鄉村人口相對過剩的急劇性，城市手工業者跑到鄉村中去，把鄉村的手工業者轉變為農民，一言以蔽之，「對土地壓榨」之增加。這部份地說明了土地價格的非常昂貴，地租的極度高漲，下層份子和農民之經濟的星散和零碎，經濟經營條件的退化與惡化以及種種可怕的窮困和貧乏——在這種貧窮壓迫之下，曾使鄉村窒息不通和深度的危機，這種危機引起了中國的革命。

這種危機的解決，惟有經過推翻帝國主義與現存的土地制度之根本徹底的破壞纔有可能。工人階級和與城市貧民聯盟之農民的基本階級便是反對帝國主義，為土地鬥爭之革命的動力。僅僅

工人階級——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的領導者纔能領導這種鬥爭。

第十一節 中國的農業危機

中國在一九二七年有九、〇〇〇、〇〇〇人餓死，在一九二八年有三七、〇〇〇、〇〇〇人餓死，在一九二九年有五七、〇〇〇、〇〇〇人餓死。在這類飢荒中就暴露了由於國家社會關係所引起之生產力衰落及所束縛的中國農村經濟之深刻的慢性危機。在此地我們看見，爲食料的基
本對象之生產物不足的危機。最近幾年食品生產物輸入之巨大的增加便顯示了生產不足之危機的
深度。我們可以在印度、南洋、波斯、土耳其、突尼斯、比利時、法國的寬府以及許多其他殖民
地國家中看到類似的生產不足的危機。我們在從封建制度的生產方法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過渡
的大多數歐洲國家中也可看到類似的爲食品基本對象之生產不足的危機。而類似的飢荒與生產力
的破壞，與幾百萬人的死滅站在同等地位的是農民的離散和瓦解之極端的加速，巨大農民羣衆之
游民化——同時分出稀少的富農份子。在商品貨幣經濟條件下，在中國空前的限度內之反覆的飢
荒加劇了農民分化的過程。

與一九二九年中國食品的基本手段生產不足的危機一起並在和世界農業危機相聯系中便爆發了最主要的技術的和商業的農作物之生產過剩的尖銳危機。這一生產過剩的危機引起了中國輸出之主要對象（大豆、絲、茶、落花生、胡麻、及其他油子等）價格之極度低落。在這裏我們便看到，生產過剩的危機及價格之極度的低落絕不是受中國自己的這些生產物之迅速的增加所限制，而是受世界範圍內，這些生產物的生產過剩所限制。在印度、錫南、爪哇、日本，茶的生產過剩（絕不是在中國的生產過剩），引起了華茶價格之下落。在阿根廷、東阿弗利加、及印度的一部份，油子的生產過剩，引起了中國與此相當的生產物價格之降低。中國絲繭的什物早就佔有地位，但不管這個，在日本、意大利、法國、波斯等地之生產物的增加，便已指明對於華絲價格的影響。因此，中國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的農業危機就帶有兩重性質。全國感受了食品基本對象之生產不足的危機與最主要的技術的和商業的農作物之生產過剩的危機。

僅僅只有這個纔說明了農業危機之尖銳與其深度。

第十二節 土地問題與各階級

在革命和反革命時期當中，十分明顯地表明了各階級對於土地問題及對於這問題的解決之態度。資產階級政黨在取得政權之後，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不會採取任何激進的辦法。即可憐的減租二〇—二五%的口號，制止高利貸的口號也拋到九霄雲外。改良主義之土地政綱同樣也壽終正寢了。在浙江二五減租和在江蘇減低高利貸利息的企圖依從地主商人的要求而停止了。以文治派領袖為主腦的委員會開始依照中國改良主義創始者的土地政綱製成一個土地改良的提案。可是這個可憐的提案也被否決了。土地的重新登記，內地附加稅的厘定，農村經濟信用協作社的創立，進行許多農事上的改善，同樣不會實現一點。如果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十分明顯而又無疑地證明和指出了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夠領導土地革命，那麼，在反革命時期當中也十分明顯而又無疑地證明和指出了中國資產階級同樣不能夠實現土地的改良，中國資產階級地主不僅不會幻想過與斯托利賓相比擬，甚至連與斯托利賓的諷刺圖相比擬的幻想也不會有過。

資產階級政黨的「左」翼——改組派——即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過的，同樣不會提出過關於土地改革之任何激進的政綱。

資產階級之「地方化」，他們在與土地佔有的，商業高利貸的及對農民捐稅剝削的聯繫上使預

先決定了資產階級不但不能採取土地的革命政綱，甚至於不能採取土地的改良政綱。

農民運動區域之有宏大意義的經驗，在事實上，在實踐上都證明了，惟有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基本羣衆能夠爲土地革命而鬪爭。這些經驗同樣證明和指出了富農如果他們是出佃土地和從事於高利貸，那他便不會在爲掃清資本主義前期殘餘的革命鬥爭中與農民的基本階級走在一道。這些經驗同樣也證明了陳獨秀在其意見中關於封建制度殘餘之殘餘的話之完全錯誤，這些經驗和革命的自身進程已經打碎了托洛斯基的意見：中國已經進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階段，富農是農民主要的階級敵人，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已經過去了。

農民運動區域的經驗表明了，農民對地主的勝利之後很快的便開使農民之各個社會集團間的土地鬥爭。富農開始就用依生產手段的比例分配土地的口號來鬥爭，即富農謀保障從前土地使用的標準。而苦力、僱農和貧農便爲着下層分配，爲着手的分配而鬥爭。

農民運動區域的經驗證明和指出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的土地革命自身便已伏着農村經濟向着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上推移的要素。

第三章 中國行會手工業的命運

中國農商部的官場統計斷定，在一九一三年（註一），在二一、七一二個企業（註二）中只有九〇四個企業有一〇〇〇以上的工人從事工作；只有二六一個企業是操在三九、二〇〇、〇〇〇元創辦資本的股份公司裏；只有二四七個企業採用了機械推動機。所有其他企業仍舊是以手工作。

中國的工業統計比農業經濟的統計要好一點。但牠同樣是十分靠不住的。據這些統計，牠儼然斷定在礦業中似乎有二九、〇〇〇、〇〇〇從事工作的工人，這是很明顯地盲目。

中國的大機器工業從一九一三年起得到了重大的進步。在大戰期內及戰後第一年大企業的數目是增加的。增加了應用蒸氣、電力及內燃自動機（即發動力）的企業的數目。恰當世界大戰之年——特別在戰後第一年是中國比較迅速工業化的時期。但是，在全中國勞動聯合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席上執行委員會的報告完全肯定，在中國在大機器工業中工作的有三、五〇〇、〇〇〇工人，而在手工業中工作的有一七、五〇〇、〇〇〇工人。照別種統計材料看來，在手工業中工作

的忽而不到八、五〇〇、〇〇〇人，忽而不到五、三〇〇、〇〇〇人。當然，這些統計材料同樣是不精確，我們甯可將牠當作一種推測。我們可以正確地說，中國比之印度來，產業工人的數量較少，而手工業工人的數量較多。在印度，在一切產業活動的形式中有一七、五〇〇、〇〇〇人，就中只有一〇%的工人是在有組織的產業中工作，即是在每個企業中工人的一般數目在幾十人以上。在印度，在紡織工業有五、八〇〇、〇〇〇工人，而在大機器紡織工業中只有三一八、〇〇〇工人。我們有一切根據假定，中國手工業工人的數目比之印度產業工人的數目在比例上要絕對的大。其實，印度大機器工業（紡織的、蔴苧的、煤炭的、開採石油的、鐵器的、製鐵的）較中國為發達；並且外國工業品輸入比之中國來也是絕對地和相對地多。很明顯，手工業生產物和大機器工業生產物之間的相互關係，并非是由於工人的數目來決定。上海紡織工廠的一個女工比一個在自己家中紡作的農婦所生產的要大過二〇〇——三〇〇倍。這個問題是為資本的有機構成來決定的。而在手工業中的資本的有機構成——假如能夠應用這一範疇到手工業上去的話——是異常的低度。（當然，關於資本的有機構成一範疇僅是有條件地應用於手工業上去）。這個也就決定了全國個個工人之低度的勞動生產性，一般的社會勞動之低度生產性以及勞動羣衆之低度的

以範
範疇
決定
去處

生活水平，在那裏工業生產很特色地由手工業者來履行。在手工業中的資本的有機構成比之在農村經濟中還要低下，因為在農村經濟中單純的自然力的作用也和人類趨於同一傾向。馬克思對這問題會寫道：「在一般場合應該懂得，在不發達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下農業比之工業來是更能生產的，因為在那裏自然界也和機器與器官一樣參加工作，當着自然力在產業中大體上被人力代替了的時候，例如在手工業的產業中等等。」（註三）

各國和各個生產部門之基本的和經濟的相互關係是由於資本的有機構成來決定。英、日、美或任何的帝國主義國家，與中國兩方面之間的交換乃是不等價的交換；因為在英、日等等國內商品中物化較少的中等的必需勞動時間，即是比之中國商品來物化較少的社會的必需勞動時間。當着農村經濟中的資本的有機構成比之在工業中來更其低度的時候，那農村經濟與工業間一切交換都是不等價的交換。同樣，在手工業中的資本的有機構成比之在農業經濟中更其低度的時候，那麼很明顯，手工業與農村經濟間的一切交換都是不等價的交換，如果手工業者不採取超經濟秩序的種種方法來平均社會必需勞動時間之消耗的差別。這個在中國更其必要，那裏在農村經濟中的資本的有機構成不僅因為單純的自然力的作用而提高，並且也因為由於灌溉系統的，排水建築物

的，測量土地的高低等等形式，併合長期的資本於土地而提高起來。明顯地，在這後者之中，便已包含了行會制度發生的原因之一和一般產業活動之資本主義前期組織之特性。明顯地，「產業的」即手工業的資本之低度的有機構成更說明了底下的事實，即在一切資本主義前期的社會形態之下要從農村經濟中取得基本的必須分量的剩餘生產物。

我們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讀費爾巴赫論中關於封建時代的城市所說的話吧，「在這些城市中的資本是自然的資本；牠包括着住宅、器具以及自然的世襲的徒弟，並且由於不甚發達的交通及不充分的交換以致這些自然資本一代代的從父親傳給兒子而不能實現。」（註四）

有產階級社會之工業資本家是生產手段的佔有者；至於手工業者除生產手段外還佔有世襲的徒弟。他與其他手工業者的聯系只在於「某種特定工作之公共所有權的羈絆；當着手工業者同時又是商人的時候，集合於販賣商品場所的必須；各個手工業者之利益的衝突，學習手工業勞動之保障的必要；以及全國的封建組織等等都是每種職業結合工人於行會中的原因……城市日常工作需要，產生了一種賤民……傭工和學徒在每個手工業中按着行東利益的要求都有他們各自的組織。他們與行東間之家長制的關係，給與行東以雙重的力量：第一，他對於傭工的全部生活有

直接干涉的權力；第二，在同一行東處工作的傭工，能夠有實際上的融合，結合他們與其他行東的傭工相對抗并使他們與後者分離起來；最後，傭工因其自身的利益——即自己有成爲行東的可能——而與現存制度聯系起來。因而每當賤民反抗全部城市制度舉行叛亂時——這些叛亂都因其自身力量的薄弱得不着任何結果——傭工便爲這渺茫的幻想所克服，實際上說起來，他已與這行會制度本身融合於一了。」（註五）

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給與封建制度的歐洲之手工業的說明。如果大家問手工業在中國與在封建制度的歐洲是否有同樣的意義？牠成就了行會制度沒有呢？那麼，或許馬克士伯爾說的很對：「凡存在品級制度的地方便沒有行會，因爲在那裏行會完全是多餘的東西；凡宗族經濟佔統治的地方，如像中國行會只有很少的意義。」（註六）

如果中國還存在着行會制度，如果手工業的生產及一般行會的勞動組織還起着相當重要的作用，還有相當重要的比重，那麼，我們便有極充分的權利可以說，不僅在土地的關係上，不僅在鄉村的生活，甚至於在城市產業活動的領域內，在城市的生活中都應該存在有資本主義前期的遺跡和殘餘。

俄國修道士洋欽佛於一八四八年曾肯定的說道：「在商業等級中，沒有政府設立的行會和幫口，無論是工廠主或手工業者，他們都可以自由地不支付許可的代價而佔據他們願意佔據的場所。」（註七）其結論似乎行會和幫口不會有過。但洋欽佛同時又說：「處於某種貿易的或產業的廣大派別之中，相互之間可以任意成立公會，并且大都是從富商中選出管理的會長。在公會中有年會，在年會上共同議定在整年中在某個地方他們商品的固定價格。會員中誰在其商品的出賣中有低於設定的價格之劣跡時，會長便科規定的貨幣罰金。」（註八）

但這也就是行會和幫口。這也就是產業活動之資本主義前期的組織。如果牠到現在還殘留着，那我們便可以說，這就是在產業界中之資本主義前期的遺跡和殘餘。一切問題乃在於這些資本主義前期的殘餘尚保持若干，其比重怎樣，以及有若干資本從屬於這種產業活動的組織形式的自身？

註一：一九一三年中國作坊和工廠以及工人的總數：

工人

企業

工人

企業

由七——三〇人

一八八三〇家

由一〇〇——五〇〇人

七二六家

由三〇——五〇人 一四三家 由五〇〇——一〇〇〇人 一四五家

由五〇——一〇〇人 八三家 由一〇〇〇人以上 三三家

註二：Remer, *Readings in Economics for China*, Shanghai, c. 141.

註三：馬克思：剩餘價值論第二卷，第一部 p. 186.

註四：馬克思與恩格斯文匯。第一本，p. 235——一九二四年莫斯科國家出版局發行（馬克思與恩格斯研究院出版）。

版）。

註五：全上 p. 234—235.

註六：Max Weber, *Wirtschaftsgeschichte*. München 1924, c. 128.

註七：洋欽佛，公民的和道德的狀況中的中國，一九二二年。p. 22.

註八：全上。

德國歷史學派的創立者之一的卡爾·畢夏爾曾經分析過產業在其歷史發展中的形式問題，他肯定的說，我們可以得到產業的五種重要形式。「在長期的歷史中，其形式如下：一、家庭生產

(爲家庭的需要而生產)：一、定貨工作 (Lohnwerk)；二、手工業；三、家庭或家造工業；四、工廠。〔註二〕這裏稱爲家庭生產的是指在家庭中的工業製造品及從私人經濟中取得原料以供給家庭的生產。定貨工作是由於兩種形式完成，即出門 (Sohn) 和在家中工作 (Heimwerk)。工廠一名稱應解爲手工工廠業和大機器生產。而家庭的或家造的工業是將家庭資本主義工作的一切形式結合於其自身：占買人的工作，配貨人的工作，爲直接出賣之農民的家庭工業等等。

我們進一步來看，中國就存在有這些產業的一切形式。所有包含於手工工廠的一切形式。在中國基地上之歷史序幕中都會發展過。中國不會發展過大機器的生產。(註二)帝國主義爲牠置下了基礎，并培植了和發展了牠。舊式的農家庭生產起着比較不大的作用。(註三)但定貨工作，手工業和家造工業雖然比重減少却很倔強。手工工廠業和機器生產的意義固然盡量的增大起來，但近代中國的一切，近代中國的經濟，其本身仍附上了過去的殘跡。此地我們只限於說明了一切產業形式中的手工業。在歐洲各國，行會手工業的破壞，經過了各種不同的形式和各種不同的階段。英國的幫口融合於城市自治之中，隨着城市自治的死亡而死亡了。法國當着資本主義發展(手工工廠業——家庭中的資本主義的工作)時，行會便已從各方面毀壞了，并且國王命令取消

牠。在比利時和荷蘭牠被勝利的法蘭西革命撲滅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於一八三三——一八四〇年就已廢止了牠。在德國和奧匈於一八五九——一八六〇年便已將牠肅清了。而意大利則到一八六四年纔廢止。但法案、命令只不過廢止了手工業的行會制度，而手工業自身仍舊保存着。法案、命令在這種場合僅有形式的經濟功能。沒有行會組織的手工業照樣繼續存在。但手工業的命運已經註定了，問題的重要就在於破壞，毀滅到處使得手工業自身屈服於資本。畢夏爾曾計算出五種形式：「一、手工業被同類的工廠生產所排擠；二、牠的生產範圍被工廠或家造工業所限定；三、手工業包括於大企業之中；四、手工業由於需要性質的改變而衰頹；五、手工業在店舖裏的地位因其家庭僱促生產的程度而降低。」（註四）

這段摘要的話遠不充分。「資本主義在其處理中有無限的方法在舊的手工業的基礎上種下深根；牠絕不需要爲此而去創立大的企業；甚至在一般上牠連獨立的企業也不需要，因爲牠往往會於間接中引導產業勞動附從於其自身的。」（註五）麵包匠完全依賴於供給他們麵粉的，有時供給他們全部生產工具的麵粉商和磨坊老板；小的肉店主整個依賴於牲畜的商人或仲介人；銅匠與木匠之做散工或包工——這便是手工業間接依賴於資本的實例。將手工業包括於大企業之中便發生

合併，就包括這字的本來意義說，亦就是牠們的合攏。「合併與包括在這場合，即在資本主義的企業侵蝕附屬工藝的獨立性及引導牠們依賴於主要生產時是佔有地位的。」(註六)剝物匠之爲細木匠，大木匠和室內裝飾匠製造一部份的圓木，裝訂工人之爲出版商而工作——這便是手工業合併於大企業的實例。桶店之爲肥皂和顏料工廠製木料容器和爲大酒商製造酒樽，銅匠、鐵匠和大木匠之供諸工廠或大資產的役使——這便是手工業包括於大企業之中的實例。集合若干種工藝於一個人手中便引導了手工工廠業的形成。列車工廠之合併輪匠、剝物匠、大木匠、鐵匠、穿孔匠、電氣技手、漆匠、玻璃匠、鞍匠、室內裝飾店、打錫匠——這便是手工業合攏的實例。但手工業的瓦解也有這樣發生的，即把舊的從前獨立的手工業重新集合爲較大的集團，他們的生產範圍依照牠的限度而縮小。細木匠也以大木匠的資格而工作，鐵匠闖入了銅匠的領域，鞍匠也可成爲室內裝飾匠等等。就分工的意義說，這退後了一步。在小區域及鄉村中發生了手工業和農業經濟的合攏。在這裏就分工的意義說，也退後了一步。或者手工業者由於兼做商業而得救。靴匠開設商店，裁縫匠販賣羅紗、紙烟。「由於交通的形式而來的生產的分離，特種商人階級的形成是向前進了一步。」(註七)在其爲生存的決死爭鬥中手工業却退後了一步，殘留了舊的、壞的、更落後的

關係。但這爲數尙少。往往手工業因發生分工而也有得救的。我們知道，在中國一種雨傘却要六家製造所來製造。一個手工業者每每只爲自己緊守着一部份的最繁雜的生產活動，而其餘部份的工作便由家庭資本主義工作去履行。手工業與近代工業聯合起來了。手工業者成了估買人、配貨者。凡在原料特別昂貴的地方，在那裏手工業者總是陷於依賴原料商人的境地。凡在手工業製造品輸送到外部市場的地方，在那裏手工業者實質上幾乎經常成爲輸出之家庭工人。但同時可以看到，手工業者自己成爲商人，並且爲貿易去直接的大量的生產。手工業者可以改良自己的生產技術，採用新式機器，使用近代發動機的手段。小機器的使用在中國城市中是一種極普遍的現象。然而，當着蒸氣機尙是一種固定的推動機時，僅僅只有大機器的工業纔能使用牠。但在小製造所中電力也可以當做發動力一樣使用。小規模的生產也運用內燃發動機。同樣許多新的化學方法也不需要大規模的作坊。技術、新式機器、生產之新式化學方法、新式推動工具的發明，使各個部份的手工業者不僅在市場上有保持自己地位的可能，並且在順利的情况下可以走進資本主義企業家的行伍中去。製造所的手工業者轉變爲機器造作的製造所的手工業者，最後轉變爲先進的大工廠。

……德國歷史學派的許多人，從事於研究手工業的運命者，乃因為在他們的眼前發生了德國手工業的瓦解及隨之而來的一切社會的貧困。這學派的最初代表者尚希望以各種方法將手工業挽救起來。斯莫爾曾經提議，要求國家出而干涉，預言道，如果「國家一時起來干涉，也許會破壞配貨者、佔買人及工廠主的利益，但這樣却可保障中等階級并可避免貧困，這種貧困應歸咎於比較可惡的富有階級，要想破壞他們堅固的利益，便應實行比較澈底的國家干涉。」（註八）畢夏爾在一八九三年并非漫不經心，反之他完全指出，「組成舊式城市人口之核心的獨立的小人份子消滅了，而他的地位便為相互間不生聯系而又不獨立的工人羣衆所佔有。」（註九）但他仍舊期望「從不獨立的工人中形成一種優越於從前小手工業者本身經濟精力并與社會適應之新的『中等階級』」。宗巴特已經沒有小資產階級的自欺，他以資本主義之觀念學家的眼光來考察手工業者的命運。他曾經很冷靜的說道：「手工業之舊的範圍可以分爲三個不同的集團：

「一、小行東，單獨的行東和傭工轉入於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去。

「二、少數有能力的個人從手工業的火坑中解放出來并且站在通行企業家的道路之上；這是資產階級的新來者。

「三、其餘剩下的行東還相當堅固地站得住，不至馬上就去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但另一方面要想高升而力量又不夠；他們的數目隨着手工業生產範圍的縮小，手工業者地位的惡化以及生產的分化過程的向前而減少起來。

「在指出這一切以後，我們不能認爲從上面作出的是不恰當的結論：手工業在一般上是日趨於崩潰道路的一種社會階級。」（註十）

我們不能不同意於這些關於手工業命運——手工業者發生階級分化和階級崩潰——之明確而顯然的結論。從資本主義前期的生產方法看來，資本主義承受下來的三個階級：地主、農民和手工業者，并非資產階級社會所固有的。資產階級或者剷除封建的地主（法國），或者與他們妥協，而將他們變爲領取地租的寄生蟲（英國），或者資本主義的發展將他們改變爲土地的資本家（普魯士）。農民和手工業者就階級的意義說來，已爲資本主義解體了，分化了。最大多數失去了生產手段而成爲無產階級的部隊，極少數成爲農村資產階級和城市資本家的部隊。

這便是現時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的行會手工業之痛苦的沒落的道路。這種道路在歷史上有過如下的階段：

一、資本主義的發展破壞了中世紀行會制度。實行這種手術的絕不是大機器工業。在法國、西班牙、比利時、意大利等等差不多還沒有機器工業時，那時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和手工工廠業便已完全毀壞了行會的地位，並進而廢止行會制度。但無論是家內工作或手工工廠業都不能絲毫毀壞手工業。而且手工工廠既不能約束社會生產於其一切範圍內，亦不能在其基礎上將牠加以改造。牠只是當作披在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庭工業的廣大基礎上的經濟的外衣。牠的固有狹小的技術基礎在發展的一定階段上便開始與其自身所創造的生產的需要起了衝突。（註十一）

二、從行會制度的限制和擁抱中「解放」出來的手工業開始與手工工廠業、家庭工業以及機器工業進行鬥爭。手工業者慘遭失敗，於是轉變為手工工廠業或工廠的附屬品，轉變為商業資本的債務人或至於沒落。手工業者的階級（正確的說，等級）解體了。

在英國產業革命完成之後，這些過程在歐洲得到了巨大的開展。在帝國主義時代，這些過程在世界範圍內也得到了巨大的開展。在舊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這些過程是經過較長久的歷史時期而發生的多少重要部份的手工業者都解體了而成爲無產階級，並以工人資格生活於機器工業之中。機器生產不斷地侵佔了手工業的各個部門。關於英國和德國的職工所達到的貧困，曾經記載下許

多不忍卒讀的篇幅。

至於其餘的國家，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被機器工業的製造品一下子就破壞了。在歐洲，手工業起先曾被手工工廠業和家庭工業的火繩銃所射擊，僅僅在最後纔爲大工廠的大砲轟毀了。在印度和中國，手工業一下子便被大英國、德國、日本、美國等等工廠的烈火所毀壞了。而手工業者的解體在這些國家中只有極不重要的部份能夠轉變爲工廠的工人。在歐洲國家中手工業的數目是隨着工業化的過程而減少的。譬如在德國，從一八八二——一八九五年這個時期獨立手工業者的數目是減少的：紡工減少六七%，顏料工人減少五八%，織工減少四八%，鐵匠減少四〇·五%，帽匠減少四二%，磨工減少三二%，皮革工人減少三〇%，桶匠減少二六%，酒匠減少二四%，漆匠和金匠減少二一%，肥皂工人減少二〇%，製箱工人減少一七%，細紐匠減少一七%，毛皮匠減少一四%，玻璃匠減少一三%，小帽工人減少一一%，銅匠減少一〇·五%。至於德國工業在這個時期則飛快的增大起來。

在印度，大機器工業的增長，工業無產階級的增長，與生活於工業中的人數之相對的減少，與大城市人口之相對的減少并行前進着。在中國，外表上看起來也發生過同樣的過程。我們僅僅

是不能用統計將牠表現出來吧了。這是否是說，資本主義的法律已經改變了，或者是說我們來重新審查關於工業人口相對增加的法律呢？無論如何不是的。僅僅是擴大了這類公律的功能的範圍。在世界經濟和世界市場存在的條件下，英國城市可以因削弱印度、南洋羣島以及中國的鄉村而增大；德國及日本的工業可以因削弱中國的手工業而增大；中國農村經濟的解體可以在美國引起了工業人口之相對的增加。殖民地中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之主要部份的份子都從農村經濟和手工業生產過程中被排擠出來。但大工業或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企業却不能轉變他們爲無產階級。他們是流浪者。在這種意義上說來，手工業者不僅是無產階級化了，而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却是流浪者化了。

在封建的歐洲，行會手工業的發生係長期發展的結果。直到十四世紀出門(Schmied)或家中工作(Eisenwerk) (註十二) 形式之定貨工作尙是工業的基本形式。在這兩種場合中，工人設置生產工具，而定貨者供給原料。但行會在以前就開始發展了；歐洲第一個行會早在十一世紀就以商幫的形式出現過。十三世紀的歐洲城市生活洋溢了一種鬥爭，這種鬥爭在德國和荷蘭都達到了特殊尖銳的形態。僅僅十四世紀形式的手工業行會（德國之 Zunft，法國之 Metier，英國之 Mystery 或

Company 等等) 纔開始與寡頭政治的貴族，有時也與商幫進行鬥爭。在許多國家中的手工業行會都會握過城市的政權，但手工業者等級不會形成過一個階級，甚至也不會希冀過國家最高政權。手工業者運用地方市場，因為全國市場還不會有；並且牠滿足於地方市場的統治。到十五世紀，在城市中已經形成了一種日工份子；這些日工的活動構成了城市生活之最重要的原素，——特別是在德國。「在歐洲北部國家中——俄國、羅馬尼亞、奧屬斯拉夫和巴爾幹——僅僅幾個地方進到了手工業的發展。在這些國家中，出門、家庭工作、家造工作沒有經過手工業的鎖鍊而都已發展為估買人的工作和大機器生產了。」(註十三)但在那種行會手工業却發展了，並且盡了工業的作用，行會盡了兩方面的作用：牠調劑行會內部的生產及保持對外關係之行會的壟斷。就像農奴在公社中取得同等的分與物一樣，行會全體會員都有取得徒弟的同等權利。行會調劑生產，確立商品的價格和品質、貿易章程、僱工和學徒的勞動條件、每個行東所需要的僱工和學徒的數量。行會是法庭，行會會為牠的會員的職業地盤而鬭爭，行會會為反抗鄉村手工工藝，即為壟斷城市手工業和鄉村市場而鬥爭，行會會為反抗偷逃的和放浪的工人，反抗家庭工人，反抗外人（外人不是在民族的意義來說，而是反抗商人和其他城市的手工業者）進行了無情的鬥爭，行會會調劑了

手工業的技術、原料的品質、生產工具、對其他行會的關係，最後，當着避免生產過剩時便確定行會的數目。行會在城市中會以自己的手掌握過政治的政權或者會參加過管理城市。

在中國，行會和幫口的發生，比之歐洲來其歷史更爲悠久。曾有人指出，在中國行會會從十二世紀存在到我們的世紀。無論如何，馬克博羅在十三世紀便已遇見了牠們（註十四），十四世紀歐洲旅行家的毛病就在於將各種幫口和行會之間所成就的分工看做一回小事！「誰販賣活鳥，誰便不能販賣已殺戮的死鳥……。」（註十五）但中國的行會和商幫與一般東方的行會和商幫一樣，在很多的關係上與歐洲的有極大的差別。中國不會有強迫加入的行會（*Zunftzwang*）。在東方一般行會很少去限制行會的數目。這個也許可由這種事實來說明，即那種比之歐洲來有較發達的商業關係和商場之顯著的作用對於手工業者的市場有較好的保證。（註十六）中國的行會與一般東方的行會一樣，其權力和威權并非由於依賴封建領主、諸侯或國王的特許、征奪或賄賂而創立起來的。牠們獨立地發展起來，僅僅在極稀的場合是由於特殊權力的允許而創立的。在歐洲，行會和幫口的機關彷彿就是城市中的政治政權。在中國，行會和幫口不會成爲政治政權。東方暴虐政制的官僚具有那樣大的勢力，使得僅僅行會在稀少的場合能夠將自己置於牠的地位之上。我們只能找到兩個

城市——牛莊和汕頭——，那種行會的地位差不多與在城市中直接握有政治政權的歐洲行會的地位沒有什麼區別。

並且也有很多場合，行會和幫口的政治影響是極大的。「牠們的權力為各省的上層官吏所賦予，並且皇帝也很留意地傾聽牠們的怨聲。如果照牠們的影響判斷，那牠們比之半官的地位大得多。」（註十七）幫口的章程和規則被法庭認為同等的法律。「一般公認，幫口代表與地方官吏共同執行管理的職能，如設立地方稅和關稅，組織救火會和民團，調節破產的重大情形，對於孤兒院和養老院之基金的募集和監督。幫口往往貸出一定額的厘金和其他捐稅。」（註十八）

封建的歐洲城市，在經濟上以壟斷價格、商業交換及高利貸剝削鄉村；但在政治上城市却不能剝削鄉村，因為政治政權是握於封建主的手中。也因為這個原因，國家（即封建地主的組織）從不會充分地讓予行會（即有產者的等級）來調節經濟生活。至於在中國城市中政治政權，其給與商業的影響遠較封建的歐洲為大，行會不僅確立價格，甚至確立量、衡、幣制，以及調節一般經濟生活。東方的暴虐政制不會干涉行會的事業，或者僅僅在農民暴動或城市的賤民暴動強迫着牠來反對幫口的貪慾時，牠纔起來干涉。在行會和幫口及國家政權之間也曾有過衝突。那種衝突即在

我們的今日也有。在衝突的場合下，行會和幫口便以停止一切工作——罷工來回答。但就一般說來，國家政權與行會和幫口總是很好的打成一片，因為「政府官吏大都是從商業階級出身，幫口很好的知道去利用官吏充分發達了的熟諳營業的本能；因為以中世紀的形態表出的社會輿論——行會的罷工和抵制——代表了巨大的力量。」（註十九）摩爾茲（Morze）在此地却把握了真相：國家政權依其個人的成份和其階級內容看來一部份是附屬於商人資本。在歐洲手工業行會與商業幫口之間會發生過長期的鬥爭，僅僅在行會的沒落上成就了商業幫口，最後一般行會自身也都屈服於商業資本，而後來就連非行會的手工業也屈服於商業資本了。在中國在十四和十五世紀手工業便已很恭順地屈服於商業資本了。這雖然表現於商業幫口有過很好的基礎，然而手工業的行會一般說來並不會有過自己的基礎，即如有過也只是極其可憐的。但曾經錯誤的以為商業幫口是最有力量的行會組織。「銀行家的幫口起着極廣大的作用。也許可以說，只有他們具有全中國的作用。」（註廿）在歐洲行會時代，其特點是非發達的分工。馬克士伯爾寫道，「我們在中世紀行會的一覽表中找到了九種不同的行會，在那裏若從技術上觀察，那便完全充分地有二打或三打。」（註廿二）在中國，其分工較之中世紀的歐洲更為發達。在上海，可以計算出的有五八個手工業的行會，一

一七個商幫和一五一個同鄉會館，這裏的計算當然極不充分。（註廿二）在廣東，當着行會和幫口轉變爲職工會的時候，後者的數目超過了四三〇個。（註廿三）各製造所內部的和各行會內部的分工差不多都沒有達到行會基礎之本元的泰洛爾制度。這個可由這一種事實來說明，即是將華南和華中各城市中的個別行會除外，在中國并不限制行東的數目。那裏會拿生產過程來分割，而這裏又不可以拿生產過程來分割，這裏會拿徒弟或地域來分割過。人力車夫往往把一個城市分割爲幾區，他們不可以從一個區域到另一個區域去。運輸苦力或裝貨工人拿港口的位置或搬運的種類來分割。吹打手和乞丐也有自己的幫口。他們相互之間拿街道來分割。水運搬夫相互之間以街道和住屋來劃分。理髮匠以徒弟來劃分。如果徒弟去到別個理髮匠方面工作，那他應當比以前有較多的報酬。而軍閥和「政客」相互之間便以地域來劃分。

中國的幫口會否進行過類似於歐洲幫口反對鄉村手工藝的鬥爭或像印度那樣只以城市市場爲滿足呢？我們不能答覆這個問題。一般說來，我們不承認像中國那種鄉村手工藝：陶冶業、大木業等等是有組織的事。但很明顯，現代手工業的行會已經無力開始類似的鬥爭了。商業資本盡力的假手於資本主義的家庭工作去剝削農民；手工工廠甚至於工廠也竭其全力去屈服手工業者於資

本本身，至於那種鬥爭連夢也沒有做過。

這是手工業崩潰的原因之一。

註一：卡爾畢夏爾。國民經濟的發生，一九二三年 p. 93.

註二：關於中國沒有外部推動爲什麼不能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問題，第一個是爲馬克士·伯爾在一九二三年的著作“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Tübingen”中所提出。

註三：在或多或少單純形式中，牠曾被保存在那稱做外人的住民之中。許多部落仍舊在從事自然經濟的宗族制度之下生活着。

註四：畢夏爾，國民經濟的發生，p. 116.

註五：宗巴特，德國工業發達概論，一九〇二年，p. 4.

註六：同上 p. 141.

註七：馬克恩與恩格斯叢刊第一冊，莫斯科國家出版局發行，一九二四年，p. 236.

註八：Gustav Schmoller,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leinergewerbes im XIX Jahrhundert, Hall, 1870, S. 703.

註九：畢夏爾，國民經濟的發生，p. 124.

註十〇…米田持、德國工業發展概論。p. 317—319.

註十一…馬克羅、資本論第一卷 p. 347.

註十二…Karl Bücher, Das Gewerbe,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tom IV. S. 850.

註十三…同上 p. 877.

註十四…馬克博羅的遊記。

註十五…Men ler Pin's abenteuerliche Reise durch China, die Tartarei Siam, Pegu und andere Lander, S.

158.

註十六…沙愛諾夫、東方問題 p. 164.

註十七…T. R. Jernigen, China in Law and Commerce, New-York 1905, c. 208.

註十八…同上 p. 219.

註十九…Morse, the Gilds of China, London, 1909, c. 21.

註二十…Williams, China yesterday and today, New-York 1923, p. 195.

註二十一…Mar Weber, Wirtschaftsgeschichte, S. 130

註二十二：滿州里通信第七期，一九二七年，p. 4.

註二十三：廣東職工運動的材料。

在全國經濟生活中，已經有大機器工業、手工工廠業、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此外，外國輸入的商品還要與手工工業爭奪市場，在那裏要想手工業行會和商人幫口起着一般任何重要的作用是可能的嗎？

資本主義前期的遺跡和殘餘到處可以看見，可以把牠估量得不充份，但也可以過分的估量牠。馬克·霍文 (Mao Gowen) (註一) 是記載過中國幫口的第一個外國人。在當時，中國的幫口和行會確立貿易和生產的規則，并強制人們遵守這些規則；牠們確定價格，牠們強迫非幫口的人員承認幫口的決定，牠們與政制折衝，牠們強迫外國商人受牠們的檢查，在衝突的場合下牠們是仲裁人，牠們調節工資和勞動條件等等。摩爾茲在其著作中 (註二) 除根本上重複了馬克·霍文的意見外，而在事實上却看到了在二十年的過程中幫口受了重大的變遷。我們首先要來考察，行會和幫口還有沒有，牠們之中剩下了一些什麼？像這類問題從「證據」開始便是爭論的問題 (有些中國

通完全否認幫口的作用和意義)。

關於這個問題公正的美國人威廉士(Williams)曾寫道：「幫口確立量和衡。政府曾經公佈過量和衡的劃一制度，但幫口却不採用牠……幫口確定工資，決定行東的學徒數目。數年前玉器商幫的人員曾槍殺一個破壞這個規則的自己幫友……商幫確定商品的性質，確定價格，懲罰膺造商品或破壞任何規則的人，確定仲金的高度、支付條件、各種貨幣的行情。」(註三)

另一個目擊者的美國人格布魯(Gamble)列舉出北京許多手工業幫口的章程。茲將著者結論中的一段扼要引申如下：

「許多商人集合於寺院中來議定價格。誰不遵守那種價格，便科罰誰……在華南和華中有些幫口招收學徒僅僅限於幫友的子弟或近親……只有很少的幫口公開收納新的店員和職員，如果當事人不會完了學習的年限……在共和政體創立之後，警察便將幫口採用肉體懲罰的權利取消了……幫口選舉的會長確定商品的價格。銀行幫的會長每天早晨確定各種貨幣和銀錢的行情，而絲和棉製造商人幫口的總辦，便於每星期決定一次價格。有的商品——這種商品的價格變動得不很快——不是總辦，而是幫員確定價格。所確定的價格算做最低的標準。商人有權利提高價格，但

沒有權利降低價格。幫口極嚴酷地懲罰那以低於所確定的價格而出賣的人。幫口確定工資、工作時間、學習年限等等。牠也解決各種糾紛。」(註四)

奉天的美國領事亨慈爾曼寫道：

「商會（即幫口的聯合）對於政治和行政事務有重大的影響；牠們反抗高度的捐稅，幫助治安，調節價格等等；牠們對於貨幣營業也有很大的影響……銀錢兌換人的幫口確定貨幣的行情，決定貨幣流通的規則，監督履行規約，解決各種爭議。」(註六)

天津的美國領事很率直地寫道：

「……這些幫口的目的在於避免中國賣者與外國商人之間的競爭，而結果這類外國商人無往而不與限以較高的價格出賣商品的幫口決定發生衝突。」(註六)

南京的美國領事寫道：

「這些幫口確定價格，而在糾紛的場合則是居於第三者地位的法庭。」(註七)

美國商業代辦亞爾諾德寫道，

「這些幫口調節商品的價格、工作時間、學徒、捐稅以及一般幫口的一切公共問題。」(註八)

類似的證據也許舉來比較有用。可是證據已經舉得很多。很明顯，幫口是存在的，並且在全國經濟生活中起着極重大的作用。商會，實際上只是幫口的聯合。我們必須指出，幫口的政治積極性是隨着牠的經濟勞動力的衰落的尺度而增長的。牠們反映出了沒落的小資產階級之臨死的痙攣。在一九〇五年，牠們由於禁止中國的移民會組織排貨來反抗美國。在一九一五年，牠們由於提出二十一條的要求便以排貨爲主要運動來反抗日本。在一九二五年，在五卅慘案後牠們以資產階級的十三條要求來對抗工人的十七條要求。（註九）在內戰時期，牠們的作用以巨大的尺度而增大起來。牠們支付公債，牠們分攤捐稅，擔保軍用票，給養軍隊，組織保衛團來反抗土匪，組織罷工和停業來反抗捐稅等等。政治積極性的廣播與幫口和行會之經濟作用的減少絕不矛盾。其實，在德國一八四八年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就已開始了爲完全恢復行會，爲禁止保有兩個以上的傭工，爲補助手工業而徵收工廠稅，爲禁止鄉村手工藝之廣大的運動，並且在一八四九年二月，政府的命令實質上便是復活行會制度。（註十）在中國一九一一年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幫口會出面反對統一幣制，統一度、量、衡的計劃，反對鐵路的集中化。而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勝利之後，幫口會以勝利者的身分出面向南京政府提出自己的條件。我們僅僅看到，幫口和商會代表了知名的社會

的尖塔！下層是手工業的行會；商人幫口在上面統治牠們；而銀行幫在上面又統治着在商會中與手工業行會聯合一起的商人幫口。這個尖塔全部都會爲排脫、矯正自由競爭的公律努力過。在壟斷的資本主義時期，在別的國家及中國的一部份，壟斷者的聯合——卡特爾、托拉斯、新狄嘉——都企圖調節價格和市場，在中國價格和市場的調節，一般的說來，一部份是在資本主義前期的、行會的、幫口的基礎上發生的。

但并非永遠如此。資本主義只顧自己。從一切方面——自內的和自外的——去侵蝕中世紀的幫口和行會。關於這個目擊者也舉出了非常有興趣的和有研究的證據。美國商業代辦亞爾諾德指明道，「必須注意到，在中國，競爭頗爲激烈，並且我們相信，幫員以低於確定的價格出賣即幫口亦不能制止。」（註十二）廣東的美國領事說道：「幫口要求牠自己的幫員，要他們應用和保持支付與清算之同一的條件。許多幫口的幫員祕密地破壞這種有開除出幫的法規。」（註十二）亞邊那渥在其著作中指示我們道，在北滿存在了僅僅不大健全的行會，這些行會的權力和影響尙是根源於中國本部的幫口。曾經往往有這種情形，即國家當局出而反對幫口。在北京，當局會制止肥皂幫對於價格之過於任意的調節與反對小手工工廠的鬥爭。（註十三）

「在河北（直隸）南部家造織工幫會聯合六〇〇、〇〇〇織工反對——鬥爭一開始不是爲生存而是爲死亡——大手工工廠業和蒸汽紡織機，并禁止自己的幫員受這些企業的僱用。整個問題在於幫口的這種禁止能夠實行到怎樣的程度及如何保證自己幫員徒手勞動的賃銀。」（註十四）亨伯爾在一九二一年會寫道，從這時起，這類鬥爭便被手工工廠業和大工廠的勝利結束了。同時著者指出，當局屢屢公佈關於營業的命令和法規，堅持登記一切小店舖、大店舖、製造所、甚至於幫口僱工的姓名及盡量保證對於經濟生活之直接的監督。（註十五）最有趣的，在一九二六年在無錫於建築祖師魯班的神誕日（六月十六日）集合了幾千建築企業家、石匠、木匠來採用幫口的新章程。新章程確定了人工資的限度，工作時間（夏天十小時，冬天九小時），行東和接主必須供給工人的茶點等等。章程的第四條說：「對於建築工作的標準應當在公平的基礎下計算。價格過低便不可以承受工作。過於激烈的競爭應當避免，因爲違背該法規便無意義。」章程的第六條說：「如果某個接主比別個接主作出更巧妙的建議，那麼，前者務必按照製定的方案和標準賠償後者的損失。」在章程的後面看到，幫口應當是一切契約的代表，幫口負責履行契約，不許工人在任何工作時間內轉到另一接主方面去工作，新的商店應當來幫口登記并納費十元，病人應當得到補助等

等。所有舊幫口的規則除基本的、禁止競爭的以外都須遵守。這類幫口已經不是現時的幫口，因為牠不除去競爭。（註十六）

當然，在外國租借地上的通商口岸，幫口的作用和意義逐漸低了下去。外國的競爭，各個聯合商場和大商店的競爭，工廠製造品和手工工廠業以及佔買人的家內工作的競爭破壞了行會制度的基礎。甚至絲和茶及輸出商品的商幫也失去了從前的地位。而輸入商品的商幫當着輸入品的對象，如紡品和織品以平穩的價格公賣和批發時還更大的喪失了自己的意義。因此，陷入深淵的全國幫口更固執的維持着。但那個手工業已經盡量地被資本屈服了。

我們來看看證人指出的事實吧。

這些事實是從工業發展的階段完全不同的全國的各區域中得來的。

「……生活於各別生產部門的工人，如裁縫業、大木業等等的工人可分為行東、傭工和學徒。行東工人通常有製造所并保持一定的傭工和學徒。他通常為定貨（Contract）工作。我們以裁縫為例，如果誰要做襯衣，誰就送材料給裁縫店老板，并支付定錢給他。然而老板每每以自己的一个傭工受僱於定貨者，按照人支付工錢。在那種情形之下，老板取得與傭工同等的工資；然

而有時老板取得傭工工資之一定的百分率。學徒在指定的學習完了以後，也可以有老板一樣的工資；但錢却被供給宿舍、日常生活和些許貨幣報酬的老板所取得。」（註十四）

此地，我們看到了與定貨工作聯結一起的行會手工業。那樣的條件我們在山西秦安府便可找到。

「在江蘇省的江陰有出賣最優良的竹製的木製造品。製造竹馬，彫像及普通一切彫刻的工作。江陰的彫刻家極其馳名。在一個彫像上往往工作幾星期，有時幾個月。工作方法世代相傳。分工極為細密。刻出彫像的工人不做刻劃師的工作。有五個店鋪專從事這種生產；所有在城市近郊的工人，或者在這些舖子中工作或者為這些舖子工作。」（註十八）此地是店鋪與手工業者聯合一起工作的實例，在這場合，高度的賦有藝術天才的手工業者，在手工工廠中充分地保持着行會的分工。

「建築工人的幫口本身包含了大木匠、石匠、磚瓦匠、鐵匠和漆匠。所有這些職業的工人，首先得參入幫口，并且得到了徽章。如果他不會參入幫口，他便不能獲得定貨。在現時幫口盡力地減低自己的影響，有許多大木匠、石匠等等都不是幫口的幫員。學習期限為四年。幫口的一切

決議，幫員和非幫員都須一律遵守。建築的接主爲着自己的目的來利用幫口。通常工人從接主方面領得的工資低於確定的。但當他得到定貨時，那他就向定貨者預先言明須以幫口確定的工資來計算。僅僅在有的專門工作時，工人纔能取得幫口確定的工資。遵守着行會原則的分工。錫匠不能做銅匠的工作，銅匠也不能做錫匠的工作。」（註十九）

這個記載說明了北京建築業的狀況。幫口從各方面解體了。而長沙（湖南）的石匠和木匠幫口還有更有趣的歷史。

「在一九二二年秋天，傭工——石匠和木匠——宣佈同盟罷工。罷工者要求增加工資和幫口規則之相當的改善。結果允許這些工人解除從前的限制有獨立找尋工作的權利。」（註二十）

如果在北京是自由競爭和接主企業家的陰謀詭計，那麼，在長沙則是工人的結社掘毀行會制度之永久的基礎。長沙的鞋匠幫口也有自己的歷史。

「鞋匠分爲三種幫口：製造外國靴鞋的鞋匠，製造中國靴鞋的鞋匠，及從事修補的鞋匠。第一個集團又分作兩個集團，湖北人組成的北幫和湖南人組成的南幫。有些鞋匠已經從事於裁縫的手工業或販賣現成的製造品……從事於修補的鞋匠特別之多，幫口無法去強迫自己的幫員遵守規

則，因為鄉村將許多失業者驅到城市來，并且靴鞋製造所同樣也攆斥失業者。按照決定的規則來說，從鄉村來的修補鞋匠，非幫員，幫口即以每個新來者看待，給以半數的工資。」（註二十一）

此地由於輸入商品的競爭和鄉村的崩潰所引起的失業掘毀了幫口。我們試一考察福州（福建）城內的行會制度！

木刻工人自己購買適當的木材并履行家內工作，但大體說來，僅僅依商人的定貨者履行工作。學習期限為五年。業務以熟練程度來計算。手工業者數目為三〇〇——四〇〇人，估買人數目為三〇——四〇人。（註二十二）

這是舊式的藝術的行會手工業轉變為依靠估買人的定貨而工作的手工業者之實例。

「木作工人分為，一方面大木匠、建築匠、細木匠、彫刻匠，另一方面家具匠。大木匠不獨立工作，而是受僱於接主。家具匠經常為定貨而工作，往往都是某種富足的商社供給手工業者以必需的林木。」（註二十三）在此地充分地屈服於資本。

「福州的靴鞋手工業正度着困難的危機，五〇〇個鞋匠工作，一〇〇〇個鞋匠失業。上海來的鞋匠與舊式的鞋匠競爭。外國商品的輸入同樣也壓迫着鞋匠。以前分工是這樣，短靴的上部也

在製造所中製造。現在上部由婦女在家內工作中製造。模製靴底的輸入便將從前做這類工作的人消滅了。你奇怪嗎？傭工會提出這類要求：一、一個行東不應有一個以上的學徒，二、不能將靴鞋上部交給家內婦女去做，三、不能解僱工人。」（註二十四）此地是充分地危機和瓦解。

福州裁縫匠分爲三種：一、縫中國衣，二、縫外國衣，三、縫軍衣。一個行東有二——六個傭工和多過此數的學徒。「如果誰做衣服，誰便把材料送給裁縫匠或喊他到自己家裏來。」（註二十五）此地還保持有中世紀的關係，因爲一般說來，裁縫業實際應用機器的方法爲期匪遙。同時，福州在工業發達的意義上是通商口岸的一個比較落後的城市。在比較發達的口岸中，行會手工業的解體與其屈服於資本還要更進一步。

在上海有之，四個大的家具手工工廠，每個有一〇〇——三〇〇工人工作。手工工廠由七個部門組織而成，即：大木匠、塗漆匠、切取匠、裝飾匠、青銅匠、釘工、鋼匠諸部門。行東是各部門的主腦。行東僱用工人，支付他們工錢，供給他們日常生活和宿舍。（註二十六）此地我們看到了手工直接結合於手工工廠的模範例子。

在上海製造雨傘的手工工廠好像細菌一樣的生長起來。此地生產過程分爲七個式樣。第一個

部門製造框格，第二個部門製造木質部分，第三個部門製造金質部分，第四個部門粘紙或材料等等，最後，在裝置的部門內把所有這些部分併合起來。（註二十七）

在上海鞋匠在自己的製造所中僅僅製造靴鞋的幾部分。下餘部分由資本主義的家內工作履行。家內工作是製造所和手工工廠的附屬物。在杭州和福州製造冥錢是由手工工廠和家內聯合履行。生產過程分爲八部分，其中僅僅五部分在製造所中履行，而其餘部分則由家內履行。（註二十八）在杭州企業家也曾企圖採用機器。但關聯於工人的規章他們仍不得不拒絕機器的採用。在二十個手工工廠中有四千個做工的工人，而在家內工作中有成千累萬的婦女。例如，在上海有三〇個輸錫的商社，有七〇〇個製造所製造冥錢，在城市近郊有成千累萬的婦女製造冥錢的其餘部分。每年回轉數達到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註二十九）

也有這種情形，當着生產過程分爲許多手術時，其中每種手術由依照行會原則組織的專門手工業來履行；但這些手工業并非地域的聯合，而是個別的配置的物體部分聯合於專門的製造所中，在這種情形下，這聯合甚至也成了專門的手工業。

一一部分工人用竹來製造傘幹。一部分工人爲雨傘的必需而粘紙、裁紙或佈綢。一部分工人

使粘紙或佈網不至透水。一部分工人製造雨傘的金屬部分。最後，一部分工人把雨傘的這一切部分湊合起來，此地這種手術的全部或牠的一部分履行於別個的製造所之中，——這些製造所通常依照大商社的定貨工作。〔註三十〕

類似的分工和生產組織，我們也可以在扇子的製造中看到。中國於一八九二年輸出一、一〇〇、〇〇〇柄，於一九〇一年四、一〇〇、〇〇〇柄，於一九二四年九、〇〇〇、〇〇〇柄的扇子。而國內的消費超過輸出許多倍。在夏天，中國人都用扇子。在杭州、浙江、福州、蘇州、上海和南京，其生產組織在行會的基礎上有下列的形式：

「一種商人買竹子和一般扇子的木材部分。另一種商人買紙等等。在第一個製造所中用竹子來製造扇子的骨子和格子，在第二個製造所中製造紙料的部分，在第三個製造所中履行木料部分的工作，在第四個製造所中履行刻劃的工作，如果這種工作也有地位，那在第五個製造所中就是裝置扇子。在鄉村和城市，製造扇子的行會手工業到處可以看到。大家在手術——這手術的習慣爲他們所承認——的履行上都極嫉妬地保持自己的權利，如果有誰從旁謀害了屬於一定種類的手工業者之生產過程的某部分，便必然地會激起一種波瀾。〔註三十一〕」

此地行會的分工達到了邏輯的完成。已經不是個別的生產部門（製造扇子），而是這種生產過程之一定的部分說明了一定種類的工人之行會的壟斷。此地行會制度是否保持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呢？完全不是那回事！有些批發商社以材料供給製造所，並且這些製造所的工作是爲這些商社而履行。另一種情形，就是批發商社和零售商社從手工業者那裏估買現成的扇子。因此，手工業者事實上是商業資本之血汗的家內工人。但手工業的破敗並不僅僅來自這些方面。「在鄉村也不遵守綿密的分工。扇子在農民的家內製造。買辦商人從城市近郊來到農民那裏收集扇子。扇子往往用刺繡的格子布來製造。刺繡也是由家內工作來履行。扇子的製造甚至在上海也是家內工作。」（註三十二）是以估買人和配貨者毀壞了手工業。

在較少捲入世界的和外省的漩渦的省分中，手工業還很堅固地保存着，在那裏輸入的商品和中國工廠的製造品還不能依照這種或那種原因去掘毀行會業的地位。達漢洛夫關於廣西省的手工業寫道：

「所有其餘的生產——通行於全省的生產，如紡織品的製造，金屬的探製，皮貨的、木作的、化學的、食品的、烟草的製作等等都建築在手工業者的徒手勞動的基礎上面。手工業的生產

是主要的生產，牠供給凡不用外國和外省輸入品以及農民家庭工業的人民之全部需要，從事於工作的的大約有一〇〇、〇〇〇人，佔全省人口一%有奇。然而手工業生產度着深沉的危機，從各方面都可以聽到一種怨聲，就是手工業生產不僅不是擴大，反之是年復一年地轉變方向，減少自己的生產和生活於其中的工人數目。到處發生這種現象，即凡屬外國資本和外省資本深入的地方，在那裏便有高度發展的技術之全套武裝，並且因此也就很容易地以自己的生產物來排斥手工業的生產物。手工業者覺悟到自己完全只有在這種生產領域內（即應用徒手勞動的領域，如建築工人、食品工人、玉匠、理髮匠）或者這種生產領域內（即外國工廠工業的生產物與那裏一般採用的標準，如有些紡織品、靴鞋、烟火和香水的生產物有嚴格差別的地方）外國的競爭才不能發生作用。（註三十三）

因此，在廣西一省於一九二六年向或多或少的保持了小店舖製造所的行會手工業者的純粹形式。但從這時起就在廣西也有很多變遷。全省迅速地捲入了對外貿易的漩渦，建設小作坊、大手工工廠、建築馬路，並且手工業的危機決然地加劇起來。但在沒有鐵路、沒有內河航業、輸入商品的運費過分昂貴的省中，如陝西、甘肅、四川的一部分、貴州，手工業還更堅固地維持着。然

而對外貿易的少許復活，運輸的少許改善，其自身便已顯示了手工業之深刻的危機。從這種立場看來，全中國的繁榮比之停滯，貿易道路的破毀和內戰對於手工業還更有害。「小商品生產者感覺到他的利益與其餘社會的利益，處於對立的地位而要求這個壟斷地位的保障，也因此他纔害怕競爭，爲要阻止競爭，爲要『不允許』在自己區域內的競爭者，爲要堅固自己小主人的地位而保持一定範圍的顧客，不管是個人的或集體的，他都需要全部的努力。」（註三十四）帝國主義者爲通商口岸、爲租界、爲鐵路而鬥爭，並且也曾爲市場、爲自由競爭反抗頑固的敵對的組織在全國範圍內的小生產而鬥爭。這種鬥爭可以說還未完結，手工業還想，企圖『不允許』在自己區域內之外國商品或工廠製造品，雖然這種企圖無能爲力。但事實上僅僅對外貿易做成了巨大的活躍，僅僅改善了大工業的地位，僅僅恢復了貿易的道路和運輸，而手工業則沒落下去。這種傾向在一九二八年最顯然了。在一般好市况之下，卽如不是成千累萬，也總有幾百個的手工業者破產了，並且幾千幾萬的手工業工人轉爲失業者。同時小商人也崩潰了下去。在北京有一〇、〇〇〇個手工業者，和商人破產了，在廣州破產的小商人和手工業者的數目也不下數千，在武漢「登記過的」失業者的數目達到九八、三〇九人，就中有一五、〇〇〇產業工人，三五、〇〇〇手工業工人和四一、

○○○店員。

在舊式的藝術的手工業中也充分地保持着行會手工業。這些手工業，在往昔足供奉皇室、上層官僚、富商和地主的。藝術的手工業在一定的非常狹隘的顧客範圍上而工作。在中國上流社會中曾引起重大的推動。改變了道德、興趣、時髦。改變了衣服、形式、裝飾。當着革命以前不是黃金而是白玉（White Jade）算做最漂亮的裝飾品時，皇帝的寶座、皇帝的帽子、上級官員的衣服都以白玉來裝飾。玉商和製造玉石的手工業現代成爲中世紀的密傳。現在對這些工人的需要減少了，因爲外國的旅客的需要不能代替往昔的周圍顧客。但手工業仍以舊的形相存在着，雖然牠的市場縮小了。製造金銀的行會手工業十分堅固地存在着。這種手工業在中國從來沒有達到像在印度那樣完備的水平。（註三十五）孟子、鴉片匣、女人的脂粉和裝飾品都表現着手工業者的玄想和趣味，但不曾顯示出什麼特別。廣州的銀料製造品，甚至於廣州的刺繡和圍涎都沒有什麼藝術的價值，因爲這些物品是爲外國人做的，並且其中沒有什麼「中國的」和藝術的味道。「這些製造品是已經與外國人交易發展的生產物」。從金業行東方面學習期限爲七年，而從銀業行東方面學習期限爲六年。傭工資金比較很好。製造金器的僱工每月可得三十元至一百元，在銀業行東方面工作每月可

得八元至十三元。在中國很少遇見錫、亞鉛、鋁或白金的工作。銅的工作比較普遍。赤銅的工作仍有重大的意義。傳說在十二世紀在中國就已實行赤銅的工作，并且中國人也承認牠是最老的民族藝術。（註三十六）現在這種手工業也日趨於衰落，雖然有些輸出（六〇〇、〇〇〇——七〇〇、〇〇〇擔）和旅行家的商人些許救活了這些手工業。菩薩的塑像、金銀塔、香爐、銅鑼、小艇，都是這些手工業之主要的主题。在上海、廣州、北京，可看出這類手工業有相當的增長，甚至於金屬和木質的彫刻工作及裝飾工作的手工業也有些許增長。在上海、奉天、北京，甚至金屬的彫刻工人已經被商業資本組織在手工工廠之中。（註三十七）此地須注意，「在金屬上的油漆和彫刻工作都是極長久的工作，一件物品有時要經過兩三年纔能製造出來。」（註三十八）這個也就成了這些手工業附屬於商業資本或手工業與商業聯合一起的前提。但這些製造品的輸出和旅行家的購買牠們也還有一個特種的結果。藝術的手工業在需要增加的影響之下而增長起來。在印度，棉紗、毛織團扇、毛氈及玉器製造品的製造達到了行會手工業發展之完全獨特的水平。需要的迅速增加引起了這些製造品的偽造，引起了牠們品質的低劣，引起了手工工廠生產的過渡，最後，引起了手工業的繁榮。（註三十九）在中國也可看見與土耳其、波斯一樣的過程，在那裏，毛氈、美術的靴鞋

及首飾的製造也與南洋短靴、日本紙料和玩具的製造一樣的過渡到更完全的手工廠的方法。但這些手工業的增長是與達到手工工廠生產的過渡聯系着的。有時保存着，有時毀壞了完全不尋常的「生產」，而此種不尋常的「生產」僅僅在中國成爲那些行會的「壟斷權」，在南京，紡織匠過去必須把新的織物交給專門的手工業者——這種手工業者獨佔這項工作——去蕩平。在君主政權推翻之後，新的商社已經不遵守這類規則了。（註四十）在南京尚有整整地二百三十四個從事於栽花工作的園丁；他們組成兩個幫口（在城裏有四五個園丁，在城市近郊有一八九個園丁），在這裏價格共同議定，而手工業是世襲的。（註四十二）但這個——手工業的世襲，世襲的幫員——與其說是社會的範疇，無甯說是生活的一撇。在中國從來沒有過品級制度，即職業的世襲也只是在某些異常專門的生產部門內纔存在。但我們仍可看到，在流通界中，在交易界中，行會的壟斷不僅各個商業部門，不僅各個交易物體，甚至於在這些幫口壟斷範圍內的各種職能也佔有地位。這個說明了一切仲買人，仲介代理人之廣大的普遍性。而他們之不被排擠，乃因他們在這些職能上具有行會壟斷之神聖的傳統。

與手工業者幫口一起的各種苦力幫口起着巨大的作用。此地有壟斷的當然不是苦力，而是一

切企業家、接主和監工。中國的城市和鐵道運輸中，人力車夫和特種的中國單輪車夫都有莫大的意義。大家公認的，僅僅從事於人力車夫的在北京有七〇、〇〇〇人，在上海有五〇、〇〇〇人。同樣也很明白，就一般規則說，人力車和單輪車不是屬於苦力，而是屬於有幾百輛 有時幾千輛的人力車和單輪車的大企業家。並且牠們的出租每每經過三四個包辦人。我們不預備在這個聯系中陳述這種運輸的形相。我們僅僅充分地指出，大部分重物的搬運都是架在搬夫背上；在口岸上，在火車站上都有成千累萬的苦力，他們被組織在頭目或接主領導之下的協會之中。我們也不預備說到關於這類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剝削；關於他們過去和現在反抗打破他們最後飯碗的電車、鐵道、汽車的鬥爭。在這種「職業」關係中，各個集團的企業家和工人是依地域而區分的。行的基礎還那樣有力，就是在一九二八年在上海人力車夫和企業家幫口曾在反抗新捐稅的信號之下宣佈同盟罷工。在上海，屠戶的幫口也進行過類似的罷工。與運輸工人一起的中國城市中的水運工人和清道夫也起着巨大的作用。水運工人同樣也受僱於監工的接主。在這場合，水運工人與人力車夫一樣，是依靠東家的食料和東家供給的宿舍過活的，如果這些可憐的場所一般可以叫做宿舍的話。甚至在城市中也有挑水工人，如像在北京、無錫已經有幾千人從事這種職業。我們要

知道，在中國許多城市中像這類工人——人力車夫、搬夫、水運工人、清道夫、單輪車夫、挑夫，最後，沒有一定職業的苦力、日工苦力、下等苦力——組成工人的大多數。

註一：D. J. M. e. Gowans, Chinese Coolies,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rade-Union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e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88—1889, p. 133—192.

註二：Morse, The Coolies of China, London, 1909.

註三：威廉士。中國之合作，紐約，一九二二，p. 191—194.

註四：S. Gimble, Peking, a Social Survey. New-York 1921, p. 162—190.

註五：亞爾諾德，中國通商年鑑 Vol. I, 1919, p. 243.

註六：同上 p. 346.

註七：同上 p. 538.

註八：同上 V. II, p. 246.

註九：在上海檢案後，商會要求賠償、懲兇、撫恤死者家屬等等。工人曾提出更切實的民族要求和許多工人要求。

註十：Schmoller,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l ingeshaes, S. 84—86.

註十一：亞爾特德，中國通商年鑑，p. 247.

註十二：同上 V. I, p. 127.

註十三：緒州里通商第一一號，一九二七，p. 49—51.

註十四：S. Gamble, Peking, a Social Survey, p. 201.

註十五：同上 p. 199.

註十六：中國經濟通論第二九二號，一九二六，V. IX, p. 188.

註十七：中國經濟月刊第九號，一九二五，V. II, p. 21—22.

註十八：中國經濟通論第二〇〇號，一九二四，p. 2.

註十九：同上第一七四號，一九二四。

註二十：同上第一五四號，一九二四，p. 255.

註二十一：同上第二五四號，一九二五，p. 255.

註二十二：同上第二三號，一九二八，p. 292.

註二十三：同上第三號，一九二八，p. 30.

- 註二十四：同上第一〇號，一九二八，p. 118.
- 註二十五：同上第二二號，一九二八，p. 237.
- 註二十六：同上第二〇號，一九二八，p. 250.
- 註二十七：同上第一七號，一九二八，p. 215.
- 註二十八：中國經濟新聞第八號，一九二七，p. 713.
- 註二十九：中國經濟通詢第二八六號，一九二八，p. 92.
- 註三十：同上，第二八三號，一九二八，p. 47.
- 註三十一：中國經濟月刊第一號，一九二四，p. 2.
- 註三十二：同上，第一號，一九二四，p. 3.
- 註三十三：達漢洛夫，廣西概論，廣東竹詩，第八—九號，一九二六年，廣東出版。
- 註三十四：列寧全集，第三號，p. 257.
- 註三十五："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2, p. 14.
- 註三十六：同書，第十九號，一九一三，p. 66.

註三十七：中國經濟通詢第一七一號，一九二五。

註三十八：“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1912, p. 65.

註三十九：“Gajel, The Industrial Evolution of India, London 1924, p. 38.

註四十：中國經濟通詢第二五號，一九二五。

註四十一：同上，第四六號，一九二五。

* * *

在這些聯系中我們還要說明三個問題：一、手工業工人的狀況，二、手工業者之社會政治的面目。三、革命與反革命對於手工業的影響。

我們必須指出，手工業工人——傭工和學徒的狀況比之產業工人來壞得多，在這一點上考察者都是一致的。「產業工人的勞動規則和條件比之手工業工人來有重要的進步。這是就工作日的長久和工資以及尋找位置的條件而言。這種情形除一般原因之外，可由這種事實來說明，即在廣西熟練的有教育的機器勞動工人非常之少，也因此他們能夠比較容易地得到自己勞動之較好的條件。鐵礦工人却成爲例外，因爲這個地方不需要特別的學習，但他們的勞動條件同樣不好過

手工業者，而在衛生的關係上甚至還要壞些。」（註二）這是達漢洛夫記載的關於廣西手工業工人的狀況。下面來傳達山西省產業和手工業工人的狀況：

「在山西，工人可分爲兩種：新產業部門的工人和舊式生產的工人。鐵路工人、開車工人、機匠及一般近代企業的工人都屬於前一種。這些工人大多數是從天津、上海、漢口來的。他們每月工資從十元到三十元上下。在山西工人中當以這種工人的生活爲最好。他們住着十分舒服的房子，吃着麵粉的食品，有時也吃肉。他們穿得好清潔，甚至有時有些人着西裝。他們穿戴外國式的帽子、皮鞋及中國的短衫和袴子……手工業工人每月可得四元至八元。這個數目除他們自己吃和穿以外并要維持家庭。他們住在土屋裏面，有時住在地窖中或森林地帶的巖洞內。他們的食品對象主要是馬鈴薯或麵食。椰菜和蔬菜在他們看來都是奢侈品；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大概從來不會吃過肉。他們穿的棉布衣。在他們吃和穿的每個月的消費上很難說能夠超過二——二·五元以上。」（註三）。

這個已經是中國考察家的報告。與一個姓孟的中國人一起研究過北京工人狀況的美國自由派的有產者亨伯爾曾得出如下的結論：

「幫口之中，不熟練工人的工資大約低到飢餓的最小限度。熟練工人的工資——石匠和大木匠的工資高過不熟練工人的到七〇%。但他們的經濟狀況也很困難，因為氣候條件的影響他們在一年中有四個月沒有工作。不熟練工人的工資低到他們的大部份甚至無力去結婚。幫口努力維持生活之一定限度的水平。如果意外的條件引起了生活水平之暫時的提高，那麼，幫口却并不想來阻止這個提高。他們當着實際工資的水平已經低到彷彿飢餓的最低限度時，那時纔想到提高工資。」(註三)

是的，在北京從一八五九年到一九二四年中幫口會將工資提高了十一倍，但價格的提高和貨幣的跌價使得這些提高歸於烏有，或者更正確些說，工資的提高只是價格的提高和貨幣跌落的結果。

所以就一般的成例可以說，手工業工人的生活比之產業工人來得壞，手工業工人的工資等於飢餓的最低限度，不熟練工人便無力結婚。不管產業工人受着地獄般的剝削，他們的生活遠較手工業工人為好。這種極壞的剝削在許多關係上還裹着中世紀行會家長制度的外皮。

現在已經完全明白，在中世紀傭工和學徒要住在行東家裏，就因為便於監督他們，便於看管

他們，使得他們不到處工作，使得他們不至與行東競爭以及不至破壞行會規則。這是獨特的一對生產的監督」。行會不但要進行反對走方的手工業者，反對家內工作，反對鄉村手工藝的鬥爭，同時還須與自己的傭工和學徒的競爭奮鬥。所以傭工和學徒要住在行東家裏，所以他們要依行東的食料生活。從行東與傭工的相互關係而來的這種資本主義前期的特點隨着手工業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而消失下去。宗巴特肯定道，在四十年代，最少也可以說，在中等的和不甚大的城市中傭工尚是行東的家僕。在一八六七年，在細木的手工業中，在這一年內全體傭工和學徒有一二·九%尚是住在行東家裏，而在一八七一年已經只有七·三%！（註四）在中國，傭工和學徒常常是行東的家僕。資本主義前期的遺跡仍舊存在於勞動的條件中；資本主義前期的殘餘仍舊架在工人和東家的相互之上。但中國的家長制也已經在瓦解。常常也有這一種情形，即在這種情形之下傭工和學徒都是「家族的成員」、「勞動公社的成員」。但我們知道，在山西手工業工人不住在行東家裏。我們知道，傭工的工資係由三個部分而成：特種工資、生活基金和仲金。日常生活的基金往往保存在自己的東家手裏，因此傭工也就依東家的食料生活。甚至有工人為取得較好的食品還交錢給東家的。但往往也有工人把這部分工資領到手裏而住在外面。由歐洲的讀者看來，這

必然是一個疑謎，這就是一件怪事——措油。「措油」就是工人把工資的一部分交給接主，工頭或組長。其中若干作為工作取得權的賄賂費。另有人說這款項是作為使用生產工具的賠償費。但我們可以說，這款項是為那位給工人工作的人所取得。並且後一說法是正確的。為工作鬥爭是如此的劇烈，這項仲金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從全部工資的四%增到一〇%！至於那個時期的生活必需費則從全部工資的一%增到二〇%。在無錫，建築工人須把自己工資的一〇%付給接主。如像手工工廠的工人住在東家的宿舍裏（不是住在家裏），人力車夫、水運工人等等也同樣往往住在東家的宿舍中和由東家備辦食品，就我們的眼光看來，這比之討厭的手工業中的家長制度當是另一回事。但當着企業家在工人看來還是房屋所有者的時候，當着工人必須到企業家的舖子裏購買的物工制度（truck system）還有効的時候，當着資本家和工人的關係充滿高利貸者和債務者的關係的時候，我們同樣以為這還是屬於一般早期的資本主義的現象。這些現象我們在中國、日本、印度的工廠中尚可看到，在這些工廠內「措油」制度還有很大的力量，這種制度在上海、漢口就有監工，在孟買、加爾各答就有 Sirdar。

家長制、資本主義前期的勞動條件，當然削弱了階級鬭爭，降低了階級意識。就我們知道

的，從一八五九年到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只有過兩次罷工，並且結果兩者都趨於失敗。我們不大知道，行東和傭工之間的鬥爭在中國城市生活中曾發生了若何的作用。就我們所知道的（對於這個問題完全沒有研究過），在太平天國暴動時代，廣西鐵鑛工人曾親自出馬；在回教徒暴動時代，山西、陝西的鐵鑛工人和搬夫一致的站在太平天國方面從事鬥爭。在義和團暴動中船夫和搬夫都起過顯著的作用。所不明白的就是在城市中。據我們所知道的，在幫口中按照行東和傭工的路線所引起的糾紛，在有些城市中於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就已有過。這類鬥爭在一九二五年達到了巨大的範圍，並且我們有權認為，一九二五年是行會與幫口分裂的開始，內部分裂的開始。階級鬥爭毀壞了家長制。一方面行東，另一方面傭工和學徒，彼此相互視為階級敵人而對抗起來。必須了解，行會的傭工并非無產階級的先鋒。牠在歐洲不是站在封建和品級社會的圍欄之外。牠不是站在衝鋒陷陣的地位，「那些不可避免而必須與城市的發生一起形成的脫離階級分子，那些組成一切中世紀的城市住民之下層的無權等級的分子，那些站在公社之外，站在封建的束縛之外，站在行會制度之外的等級分子……這些分子成爲無產階級的前身，他們曾於一七八九年在巴黎近郊引起了革命。」（註五）這是恩格斯寫下的。他也曾對考茨基說過，行會的職工不可以稱爲

無產階級。他們只有在顯示了脫離階級的、非行會的職工小作人的時候纔能成爲無產者，也只有從有這樣的顯示時候起，我們才以把他們算做無產階級。在中國城市中，無產階級的前身是苦力，而非行會的傭工。行會的傭工只有當着他已經不擁護行會制度，當着這個制度解體了，當着產業無產階級已出現了和其他階級的社會面目改變了，當着行會的傭工在階級的意義上已經越出了行會制度的時候纔能成爲無產者。這不是說，行會的行東與傭工之間沒有階級矛盾。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注意到，與領主和農奴之間的階級矛盾一起的關於行會的行東和傭工之間的階級鬥爭乃是封建社會之基本的對抗。但不可以把兩種不同的生產方法的階級鬥爭混在一起。行會的傭工不是無產者。他是按照行會制度解體的程度如何而成爲無產者的。一九二五年解決了這個長期的過程。在中國解決的領域內，在這個意義上已經從數量過渡到質量了。手工業的傭工大體上都已成爲無產階級的組成部分。特別的是廣東資產階級政黨全力把幫口簡單地變爲職工會。在廣州整個時期存在過三個職工會的中心，其中有兩個依其本質來說是建立在幫口的基礎上面。資產階級政黨的領袖們甚至在武漢堅持行東是職工會的會員的權利（一九二七年五月）。在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政黨暫時勝利之後，在職工運動中也曾提出這樣一種原則，這原則與十九世紀歐洲的反

動政黨盡力組織僱工的聯盟無什麼差異。但其基本過程在中國重要的中心區域都已完成了。手工業的僱工和學徒事實上已經退出行會制度并與無產階級結合起來。一九二八年的工人運動表示了手工業工人會給與反革命以後方的搏戰。這種搏戰在一九二九年也是繼續着的，那時一般革命的工人運動又開始了新的高漲。在廣州暴動的時期內，就實質來說，手工業的無產者和苦力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爲蘇維埃政權而進攻。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的革命運動在中國重要的區域內都給了行會制度一個最嚴重的打擊。

此地給了關於政治革命對於行會手工業有過怎樣影響的問題一個答案。在一九二八年對外貿易的復興，工業中的復興過程，道路和鐵路的建設，新工廠和手工工廠的發生都加速了經濟的意義，而行會手工業之緩慢的、苦悶的、可憐的沒落開始在城市，而後又在鄉村。這個不可避免的過程也決定了手工業行東的政治面及其政治的行動。

他的經濟狀況是極端動搖的，也因此適應了他的政治的動搖。他害怕競爭，并懷恨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對他的關係就是競爭的擔負者。手工業者的大多數都懷恨資本主義，因爲資本主義

了他自己。這個說明了抵制英國商品的那個甘地之反資本主義的傾向，不是幫助了手工業，而是幫助了印度的資本主義。事實上不是酒杯，不是農民的紡車，不是家造紡績品佔據了英國的地位，而是孟買的工廠佔據了英國商品的地位。但我們以為在這種關係上，歐洲的與中國的手工業之間有十分重要的差別。在德國中世紀和十九世紀手工業者比較少的剝削傭工（在八十年代在一〇〇個行東方面是七〇個傭工）。在我們身邊所有的材料和證據都說，在中國傭工對於行東的數目的關係要大得多。凡是仍然保存有店舖製造所的地方，在那裏東家與其說是手工業者，無甯說是商人。從此我們可以說，在歐洲，手工業者企圖以類似於農民的節食，過分緊張的勞動以及對自己的傭工和學徒之額外剝削的方法來支持反抗競爭。在中國，行東就有更大的可能把節食和過分緊張的勞動架在自己的傭工和學徒身上了。故當產業工人的運動推醒了行東和手工業工人的時候，當提出了關於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問題的時候，行東就很自然地陷入了反革命的營壘之中。但他即是當反革命的同盟者同樣也是不堅定的。如果一九二七年春天和夏天中國手工業者的行東在工人的要求影響之下走進了反革命的營壘，如果在同年秋天他曾射擊過葉賀的軍隊，如果他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廣州會打碎了共產主義者，那麼，在一九二八年秋天他已經重新站在在

野黨的方面——資產階級政黨左翼的旗幟之下，但沒有越過資產階級政黨的圈欄。中國大資產階級可以投降於帝國主義之前。手工業者不能與帝國主義締結和議，因為帝國主義不能向他讓步，帝國主義要剿滅他。所以手工業者很容易捲入於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但也很容易受反動的烏托邦傾向的壓抑而徬徨起來，動搖起來。他自身常常是剝削者，但商業資本例如估買人也常常以無情的方法來剝削他。除此以外，手工業者也和農民一樣還須設置生產工具——破碎的生產工具。這個就限定了他極其容易地陷入於高利貸者的鐵蹄之下。這個問題——高利貸制在手工業界中的作用——我們完全沒有研究過。但我們知道，在印度手工業者已經不常常設置自己的生產工具，因為他們落到了高利貸商人的手中；而皇家的農業委員，甚至也明瞭了手工業者中之債務奴隸的情形。（註六）在中國必然地有過類似的現象。除開成了資本家的少數僥倖者以外，手工業和手工業者，大都在帝國主義、中國大生產、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打擊之下而沒落下去。手工業者徘徊於革命和反革命的基本力量之間。

這個應當是決定無產階級對於這些等級關係之策略的前提。這問題在殖民地國家內具有莫大的意義。在這些國家內整百整千的，而在某些國家內益千累萬的手工業者，都足影響於城市的情

緒，而往往也影響於鄉村的情緒。

註一：達漢洛夫，廣西概論，廣東什誌，第八——九號，一九二六。

註二：中國經濟月刊第九號，一九二五，二二頁。

註三：T'ien Pei Meng and S. Gumble, Prices, Wages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Peking, 1900—1924, Peking, 1926, p. 110.

註四：容巴特，經濟變革前夜的德意志，一九〇〇，九八——九九頁。

註五：恩格斯給考茨基的信，一封信，莫斯科，「莫斯科工人社」出版，一九二八，三七四頁。

註六：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in India, 1928, p. 435.

第四章 手工工廠的發展

「從手工工廠本身的生產方式看來，在其發展之初，除開比較大量的工人同時爲同一工作和同一資本而工作外差不多與手工工業沒有什麼區別。製造所行會的行東僅僅是擴大自己的規模。所以最初只是數量上的差別。」〔註一〕但即是如此，也很難舉出製造所的手工業者與手工工廠的手工業者間之正確的界限。不僅從生產方式看來，即從勞動手段看來，手工業與手工工廠最初也只是數量上的差別。而「勞動手段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尺度，并且也是遂行那種勞動的社會關係的指標，因爲區分經濟之階級的不是生產，而是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手段生產。」〔註二〕勞動手段在手工工廠中即使與在手工業中一樣，但社會關係已經開始了變革。列甯考究資本主義的手工廠的意義和本質就在於牠「是手工業生產與小商品生產之間及資本的原始形態與大機器工業（工廠）之間的一個居間連環。」〔註三〕但在手工工廠的生產方式之下，遺留下來的僅僅是從前的勞動手段。而社會的關係和手工工廠自身的關係則變動了。「隨着手工工廠的行會形式自由出現的

同時迅速地變革了所有權的關係。自然的，閱閱的資本向前的第一步乃為商人所促成，而商人資本是動的資本，是具有現代字義的資本，如就表現於當時關係的應用而論。向前的第二步便是手工工廠的出現，——手工工廠依着自己的順序而動員大量的自然資本，一般說來，與大量的自然資本相較則擴大了大量的動的資本。

「隨着手工工廠而來的工人對於僱主的關係也變動了。在行會中僱工和行東之間繼續存在着家長制的關係；在手工工廠中已經在他們的地位上表現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貨幣關係，雖然他們在鄉村和小城市中繼續帶着家長制的性質，但在大的真正的手工工廠的城市中很早就已失去一切家長制的色彩了。

「商業和手工工廠的擴大加速了動的資本的積疊，即如在行會中，對於生產的擴大也給了大的推動，至於停留在這些範圍中的自然資本甚至也減少了。」（註四）

在歐洲手工工廠之歷史的發展開始在意大利和佛蘭德爾，在那裏手工工廠最初就很優越地為外部市場而工作，隨後在英國和法國，在那裏最初為內部市場所限制。從手工工廠過渡到大機器工業在歐洲差不多經過三個世紀纔完成。

如果說到中國協業的歷史，那就必須指出，中國先於歐洲好幾個世紀。馬克思曾經指出，從工業發展看來，水的調節有過莫大意義。他也指出過羅巴爾、荷蘭和埃及的許多實例。灌溉系統和反抗河流氾濫的大建築的設立，隨後萬里長城的建築，運河的開闢以及道路的敷設都是中國協業之主要的形式，但協業在工業生產的領域內也會佔有地位。全國需要鑄錢、武器及各種家具的金屬，必須發展鑛業。早在十一世紀，除金、銀外，在國有的鑛山上就已開採了八、六九三噸的銅，三、二七四噸的鐵，五、四七四噸的錫，一、三八二噸的亞鉛，并且年鑑記載，在一二三六年有七六〇家，在一二三七年有一、〇〇〇家為鑄鑄生鐵被強迫遷徙到山西，而在一二三六年有一一、〇〇〇家，在一二六四年有四、〇〇〇家為同樣的目的而被遷徙到山東。（註五）成千成萬的家庭都為着開採銀子和從事金山的工作而動員起來。生產是無疑的大規模。亞刺伯的旅行家曾經指出，在十六世中國艦隊有一隻帆船，在這船上船員和水兵有一千人。（註六）無疑地，造船業已經發展了，并且在十九世紀中葉在白河、湖南和浙江事實上成千累萬的工人為大的造船企業而工作。馬克博羅告訴說，現時的杭州尚有工人總數從二十到四十的製造所。（註七）在十三世紀在杭州就已經有「圍繞政府官邸周圍的許多製造所，在那裏手工業者製造上等的着物、用具和軍器

……在那裏有一、六〇〇個手工業者行東，其中每個手工業者行東都統率着三個或四個傭工。」（註八）（這些手工業者便是官府的奴隸）。我們知道，早在十一世紀就已經有大的陶器手工工廠和最大的景德鎮磁器手工工廠，牠們發展的時候，那時候在法蘭西就連王家手工工廠也還不會夢想到。造幣廠、軍器製造所及大多數寺院同樣都是大生產的場所。

如果我們轉來說到這些生產在十九世紀初葉的狀況（那時與歐洲交通開始引起了中國在經濟上之深刻的變動），那麼，我們以為鑛業（開採煤炭和生鐵）不會受着及時的變動，磁業已經走向衰落，陶器不發展了；在滿洲政權安定和歐人侵入以後，便開始了大的造船業的危機。據威廉士報告，在廣州有五、〇〇〇多的鞋匠和六、〇〇〇多的絲織匠。（註九）但我們不大明白，絲織匠是否已經組織在手工工廠之中。反之，所有統計材料都證明，在基本的絲業中却都是家內工作。最知名的俄國修道士洋欽佛也只是說，「政府擁有三個絲廠：在江甯府、徐州府和杭州府。這些工廠專為朝廷製造各種絲織物，而製造的數量依照皇室總管認為足夠一年的消費便得。朝廷絲織物的式樣一如歐俗每經過十年或朝代變更都必須換樣。在杭州府製造的最上等的絲織物是預定供給皇室的人，并且由陸路輸送，而別的則從水路運輸。」（註十）

而北京乃爲當時皇室的所在地，甚至也找不着較大的工廠；但在有些複雜的美術製造品的製造中，一種物品的生產也有分做幾部份的；例如人造花的工作，一個把草心切成葉瓣，另一個把這些葉瓣組成爲花；花的染色要經過三道手。至於綿角燈的工作形式，從綿羊角的纖維起到最後鉗鐵的部分止全部要經過六道手。

人造花的工作生產於各種家庭和家族中，而綿角燈則由一個工廠來製造——僅僅由各個人來製造。（註十二）

在歐洲，紡織業是手工工廠的第一種，而且也是主要的一種。一隨着人口的增加於是擴大了對於衣着材料的需要，開始加速了自然資本的流通、積疊和動員，由這些所引起的及由交通不斷的擴大所孕育的對於奢侈品對象的需要給了紡織業在數量和質量的關係上一個推動，而將牠從以前的生產形式中解脫出來。（註十二）

恩格斯在其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日給考茨基的信中（註十三）指出紡織業，惟有非行會的紡織業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及非行會的織工小作人對於無產階級的發展有重大的意義。我們相當地可以說，中國紡織業在某些重要的尺度上不會發展到手工工廠。棉織品的生產、蔴織品的生產、以及

除了皇家手工工廠外之絲織品的生產都是城市和鄉村的家庭工業。貧農和城市貧民在中國的特殊條件中，在異常嚴重的剝削之下，不僅供給了城市，在一定的限度內，甚至也供給了外部市場之紡織的必需量。這點是否是中國本身的力量不會發展到大機器生產之一個重要原因呢？

在其他的生產部門中，工人的缺乏不會激起技術的改善。中國人早就知道穿孔的技術。他們在四川開採食鹽就是應用這種技術。他們曾經發明羅盤針、火藥、印刷技術、鑛業技術等等。但在這些事業上停止了。中國鄉村為要將這些生產供給於工人，經常都是排擠了大量的苦力；至於國家則以強迫的規例禁錮自己的工人。照恩格斯的話來說，生產手段統殺了人類。由於工人的充斥便阻止了技術的發展。「骨幣構造的遺骸，對於研究滅跡動物的組織有重大意義；勞動工具的遺型，對於研究社會經濟的組織同樣有重大意義。」（註十四）在手工業者製造所中的工具，特別是在手工工廠中的工具，只是集合了從前的勞動手段，只是已滅跡的社會之已滅跡的生產形式的工具而已。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給了中國生產過程以新的組織，並且也給以新的勞動手段、新的推動機、新的化學方法和式樣。但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發生了第二個困難。我們要想在手工工廠和工廠之間舉出正確的界限是異常地困難。

註一：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二九八頁。

註二：同上，一五一頁。

註三：列寧全集第三卷，二九九頁。

註四：馬克思與恩格斯叢刊第一冊，二三七——二三八頁。

註五：W. F. Collins, Mineral enterprise in China, 1922, p. 71-22.

註六：沙發諾夫，中國歷史上之各階級和階級鬥爭，一九二八，二四七頁。

註七：馬克博羅遊記，第二集，一八六頁。

註八：沙發諾夫，中國歷史上之各階級和階級鬥爭，一九二八，二五九頁。

註九：Williams, Middle Kingdom.

註十：洋欽佛，在公民和道德狀態中的中國，四二頁。

註十一：同上，三九——四〇頁。

註十二：馬克思與恩格斯叢刊第一冊，二三九頁。

註十三：一封信，莫斯科工人社出版，三七五頁。

第四章 手工工廠的發展

註十四：資本論第一卷，一五一頁。

在中國一切手工工廠中紡織業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起着重要作用。在別個地方我們已經詳細地指出了中國紡織事業發展的進程和紡織手工工廠發生的過程。（註一）此地我們充分地可以說，紡織手工工廠的發展促成了技術的革命，革命雖然也局部地延長了這種職業的生命。與舊式木織機一起的已經出現了近代的木織機，而有些地方也有鐵織機出現。新的生產工具代替舊的生產工具於是提高了勞動生產性，在近代木織機的應用之下提高二倍以上，在鐵織機的應用之下提高四——五倍以上。類似的技術革命在紡織的事業中也開始了，僅僅在一九〇八年在漢口就已採用了第一架扎卡爾德式的紡織機。（註二）比較廣佈的紡織手工工廠我們將不去舉例說明了。我們充分地指出，在每個城市中都有不少的手工工廠，在紡織業的中心，如河北（直隸）省即在鄉村中也有大或小的許多手工工廠。在山東一個富農往往在自己家中都擁有四——六架紡織機。在最發達的城市中，凡有電力設置的地方都已開始了這類生產之新的技術革命。電汽即是變手工工廠為工廠的推動力，在奉天在一九二四年就已有二十多個紡織手工工廠，其中有十七個是以人類勞動為

發動力，而其餘三個則以電力工作。在全部手工工廠中共有一千八百二十四架紡織機，在用電力發動的手工工廠中一個工人可以工作兩架機器，而在徒手的手工工廠中，一般說來，在一架機器上要兩人工作——一個織工資格的工人和一個「發動」資格的學徒。「用電力發動之紡織機的生產性高過用徒手發動之紡織機的生產性兩倍。」（註三）（我們順便指出，在一九一七大戰時期的市況下，奉天有七千四百架紡織機工作，而不是一千八百二十四架！）所以在用電力發動的紡織機上一個工人的勞動生產性高過在舊式紡織機上一個工人的勞動生產性八——十倍。

至於手工工廠之類似的不精確性，及同時那樣的技術進步我們在牛莊也可看到。那裏在一九二一年，九十八個手工工廠有一千三百二十一架織機，在一九二五年，一百二十個手工工廠有二千架織機，而在一九二七年，八十七個手工工廠有一千二百架織機。在一九一五年就已開始採用電力，而現時在二十四個企業中有五百架織機運用電力。（註四）這是說，企業和織機數目的減少并非就是生產之同等的減少。

生產手段在技術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并行存在着，無錫便是個很好的例子。在那裏十七個手工工廠中有一個採用鐵的織機，三個採用有銅鐵組成部份的木織機，十三個採用木織機（註五）。類

似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在絲織業的領域內看到。毫無疑義，大部份的絲織品完全還是在農民經濟中製造的。但在這類生產部門內勞動之手工工廠的組織化已經給與莫大便利，並且絲織業盡量地集中於城市手工工廠之中。

在杭州現時已經有四千多架近代絲織機，在湖州有三千多架近代絲織機，而在長江流域和廣東，家庭工業和手工工廠性質的絲織業仍舊佔着顯著的地位。如果我們注意從中國輸出的生絲只有三三八%，而有六二%為內部市場所消費，如果我們注意（不管別種織品——人造絲也包括在內的競爭）絲在富有等級的人民之衣着材料上尚有重大的作用，那麼，很顯然，絲織業有極大的意義。

我們簡略地指出，依照綿織品和絲織品生產加强的程度，染料業和顏料業也強大起來，並且過渡成爲手工工廠，在上海，僅僅法國租界就有工人總數二千人的四十個顏料手工工廠。

近來編織物的手工工廠在上海、漢口及其他城市都獲得了異常重大的意義。有的企業有幾百工人從事工作。僅僅在上海就有六十個很大的手工工廠，就中有幾個非常之大。在漢口的手工工廠，不僅有一百架機器的，有六十到八十架機器的，並且也有三或四架機器的。在蕪湖有二十二

個編織手工工廠，機器的總數八百架，有一個商社設置着四百架機器，在這些機器上工作的有八百個工人。編織品的輸出盡量地增長，並且印度就受到中國競爭的痛苦。機器的大廉價助長了這類生產和家庭工業性質的生產之廣佈（一架編織機值二十元），雖然，一般說來，機器在租賃上受着大企業家的壓迫。編織品的輸出作成了生產大量商品之必須的標準，安置了這類生產強固的基礎。差不多每省，或者更正確些說，差不多每個軍閥都有自己供給兵士軍裝之官辦的縫衣手工工廠。在這類官辦的手工工廠中照例是孤兒工作。剝削成了慈善事業。在北京，在軍衣手工工廠中的四百五十個孤兒都是受着最壞的剝削。

註一：馬吉亞爾，中國農村經濟，二九七——三〇三頁。

註二：廖仲凱，中國的工業和財政，二三六頁。

註三：中國經濟通詢，一九二五年，九〇頁。

註四：中國經濟雜誌，第一號，一九二八年。

註五：中國經濟通詢，第三號，三三五頁。

毫無疑義，中國最古的手工廠是陶器和磁器的手工廠。這些生產會於何時開始的，——無須我們去判斷。這類事業之最傑出的鑒別家布林開利曾肯定道，歷史文件證明，陶器事業在中國已經存在了二六九八年，而磁器的手工廠存在於我們的時代以前二〇二二年和八八年之間（註一）。這類事業的同樣傑出的鑒別家培羅格肯定道，中國人知道陶器事業僅僅在我們的世紀前一七〇〇年，而磁器則在我們的世紀前一八〇〇年纔知道。（註二）事實上，資產階級的「中國通」比之農民的來對於這類問題是會一百倍的大注意而特注意的。我們對這個重要生產的發展不預備去作歷史的概述。在一六二五年安特科爾牧師曾肯定道，磁器手工廠主要的中心——景德鎮有一百萬住民。沙發諾夫從他的記載中作出結論道，在十七世紀，在景德鎮曾有皇帝的農奴的手工廠，強迫貴族的子弟與僱用的工役一起服役。（註三）固然，安特科爾自己說過，那裏的大商人都擁有可驚的數量的工人。很明顯，那裏有的不是皇帝的而是農奴的企業。倫格佛爾曾經歌頌景德鎮，因為那裏有三千個爐灶和一百萬工人。在十九世紀初年到過景德鎮的旅行家也曾說，城市住民在一百萬人以上，并且就城市的外部形式與伯明罕比較起來，其差別僅僅景德鎮生產的不是銅鐵而是磁器而已。（註四）如果這種種的判斷有一半或者即有四分之一正確的話，那麼，毫無疑

義，景德鎮會是資本主義前期的歷史之最大的產業中心，並且也用不着什麼大驚小怪，在十二世紀中國不僅輸出磁器製造品到印度、亞刺伯、亞非利加，並且從十四世紀也開始輸出到歐洲。大規模的輸入於歐洲是在十七世紀東印度公司開始的時候。但也正當這個時期開始了生產的衰落和退化。當時在歐洲和美洲都開始徵逐「真正的中國古磁器」，而在中國則開始了磁器的廢造。到十九世紀中葉，景德鎮已經衰落了。日本和法國的生產追到了牠的前面。太平軍佔領了景德鎮，爲要剿滅和斷念令人的咀咒的磁器的進貢，於是好的皇鑿破壞了。到十九世紀末葉，海關監督報告，在景德鎮有一百二十個煨燒的爐灶和全體十六萬工人。（註五）一九〇四年的洪水引起了巨大的破壞。而在一九二八年，景德鎮的住民不見得會超過三十萬人；磁器手工工廠的工人走到同盟罷工，並且企業家的代表要求南京政府挽救古舊的第一等的生產的厄運。（註六）一方面，日本、德國、法國的競爭，另一方面，內部市場的縮小，給了景德鎮以嚴重的打擊。但當時由於日本、德國、法國等等的生產競爭使全部惡化了，生產費提高了，運輸條件惡化了；當時沿河七里的距離要繼續走上兩三天，全部器具有二〇%殘缺不全，在百里以內沒有森林，即是說在景德鎮的周圍沒有燃料；當時輸送煤炭的昂貴，新木的昂貴，技術的落後，企業家之資本的缺乏，世界市場

爲龐大的卡特爾（在德國已經聯合了二十二個大商社）所統治；當時雜稅、厘金窒礙了生產；當時勞動組織與中世紀很難說有什麼差別，在這一條件之下，景德鎮能夠抵當得住嗎？我們不大知道，在景德鎮究竟有若干工人，但僅僅從事採取原料——粘土的工人就有一萬。工人按照工作的種類而組織行會。分工異常地散碎。三個基本的機能——製造器具、燒煨和修飾——又細分爲許多副機能。製造器具分爲五種，燒煨分爲四種。有兩個新的企業已經採用了新式機器。有一個窯爐已經應用煤炭爲燃料。很明顯，煨燒的爐灶是租借來的。而全部事業都隸屬於漢口和上海的幾個銀行和大商社。（註七）恢復景德鎮過去榮譽之掙扎的企圖到今日已成最後的失敗了。現在許多窯灶都已經在製造普通的用具。最大的中世紀的手工工廠解體了……

陶器手工工廠乃是典型的中國式的手工工廠。陶器業是鄉村手工藝之最主要的部份，但給鄉村手工工廠以滿足的其主要部份則爲城市的需要。宜興的手工工廠特別著名。牠們大概在我們的世紀前五個世紀就已存在了。牠們在十四世紀——十六世紀已經達到最高度的發展水平。在現時已有六十三個窯灶，而屬於生產範圍的如三千個爲製造器具而開採原料的工人。每年的生產價值等於一百萬圓。近鄉的全體住民有六〇%都從事手工工廠的工作。商品經過仲介人出賣，仲介人

取得商品價值六——七%的仲金。除厘金外還有五〇%的捐稅。(註八)陶器手工工廠的生產組織是異常地有趣和特別。在漢寧(滿州里)，這種生產的中心地，作坊主人要到佔有者那裏租借窯灶。而工人依照組合的基礎組織起來。每個作坊有一個組合，於七十個之中有四——五個行東、四——五個傭工、一——五個煨燒者，其餘的都是工人。其次，工人有的被僱爲運水和粘土，有的被僱爲燒煨窯灶等等。這種工人的數目有時達到一百五十人；他們之中很多小孩子、這種工人受僱於組合。利潤分配的形式如下：指定八%給作坊主人，三八%給行東和傭工(這種行東和傭工依五五：四五的比例分配自己的部份)，而五四%則給組合之其他人員。然而作坊主人并非僅僅獲得八%。「作坊主的店舖，除東家的糧食外，還要供給工人及其家屬的一切，直到鴉片烟爲止，在這裏非常貧困。工人處於永遠的債務之中。工人的家屬甚至終其身陷於債務之中而莫能自拔。」對於這我們還須加以補充，討厭的住宅條件、無止境的感冒風寒、從粘土工作而來的可怕的職務上的手痛病，此外我們還可明白，家長制的組合組織退化成爲了債務的奴隸。商品經過仲介人出售。在冬季的時候組合的人員也被走方的商人所僱用。作坊主人與市場沒有直接的聯繫。所以一切組合共同形成了一個幫口，并且「漢寧不知道這種情形，即作坊實行照着低於確定的價

格而秘密出賣的情形」，格拉西莫夫在其非常有興趣的論文中曾這樣寫（註九）。至於在廣東的陶器手工工廠中也有這樣的生產行程和組織。從明朝時候起在生產技術中沒有起過任何的變化。僅僅在磁器的顏色上採用了德國的樣式。（註十）類似的組織我們在磚瓦的手工工廠中也可遇到，如果可以這樣呼牠們的話。牠們差不多在每個城市的近郊都有。牠們特別廣佈於鐵道的近傍，在那裏有可能轉運商品製造品。牠們增長於已發達的城市的附近。在龍潭（江蘇）自鐵道建築以後，企業的數目從二——三個增加到四十個，而燒磚瓦窯灶也差不多增加到四十個（註十二）。我們必須指出，工人是企業的「股東」或「成員」，即是說，在這種生產部門內保持了組合組織之一切的魔力。組合殘酷地剝削日工，而接主和作坊主則更殘酷地剝削組合的人員。表面上看來，這種組織的魔力就在組合之家長制的特點隱蔽了高利貸制、物工制度等等。

在陶器和磚瓦的生產場合內，生產的技術——煨燒窯灶的必需——或多或少地限制了器具和磚瓦之大量的生產。在這裏技術的成份成爲組織的基礎。與組合的勞動組織類似的手工工廠的聯合在壓榨甘蔗液汁的手工工廠中也有地位。甘蔗的種植久已趨於衰落，從台灣、爪哇、古巴來的白糖排擠了中國出產的白糖。但在離商品輸入較遠的地方與在沒有接近大的製糖廠的地方，如像

廣東，原料由香港的作坊供給，還盡量地保持着甘蔗的栽種，并且也保持着榨糖的手工工廠。這些手工工廠通常隸屬於生產甘蔗的農民協作社。農民協作社的聯合，便將手工工廠出租給工人組合。而組合取得與工作同等的工資。組合的基礎通常與同鄉會結合一起，隱蔽了「作坊主人」或組合頭目方面之最壞的剝削形式。同時也和俄國民粹派的著名的組合一樣，重要地是與農村經濟聯系一起（牛奶棚、油業、伐木業等），在中國組合也「保存」於產業活動之中；當然保存於完全頹廢的形態之中——不是集體勞動的細胞，而是與高利貸制、物工制度等等相聯合之原始積疊較壞式樣的細胞。類似的組合在內蒙古和殖民地區域，由僱工來組織，組合往往在大土地的投機家 and 地主的土地上從事集體佃戶的工作。

組合的基礎也保存於舊式的鑛山的產業中，這種產業稱之為手工工廠也許不正確，雖然在這些產業之中無疑地有過同樣的協業。這種中國式的鑛工組合和一般鑛業組織的組合與中世紀歐洲的鑛山企業並沒有什麼差別。泰洛爾的銀屬的勞動過渡到自由鑛工的組合便是一例；在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歐洲的鑛山企業所有者被排擠於「工人協作聯合」之外，而協作聯合僅僅支付土地所有者以地租。這些組合分配所得與農民分配割讓地一樣，應用了組合對於所有者關係之連環保證的

原則。但歐洲在十三世紀組合的成員間就已經開始了分化，最後這種分化引起了組合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企業。(註十二)直到今天組合的組織尚「保存」在山西、山東等省的舊式的鑛山企業家之中。當然沒有達到并且也無須乎達到俄羅斯民粹派心靈中之組合的理想化。下面是十九世紀中葉外國人給與組合的記載。(註十三)

組合從自己中間選出組長，組長受組合工人的信託并依照他的職權執行仲裁；雖然負有管理各種行政的職能，甚至關於贖買組合的糧食和出賣組合的生產品(煤炭、鑛物)，然而他對於組合成員的關係并不具有什麼權力。一切事情通常都由於組合全體成員大會或大多數投票來解決。

以組合成員入股金而成的不法的貨幣手段(有時股金為三——五盧布)來設立的屬於工人組合的企業，在大多數情形之下是失去了向前發展的可能性，而往往只是一定的工人組合成員之一種生存手段；有時這些企業因地方當局以非法的舉動來要求鑛山財富開採權的代價(最顯著的情形，就是當着工人組合開採荒地時，例如開採銅鑛，他們之所以能夠拒絕地方當局之剝奪的僅僅是因爲地方當局已從他們那裏要求過一〇、〇〇〇——七〇、〇〇〇兩)。(註十四)組合通常是從二〇——三〇人組織而成；組合成員差不多常常都是一個村落的人或隣村的人。

中國從事鑛山工業的工人組合究竟有多少，因為見聞的十分缺乏幾乎不允許我們來說；明顯的就是在中國各省中煤的開採以及銅、金、銀、鐵等等的開採都是由工人組合來生產。僅僅只有一部分見聞允許我們說，例如在石炭工業中，組合的基礎達到廣大的應用，而在某幾省甚至當局加以獎勵，（參看東方研究院新聞，第十卷，一九〇四年，二七一——二一八頁，及中國經濟通詢第二一七號，一九二四年）。各省關於石炭工業的報告，在一九二八年曾登載於申報和民國日報，明指組合的企業在山西、河南、直隸、雲南等省繼續繁榮着。這些見聞證實了一種報告，即在山西各縣由工人組合開採小的石炭鑛坑有好幾百個。

與屬於工人組合的鑛山企業并行存在的還有個別的小企業或小股東企業；後一形式的企業在中國鑛山企業中特別廣佈。若從勞動力的立場來判斷這類企業的範圍，那麼，首先可以說，這類企業不能算做小企業，因為企業內有二百多做工的工人；但如果注意到這類企業的生產品範圍，那麼，可以說二百多工人一天採掘的煤炭尚不到八十噸。要說明這個，便是這類企業的技術的設置尚是最原始的，尚停頓在前世紀九十年代的狀態。（註十五）

小的鑛山企業，例如石炭企業，其生產物重要是投資於地方市場；為出賣商品之售貨場的組

織和很快的獲得現金對於小企業，姑無論是組合或私人企業家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爲出賣商品之行情與計算的問題通常在大多數場合之下，小企業都是握在地方商人或煤炭貿易商社的手中。

根據直隸、河南、山東和其他各省所有的見聞，我們可以指出，大多數小的鑛山企業，特別是工人組合的，事實上都是煤炭貿易商的私有財產，他們確定價格，煤炭依照這種價格出賣，賣款於企業，預定出品的標準、期間等等；往往如果商人確信事業的有利，那股份就不斷地被這商人佔有，而佔有股份的工人組合便是這商人或公司的工人。

從這些記載尙難斷定，工人組合自身瓦解了幾久。表面上，階級的牧歌在一八七五年就已經沒有，當時帕威爾曾發表他自己的記載，而在我們的今日更是沒有。一切組合整個受着商人的剝削，而組合的成員則受着組合頭目的剝削。

不待說，甚至屈服於商業資本的舊式鑛業也只有有在離鐵道很遠的地方纔能存在，在那裏尙沒有開始近代鑛業的發展。技術的探掘僅僅在尙不需要吸水唧筒的地方，在沒有地下水的地方纔有可能，因爲即是這個決定探掘的範圍。這些鑛坑經常只有不多的生產品，一星期從五〇——二〇〇噸，這裏一個鑛工的生產性等於〇·七五——一噸的煤炭。一噸煤炭的價格在鑛坑爲二·五〇

元，而在城市爲四·五〇元；高度的運輸費決定了舊式的鑛坑僅僅能夠爲地方市場而工作。凡在運輸改良了的地方，在那裏便已開始過渡到近代採掘煤炭的方式。（註十六）在山西許多地方鐵鑛的開採也組織在這樣的基礎上面。至於實際的差別完全在於鐵鑛在鎔鐵爐中製造，及鎔鐵爐的佔有者完全把自己隸屬於採掘鐵鑛的組合之中。

完全屈服於財政資本的中世紀生產在雲南鎔丘附近的著名的錫鑛山上可以看到。英、法資本家二十年來爲着鑛山，即一般爲着雲南鑛山的財富進行了最頑強的鬥爭。他們從北京政府取得了租借地，但不能征服本地方與鑛山有利害關係之絕望的頑固的反抗。地方當局簡單地逮捕出賣自己的鑛山和租讓土地的國賊。（註十七）反抗是這樣的頑強，使租借者在一九〇九年放棄了自己的「權利」。採掘的技術僅僅改良了在應用爆發物體的時候而不至有精神的反抗。礦工大都是從雲南和貴州一帶而來。採掘物的生產只在多雨的季候。當着生產轉向充分活動的時候，工人的數目可達到一〇〇、〇〇〇人。鑛坑的佔有者登記工人的組合。每個組合在組合頭目領導之下由五十人組織而成，其中分爲五個小組。這些組合不能分得利潤。他們僅僅取得工資。鑛工每個月可得八元，洗鑛工人每月可得二十元。組合頭目獲得十元到三十元的工人的登記費。錫鑛需要鎔解。鎔

解在專門的作坊中進行。「鎔丘實際上是這些作坊主在省當局有限的監督下的獨立共和國。這些作坊主的幫口保護自己幫員的利益而反對外人的侵入。這些作坊主的支配權由剝奪工人和剝奪礦坑佔有者來支持，因為後者不得不照最低的價格出賣自己的鑛產。往往鎔鐵爐的佔有者也佔有礦坑。在鎔丘六十個鎔鐵爐的佔有者無限制的統治着市場。」（註十八）這些作坊主的幫口爲了最後投降於財政資本之前而驅除英法的租借者。這個簡單地實現了。爲保證自己的壟斷給與省政府以五%的採掘的錫之出賣權；而後來唐繼堯省長壟斷了全部錫的出賣權，并將牠出賣給香港製錫的作坊。唐繼堯死後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遺產。海豐和香港的資本家都握有錫的壟斷權。雲南錫的開採隨着馬來島錫的開採的增加和錫價的低落而遭逢異常嚴重的危機。

在一九一六年輸出爲七七、〇〇〇噸；一九一七年爲一一、九〇〇噸；一九一八年爲八、八〇〇噸；一九一九年爲八、八〇〇噸、一九二〇年爲一一、五〇〇噸；一九二一年爲六、一〇〇噸；一九二二年爲九，一〇〇噸。

一九二九——三〇年的世界經濟危機，這個時期錫的生產過剩引起了錫價特別猛烈的下降，

移轉到中國。

在湖南省採掘錫的鑛坑數目非常之多。牠的開採開始於一八九五年，當時日本銅鐵鑛已告枯竭。鑛產企業小而散漫。也因這種情形資本霸佔了錫鑛鎔解的過程。在一九〇九年商社對於應用黑林斯米特過程的壟斷，獲得了地方官吏和紳士的協助。這個壟斷曾於一九二一年復興起來。（註十九）恰如中世紀之歐洲一樣，各個企業家都佔有鎔解的銀鑛并將全部生產隸屬於自己。（註二十）正確地說，同樣也獲得了鎔解的錫。所有的差別在於帝國主義屈服了中國的壟斷者自身。美國資本之必須保證自己對於錫的貿易的壟斷正如當時英國資本之必須保證華茶貿易的壟斷一樣。錫的交易不是長沙而是紐約。鋼鐵生產的縮小和一九二九——三〇年汽車危機時，這類生產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機。

世界大戰給了錫的開採以巨大的推動。在一九一四年一噸錫的價格增高六倍。當時即中國自己也開始了鑛產的改造。

中世紀的工人組合和中世紀的鎔鐵爐佔有者的幫口都一樣的屈服於財政資本。

我們不大明白，製紙手工工廠——這種手工工廠同樣是屬於中國古代的生產——的組合組織

所存在的這種或那種形態。這種手工工廠設立在河邊或溪邊，因為對於紙的原料（竹、蒿、樹皮、穀、木材等等）的改造需大量的清水。大家都知道，馬克思知道中國和印度製紙的兩種古代亞細亞的生產形式。（註二十一）這兩種形式一直存在到今天。外國紙輸入的增加，特別有力的是在革命時期的增加，似乎在這種生產部門內還很少反映出來。中國甚至輸出紙到有大批中國僑民的地方。僑外的中國人都喜歡用「自己的」紙。製紙手工工廠特別廣佈於浙江、廣東和福建。有人推測，在福建紙的生產品的價值當在八、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註二十二）

然而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建立了紡織的和顏料的手工工廠，不僅改造了舊式的手工工廠，并且也引起了整批的舊式生產部門——這些生產部門以前是以手工業勞動或家庭勞動來履行——之手工工廠的建立。

在北京、天津以及華北的許多城市中有成百成千的毛氈手工工廠。在北京依賴於好市況，牠的數目曾達到二〇〇——三五〇；然在這些企業中只有十九個每個有十九個以上的工人工作。（註二十三）這些工人差不多都是小孩。據亨伯爾的統計，從事這種生產的工人有九七％是小孩。（註二十四）工作日——九——一一小時。在天津牠的數目據說更要多些。在五百個手工工廠中僅僅

只有兩個置有資本在一〇〇、〇〇〇元以上。其餘的都是小企業，資本從一千元到二千元不等。在一九二四年在天津從事毛氈手工工廠工作的工人約有一〇〇、〇〇〇人。（註二十五）但這種生產也一樣的存在着嚴重的危機。美國以前爲八〇%的輸出地，而現在已經退出中國市場轉向土耳其和波斯購買了。所以輸出在一九二七年降落到五〇%。在今日英國是重要的購買者。毛氈之藝術價值幾等於零。

南京以天鵝絨的手工工廠而誇耀。革命前有三百八十個企業，全部「機架」數目爲一、一〇〇，在一九二四年三百五十個企業機架爲八〇〇，而從這時起還關閉了二十四個企業。按照機架的數目看來，企業又分爲三類，一種形式——杜家——有十個，而另一種——段家——有三個大的手工工廠。集中的過程以很快的速度進行。（註二十六）

在湖鄉村（江蘇）整個村莊差不多都是家造彫刻匠，他們用粘土雕塑一切的偶像。以前家造者自己貿易自己的出品。現在已經有四十六家收買這類出品的舖子，而有些舖子，已經創設了自己的彫刻手工工廠。（註二十七）

在山東髮網的製造會起了異常重大的作用。這種生產在過去是家庭工業，我們不誇大的說，

當着這種生產正繁盛時，從事於製作的有五〇〇、〇〇〇農民。現在隨着剪髮的時髦風氣髮網的輸出便激劇的低落了。也正在這個時期在濟南設立了幾個大的手工工廠，有二、〇〇〇婦女工作。（註二十八）如像鈕扣手工工廠一樣，這種手工工廠也存在了嚴重的危機。

在現在整批的舊式手工業生產都已經生長成爲手工工廠，例如：製造燈子的手工工廠，製造桌子的手工工廠，製造一切對於禮教的、宗教的、政治的及生活的儀式所必需的紙炮、火槓和材料的手工工廠，製造煙火的手工工廠，製造通俗玩具等等的手工工廠。依着生活和習慣的改變發生了新的需要。在中國已經有牙刷的需要。牙刷在從五個到十個工人的手工工廠製造，在這裏實行高度的分工；一個工人做骨子，另一個在骨子裏穿孔，第三個裝毛等等。在中國已經在穿歐洲式的靴鞋。對於牠也需要刷子。在奉天刷子在十分巨大的手工工廠中製造。在中國也編製牙簽。牙簽從日本輸入。突如其來的抵制日貨，於是發生了製造牙簽的手工工廠。草蓆和編織物的製造是最普遍的生產部門，在溫州和許多其他城市便有幾打的手工工廠。蠟燭的製造在許多地方也已經過渡到手工工廠的生產。

在福州的肥皂手工工廠有從五〇〇元到五、〇〇〇元的資本，而工人的數目從五人到二十

人。在武漢有八個肥皂手工工廠。投入這一產業部門內的資本將近一百萬元，牠的每年生產品的價值在一百萬元以上。大的手工工廠資本在二十五萬元，小的二萬三千元。這些手工工廠依其規模而論已經可以說是工廠。肥皂手工工廠大都以植物的蠟、棉油、豆油等等為原料。近代形式的肥皂鍋子極其便宜（八〇〇——一〇〇〇元），壓榨機約六〇——七〇元，也因此以不多的資本便可組織手工工廠，甚至凡在以蒸汽通過管來發熱的地方都是近代的形式。（註二十九）而舊式的手工工廠則使用無蒸汽熱的簡單的鍋子，雖然在這種方法之下在肥皂泡中有四〇——五〇%的水。（註三十）這類生產部門的手工工廠，在大城市中都已經過渡到很好設備的工廠了。市場有相當的廣闊。大生產不僅以廉價打擊小生產，并且也提高商品品質打擊牠。在一九三〇年四個較大的外國肥皂作坊聯合成爲一個托拉斯，這個巨大的外國托拉斯的競爭特別迅速的破壞了中國的小企業。至於手工工廠過渡到工廠在製皮業中也可看到。在與外部世界的商品交換沒有展開以前製皮業表面上是鄉村的手工業。其實，皮革、皮毛在中國人民的衣着上僅僅起着極小的作用。那印度馬都拉斯的周圍曾被創設了第一個製皮手工工廠，那時印度就開始了毛皮和皮革的輸出，并且由他們在方法的引導完成了製造毛皮的所謂格魯讓的過程。（註三十二）在中國皮革和毛皮的輸出也引起了

手工工廠的建立，首先是在隣近於置有大批的這類原料的蒙古區域。在西北比較不大的城市宜化，四十三個手工工廠有五千六百工人工作，在大廠中工人的數目達到一二〇——一五〇人。手工工廠一年只工作七個月，他們都是爲天津的大出口商的定貨工作。（註三十二）在重慶皮革手工工廠有從三、〇〇〇——二〇、〇〇〇元的資本，機器數自從二——七架，那裏機器是以手推動。在天津和上海已經有巨大的工廠，甚至在上海還可以找到生產組織的三種形式：一、舊式製皮過程的舊式製造所；二、比較新式化學的手工工廠；三、近代機器和新式化學過程的大工廠。

在油業領域內也可以找到生產單位的四種形式：一、用木製壓榨機的小製造所；二、用水壓榨機的手工工廠，這種壓榨機已有一部份是鐵製的；三、用鐵製的壓榨機和用蒸汽或電汽推動機的製油作坊；四、用所謂抽取的引油方法的新式工廠。在鄉村製油企業往往組織在協作的組合基礎之上，但協作顯然帶着富農的性質。例如在餘姚縣（浙江）到處可以遇見製油企業的這種形式——季節的，一些農民集資設立的，稍稍帶點股東協社的形式。在其中工作的大都是這協社的社員或他們的家屬，有時也僱用工人。他們招募徒弟不僅從本村，并且也從沒有自己製油的隣村。報酬取貨幣形式。

在南方（廣東）對於甘蔗的栽種和砂糖的調製也組織那種「股東協社」。但我們必須指出，無論是固定的組合和臨時的或季節的組合當着進行工作時每次都由包工人來建立。工人加入組合須與包工人訂立關於工作時期和工資的條約。在組合中除成年工人外尚有學徒工作。通常這些包工人都是極殘酷地剝削自己的工人和學徒。有時在條約中規定，包工人除薪金外應當供給工人飯食，而有時工人得到一些金錢來自吹。（註三十三）

在搗米工作組織的組合形式的外膜之下完全取着剝削的特殊形式，這裏可以看到，在中國淨米仍然是按照舊式的進行，只有幾個城市中存在大的作坊。

種子的搗磨或用家庭自己的手段進行，或僱專門的工人進行（如浙江、江蘇）；工人用他的生產工具（土器和木槌——搗具）在僱主處工作。照一位從南海縣（在浙江）來的同志說，在他的家鄉這種工人有極大的組合，這裏地方紳士起着包工人的作用；當農民需要搗米的時候，他們便來到紳士家裏與之磋商派送工人，然後工人到農人家裏工作，并領得工錢，而工錢的一部分必須交給因介紹工作而具有仲介人資格的紳士包工人。

然而這是淨米的現存方式中之最原始的方式。現在已經在有力的廣佈其他的方式，那也可以

說是「新式」技術。米在石臼中間舂搗。最後，在許多城市中，如蕪湖、漢口已經有極大的搗米作坊。（註三十四）

我們還須說到蒸溜的手工工廠——牠們的地位起着頗大的作用。在紹興（浙江）約有七百個用米製麥酒的蒸溜企業。每年生產品的價值約值二、〇〇〇、〇〇〇元。這類企業在滿州里異常廣佈。那裏用高粱作原料。生產過程實際上與俄國鄉村所應用的自溜的生產方法沒有差別。在滿州里每年商品生產物的價值約值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在山西蒸溜的事業也非常廣佈，有人推測全省每年生產達到一、〇〇〇、〇〇〇立脫左右。（註三十五）但中國小手工工廠生產受着一切方面的競爭的打擊。甜香酒、酒精、葡萄酒和啤酒之輸入到中國也和一般奢侈品物品的輸入一樣是不斷的增加。現在已經有仿造外國甜香酒的中國大企業。最後，中國的和日本的資本已經組織了中國甜香酒的大生產。非常有趣的是附近西湖的蒸溜作坊購買了土地，並且在現在已經有三千畝（二五〇英畝）種植葡萄樹的大經濟。（註三十六）我們知道，這是中國一般最大的農村經濟企業之一。麥酒——被視為大生產的生產物和輸入的商品——不能深入到鄉村，因為那裏被本地的生產無選擇的統治着，但在城市市場，大生產和外國酒精已經排擠了中國的商品。

註一：布林克利，中國及其歷史藝術與文學，波斯頓一九〇二年出版，p.6.

註二：帕列洛格，中國的藝術，巴黎一八八七年出版，p. 178.

註三：沙發諾夫，中國歷史上之階級與階級鬥爭，p. 294.

註四：Borget et N'ck. La China ouver e Peires 1835, p. 321.

註五：海關十年報告一八九二—一九〇一，第一卷 p. 333.

註六：參看「中國研究院的會報」。

註七：中國經濟月刊 1926, p. 314—327。

註八：同上，No. 3, 1926, p. 121—126.

註九：滿州里通論。No. 1, 1928, p. 34—36.

註十：中國經濟通論，V, No. 276, VIII.

註十一：同上，No. 225, 1925.

註十二：Weber, Wirtschaftsg schichts, S. 167—168.

註十三：這從安得利夫(東方大學)的著作中國的小生產中引來的。

註十四：Pawel, 山東省，中國評論，一八七五年。

註十五：G. Wegener, Immers an China, 1926, S. 285.

註十六：中國經濟月刊，No. 14, 1925, p. 26—27.

註十七：Collins, 中國的礦業，p. 60—72.

註十八：中國經濟月刊，N. 4, p. 154—168.

註十九：Collins, 中國的礦業，p. 94—99.

註二十：考巴特，近代的資本主義。

註二十一：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p. 359.

註二十二：中國經濟雜誌，N. 291, 1925.

註二十三：中國經濟月刊，No. 5, 1924, p. 15.

註二十四：Gambé, 北京一個社會的變遷。

註二十五：中國經濟通訊，No. 170, 1924.

註二十六：中國經濟月刊，No. 9, 1925.

註二十七：同上，No. 5, 1924, p. 13.

註二十八：中國經濟通論，No. 107, 1925.

註二十九：中國經濟雜誌，No. 4, 1928.

註三十：中國經濟通論，No. 17, 1928, p. 161.

註三十一：Gardall, 新時代之印度產業革命，1924, p. 66.

註三十二：中國經濟月刊，No. 14, 1925.

註三十三：從佛拉集米洛夫之非常有價值的著作中國產業之資本主義前期的情形中引來的。

註三十四：中國經濟通論，1928, p. 107.

註三十五：中國經濟月刊，1926, c. 555.

註三十六：中國經濟通論，No. 21, 1928, p. 264.

* * *

機器生產在生產手段的手工廠生產的基地上開始發展起來。當着機器本身尚為集中於手工工廠的手工業者生產時，已經存在了巨大的紡績工廠。一機器生產最初在不適應於牠的物質基礎

上突然發生……但大工業在發展之一定的階段上便與手工業本身和手工工廠的基礎陷入了技術上的矛盾。「註二」這矛盾直到大工業霸佔了「對於牠的生產的特種手段」——機器本身時，「直到機器生產機器」時纔告解決。在歐洲這個過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徐徐地進行，僅僅在六十年代在第一個摩托卡的建立之下應用了機器。這是創造龐大的鐵道建設和海洋航業之技術的前提，同時也是生產手段的技術生產過渡到機器生產的基礎，最後對於誰也不難想像是過渡到帝國主義的轉換手段。

中國也與其他殖民地一樣，獲得了巨大的生產手段和運輸手段之適宜的形式，但生產手段的生產根本上還是受着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落後的國家依賴着帝國主義在發展的更高階段上生產。在世界大戰時期，帝國主義國家的工業根本上都為戰爭而工作，那時在中國和印度之前，顯現了達到大工業發展之最廣大的可能性。牠們不能充分地利用這個可能性，因為牠們那裏沒有生產手段的生產。最有趣的是中國和印度工業化的最快速度我們不是在戰時，而是在戰後第一年看到，那時已經可以獲得機器。在中國和印度工業化的速度於一九二二——二三年又復緩慢起來，那時這兩個國家都進到了工業危機時期。

在戰前和戰爭時期，中國曾有過巨大的鐵路製造所和造船塢——生產運輸手段的產業部門。這些作坊重要是從事於修理，僅僅上海的船塢發展到獨立的造船。如果除開兵工廠不算，那麼生產手段的生產便由鄉村手工業的方式（鐵匠、大木匠、木作工人）或城市手工工廠的方式來生產了。大戰時期，生產生產手段的手工工廠迅速地發展起來。在上海、天津、北京、奉天、漢口、廣州、大連等處都有十分大規模的這類手工工廠。我們知道，在北京、上海、大連有工人總數三〇〇——四〇〇人的企業。這些手工工廠製造紡織機、唧筒、製油所和砂糖作坊的壓榨機、肥皂的、火柴的、製皮的及其他手工工廠的汽鍋。現在已經不可以，例如拿輸入的機器來決定近代式的紡織機、滌棉機、摩托、灌溉機等等的數量了。中國已經有自己的生產手段的生產，但僅僅在手工工廠的基礎而已。在歐、美機器由龐大的機器來生產，而在中國則由聯合於手工工廠中之技巧的手工業者來生產。在這些手工工廠中已經到處出現了電汽、作爲發動力的小摩托、電爐等等。

然而由於全國原料（鐵、鋼）和燃料（煤炭）的缺乏便給這些手工工廠的廣佈置下了非常嚴格的界限。很難說在世界各國中感覺生鐵的缺乏有像中國那樣厲害的。鄉村製造所的鐵匠和城市手工

工廠，一般說來，都一樣的在舊鐵上工作。在通商口岸販賣外國的鐵屑；在內地則搜集和販賣中國的鐵屑。英國和德國城市過去和現在都在中國市場上售賣自己的舊鐵。（註二）舊的生產不能滿足需要。而大的中國的鐵塊生產都送到日本市場去。至於中國則以白銀來支付英國和德國的鐵屑。

全國鐵的消費增加了，但牠仍舊是作成了可憐的微小的分量。

在世界大戰終結以後，這些手工工廠大多數關閉了或者可憐的殘存着。山西的舊式的中國鐵業製造所在第一次過着外國的競爭之後便發生了危機。（註三）至於近代的手工工廠在戰後也逢上了同樣的運命。

從牠們之中僅僅最堅固的存留了下來。

註一：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p. 360.

註二：Sargent, Angl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 Oxford, 1907, p. 297.

註三：Baron Richthofen's Letters, 1870—1872, S. 46.

關於手工工廠的經濟條件及其在中國的比重簡略的說幾句話。首先，中國的手工工廠與一般手工工廠的生產方式一樣，一望而知爲低度的資本有機構成。不變資本在與可變資本的比較中其分量頗爲微弱。手工工廠在這點上較之手工業前進了一步，但仍然是極不固定的經濟單位，因爲工人部分的相當大絕不是表明手工工廠本身的大。而往往只是指出不變資本的部分非常之低。二百個鑛工往往採取八十噸的煤炭，但他們的工具則用竹製的連着鐵鏢頭的粗大槓子。在毛氈手工工廠中不變資本除原料外，便是木製架——這也是一切。在肥皂手工工廠一切設備便是幾個汽鍋，甚至完全近代的設備也只值八〇〇——一、〇〇〇元。木製紡織機、裁衣機器、編織物機器同樣非常低廉。編織物機器二〇元，紡織機二五——三〇元，我們已經指出過，皮革手工工廠的固定資本往往不到一、〇〇〇元。在中國很特色的在手工工廠界廣佈了這樣的生產部門——需要不多的資本的生產部門。所以手工工廠異常不固定。

一、手工工廠，一般說來，沒有關稅的保護便不能進行，所以在其他國家中得到的是極小的改變，爲的是牠失去了自己的市場便會瓦解；在或多或少順利的情形下，牠很容易地復生長起來，但正因如此牠也很容易地受到破壞。（註一）而在中國這個保護——關稅的保護——甚至

還不會有過。

二、手工工廠的佔有者完全都是資本主義的企業家。手工業者在營業十分拮据的場合便降低自己的需要，更其增大的剝削自己的不多的傭工和學徒，並以節食和緊張勞動的方法期待着「大好」時光。在很多的場合手工業者不是資本主義的企業家，即是說，他沒有自己資本的利息和沒有企業所得也能生存。正如有一塊小分地的小農一樣。手工工廠的佔有者願意利潤，如果沒有利潤，他就要關閉自己的企業。只要營業有小的拮据，壞市況給以小的打擊，便有成百成千的手工工廠關門。危機有力的打擊了小手工工廠的企業。如果小資本不能迅速地實現商品，那資本的缺乏立刻失去了牠的繼續生產的可能性。在中國更其如此，手工工廠往往隸屬於沒有準備金存儲的股東協社。

三、對於中國的手工工廠特色的有相當大量作工的工人。在大多數手工工廠的生產部門內，大多數工人都為婦女和兒童。（註三）在尚沒有採用織紡織機的紡織手工工廠中，在絲織的、毛氈的、花邊的等等手工工廠中，婦女勞動頗佔優勢。資本之低度的有機構成便是異常高度的剩餘價值率的前提。高度的剝削仍然那樣壓制着工人，——特別是住在東家家中和吃着東家飲食的意

工。但此地工人生活於東家家中已經不是手工業者的「家長制的勞動家屬」，而是早期資本主義之最殘酷的剝削形式，此時企業家不僅是以勞動力的購買者，並且還以房東、飯店主、商人而與工人對立着。但正是這種成份往往成爲手工工廠的崩潰和過渡到生產組織之更低的形態——家庭工業的刺激物。農民或城市貧民，恰如估買人或配貨者的工人一樣，只不過除去了東家關於供給工人食糧的憂慮而已。他們只能以低價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在中國我們常常看到這種過渡，特別當着壞市況降低了企業家利潤的時候。但市況一稍稍改善便又引起了新的手工工廠的活躍。

四、危機完全有力的打擊了手工工廠。手工業和工廠依照完全不同的原因比之手工工廠是能更堅固地抵抗危機的打擊的。這便決定了下面一件事實，即在危機時期手工工廠集中到好運的企業家手裏的過程進行得異乎尋常的迅速。一個企業家有六——一〇個企業平常得很。危機有力的打擊了生產奢侈品物體的手工工廠。而在中國恰好這些生產又是特別的廣佈。

五、在資本不變的部分中比較不大的部分成爲生產手段，而比較大的部分成爲原料。而中國手工工廠所改製的原料多半是農村經濟的出產，那便是：棉花、生絲、獸毛、鬃毛、米、高粱等等。這些商品的價格在中國市場上受着猛烈的動搖：在收成之後很低，在收成之前很高。如果企

業家備有或多或少的必要的資本，那他便可以在低價之下購買大量的原料，而少數獨立的企業家便不得不在全部高價之下購買原料。這便是小企業家在與大企業家的鬥爭中不能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大批的手工工廠的生產部門，差不多都是由於外部的需要所引起，那便是：花邊業、刺繡、銅壺、廣州帽的製造、毛氈的手工工廠、以及一部分髮網、草帽、草蓆、編織物的製造。外部市場的需要依賴着式樣，銀的行情而有猛烈的動搖，並且也可以完全停頓起來。在這場合，當然多數手工工廠關門了，工人被驅逐到街上。但牠們的一切作用，意義和比重不斷的增大起來。這便是已經發展了資本主義的殖民地的特點之一。在摩洛哥、亞支爾、突尼斯、埃及、土耳其、波斯、安南及一般殖民地中，大機器工業發展得非常薄弱，資本主義在產業界中的發展正在經過手工工廠。然而在中國大機器工業已經高踞在手工業和手工工廠之上了。

七、從大生產區域的佈置看來，除鑛業外，大體上都集中於通商口岸或在日本影響之下的滿州里。中國的大工業很特色地佈置於帝國主義影響的中心，尤其是外國租借地。然而手工工廠却廣佈於全國，廣佈於一切城市。手工工廠彷彿是大生產和資本集中的工兵。

至於說到手工工廠的、手工業的、家造的和家庭的生產與工廠的生產的比重，那末我們充分地可以說，雖然大紡織工業之相當迅速的發展（一九二五年有一三、〇〇〇架蒸汽紡織機。一九二六年有二五、〇〇〇架，一九二七年有二九、〇〇〇架），增加了中國工廠生產兩倍以上，但國家對於紡織品的全部需要有六五——七五%還是爲徒手的生產所掩蔽。農民的日用品，農村經濟的生財、家具、廚房的附屬品、木器、住宅的設備、大批的需要：烟草、烟袋、香錠、格紙、香燭和許多別的東西，——事實上都是由手工業、家造業和手工工廠來供給。在城市工廠的生產物已經爲這些製造品置下了堅固的根株。

當然，工廠的製造品也已經開始侵入了鄉村。現在已經不僅是紡織品、石油、火柴、并且連紙烟、玻璃、家具、棉紗、甚至靴鞋也都深入到鄉村了。

註一：馬克思和恩格斯遺刊，第一冊，p. 229。

註二：在北京毛氈的手工廠中有九七%，油漆的手工廠中有三五%，縫衣的手工廠中有三四%，潛織的手工廠中有三〇%，玉器的手工廠中有四三%，都是以重工業來從事工作。

第五章 家庭工業和家造業

徒手生產的保護和分工的擴大進行、比較的穩定性、家造業之屈服於手工工廠、手工工廠之屈服於商業資本，——照列寧的意見所有這些都是手工工廠之技術和經濟制度的主要特徵。在家內工作之下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仲介人的衆多、勞役制 (Sweating System) 卽血汗的制度、最緊張的剝削制度、物工制 (Tieck System) 卽用食物來支付、工作的不衛生、工人宿舍與住所聯合一起、無限長的工作日、引誘婦女和兒童去生產、工人需要水平的低下、最後將工人與土地聯繫起來、勞動者的渙散、奴役的繁榮和一切外表形式的依賴、工人之依賴於土地關係，——照列寧的意見，所有這些都是家內工作的基本特徵。(註一) 家內工作之擴大的廣佈，是以兩個條件爲前提：一、現存必須出賣自己勞動力并以廉價出賣的大量農村無產階級；二、現存熟習地方條件并能夠在分配工作之下盡代理人作用的富裕農民。中國就具有這兩個條件。但我們願意指出，富裕的農民較少的而商人則較多的履行了估買人和配貨者的作用。估買人發生之經濟的必然乃緣於銷

售組織的必然，但這并非說，估買人的利潤僅僅在於銷售的大和小的差額之間。估買人與家內工人間的關係可以採取各種形式。「第一種和最簡單的形式是商人購買製造品。商業資本的第二種形式是牠與高利貸的結合。商業資本的第二種形式是以商品支付製造品。商業資本的第四種形式是以對於生產所必需的家造商品種類（原料或補助材料等等）來支付商人。從這些形式剩下來的是經只有一步便可達到商業資本的最高形式——估買人直接分配材料給那為一定的工資而工作的家造工人。家造工人事實上（*de facto*）成為在自己家內為資本工作的僱傭工人；此地估買人的商業資本過渡到產業資本。」（註二）這便是家內工作屈服於商業資本之各種階段和形式。當着估買人轉變為配貨者時，商業資本也在此時轉變為產業資本。從這裏僅僅一步便可達到聯合散漫的工人和零碎的生產過程於手工工廠之中。但配貨者僅僅供給家庭工人以原料和補助原料。生產工具屬於家庭工人或家造工人。從這裏再向前一步就是配貨者能以生產工具供給家庭工人。在南京配貨者便供給製造花邊和刺繡的婦女以生產工具。在直隸農民租賃紡織機異常廣佈。在天津便有在三年中出租了二百架紡織機的商社。在浙江開化縣會租賃一萬架以上的編織物機器。（註三）出租編織物和縫紉機器在城市中同樣異常廣佈。出租機器之高利貸的條件頗為苛刻。（一架機器的價值為

二十元，家庭工人每月須付租金一元），在分配機器的場合，配貨者已經是工業資本家；僅僅只是沒有將散漫的機器和工人的地域聯合於一個製造所中而已。但即紡織機、縫紉機和編織物機器等等的出租也已指出了，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技術的進步也能為廣佈着的最壞的剝削形式所利用。

中國從手工工廠和家庭勞動過渡到大工業完成得比較遲緩，很明白，因為還可能「依着婦女和兒童工作之簡單的濫費，依着勞動的一切條件——在這些條件下勞動和生活可以走上正規——之簡單的剝奪，依着過渡的和夜間的殘酷勞動來減低勞動力的價格。」很明顯，那時這種剝削形式與自然的限制尚不衝突，因為「當時一經達到了這點——到達這點經過很長的時間，——便由機器的引導迅速的從分散的家庭勞動時期（同樣手工工廠時期）轉到工廠生產時期。」（註四）貧困的中國鄉村和千百萬的城市貧民羣衆從本身還完全表現為最壞的剝削形式之「人類的本體」。而也正是這種情形阻礙了大工業的發展。「那種關係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實際的障礙并且依着牠發展的限度而滅亡。」（註五）

註一：列寧全集，第三卷 p. 344—347.

註二：同上，p. 285.

註三：Lien, 中國的工業與財政 p. 10.

註四：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p. 450.

註五：同上，第一卷，第一部，p. 319.

「商人給與織工以紗線和原料并齎以不多的貨幣。商人將這全部記下織工的賬目。當織工工作完成時，織工便將作成的商品賣給商人。當商品出賣時（通常經過幾個月），商人便將織工應得的金額記下，——織工卽在這金額下出賣了商品（這金額通常比現時的賣價低得多）。計算形式如下：齎借金的每一個羅比——紗線和原料的價格——商人每月獲得一個安列，卽每年獲得七五%。（註一）從賣價中的每個羅比商人以仲介人的資格獲得一個安列（卽每年之七五%）。此外，從每一個羅比商人獲得報酬金一安列。這個制度很快地促使織工成爲商人之悲慘的奴隸。」（註二）

在印度大約有六、〇〇〇、〇〇〇織工。關於他們的狀況已由摩利孫在上述的記載中說明了。但我們知道，在中國石門縣，農民依估買人的定貨工作并且每天賺得四仙。（註三）我們知道，在木織機上工作的農民一年可賺三六元，而在鐵織機上工作的農民一年可賺六〇元。我們知

道，一個月賺五——八元由農民織工看來完全是幻想。在京兆（直隸河北）估買人和商人以貨幣的借債來維持自己的織工農民，而這種借債他們後來必須以服役抵債。在西安縣（陝西）許多鄉村的農民都是地方紳士的債務者，而後者則決定農民以家庭工業生產物（竹篩、土布、草蓆等等）來支付債務。這些紳士一點也不怕麻煩，他們的債務者不是一個或兩個，而是極多的農民，那樣，結果在他們的倉庫也便堆滿了一切的商品，並且由於他們的那種活動結果獲得二〇〇——三〇〇%的利潤。（註四）

家庭工人與商人之間的聯系可以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最常見的是農民自己將家內方式所製造的麻布拿到市場出賣或交換自己的商品。這是在廣西看到的。在江西草布——最下等的棉織的着物材料，生產者大都依賴於批發商社。他們若沒有購買紗錠的手段便去到估買人那裏預支；從估買人方面看來，他們無異是批發商社的代理人。（註五）在江西也有商人常常預先購買紗錠給農民作為原料的。但起着最大的作用的還是城市商社的代理人在鄉村簡單的搜集家庭工業製造品。那便是搜集紡織品、草蓆、編織物。家庭工作與商業資本之間的聯系最普遍的是採取定貨工作的形式。在南京、無錫、汕頭、上海，花邊女工和這些城市近郊的農民都去到供給他們原料、生產

工具的商人那裏工作，但同時也是雛形的形式。這種聯系的形式我們在甯波草帽製造業中的家庭工作和商人之間便可看到。也有那樣的，就是批發商在鄉村中開設自己的布疋代辦所，在那裏製造適宜的製造品。在出產草蓆的南樂縣，有五十多個山東批發商都有自己的購買草蓆的代辦所。（註六）但如像在山西省，草帽都在地方市場上出售，在那裏批發商經常都有自己的堆棧。（註七）以前草帽的製造爲各個鄉村的家造業所佔有；草蓆的調製同樣是各地家造業的手工藝。現在在甯波已經有手工工廠，而在上海却有製造草帽的工廠。

我們已經指出，家庭工作往往依照製造所的手工業者或手工工廠的定貨而生產。靴鞋的製造所和手工工廠將中國鞋的上部分交給家內製造。扇子的各部分和整個扇子，不僅在手工工廠中製造，並且同樣也在家內工作的順序中製造。冥錢的各部分同樣由家內生產，而由手工工廠配合起來。最後時期異常廣佈的糖果和編織物的生產多半都是依照供給工人原料、機器和預備金的配貨者的定貨之家內工作。在比較貴重的製造品的情形下（貴重的刺繡美術製造品）家庭工人將自己的商品交給仲介的商人，取得預支金，而在製造品出賣之後再來着手計算。所有這些形式都存在於各種各式的結合中，最常常的是與高利貸相結合。

所有這些形式可以歸納到列寧所指出的四種基本形式之中。前期資本主義的，特別是由着實際的資本主義過渡時期的關係，其區別正在於多樣的、錯雜的和極不同的形式。

註一：一羅比等於十六安列。

註二：摩利孫，印度經濟的轉變，倫敦，1911, p. 144.

註三：中國經濟月刊，N. 3, 1926, p. 331

註四：佛拉齊米洛夫，產業之前期資本主義的形式。

註五：中國經濟通論，N. 278, 1926.

註六：同上，N. 175, 1924.

註七：同上，No. 182, 1924.

在一切家庭工業部門中織布業，特別是棉織業佔着最顯著的地位。在印度，家內織工問題是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他們的數目在五、〇〇〇、〇〇〇人以上。他們的狀況比之貧民還要壞。在一切關於印度難民的調查中都指出，在社會的工作上，在社會的組織方面第一須救濟的是織

工。輸入紡織品的競爭和國內大紡織工廠的紡織品的競爭將牠們破壞了。據一九二六年的計算，在印度對於紡織品的全部需要中，外國輸入的紡織品佔二〇——二五%，印度紡織工廠的生產品佔五〇%，而家庭織工的生產品佔二〇——二五%。我們知道，在中國，非工廠的織工的數目和意義（包含從事手工工廠工作的）遠較印度爲大。一九二五年，中國紡織工廠的生產品（二七、〇〇〇、〇〇〇鎊的紡織品）佔全部需要的二·一三%，輸入的紡織品（二六五、〇〇〇、〇〇〇鎊）佔二二·六%，而家庭和手工工廠的出品（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佔七四·二%。從這時起蒸汽紡織機的數目增加了二二、〇〇〇——二九、〇〇〇架。到一九二八年紡織工廠增加的傾向更比較迅速，但一切紡織品的基本數量尚是由家內方式來生產。在印度、邊加利、孟買總督府，在聯合各省，在中央各省以及朋查北，工廠和家內織工數目間之相互關係歸結如下：（註一）

一九〇一年

一九二一年

工廠織工和紡工的數目……

一三七、〇〇〇

二〇四、〇〇〇

手作織工和紡工的數目……一、四八二、〇八六

一、二九六、一八六

在紡織和麻織工業中心之一的邊加利，工廠工人爲六〇〇、〇〇〇人，而徒手織工的數目則

爲一、八〇〇、〇〇〇人。在馬都拉斯徒手織工的數目在一九一一年爲三六八、〇〇〇人，而在一九二一年爲三〇〇、〇〇〇人。（註三）無疑的，中國比之印度徒手織工更要多些。無疑的，他們的數目的減少比之印度還要慢些。同時無疑的，紡織工業在同一時間內外國紡織品的增加和需要減少之下之迅速的增加便會引起這種手工藝走向嚴重的危機。在大工廠中蒸汽紡織機的數目在一九二五年爲二二、九二四，在一九二六年爲二四、〇五七，在一九二七年爲二九、七八八。

毫無疑義，從這方面來的災害便給了中國從事於織布業的織工和農民以威嚇。印度的經驗證明，這些織工的運命是徐徐的滅亡，徐徐的飢餓而死。但在許多省份中家庭織布業不僅在鄉村并且在城市也起着巨大的作用。我們肯定，在直隸和山東的許多地方，貧窮份子從家庭紡織業所獲得的收入要比從耕種獲得的爲多。

絲織紡絲業還不能消滅仍舊起着巨大作用的家庭紡絲業。在這個領域內近代工業的發展不斷的排擠家庭工業。牠（家庭工業）在沒有對於供給大的絲織絲繭的很好運輸的地方或沒有可能建設工廠的地方還是存在於國家的深淵之中。絲織業還是極困難地支持着，因爲大的絲織工廠僅僅在最近時期開始發展，并且內地市場對於絲織品的需要還不甚大。人造絲、日本的競爭、毛織品的

廣佈、歐式衣着的廣佈——所有這些都在反對絲織業。絲織的手工工廠也有力的發展起來。絲織的工廠也在發展。在杭州十一個絲織企業中有四六〇架紡織機，在上海在一九二四年就已經有八個絲織工廠；在杭州有一個工廠有一五〇架紡織機。（註三）一言以蔽之，從一切方面都足同樣地來加害絲織業；但牠仍然支持着，並且如果在中國所生產的全部生絲有六〇%是留在國內的話，那麼，無疑的，這個數量的七〇——八〇%是轉化為徒手方式的紡織品。在 Pongé 或 tveca silk 的關係上工廠生產排斥家庭工作的過程走得最遠（在最近時期工廠的紡錠佔全部輸出的九〇%，而家庭出產的生絲只佔一〇%）。但絲織業仍然支持着，即在形成了大手工工廠的地方。在山東省的東部四縣，紡織品還是以舊方式來生產，但在手工工廠中生產。在那裏有一九一家企業，共有六、五四〇架紡織機和九八一、〇〇〇件出品。（註四）在滿州里手工工廠還是極有力的掘毀家庭紡織品。

註一：“Report Of The Indian Industrial Commission”, London, 1919, p. 396.

註二：G. Brouh von, Labour in Indian Industries, Oxford, 1924, p. 125.

註三：Kahn Li Die Sei'industrie in China, Berlin, 1927, S. 15.

帝國主義不但掘毀了家庭工業的各別部門，并且也引起了和發展了牠的各個部門。從中國髮網、毛氈、扇子、草蓆、編織物、草蓆、草帽、紙礮、冥錢、花邊、中國式的紡織品、刺繡、編織製造品等等的輸出便給了這個以最好的例子。所有這些生產——我們不預備去收集牠們的詳細記載——都有其自己的豐富的事變和危機的歷史。在山東當時髮網曾給了成千成百的中國人以薪工，最後却因式樣的改變結果便失去了往昔的意義。當時在南京、無錫、上海、汕頭都有幾萬配製花邊的中國人。現在他們的半數都馴服的忍受着失業。草蓆、草蓆、編織物、中國扇、刺繡、花邊等等的輸出陷於衰落。而草帽、草布、冥錢等等的輸出却增加起來。

這在下面便可看出。草布、冥錢、紙礮、草帽、和一部分絲織品，特別是輸出那種國家，在那裏有多數中國的僑民，輸出到高麗，在那裏生活習慣與中國頗相類似。在暹羅、印度、尼西亞、緬甸、安南、馬來島等處的中國僑民都喜歡有「自己」宗國的商品。正因此供應這些市場的生產雖然也有阻滯，但一般說來是繁榮的。舉例如下：

冥錢的輸出

一九二五年.....	八五、三五〇細
一九二六年.....	九六、七四三細
一九二七年.....	九四、五四八細

草布的輸出

一九二五年.....	二〇、七二六細
一九二六年.....	二五、六五九細
一九二七年.....	二五、七六〇細
一九二八年.....	二六、六二三細

但在那種場合，即當着家庭生產受了式樣的改變之激動時，家庭工人的狀況便立刻陷於絕望的地位。式樣的改變使成千成萬的農民和城市婦女失去薪工。商人——他在生產繁榮時期「平均」爲一〇〇——二〇〇%——可以縮小估買或配貨或從自己的經營離開，而工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彌補這個薪工的損失。生產的縮小，危機時期，奢侈品的消費大量低減的時期，所有這些對於他們

都可構成特別的災難。

家內工作的各部門分佈於全國各部分。紡織業更其廣佈於各個區域。但絲織業或草布生產的地位則由現有的原料（繭子和中國的蕁蔴等等）來決定。草蓆的製造便受着沼澤地方之無可如何的壟斷，那裏有這種生產所必須的原料——蘆草。但往往這種或那種生產的廣佈有時出於偶然；例如在刺繡和花邊的製造中，宣教師和神父便起了巨大的作用。編織事業很特色地在大城市的中心，在揚子江流域發展起來。冥錢的配製廣佈於全中國，但牠在杭州、海州、紹興、北京、上海則具有特殊的意義。在家內工作的廣佈中，一定區域之土地關係和農業狀況起着莫大的作用。泰利完全正確地指出，法國在大革命之前，家內工作在枯竭了的地帶，農業經濟已進到衰落的地方和地主壓迫特別嚴酷的地方是特別的廣佈。這規律在中國也可看到。直隸之成爲家內紡織業最重要的中心，山東之廣佈家內工作最壞的形式，廣州之恰如汕頭一樣家內工作的各個部門之發展都非偶然。在這些區域農業危機最深刻。

就這意義說來，土地的關係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已決定了家庭工作的窮苦的狀況，何況在中國

的條件下工錢是異常的低下。貧窮飢餓的鄉村和城市的貧民爲任意的工資而尋找任意的工作。而阻礙大工業發展的帝國主義便阻止了已經破產的農民或城市貧民置身於產業之中的可能性。工手之異常廉價、個人之依賴關係、奴役、高利貸——一言以蔽之，資本主義家內工作存在的本身便阻礙了大工業的發展并成爲技術停滯的原因之一。

中國資產階級總喜歡把馬爾薩斯的理論當作一切無須爭論的理論一樣的來運用。似乎最得意的是以人口對於生存手段的壓迫來說明一切危機和災害。但中國恰好就是一幅最輝煌的圖解，「人口表示不是對於生存手段的壓迫，而是對於勞動所必須的手段之壓迫。」（註一）

註一：恩格斯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給耶格的信，書信集。莫斯科工人社出版，一四七頁。

第六章 中國大機器工業之發展

接二連三的強暴的掠奪的襲擊的代價，兩次破壞的戰爭，賄賂和暴力之代價，將中國捲入了世界商品流通的漩渦，開闢為世界商品的銷售市場和原料、食品及殖民地商品的生產地。銀價之低落、經濟平衡之破壞、兩次戰爭之失敗、鴉片之輸入、外國商品的輸入給了老大的中國一個無理的結局。雖然鴉片的輸入減少了工業品入口之可能性，然而外國資本之強暴的侵入中國和滿清政權之解體引起了太平天國的暴動（一八四八——一八六四年）。這次暴動是中國民衆對外國資本的鞭撻之第一個答覆。外國的資本和中國的反動將「老大中國的囚徒——專制底下的廣大民衆」（馬克思）所發起的偉大的民衆運動，偉大的農民戰爭擊敗了。

太平暴動結束以後，中國生產器具在技術上並沒有什麼改變。生產組織、生產工具、社會關係也沒有一點變動。我們會看見一位法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鳩蘭（Julien）描寫中國前一世紀六十年代生產技術的過程情況的一本漂亮著作。（註一）從這著作中我們知道當時是怎樣採取鐵鑛、

煤、錫、金；是怎樣溶解生鐵、金、銅、錫；是怎樣製造鑼、鐘、鏡；各種手工業者是怎樣工作和用什麼工具工作；信紙、墨是怎樣製造和油坊、糖坊是怎樣工作。這是充滿了趣味和技術熟練的一本書，牠將一幅中世紀生產的圖畫展開在我們面前。從黎佐芬(Richtofen)描寫七十年代的中國之傑出的著作中，(註二)我們知道，甚至在山西——在那裏鐵和煤的聯結一起直接開了英國對於產業發展的前途——最大商業道路的轉運僅達三百噸商品，其中百分之六十為生鐵，百分之三十為煤。(註三)而山西幾乎供給了中國西北二部全部的鐵！關於鐵的溶鑄，黎佐芬寫道：「沒有歐洲式的家竈。溶鐵場(溶解的地方)為一斜平面，八尺長五尺寬。平地有兩面圍以四尺高的土牆，一面開着，而其餘一面有一個小而矮的房子，那裏有兩個人在推動木風箱。地上散着細片的無烟石炭。此外大約有一百五十個粘土的溶鍋，十五寸高六寸寬，內中堆着煤和細片的鐵塊。將煤着火并吹噓使其燃燒起來，但溫度不必過高。於是就獲得鑄鐵，鑄鐵的改造由鄉村完成。每個鄉村把牠製成各種各色的專門商品。」(註四)

從黎佐芬的著作中我們也可知道，在採煤方面，中國人比之中世紀的歐洲來甚至還要落後。

中國鑛工最深入的地方，在山西為二百尺，而在揚子江流域為三百尺。中國南方採煤是在異常低

的鑛坑裏採取，在那裏鑛工須用四肢爬行很遠，對於煤炭的裝運是用一種拖車，將繩子繫在拖車的前面……排洩地下的水在北方用桶，而在南方則用竹筒。（註五）這就是所謂「土著鑛業」。我們知道，中國存在有大的手工工廠。然而中國差不多不知道大機器生產。全國工業生活都是建築在手工業和家庭工業之上，而有些手工工廠是專為皇室和統治階級而設的。

太平天國暴動壓服以後還不到一年在中國的地面上便出現了第一個大工廠。第一個大絲織廠是從暹邏回來的中國僑民張道藩所創辦。但人民的騷動使第一個工廠不得不自願離開祖國並且在葡萄牙人政權之下的澳門（Macao）逗留五年。僅僅在五年以後他纔回到中國。（註五）據我們知道這是中國第一個為市場而工作的工廠。新式的生產，新式的技術漸漸地侵入到造幣廠和兵工廠。由於海洋和江河的航行於是在大的通商口岸發生了修理舢舨的機關。於一八六五年開關了香港、廣州和澳門之間的航道，組織了第一個英國的汽船公司。（註七）兩年以後在上海組織了第二個英國的汽船公司。（註八）外國資本開關了中國對於國際的商品流通，但商品流通限於已開關的商埠和大的河流。大的運輸手段還沒有。航運活動的本身在資本主義關係發展的意義上是最重要的因素，但牠不能深入內地。大工業需要鐵道作為適應的運輸手段。所以向在一八六三年上海的二十

七個英美商社會上了一個建築滬徐鐵道的請求書。「在一八六五年，同樣的企圖曾經最大的英國商社——查爾廷、麥特遜及其同行——立案，但規模很小：從上海到吳淞——全部十英哩；并且是一種車道的形式。到一八七五年，路線已決定了，不顧當局的抗議而將馬車道改爲鐵道；但有人列車甫經通行，鐵道便受了人民的抵制，於是外國人同意中國政府贖回，最後於一八七七年將鐵軌拆去并送到台灣。」（註九）這樣便結束了第一個建築鐵道的企圖。這時在印度已經熱狂的進行着鐵道的建築，而在孟買第一個紡織工廠已經開工。然而我們必須指出，英國的資本家，特別是蘭開夏的資本家，他們雖然幫助印度建築鐵路，但他們却反對在印度建設工廠。資本的輸出在這時期重要的是向着交通和農村經濟。但那時在中國却拆毀了第一條鐵路的路軌并將牠「放逐」到台灣，那時從廣東將第一個蒸汽絲織廠驅逐到澳門，在日本於一八六八年雖然是從上而下，雖然是不徹底的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然而國家却毅然決然的走上了資產階級發展的道路。至於那種千篇一律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即根據上述的事實肯定中國國家的作用止於在破壞機器。（註十）

如果更基本的加以研究，便不難知道，事實完全不是那樣。中國的國家不是反對一般的機器，而是反對從屬於外人的機器。中國的統治階級會拼命地企圖預防國家最高經濟樞紐受外資的侵掠。

同時最先覺的，最積極的和最有眼光的官吏和商人代表，也會企圖用中國自己的資本來創設大工業。在這個政策的實質中，最有眼光的是當時北京的一般巨頭。行會和幫口、小手工業者、甚至苦力都在朝廷的反動的徒黨的領導和影響之下往往出而反對一般的機器，同時有些中國資本家於中日戰爭前認為中國國家經濟如果沒有外資束縛可以走上資本主義的大生產的軌道。

這個幻想在長期發展的行程中毀滅了。

因此，在一八七二年，中國資產階級集團以段進昇為首組織了一個中國輪船公司：「中國招商輪船局」。(註十二)輪船總局在上海；但輪船分局不斷地廣佈於漢口、九江、鎮江、南京、溫州、廈門、汕頭各地。在輪船局的章程中規定外國人不能加入股份。但輪船局必需煤炭。於是在有威權的國家大臣李鴻章的協助之下組織了一個商社。(註十三)並且在一八七八年在唐山(直隸)附近用近代方法開始開掘第一個鑛坑。僅僅在一八八九年商社獲得對於市場的第一次生產品；但在一八八九年西林的煤炭企業已經開工了；一般煤炭的出產品迅速地增加起來，在一八九七年牠達到五三八、〇〇〇噸，而在一八九八年達到七三一、〇〇〇噸。(註十三)但唐山在直隸省。離海岸頗遠，從牠那裏載運煤炭對於輪船是異常困難。輪船局已經獲得建築鐵路的決定，可是當着該地

居民起來反對時政府便撤回了自己的決議。直到一八八一年纔開始從礦坑到海口（七英里）的鐵路的建築。這條路線在一八八八年延長到大沽和天津，在一八九四年延長到山海關。資本主義的輪船局喚起了近代巨大的煤業生涯，而近代的煤炭企業由於巨大的生產品又喚起了近代巨大的運輸手段的生涯；現有的近代運輸手段給以可能在唐山和馬頰河各建築一個有生產品六〇〇、〇〇〇桶的洋灰作坊，及唐山的燒瓦作坊；而所有這些又給了有汽力設備、工人宿舍等等的完備城市之必須的建立。企業於一八八七年四月十二日曾公佈股票契約。資本總額爲一百萬元。李鴻章最積極地幫助了這個企業之一切計劃。他以重大的地位贊助了於一八八六年在怡興（譯音）（山東）的鑛山企業和在齊府（譯音）的第一個絲織工廠之建立。在一八九三年鐵路沿秦皇島達到了海口，於是中國的煤也就自由地運輸到中國的輪船局。

當時在北方幫助了本國產業發展的爲李鴻章，在南方廣東巡撫張之洞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造幣廠，開始了許多鑛山的探掘——這些後來都告失敗，擬定了從北京到廣東的鐵路計劃并幻想建立中國的冶金術，創造強有力的供給鐵、鋼、路軌的巨大企業。張之洞已經決定了對於廣東大作坊的舉辦，那時在一八八九年他便被調到漢口。在一八九一年他在漢陽着手冶金作坊的建立。在

三年之中由國家機關投入作坊的資本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鐵在大冶鐵礦採掘，質量非常好（有六〇%的鐵）。煤由歐洲和開平供給，因為在許多年之中在湖北沒有發現適用的煤。在一八九六年張之洞將漢陽工廠以五十萬元出賣或正確些說出讓給當時中國輪船局的總辦，他是中國當時最大的資本家之一，此人便是後來（一九一〇年）的財政總長盛宮保。

在一八九六年被盛宮保從德國召回的工程師在萍鄉發現了煤礦。德國資本家允許三百萬元的借款，給了開始採掘萍鄉煤礦的可能。爲要使煤易於供給，便必須建築從萍鄉到大冶和漢口的鐵路。在一八九八年已經開始了萍鄉煤礦的採掘。由這三種企業（漢陽工廠、大冶溶鐵廠、萍鄉礦坑）形成了著名的漢冶萍公司，這個公司由私人的溝通而與中國輪船局聯系起來。到一九〇〇年公司的出產品爲二萬六千噸鑄鐵、七百噸雜鐵、一千六百噸雜銅、二萬二千一百噸京漢鐵路路軌；此外有三千七百噸的鐵是在漢陽製造。（註十四）中國的五金工業和礦業繁榮起來了！從生產的消費和發達的前途看來漢冶萍公司向建築得不壞。但中國有了五金工業的萌芽，當時在印度甚至還夢想不到這回事。我們還看見，從這些事實中中國產業獲得了如何向前發展的驕傲和期待。

中國開始了建築鐵路，創設自己的礦山事業和自己的五金工業。當着外國人企圖獲得鐵路和

礦山的租讓時，中國當局毫不猶豫的拒絕了這種要求，說是人民迷信「風水」（即中國關於風和水，關於達到平安和災害之各種形式和方法的關係，關於建造祖宗墳墓等關係之迷信學說）妨礙這種事業。「風水」似乎是礦山工業的發展，鐵路和一切其他建築的重要障礙。這其間黎佐芬的尖銳眼光已經在一八七〇年看到，「如果經營規定了有利益的話，那麼在任何礦區中你都找不出「風水」妨害礦坑經營的情形。」這是說，如果在那裏經營的是中國的而不是外國的資本，那麼「風水」事實上并不阻礙工業化。

九十年代開始，在中國不僅有煤礦工業、五金工業、商船和鐵路的萌芽，而且也有紡織工業的萌芽。威吉爾（Wegel）說上海第一個紗廠在一八九五年開工這是錯的。（註十五）上海第一個紡織紗廠早在一八九〇年就已開工。

一八九一年在上海開工了兩個紡織廠：上海棉紗廠，半官性質，創辦於數年前，但直到一八九〇年纔開工，與新中國紡績廠，為商人所創辦，於一八九一年開工。上海棉紗廠的廠主是李鴻章和盛宣懷。這個企業獲得了十年的獨佔權；獨佔權表現於每個新工廠的每一個紗拈須無補償的繳付一元給牠。企業於一八九三年曾支出二五%的紅利。工廠於一八九三年為火所焚毀，代牠而

起的是於一八九四年新建築的兩個工廠：有七百五十架織機的華盛記和裕洋紡績廠。（註十六）

當時在上海也開始了絲織工業的發展。在一八九一年那裏已經有三個絲織廠開了工，其中一個屬於外國人，兩個屬於中國人。一八九三年與一八九五年之間，又創辦了兩三家中國人的企業。

一八九二年英國企業家在上海創辦了一個極大的造船企業。這個企業很快的破產了，但很快的整理起來，到一九〇〇年已經建造了十五隻航海和航河的輪船。

一些製香烟的、製火柴的、製油的和製紙的手工廠更增加了城市工業的形態。

一八九三年張之洞在漢口以國家的款項建立了一個棉紗工廠，有一千架蒸汽織機。到一九〇一年工廠出產了三三〇、〇〇〇幅手巾，和一三五、七〇二拾紗。那時在上海和中國中部的最大的蒸汽紡績廠和綿織廠也已經開工了。一般說來，在九十年代的開始，上海和漢口似乎還在互爭工業中心的首席，但優勢很快地屬於漢口方面了。海關稅務司描寫這城市道：「工廠的烟囪增加了城市工業中心的形態。」在日本租界內的火柴工廠已經開工了，在法國租界內的五個蛋糕作坊、三個大茶業作坊都開工了；在漢陽已經有製鐵工廠；在城內已經有一個紡織廠、兩個造幣

廠、一個兵工廠等等。

外國資本這時在中國還沒有注意到一切工業部門之中。蘭開夏在那時開始感到孟買競爭之劇烈，而孟買輸出到中國的紗已經超過了英國。印度在一八四三年就已經有一四一個紡織廠，三五七七、〇〇〇個紡錘。殖民地的工業對於宗主國工業成爲那樣危險的競爭者，致使德國駐華公使私自調查，看舊鐵是否可以做農村經濟的工具。外國資本主要爲鐵路和礦山的租借而鬥爭。在事實上也已經發生了外國的紡織廠、火柴廠、蛋糕廠、絲廠等等。外國資本開始了在中國內地用機器製造農村經濟的生產品（茶葉、雞蛋、皮毛），在一八九一年輸入中國的機器總值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在一八九二年總值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在一八九四年總值四五、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在一八九五年總值九、〇〇〇、〇〇〇美金。（註十七）這些機器的主要部份是爲外國人的工廠所買進。一八九三年中國政府雖曾禁止中國的外國企業輸入機器，但對於中國企業輸入機器則絕對不禁止。

這是阻撓外國資本在工業界攫取支配權的絕望的企圖，超時代的企圖。在帝國主義階段的基礎之上，在「價值輸出，註定產生國外剩餘價值」階段的基礎之上，中國曾在外國資本輸入的面前

作過閉關自守的企圖。同時中國又不得不表示接受各列強關於允許借款給中國的提議。資產階級之理論的經濟學這時尚認爲資本的輸出從宗主國工業的觀點看來是有害的，而在宗主國工業資本中也祇是開始了與銀行資本聯系的過程。但事實上在外國租界內發生了個別的外國企業。優越的利潤表現對於各別企業家比之帝國主義的宗主國全部資本家關於利益之理論上的推論更有魔力。從一八六〇年起，外國人與中國政府雖會訂有盟約有在中國經營商業和工業的權利，但中國政府不顧所有列強的抗議，反對外國企業甚至及於工業。禁止外國人輸入機器到中國的法令頒佈後不上一年便爆發了中日戰爭。

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時，那時日本已經有大工業的發端。在一八六八年革命後的十三年中國家建設了很多作坊，但僅僅在一八八一年才過渡到有訓練的工人和一部份資本家人員有訓練的技術的現代作坊。在一八九三年日本已經有四〇個紡織工廠，共有四一四、七五八個紡錘；二、六〇二個絲廠，其中有三個工人的有五百餘家，有一百二十一個工人的有一百餘家，有三百六十九個工人的有五十餘家。那時五金工廠在日本還不會有，但鋼鐵的消費却達到六五、〇〇〇噸，銅的消費達到二一二、〇〇〇噸。國內煤的出產達到一、七〇〇、〇〇〇噸，而消費達到三、三

一七、〇〇〇噸。國內已有用輪船改造的戰艦，其載重爲九六、五〇〇，火輪船的載重爲四五、〇〇〇噸。鐵路線共長二、一一七英里。（註十八）大機器工業在日本比之在中國發展到更高的階段了。

日本在與中國戰爭中獲得了勝利。這次中國的失敗從兩種觀點看來對於牠經濟的發展都有巨大的意義。在下關和約中規定中國應付日本二萬萬美金的賠款。後來賠款的數目又增加到二萬三千萬。因此中國不得不舉行第一次國際借款。中國成爲帝國主義的債務者了。關於其他情形，德國公使柏郎德有如下的敘述：

「關於和約的談判時，日本人提出了開放一切機器入口的要求，提出了日本人在中國有建築工廠的權利和免除工廠稅的要求，同時日本工廠製造品在納付二·五%的進口稅以後，應有自由輸入中國各地之權利。中國代表李鴻章反駁道，這種問題已爲外交部考慮過，幾年來對於機器入口在某種意義上并不曾禁止。對於外國人開設工廠的禁止，已經長年存在，并且外國政府也同意這種禁止。（註十九）中國現在反對這種要求的原因，是因爲這一種方法剝奪了中國人的飯碗。但日本人始終堅持他們的要求，並將適當的條文列入下關和約之中。」（註二十）實際上下關和約第六

條說：第一、日本國民在中國有從事活動工業的權利，輸入機器納付通行的進口稅，第二、日本在中國製造的工業品在入口稅、國產稅、租稅等等的關係上須與輸入中國的日本商品受同等的待遇。於是中國對於外國工廠所必須的機器之輸入便完全開放了。

中國大機器工業之第一個發展時期便這樣結束了。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此時已走上了新的發展形態——帝國主義的形態。而「在中國却出現了一部份投機商人和財團，財團後面站有他們國家的外交力量；或者反過來說，國家是其臣民之經濟的保護者，是發展或鼓勵他們在中國之財政企業的……財政現在獲得了以前在商業與對外政策的聯系中起了商業的那種作用。」（註二十二）——資產階級的學者奧威納會說，這完全是一種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調。開始了租借地的鬥爭時代。開始了鐵路的建築，大批的國際借款對於中國的命運便是在中國開辦外國工業的企業。

到一八九九年，中國的工業已經達到了如下的情況。兩條鐵路已經通車，這就是一八九八年第二次建築（二十五個啓羅米突）的上海到吳淞的鐵路和北京到山海關（四百八十個啓羅米突）的鐵路。但外國人已經突出租借地而建築了一條六四二〇英哩（一萬零四百個啓羅米突）長的鐵路線。

一八九七年在上海建築了三個新的外國紡織廠，大約有一七〇、〇〇〇紡錘，有二千八百個

做工的工人。有一個改組的中國工廠也已開工，有二〇、三〇〇個紡錘。在蘇州、杭州、甯波、通州都有棉紗工廠的建立。在一八九九年僅僅在上海就已有十個紡織工廠，其中五個是中國的，紡錘總數爲五十萬，但最大的工廠則操於外人掌握之中。（註三十二）在上海有二十八個絲廠，有七、八〇〇——七、九〇〇個水鉢，和一八、〇〇〇——二〇、〇〇〇工人；在宿縣有兩個織廠（四二〇個水鉢）；在鎮江有一個絲廠（三三〇個水鉢）；而在徐州有兩個絲廠（六三〇個水鉢）。所有這些都屬於中國人。每年生產品計爲八、〇〇〇——一二、〇〇〇拾生絲。（註二十三）在南方絲的工業化也有同樣的飛躍。在順德的周圍已經有二百個工廠。在激浦也開辦了第一個絲廠。關於工人問題最初引起許許多多的困難，但到九十年代末這個問題已得着了很好的解決。「紡織工人一天獲得從二二——二三到三〇巴先，但他們的勞動生產力，比之九十年代開始超過了五〇%以上，那時他們一天獲得二〇巴先。」（註三十四）但當時勞動生產力，恐怕還不到當時歐洲紡織之一半。此外在上海已經有第一個蒸汽製粉廠、第一個淨米廠、兩個火柴廠、第一個造紙廠和第一個烟草廠。在漢口、蕪湖、揚州、九江、膠州都設有蛋糕工廠；在雞蛋價格騰貴與中國貨幣之暫時提高不至引起企業破壞時，這項生產一般是興旺的，第一個製肥皂的、製糖的、製火柴的、製

玻璃的工廠也都已開工。

到一八九九年在香港、上海、天津的外國租界內的自來水廠都已動工。上海中國地界也決定了建築自來水廠，在上海、香港、天津都裝設了電話；在上海、香港都有電燈；電車只北京有，因為在上海英國人和法國人尚在爭論究竟誰應該建築城市鐵路的問題。（註二十五）

中國礦坑煤的出產一天可達到二、〇〇〇噸；在萍鄉煤的出產一年達到一〇〇、〇〇〇噸。門頭溝的煤坑租與了意大利人；在山西意大利人也獲得了煤地探掘的租借；在貴州法國人獲得了礦山的租借。但這些租借地尚沒有開工。

在天津、上海、南京、漢陽、福州、廣州和成都都已經設有很好的兵工廠，同時在福州、大沽設有軍用的造船所。但這些兵工廠的出產品是極其惡劣。漢陽兵工廠一天三十五個工人製造一枝步槍，當時在德國用機器製造只需五天。在福州，在那裏技術上的指導都操之於外國人，所以兵工廠的工作很好。唐山的鐵路製造所由於需要的結果會製造火車頭、車輛。

大概的情形如此。如果總結起來，那麼在十九世紀的進程中，帝國主義握有如下的國家經濟支配權。

在一八九九年所有中國對外貿易共爲四六〇、五三三、〇〇〇元；輸入中國的計爲二四六、〇〇〇、〇〇〇元，而中國輸出的計爲一九九、〇〇〇、〇〇〇元（元的市價等於三先令一·八辨士）。外國帝國主義者已經強迫了三十二個協約海港的開放。出口的基本物品是絲和茶。菜油、苧麻、棉花、皮毛、豆等等的輸出在國家經濟中只起着不大的作用。棉織品的輸入在一八九九年爲一、〇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即佔全部輸入的三九%。鴉片的輸入計爲三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其餘的物品的輸入——火油、米、五金屬、機器、煤——其比重頗小。

差不多所有航海和航江河的船隻都是握於外人掌中（載重在一八九九年爲一、〇〇〇、〇〇〇噸）。中國的輪船只是起着附屬的作用。所有的船隻差不多都是屬於外國人。

中國的國際借款如下：一八九五年德法借款爲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八九六年英德借款爲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一八九八年英德借款爲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金鎊。

在鐵路的交通領域內各帝國主義列強強迫中國承認以下幾點：（註二十六）

鐵路的數目

長度（以米列爲單位）

英國利益.....九

二八〇〇

俄國利益.....	三	一五三〇
德國利益.....	二	七二〇
比利時利益.....	一	七五〇
法國利益.....	三	四二〇
美國利益.....	一	三五〇
總計.....	一九	六五二〇

其中有許多都不會實現。但後來中東鐵路（俄國的）、雲海鐵路（法國的）、膠濟鐵路（德國的）、廣九鐵路（英國的）、京漢鐵路（法比的）、滬寧鐵路（英國的），都相繼實現了。

所有這些鐵路僅僅在一九〇〇年後纔通車。

在礦業區域內主要的位置尚操在中國資本的掌握之中。僅僅萍鄉有三百萬馬克的借款。日本資本看上了大冶鐵礦。強迫中國礦山的租讓已經開始了，但除了北京新堤加的租借以外他們視租借地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

中國在五金業方面超過了一切亞洲的國家，包含日本和印度。

在輕工業方面有五個大紡織工廠隸屬於外國人，但優勢仍然屬諸中國方面。(註二十六)絲廠都是落於中國的掌握之中或者繳納租稅給中國。其餘輕工業部門由中國人和外國人合辦，但他們都不會佔有任何重要的意義。

外國銀行已經完全深入到國家財政系統的毛孔之中。在一八九九年在中國有以下的銀行：上海——香港銀行(資本爲二六、〇〇〇、〇〇〇法郎)、Deutsch Asiatische Bank(資本一八、〇〇〇、〇〇〇法郎)、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資本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中俄銀行(資本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Banque de l'Indo-China(資本二二、〇〇〇、〇〇〇法郎)、Mercantile Bank of India(資本三五、七〇〇、〇〇〇法郎)、Bank of China & Japan(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Yokohama Specie Bank(資本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註二十七)這些銀行幫助了對外貿易，調節了幣券的實際行情，吸收了中國主要的收入於自己的金庫之中。牠們的作用，當中國開始了國際借款時便特別增長起來。

最後根本上已經實行了顯著的不平等條約的制度。正是這種非經濟的壓迫制度使得帝國主義陣營異常地有力量，較之僅僅握有經濟支配權的帝國主義有力得多。此外，中國在中日戰爭中的

失敗充分表現了武備的薄弱，一切國家政府制度都頹敗不堪。帝國主義向各方面進攻了。

中日戰爭的失敗和帝國主義的進攻，在中國引起了一般革新和資產階級改良的運動。在一八九八年完成了政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綱成了百日政府的政綱。康有爲就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代表，這可從政權方面看出來。頒布了關於軍隊的改組和管理的命令，關於租借地讓與的命令。政府企圖引誘外國資本來發展中國的生產力。這個企圖剛剛繼續了一百天。九月二十日朝廷政變推翻了新的統治，並且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日頒佈了皇帝的命令，「康有爲爲要欺騙人民給與了不好的憲法」，「想要實施革命的政綱」，「虛偽的教義與不合理的原則，與古時聖人學說根本衝突」。中國資產階級領導資本主義發展的企圖失敗了。

兩年後在答覆帝國主義的強暴之中開始了拳匪的暴動。運動的領導權操於反動的掌握之中。暴動被所有帝國主義的列強聯合的力量壓潰了。農民與帝國主義鬭爭的企圖，雖有苦力城市貧民和破產的手工業者的協助，但同樣失敗了。

貿易之暴力的壓迫引起了太平天國的暴動。外國生產資本之強暴的壓迫與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引起了拳匪的暴動。

這樣結束了第一個鬥爭的時期。

註一：St. Julien, Industries Anciennes et nouvelles de l'empire Chinois, Paris, 1869,

註二：蘇格芬的簡、士德、1870-1872.

註三：Richtshafen, Tagebücher aus China. "Richtshofens Letters" p. 43.

註四：同上、p. 44.

註五：Stremme, Industrie und Bergbau Chinas "China's 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prüfung", Berlin, 1921. S. 199.

註六：Howard Huswell, A Survey of the Silk Industry of South China, p. 156.

註七：中國年鑑、1913, p. 186.

註八：康特爾威，中國的外國資本與鐵路，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出版，p. 10.

註九：馬札西爾，中國農村經濟，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國家書店出版，p. 160.

註十：中國招商輪船局。

註十一：開平礦務局。

註十二：十週年報告，一八九二——一九〇一年 卷二，p. 537.

註十三：科林，中國礦務的儲藏，p. 71-76；「一八九二——一九〇一年十週年報告」，卷一，p. 303.

註十四：威吉爾，中國財政，一九一四年上海出版，p. 298.

註十五：十週年報告，卷二，p. 513.

註十六：Brandt，China in ethischer Industrie'ler und Politischer Beziehung, 1896, p. 81.

註十七：S. Uyehara，the Industry and Trade of Japan, London, 1826.

註十八：李鴻章這話完全與實際情形不符，外國政府在形式上從來沒有同意過禁止在中國開設外國金礦。

註十九：Brandt，China in ethis-her, Industrie'ler und Politischer Beziehung, S. 82.

註二十：奧威拉，中國的外國財政管理，1916, p. 26.

註二十一：Duchers，La China en 1899, et vers 1901, p. 193.

註二十二：十週年報告，1892-1901, II, p. 511.

註二十三：同上，p. 517.

註二十四：Duchers，La Chin en, p. 169-174.

註二十五：康特爾威，外國資本與中國鐵路，莫斯科，1926, p. 12.

註二十六：歐吉爾在他的“Cotton Goods in China”之中說中國在一八九六年就已經有十二個紡織工廠和四一七、

〇〇〇紡錘。這個數目字我們認為是一種誇大的數目字。

註二十七：比較大的銀行只有一個：中國皇家銀行基本資本有一八、〇〇〇、〇〇〇法郎。

在中國拳匪暴動崩潰以後，接着便是爲租借地的鬥爭，離開了鐵路的建設而開始了交易所投機事業的時期。大生產的發展遇上了大的困難。大生產必須創造有其自身的市場。手工業和家庭工作不僅在經濟上表示是牠的頑強敵人，並且在政治制度上也是牠的頑強敵人。中國民族企業在市場的追逐中，遇到了由資本缺乏所引起的巨大困難。新的企業通常是基於部分的朋友或親戚之上，如像同業社一樣，因之當然不能集合大量的資本。毫無疑義，歷史上這些中國同業社之成爲股份公司的前身正與中國的信用聯合社是第一個信用合作社一樣，但其間的差別也如銀行和供給人之間的差別一樣。但這種同業社極容易破產；那種小小的銷路可以使牠走向死亡。國家技術人材之缺乏同樣引起了巨大的困難。跟着機器的引用就來了技術人材、工程師、熟練工人之輸入，

并且中國企業家與外國工程師之間很難建立一種依賴的關係。工業企業家經常帶有純粹的投機性質。他們在租借之中建造、開放、發賣、轉賣、出讓。「這種制度在中國現在還流行。」在上海……絲織業以租借而出讓。全部設備的八〇——九〇%是屬於資本家的，資本家出租工廠，每年獲得工廠價值的一五%。工業企業家通常與工廠所有者訂立年契。租金預先繳付，每一水鉢爲二元五角。」「(註二)」同時與資本的缺乏、技術智識的缺乏一起的工業企業的投機性質的許多困難引起了原料價格的昂貴。這種現象特別是在開始了大工業發展的國家來得很明顯，這尙爲馬克思所指出的。在中國牠由於加強了對外貿易和大工業的發展便直接地引起了價格的騰貴。現代的根源指出，例如在九十年代蛋糕生產的衰落恰好是雞蛋價格昂貴的結果。我們還可以知道，在鎮江本來有兩個絲廠，因爲絲繭不足的原故通常只有一個工廠工作。正在發展起來的工業由於原料的需要感到了農村經濟的落後，在烟草工業中即是如此。因而英美烟草公司採用的方法（經過商人高利貸者與農民訂立契約，在這契約之下農民所種植的烟草須賣給一定的商人），而中國的烟草工廠反而從英國輸入烟草。巨大的運輸費、賦稅、釐金、進口稅，商品輸入的競爭，關稅保護的缺乏，舊生產方法的矛盾阻碍了一般大工業之迅速的發展。在這情形之下，中國的民族工業和

外國工業比較起來，便受了許多額外的障礙。外國企業家不納賦稅、國產稅、釐金，僅僅爲自由運輸而納商品價值的二·五%。外國企業家有外國銀行的信用借貸，而對於中國的借貸利息極高。雖然有這許多的障礙，然而中國的工業仍然發展了。特別在上海有極大的成功。在一九二二年上海已經有四個造船所：“Shanghai Dock and Engineering Co.”，New Engineering and Ship building Work，Vulcan Iron Work（英國企業）和江灣造船渠與兵工廠（中國國家企業）；十個紡織工廠，四〇〇、〇〇〇紡錘和二、五〇〇架蒸汽紡織機（英國四個，德國一個，日本三個，中國六個），在上海本地也有四個工廠，一〇〇、〇〇〇紡錘；四〇——五〇個絲廠，一二、五〇〇個水鉢；八個製粉所、製油廠、造紙廠、皮革工廠等等；最後爲商務印書館，於一八九九年開辦，至一九一一年營業，有一〇〇〇工人，爲亞洲最大的印刷所。

在航業方面，中國的民族資本同樣有不少的成功。中國招商輪船局已經有三十一隻輪船，全部載重爲五九、三三二噸，其資本爲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上海與寧波之間已有兩隻輪船通行（一隻一、三〇〇噸和一隻九九九噸），行駛揚子江上流的有一隻；行駛廣州與香港之間的有好幾隻。

在鐵路建築方面同樣有巨大的進步，關於這點可從下表看出：

中國鐵路的建築(註二)

鐵路的 名稱	路線開闢 的年份	路綫的長 度以米列 計算	市郊的支 路以米列 計算	資 本	資本的 「民族性」	搭客的數目	載貨的數目 以噸計算
中東鐵路	一九〇三年	一〇七三	二〇二	50,000,000 盧布	俄國的	1,200,000	3,300,000
南滿鐵路	一九〇七年	四三七	二四一	20,000,000 盧布	日本的	3,300,000	4,000,000
膠濟鐵路	一九〇四年	二五六	二八	15,000,000 法郎	德國的	1,300,000	2,300,000
滇越鐵路	一九一〇年	二八八	—	10,000,000 鎊	法國的	2,000,000	1,200,000
京奉鐵路	1897—1903年	五二三	八四	10,000,000 元	中英的	3,000,000	3,500,000
京漢鐵路	一九〇五年	七五五	六二	5,000,000 法郎	法比的	2,100,000	1,800,000
津浦鐵路 (北線)	1901—1903年	三九〇	六二	5,000,000 法郎	英國的	—	—
津浦鐵路 (南線)	一九一二年	二三六	—	2,000,000 法郎	德國的	—	—
京綏鐵路	1909—1922年	二二八	一六	25,000,000 元	英德的	3,500,000	3,200,000
吉綏鐵路	1921—1923年	八〇	—	3,000,000 元	中國的	—	—
粵漢鐵路 (廣東線)	一九一一年	六五	—	20,000,000 美金	中英的	—	—

鐵路名稱	開辦年份	長度 (哩)	資本 (法郎)	資本 (鎊)	資本 (法郎)	資本 (鎊)	資本 (法郎)	資本 (鎊)
粵漢鐵路 (湘鄂線)	一九〇一—一九二三年	二五五	—	—	—	—	—	—
津浦鐵路	一九一〇年	一八	—	—	—	—	—	—
滬漢鐵路	一九〇一—一九〇六年	一九三	—	—	—	—	—	—
廣九鐵路	一九〇一—一九二二年	一一二	—	—	—	—	—	—
開封河南鐵路	一九〇八年	一四〇	—	—	—	—	—	—
太原石家莊鐵路	一九〇七年	一五一	—	—	—	—	—	—
			一、五〇〇,〇〇〇法郎	一、五〇〇,〇〇〇鎊	一、五〇〇,〇〇〇法郎	一、五〇〇,〇〇〇鎊	一、五〇〇,〇〇〇法郎	一、五〇〇,〇〇〇鎊
			中	英	法	比	俄	德
			國	國	比	比	國	國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一、五〇〇,〇〇〇	四、六三、一七五	二、二一、五七五	四、八二、八六	三、六三、三三四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	四、六三、一七五	二、二一、五七五	四、八二、八六	三、六三、三三四	一、五〇〇

於是中國在世界大戰前已經完成了的鐵路有六千哩，並且在建築中的有二千哩。鐵路已經起了那樣重的作用，致在一九一一年正是鐵路的「民族化」作了走向革命的直接原因。當然，中國鐵路甚至印度和日本比較還是差得很遠的。但一切大幫的貨物都已經由鐵路運輸了。

中國工業企業數目最增大的時期，可由下面極不完全的統計表現出來。(註三)

工業企業	外國的	中國的	一九一三年的總計	一九一四年的總計
蛋糕工廠	八	二	一〇	一〇
兵工廠	—	一五	一五	一五
磚瓦工廠	九	六	一五	一八

化學工廠	九	三二	四一	四一
蒸溜酒廠	—	—	五三	四一
造船廠 船渠	一九	五	二四	二四
電 站	—	—	三四	四〇
製粉所	一八	二二	四〇	四一
家具工廠	四	四	八	六
瓦斯廠	二	—	二	四
玻璃工廠	四	二	—	一七
中國苧麻機械廠	—	—	—	—
皮革廠	—	一	—	—
火柴廠	二	一〇	二二	二三
礦山企業	七	二	一八	一八
造幣廠	—	三	九	九
製油廠	—	—	三一	三五
造紙廠	—	—	二一	一三

印刷所	鐵路工廠	米廠	木材工廠	紡織廠	鑄鑄工廠	肥皂廠	糖廠	茶葉工廠	烟草工廠	自來水廠	毛織廠	壓毛廠	紡織廠
			一〇		九								九
		七	二		二								三三
四〇	一一	七	一一	二〇七	一一	一九	四	六	一六	一四	五	一一	四一
六〇	一三	一〇	一〇	二〇七	一一	二五	六	七	二一	二一	五	九	四八

在重工業方面發生了特別大的變動。

我們從上面已經看見，中國資本之不斷的增長創設了巨大的礦山企業——「開平礦業公司」。當拳匪暴動時，英國軍隊佔領了開平，在一九〇一年這企業就成為中英合辦的了，并委任第一個外國人做公司的總經理，此人便是今日的美國總統胡佛。於是中國喪失了自己的巨大的企業，中國資產階級曾企圖挽救這個頹勢。在英國軍隊退出以後，中國資產階級便申言用一、七五〇、〇〇〇金鎊贖回這個企業，而英國人所預定的價格則為二、四〇〇、〇〇〇金鎊。後來中國資本家在袁世凱的贊助之下在灤州另外開始了新的探掘，投入這個企業的有一、二〇〇、〇〇〇元的資本。英國發表了反對中國企業的戰爭，使每噸煤的價格從六·四美金降到三美金。戰爭完成了兩個企業的聯合為一，名為「開灤礦業聯合公司」。煤的出產額在一九一三年計為一、七二八、二九六噸、而工人數目則為一一、〇〇〇人。

在一九〇五年在河南租借地「北京新狄加」之上開始了煤的探掘；在一九一二年煤的出產額計為五六二、〇一二噸，而工人數目為八、〇〇〇。一九一二年秋天除掉一個之外其餘礦坑都出水，於是每天煤的產額降到七〇〇噸。從這個時候起這個企業便不會回復原狀。（目下，於一九二九年外國資本家與馮玉祥又重新談到這個企業的發展。）

德國人在山東佔有最好的煤田。煤的出產額在一九一二年計爲六〇〇、〇〇〇噸，工人數目爲七千。

日本人在滿州於中日戰爭以後，便攫得了撫順的煤礦。煤的出產額在一九一二年爲一、四八〇、〇〇〇噸，工人數目爲九千人。

中國資本家在直隸、山東、山西創辦了新的煤礦企業。在一九一一年在萍鄉採取了六〇〇、九一四噸的煤，那裏有六千礦工工作，而在博山二千工人採得了二五〇、〇〇〇噸的煤。此外，舊式礦坑所掘得的煤約六、〇〇〇、〇〇〇噸。但在所有煤礦工業區域內的最高支配權都是操於外人，英國人和日本人的手中。所有煤的出產總額在中國當時已經不是九、八〇〇、〇〇〇噸。也不是一三、一〇〇、〇〇〇噸了。

在那個時期日本資本會作了第一次攫取民族工業——漢冶萍公司的企圖。公司總經理盛宮保與日本訂立了關於生鐵供給的契約。日本帝國主義最軟弱的地方之一在於日本過於缺乏生鐵。所以日本資本在遠東凡屬有鐵礦的國家（朝鮮、馬來羣島、印度等等國家供給了日本生鐵和鑄鐵）努力經營。在一九〇五年日本與漢冶萍公司正式訂立了關於生鐵供給的契約。質量良好的生鐵每

噸價格規定爲三美金，質量較劣的生鐵每噸規定爲二·二美金。每噸生鐵運到日本的運輸費爲二·五〇美金。日俄戰爭以後，日本資本在滿州也就進而創設五金工業。漢冶萍公司在一九一〇年，以公司的出產品償還債款的條件從日本半國家銀行方面獲得了借款。

在一九一三年已經有二四〇、〇〇〇噸生鐵運輸到日本供給國家五金工廠了。在日本也開始了鑄鐵的供給。一九一一年以後，當時革命的結果，停止了政府的補助金，於是公司逐漸的增加對於日本銀行的債額。借款的利息比較低的爲每年的七——八%。但支付利息必須生鐵和鑄鐵；這裏按照契約每噸生鐵規定二·五——三美金，同時據公司經理羅某報告，每噸生鐵在公司中生產需二·五美金，而運輸到漢陽需〇·八五美金。由此可以知道，在這種罕有的掠奪的條件之下，漢冶萍公司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而成爲日本五金工業原料之供給者了。而鑄鐵，按照德國專門家的意見，在漢陽每噸出售爲一四〇馬克，而契約規定中國人每年必須供給日本一〇〇、〇〇〇噸的鑄鐵，價格只能在償還條例的百分比以內，每噸最低的價格爲五四馬克。美國領使格林在一九一二年關於漢冶萍公司營業會有如下的報告：溶製過的鑄鐵爲九三、三三七噸，其中輸出到日本的爲五八、〇〇〇噸，輸出到美國的四、〇〇〇噸，輸出到澳大利的爲五、七〇〇噸。

鐵軌的生產品爲二四、二一六噸。生鐵的生產爲三五六、四六七噸。在一九一一年曾輸出一〇、〇〇〇噸生鐵到日本。革命以後漢冶萍作坊停工了，結果鑄鐵的出口降到一二、〇〇〇噸，但生鐵的出口却增到二〇一、五六一噸。（註四）日本資本攫得了中國鐵的採掘工業和鐵的溶鑄工業。漢冶萍公司在最苛刻的高利貸的條件之下完完全全屈服於日本資本。

如果我們不會錯誤的話，那麼英國也有攫取印度工業——在借馬鋪方面的塔達五金企業商社的野心；至於美國已經將塔達水電企業握在自己的手中了。

從拳匪暴動到世界大戰的時期，中國對外貿易大大的增加了。在一九一三年對外貿易已經增加到九七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元的行情等於〇·七三美金），當時中國輸出平均爲四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元，而輸入爲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十四年之中，出口增加了三五%，而入口增加了四二%。對外貿易的財政和其他各方面完全是在外人束縛之下進行的。

大大的增加了中國對外國國家所負的債款。對於鐵路的建築，上面的統計表告訴我們，急切的外債已經有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金鎊加上一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加上八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鐵路的財產和收入，鹽的專賣的收入和各省的稅收都用來擔保這些借款。於是鐵路

的借款不僅保證了外國帝國主義對於鐵路的束縛，並且也束縛了國家的全部收入。

與鐵路借款的增加一起的便是中國國家的債務也同樣增加了。拳匪暴動壓潰之後，世界文明國家向中國追索六七、五〇〇、〇〇〇金鎊的賠款（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一九一一年中國爲「公債基金」簽訂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的新借款。但革命的爆發，借款便不會給與中國。還是在革命以後，在一九一二年，中國與倫敦銀行公會訂立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的新借款，但後來僅僅給與中華民國政府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鎊。這個時期在中國與帝國主義的關係中有一件異常重要的事，這就是大銀行團的形成：「香港上海銀行、德亞銀行、中印銀行、摩爾根公司、古勒公司、雷雪爾銀行、俄亞銀行、橫濱銀行，按照各該國銀行新狄加的意見，締結了以下一致的協約。即每一個銀行以同一的地位和同一的權利參加借款的整理或長期的政府借款（與工業借款的目的不同），或者預借，但這些必須有中國政府或省政府或爲政府所承認的股份公司的担保，然而這裏不包括流動的銀行事業和小的借款，因爲對於他們不預備發行債券或其他值錢的紙幣的。」（註五）六大列強的大銀行對中國的剝削造成了一致的戰綫。中國成了民國，因此需要改組軍隊、財政制度和管理等等。對於實現這些任務，急切的需要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中國政府爲要獲得對於自己最有利的借款條件，用盡了一切方法企圖引起外國銀行之間的競爭。這種企圖爲財政資本用世界銀行團的創立答覆了。在我們今天，所有希爾費丁、考茨基及其他許多人與列寧關於超帝國主義，各個帝國主義系統之國際的聯合及財政資本的「國際化」等理論上的對立意見并不妨礙我們回憶在中國香港上海銀行與德亞銀行之暫時的聯合，雖然當時英德的衝突已經決定了國際的形勢。也不妨礙我們回憶在大戰前兩年六大列強（站在銀行背後的政府）締結「超帝國主義」的協約，結果作了兩年後彼此決裂的口實。難道這不是證明列寧說這一類的國際協約僅僅是「暫時休息」的意見之完全正確嗎？

美國銀行於一九一三年三月由威爾遜的強迫退出了銀行團，他認爲銀行團威嚇了「中國的獨立」。美國退出之後，五列強的銀行團允借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鎊給袁世凱的政府。這次借款造成了革命之可能的崩潰和反動之暫時的勝利。這種意義在中國反復表現於其他場合，而在俄國則表現於一九〇六年事件發展的另一個階段之上。國際交易所，國際的財政資本解救了反動。然而外國資本的作用絕不止於以債權人和束縛者的性質出現於中國，絕不止於攫取貨幣和對外貿易，特別重要的是推動了工業和交通的發展。外國銀行同樣攫得了中國政府之一切重要的內

部收入。海關收入都是存儲於外國銀行之中。鹽的專賣的收入以整理借款條約的力量同樣必須轉交到附屬於銀行團的銀行裏面；鐵路的收入也是落到外國銀行。所有這些款項成爲外國銀行的流通資本，並且中國存款的盡量增加造成了外國財政資本利用中國資本的幫助和溝通而對於中國財政之可能的剝削。同時也大大的增加了和擴大了外國銀行網及其在中國的分行。外國銀行在銀價對於金價之變動的聯系中有重大的意義。最後到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 銀價依照對於金價的關係而繼續低落下去，但這種過程的發生不是直線，而是曲線。銀子失去了世界貨幣的作用。在世界市場上牠不復是一般等價的商品，而成爲簡單的商品。但在許多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國家中牠在內部市場上仍舊保持着固有作用。銀子成爲商品，因而這商品的價格不是按日而是按時變動的。石坦說的完全正確：「事實上一切決定國際行情的事業是操諸一部分人的手中，也正是那些外邦的信託機關，所以在調節行情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國民經濟的利益和中國的貨幣制度。中國簡直不知道對外貨幣政策這句話在歐洲的意義。其間甚至外國的研究家，例如威吉爾，他也承認外國銀行在一定的貨幣行情之下爲利潤的角逐往往忘記了中國民族的利益。外國銀行所確定的行情對於中國有更大的意義的在於這種行情決定了國家每年支付利息和償還外債之

銀幣的總額，而外債的貨幣單位差不多常常是以金子來表現。表面上銀行并非一成不變，甚至自覺的偽造行情，使人們在支付借款利息時急速地將銀子出賣。在一個海關出版物中報告道，甚至「重要監督都覺得不能不出來反對在償還借款時期所規定的那種時價」。以後海關出版物又說道，在每年銀價異常高漲的時候，那時中國政府便有可能用自己的銀元獲得多量的金幣，在銀行正式的行情和奔放的市場之時價間可以發生很大的差別，當着「在調節的鼓勵之下銀元之先令的分量便會在那個時候達到銀行公佈的正式行情之上。」（註六）

當時國家的國際支付并不大，當時對外貿易在國家經濟生活中并不會起大的作用，外國銀行在貨物市價調節者的機能上並沒有大的意義。剝削方法的增加是依中國和外界的經濟聯系的增加為轉移的。

因此，如果總結起來，那麼便可知道，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帝國主義就已攫得了主要的最高的財政與貨幣的組織（近代的中國銀行曾有八家，但在進行的過程中停頓了），列強差不多將整個鐵路的交通，海洋、江河與沿岸的航業都攥在自己的手中，而成爲中國最大的債權人，掌握了國家最主要的收入，吞沒了中國的礦山事業，將五金工業附屬於自己，支配了輕工業和製造工業方

面之最好的工廠，把持了一切對外貿易，攫得了南滿一切經濟的支配權，造成了開關商埠、租借地與不平等條約的制度。

四圍都封鎖着。中國人民的一九一一——一九二二年的革命曾作破壞這個制度的企圖。當一九一二年銀行團提出對中國的條件時，那時開始了改組財政機關所必須準備的廣大運動。準備給了威壓的結果。但當革命開始喚醒了農民的時候，當下層人民抬起頭來的時候，這個運動的上層領袖——中國的資產階級便立刻投降於帝國主義之前了。革命之所以失敗，正和一九一八年爲自然資產階級所宣佈的百日政綱企圖之失敗一樣。

註一：上海商界全體大會記錄，1924, p. 41.

註二：指用在建築鐵路面的資本。資本的「民族性」乃決定於鐵路建築的時期。材料取自一九一四年的中國年鑑。

註三：統計字取自一九一三和一九一四年的中國年鑑。統計字是極不完全的。一九一四年的增長，首先指出了某些

作坊的減少。

註四：年鑑，一九一四年 p. 169.

註五：Willoughby,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Baltimore, Vol. II, 1927, c. 993.

註六：石坦，中國財政危機，一九一八年，p. 121.

在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造成後兩年，在實現「超帝國主義」於中國領土後兩年，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便爆發了。世界大戰對於中國經濟顯示了一些什麼呢？答覆這個問題可以概括如下幾點：

一、歐洲列強（德國、奧匈）與中國市場完全割斷了。其他歐洲強國對於中國的對外貿易大大的減少了；特別是減少了英國與印度的意義。歐洲列強的工業都在為戰事而工作。甚至印度的工業為要從事戰爭的供給也退出了中國市場。因而美國的比重增加了（在一九一四年一二·八%，在一九一八年一二·八%，在一九二一年一七·三%，美國的輸入無須經過日本）。但日本的作和意義還更其增加了。關於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之規律的圖解能夠找出比日本更好的實例嗎。一九九五年日本對中國的外部貿易為三%，一九一三年為二〇%，而在一九一八年為三八%。日本與美國佔據了歐洲國家在中國市場上的位置。

二、在輸出資本到中國的意義上歐洲國家和美國差不多完全放棄了這個職責。這不但說明了

歐洲戰爭的情況，並且也說明了中國國家的紛亂。在戰爭期內僅僅美國銀行貸予了中國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的借款。此外日本則用錢供給北京政府，——這個政府是日帝國主義手中的政治傀儡。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橫濱正金銀行貸給北京政府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後來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這個期間訂立了大概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借款，這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這項借款是預定幫助段祺瑞的徒黨的。故全數為其徒黨所吞沒。日本與中國之間在一九二八年爭論得最厲害的就是關於承認這筆借款的問題，依照我們所有的材料南京政府承認了這筆借款。日本銀行團體還借了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給吉林省和黑龍江；爲了參加世界大戰，中國從日本方面獲得了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借款。

除了這些借款以外還有所謂「行政借款」，這項借款不是用之於任何直接生產的目的，日本輸出到中國的主要資本都是用之於生產的目的。漢冶萍公司的借款在一九二一年已經達到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在上海、青島、漢口都有日本紡織工廠的建立；擴大了撫順的礦坑；在安山已經開始了溶爐的建築；發展了製油工業、木材工廠、製粉所等等。安山五金工業在這個時期還是一種虧本的營業，生鐵質量既惡劣，煤的價格又昂貴，但日本帝國主義需要鐵，並且決心每年

在安山獲得一、〇〇〇、〇〇〇噸鑄鐵的生產品。(註二)無論中國什麼地方一旦有了鐵的開採或煤的採掘，日本資本便企圖把牠奪到自己的手中。

日本經濟勢力的膨漲，跟着就來了政治的進攻。在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條的要求，並且準備以後還要補充牠。日本賄買並且幫助安福系在北京奪取政權。然而正因為日本的進攻，使美國在一九二〇年能夠對於其他列強提出關於銀行團協約的口實。現在威爾遜所以出而擁護銀行團的原因，爲的獲得鉗制日本借款給中國之可能性。

於是，大戰的結果，我們看見歐洲列強在中國經濟系統中的意義與比重之降低，及美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之意義的增長。

然而不管美國和日本之輸入是如何的急速，但輸入到中國的商品在總的方面并不會增加。牠的增長表現於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一年由四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增加到六八八、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的貨幣之中。但所增長的不是商品量，而是商品的價格。在一九二一年的海關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在一九一三年主要的輸入品和輸出品，及在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這些商品的數量和價格，在這裏牠們的價格都是依據於一九一三年的價格計算的。這些統計說明了

在一九二一年整個貿易與一九一三年的貿易完全相同。這些統計指出，輸入減少了，而輸出却增加了。（註三）在這裏我們還可以看見，銀價對於金價的關係忽然變為有利於銀子的模樣。（戰時與戰後銀圓的市價在紐約爲：在一九一四年爲〇·六七美金；一九一五年〇·六二美金；一九一六年爲〇·七九美金；一九一七年爲一·〇三美金；一九一八年爲一·二六美金；一九一九年爲一·三九美金；一九二〇年爲一·二四美金；一九二一年爲〇·七六美金）。此外，在中國價格的增長，特別大的影響是表現於運輸費的昂貴。在一九一三年一噸貨物由上海轉運到倫敦需兩金鎊，而從上海運輸到大法蘭西需五美金。在一九一八年一噸貨物由上海運到倫敦需五十金鎊。而運到大法蘭西需六〇——七〇美金。在這個期間，我們還看到，在中國市場上商品輸入的競爭是異常的軟弱。因爲輸出的增加，在中國就強烈的感覺到商品的飢荒。中國將能夠賣出的盡行出賣。中國商人將從德國購來的顏料也出賣了。中國輸出銅，但不是採掘的銅，而是從農民那裏收集來的改鑄過的銅幣。中國甚至也輸出麥粉。日本已經不能掩蔽生長起來的兩次中國抵制日貨的嚴重運動——一九一五和一九一九年——雖然沒有終止輸入，但在一切場合都可阻止日本輸入的增長。所有這一切也說明了日本工業在中國領域內之迅速的增長。但甚至連日本新工廠的製造品

也不能滿足需要了。在中國開始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猛烈的發展時期了。在紡織品方面特別猛烈的感覺到商品的飢荒，所以在紡織工業的發展上獲得了巨大的興奮。紡織品輸入的減少，在這個時期不僅是相對的，而且是絕對的。如果在一九〇五年紡織品的輸入佔總輸入的四〇%，那麼，在一九一四年紡織品的輸入佔總輸入的三一%，在一九一八年佔總輸入的二七·二%，在一九二一年則佔總輸入的二三·一%。如果中國在一九一四年輸入一九、〇〇〇、〇〇〇細棉紗。那麼在一九一九年則爲一四、〇〇〇、〇〇〇細，在一九二〇年則爲一三、〇〇〇、〇〇〇細。到一九二一年已經只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細了。而棉絲的輸入在一九一四年由二八、〇〇〇、〇〇〇拾，到一九二一年降到了二三、〇〇〇、〇〇〇拾。這些也說明了中國紡織工業特別是日本在中國的紡織工業之猛烈的發展。

戰前中國大紡織工業的發展，其速度非常之平衡，下面的數目字便證明了這點：

中國紡織工業發展之速度（一八九六——一九三三年）

年期

工廠數目

紡錠數目

一八九六.....一二

四一七、〇〇〇

大戰時期，特別是戰後第一年，其發展更爲迅速。以下的數目字完全證明了這些：

年期	工廠數目	紡織數目
一九〇九.....	一一	八〇〇、五〇〇
一九一〇.....	一一	八二二、三〇〇
一九一一.....	一一	八三二、三〇〇
一九一二.....	一一	八三二、三〇〇
一九一三.....	一一	八七〇、八〇〇
一九一三.....	一一	
一九一四.....	一一	
一九一五.....	一一	
一九一六.....	三	
一九一七.....	一	
一九一八.....	八	

一九一九.....	五	
一九二〇.....	六	
一九二一.....	一一	一、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	二〇	二、二四八、〇〇〇
一九二三.....	六	二、六八〇、〇〇〇

這些數字絕對不是完滿無缺的表示了現時生產品之發達速度的。戰爭時期發生了許多手工工廠，有力的廣佈了爲估買人而工作的家庭紡織業。這特別是關聯到紡績業。我們已經指出，在奉天、牛莊等地，大戰時期，在手工工廠內工作的織機比之現時要多過兩三倍。
絲工業也有莫大的發展，特別是上海的絲工業，這可由下表看出來：

上海的絲織工業(註三)

年 期

絲織業數目

水鉢數目

一九二〇.....	五
一九二一.....	一一
一九二二.....	二二

一九〇〇.....	一八	五、九二二
一九〇五.....	二二	七、六一〇
一九〇九.....	二五	一一、〇五八
一九一〇.....	四六	一三、二九八
一九一四.....	四六	一四、四二四
一九一六.....	六一	一六、一九二
一九一八.....	七一	一九、二〇〇

在廣東絲工業的發展也獲得了同樣的衝動。

但發展并不限於紡織工業。大戰時期中國會有麥粉的出口。在滿州在國家殖民地化的過程中增設了麥子的播種場，結果蒸汽製粉機的數目在一九一三年由四十架到一九二一年增加到一百二十五架，但這個數字很快地又減少了。在一九一三年在中國應用蒸汽、電汽或發電機來做推動機的有四〇〇——六〇〇個工廠。在一九二一年這個數字已經提高了二、〇〇〇。參戰國的食物和化學的工業化便需要植物油來做原料。但豆子、芋蔴、落花生的出口被昂貴的運輸費和缺點所阻

礙。於是製油的家庭開始了菜油的輸出，爲適應這個需要製油工業便迅速地發展了起來，而特別是在大連。爲要說明這個進程我們引證以下的統計：

大連的製油工業(註四)

年期	工廠數目	每日最多的出產品(以噸計算)	大量的菜油出產品
一九〇七	五	一一、〇〇〇噸	一、〇三二擔
一九一三	四四	一四七、九〇〇噸	六、八二二擔
一九三二	八四	二六三、〇〇八噸	一二、五四〇擔

這裏，還須附加一點，就是在漢口、哈爾濱、青島或上海，其發展的速度還要更其迅速。

「工業企業尤其是紡織工業的發展之被限制似乎僅僅因爲不能獲得必需的機器。在現時所有起源於外國的工業製造品差不多在中國沒有外人的幫助已經都可以製造了。我們試將這些物品列在下面：光滑製造品、紡織物和棉織物、絨織品、肥皂、香水等等，雨傘、毛織品、鈕扣、化學物品、鐵釘、電燈泡、玻璃、玻璃製造品等等。中國的製船所在一九一九年所建築的商船一般載重爲一二、三〇七噸。在上海建有新的造船所。漢冶萍公司和開灤礦業都擴大了。」(註五)

海關秘書在這個極長的引證中把握了事實的本質。在這個時期工業發展的重要障礙之一，便是機器的缺乏。不能獲得牠們所需要的數目——總而言之，國內缺乏生產工具的工業部門。類似的現象在印度也曾看到。帝國主義在生產生產工具上的壟斷，使牠在大戰時期感覺到這是稀有的力量和敏捷。

關於中國和印度在國家工業化方面的這種經驗使人聯想到不僅在中國和印度是如此，即在蘇聯也是如此，在蘇聯我們有教養的右派曾經長期的反對生產生產工具的工業部門之發展的速度。

從這個見地來考究機器之輸入中國是有特殊興趣的。我們引證一切機器的輸入的數目字（除掉農村經濟的、毛絨的、縫衣的、刺繡的等等機器，因為這些工業的發展無直接的聯系），為使明瞭起見，我們來引用大戰時期中最穩定的貨幣本位美金作標準。於是我們獲得了更有興味的圖表：

機器的輸入（以美金計算）	
年期	價格
一九一〇.....	四、七五二
一九二一.....	二、七五〇

一九二二.....	二、五六一	一九一九.....	二七、六六一
一九二三.....	二、四八二	一九二〇.....	三四 五九九
一九二四.....	三、六一八	一九二一.....	七一、六九二
一九二五.....	一、六七四	一九二二.....	二六、二七九
一九二六.....	三、七九二	一九二三.....	一七、三二七
一九二七.....	六、二八三	一九二四.....	一五、〇六六
一九二八.....	一一、四七三		

此地不妨指出，戰前英國供給中國的機器爲三七·九%，德國爲一八·三%，日本爲八·九%，美國爲六·八%；而戰後英國爲二九·六%，德國爲一七·七%，日本爲一八·八%，美國爲二〇·七%。這個統計指出，最幼稚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和美國在大戰時期生產生產工具是如何的發展了。而從第一個統計可以看出，機器輸入之巨大的增加僅僅是開始於戰後，因爲在戰爭時期輸入的增加只是表現於貨幣上面，這不過完全反映了機器價格的昂貴而已。而在一九一八年以後才表現了顯著的增加，這種增加到一九二二年以後又非常明顯地減弱了。我們還須指出，在

印度差不多也有過類似的力學。

然而不但機器的缺乏是大工業發展的障礙，原料的缺乏也起了極大的作用。大戰時期從中國輸出到日本的原料（生鐵、鑄鐵、煤及棉花）顯然的增加了。中國更完全的變成了日本工業原料的出產地。試看下表：

煤的出產（以百萬噸計算）

年期 噸數

一九一三……………一四

一九一四……………一五

一九一五……………一五·四

一九一六……………一五·五

一九一七……………一七·二

一九一八……………一八·〇

年期 噸數

一九一九……………一九·九

一九二〇……………二〇·三

一九二一……………一九·八

一九二二……………一九·九

一九二三……………二二·六

生鐵的出產（以千噸計算）

第六章 中國大機器工業的發展

年期	噸數	年期	噸數
一九一三	九五九	一九一九	八六一
一九一四	〇〇五	一九二〇	八六五
一九一五	〇九五	一九二一	四二六
一九一六	一二九	一九二二	五五九
一九一七	一三九	一九二三	七三五
一九一八	四七四	一九二四	七六五

我們在下面便可看見，輸出的增加比之生產的增加來得快（在一九一三年從二一七、〇〇〇噸到一九二四年增加到八四六、〇〇〇噸）。還須指出，三分之二的生鐵是用近代方法的出產，而三分之一是用舊式方法生產的，其中輸出的生鐵都是用近代方法生產的。

鑄鐵的輸出也大大的增加了，達到了生產品的六〇%。

鑄鐵的製造（以千噸計算）

年期

噸數

年期

噸數

一九一三.....	二六七	一九一九.....	四四六
一九一四.....	三〇〇	一九二〇.....	四二七
一九一五.....	三三六	一九二一.....	四〇二
一九一六.....	三六九	一九二二.....	三九三
一九一七.....	三五七	一九二三.....	三四五
一九一八.....	三五四	一九二四.....	三三〇

戰後第一年在國內鐵與銅的需要也大大的增加了，下面的數字便可說明這點。

內部鐵與銅的需要之增加(以千噸計算)

年期	噸數	年期	噸數
一九一三.....	二六一	一九二二.....	三七五
一九一九.....	三四五	一九二三.....	三四七
一九二〇.....	三四二	一九二四.....	五四七
一九二一.....	二九三		

戰爭給了礦山工業和其他經濟部門極飛快的發展。銻的價格增加了六倍和十倍，爲要準備在戰後的慘跌。價格的搖擺也爲出產品所決定。下面關於輸出的統計也與出產品相符合：

銻的輸出(以千拾計算)

調製個的銻

一九一六年.....一〇·六

一九一七年.....一五·一

一九一八年.....一五·九

一九一九年.....二·一

一九二〇年.....九·六

一九二一年.....一二·五

一九二二年.....一二·六

一九二三年.....一一·五

原本的銻

一九一六年.....一一·八

一九一七年.....一九·九

一九一八年.....一·六

一九一九年.....七·〇

一九二〇年.....四·五

一九二一年.....二·五

一九二二年.....一·五

一九二三年.....二·九

戰時和直接在戰後亞鉛、錫的出產品也增長起來，下面的數目字完全證明了這點：

錫的出產(以千噸計算)

年期 噸數

一九一六.....七·七

一九一七.....一一·九

一九一八.....八·八

一九一九.....八·八

年期 噸數

一九二〇.....一一·五

一九二一.....六·一

一九二二.....九·一

湖南的礦山掘出了鉛和錫。湖南省政府在一九〇六年曾企圖應用近代技術——機器於這個生產之上；礦坑有三千工人做工，每月工資為六——一五元。出產品在一九一四——一八年這時期大大的增加了；以後跌落得很厲害，到最後一年纔又慢慢地增長起來，雖然在世界市場上錫的價格慘跌和馬來羣島之劇烈地競爭。(註六)

在一九一五年開始了錫的出產。後來美國增加了入口稅，在世界市場上就遭受了不幸的價格的跌落，因而這個礦山企業部門差不多完全破壞了。(註七)

在一九一八年出產品為一〇、二八〇拾，一九一九年出產品為六、〇〇〇拾，而到一九二二

年則爲三、四一七拾。大戰時期錳的需要增加了。在一九四五年在中國錳的出產品爲一九、五九五噸，到一九一九年已經只有三、四八七噸了。這個時期還有開發山西煤油的計劃。但牠們不會有什麼結果（一九一八年爲三、三〇〇拾，一九一九年爲一、九〇〇拾，一九二〇年爲二、三〇〇拾，一九二一年爲八五〇拾）並且中途停頓了。

戰後其所以那樣容易將中國礦工業從世界市場上排擠出去的就在於鈣和錳等等的易被外國的交易所壟斷的原故，當時這些交易所是允許幫助中國生產的。當着需要減少了的時候，他們不但取消了對中國工業的幫助，並且將牠從世界市場上排擠出去。

中國資產階級在財政方面獲得了不少的成功。如果在一九一三年僅僅存在了幾個銀行並且還是在萌芽的狀態中，那麼在戰時和戰後的第一年中國的信託機關就大大的增加和擴大了。

在航業方面也發生了大的推動和變動。可是在遠地航行方面所增加的中國船隻還是起着不大的作用。在一九二二年船的總載重爲一八一、〇〇〇、〇〇〇噸，行駛中國港內的只有二六、〇〇〇、〇〇〇噸，而在一八一、〇〇〇、〇〇〇噸的載重中從中國港內駛出的，只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噸是中國的船。但是中國的船隻在通商口岸的交通中已經大大的增加了。在一九二二

年四三八、〇〇〇、〇〇〇噸的載重中，行駛通商口岸的載重爲一三九、〇〇〇、〇〇〇噸，而行駛出口的載重爲二三八、〇〇〇、〇〇〇噸，其中一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噸是中國的船隻。

實際上中國的航船是在大戰時期增加起來的。如果輪船公司載重的計算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是以浮在中國水面上的來計算。那麼載重表明如下：

英國公司的載重……………二二三、二〇一噸

日本公司的載重……………七〇、三〇五噸

荷蘭公司的載重……………七九、一七四噸

比利時公司的載重……………五三、〇九五噸

美國公司的載重……………四、二一三噸

所有外國公司的載重爲……………四一九、九八三噸

全中國公司的載重……………二二三、二〇一噸

這就是說，中國的航船在十年中差不多增加了十倍。在整個的場合，因爲激勵的結果，竟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江河與沿岸的船隻和百分之十的航海船隻已經操在中國資本的手中，當然，這樣

的進步惟有戰爭時期而當着載重不是感覺到特別厲害的時候，當着在這方面的競爭已經不是輪船公司之間爲載重，而是爲輸出與輸入之間的載重的時候，當着單個的日本輪船公司分出一〇〇——一七五%的基金作爲紅利的時候纔有可能。從此以後，中國在航海與航河的交通中的載重不是增加而是減少的。

在財政方面同樣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如果不是相對的，那麼，在一切場合，中國銀行的作用與意義是絕對的增加了。誰都知道，列寧會說外國銀行的分行廣佈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中是有重大之意義的。事實上在中國的外國銀行數目迅速的增加了，但同時中國銀行數目也增加了。試看銀行分部是如何的發展：

在中國銀行分行的增加

年期	銀行數目	分行數目
一九一三	外國銀行 一三	六二
一九二二	外國銀行 二二	九〇
一九一三	日本銀行 八	五九

一九二五	日本銀行	一四	七六
一九一三	中國銀行	一九	一九〇
一九二三	中國銀行	二三三	三八七

但是如果把外國銀行資本與中國銀行比較一下，那麼很明顯，中國的資產階級被財政資本無情的武裝大砲所制服了。外國銀行所支付的固定資本單就日本計算就有一五三、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一四、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荷蘭古頓，五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墨西哥金，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香港金，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中國銀元，一七一、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三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外國銀行的大多數不僅是經營於中國，並且也經營於其他國家，但牠們除了自己的資本以外，還可支配視為流通資本的海關收入、鹽的專賣、鐵路的收入、中國的存款等等。而中國銀行正是沒有支配到這個機關。中國銀行所支付的固定資本為一五九、〇〇〇、〇〇〇墨西哥金，九、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六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和一、〇〇〇、〇〇〇金鎊。所以當我們說到海關機關、鹽的專賣獨立時，甚至中國的銀行家也做着很熱心的姿勢，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

但支付資本的簡單比較，表示中國的近代銀行支配了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總資本，這是不能與外國銀行作任何重要的競爭的。然而銀行分行的發展也是爲了打擊專門買辦。專門買辦這個字在狹隘的意義上之所以爲外國商業交易所所必需的原因，乃是因爲他們保證了外國交易所對中國商人的作用。現在這些機能開始轉到中國的近代銀行方面去了。這當然不是說買辦的作用和買辦的資產階級減少了。恰恰相反，有些地方專門買辦的集團變成了商業資產階級的廣大階層，而從事於輸入和輸出的貿易。這個商業資產階級層，其事業的本質便是爲外國交易所按照輸入的綫索採辦商品，和按照輸出的綫索做外國交易所的買辦。個別買辦的地位完全走上了資產階級的階層！

然而甚至在對外貿易的範圍內中國資產階級也佔有相當的地位。中國資產階級獲得了中國與華僑（南洋、馬來羣島、安南等等）之間的仲介地位。此外中國巨大的商業交易所開始派遣牠們的代表到日本并經過他購買棉織品。在上海開設有巨大的百貨商店，這種百貨商店在國際範圍內已經有信用的關係。在通商口岸散佈了許多商業交易所。

用了三〇〇、〇〇〇——四〇〇、〇〇〇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是由中國內地來的。鐵路的建築加速了內蒙古之殖民地化的過程。製粉所、釀酒廠、麥酒廠、製油廠、煤工業與鐵的採掘工業都很迅速地在滿州發展起來了。

在這個時期，貿易差額的被動性大大的減少了。如果貿易差額的相差在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一三年爲一、六五〇、〇〇〇元，那麼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一年這個時期只有九八〇、〇〇〇元了。國內金子的輸出減少了。如果在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一三年這個時期中國輸出了一、〇〇〇、〇〇〇金子，那麼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一年就只輸出了四、〇〇〇、〇〇〇元了。銀子的輸入增加了。如果銀子的輸入在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一三年這個時期爲六一、〇〇〇、〇〇〇元，那麼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一年平均就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了。看不見貿易上的差額毫無疑義是中國利益之巨大的增加。向各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移居不斷地增加了，而其中尤以移民的遷移更爲增加了。如果戰爭不是「黃金」的話，那麼銀子世紀這句話在直解的意義上，是對南洋、馬來羣島、菲律賓、安南的中國資產階級而說的。牠的遷移與投資中國也增加了。在大戰時期，有一四〇、〇〇〇中國工人在北法蘭西做工。這些工人的移居同樣也增加了無形的支付的積

極性。

中國的資產階級感覺到了經濟力量的外溢。在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的反對日本的拳匪運動，證明了牠能夠利用民衆的幫助，參加反德的戰爭，取消德國和奧國所訂立的不平等條約，由於凡爾賽和約而激起了一九一九年的資產階級運動。同時在遠東也受到了俄國革命的影響，當時中國資產階級在俄國革命中所看見的，還只是牠的反帝國主義的特點，中國資產階級關於統一的夢，民族獨立的夢都已做過了。

註一·Bank of Chosen, Economic History of Manchuria, c. 192.

註二·Remer, Foreign Trade of China, c. 103-184.

註三·"Journal of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July 1924, c. 40.

註四·"Chinese Econom Monthly", No. 13, 1925, c. 29.

註五·"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19, Vol. 1, c. 19.

註六·"Far Eastern Review," No. 3, c. 107.

註七·"Far Eastern Review" No. 4, 1928, c. 176.

第七章 中國工業發展的指數

一 戰後工業危機的來源

出現於一九二三年以後的中國工業化之危機，絕不是工業化過程之完全停頓。此種見解無異將中國方面的問題與施行於印度的一樣簡單化。在印度，採煤、鍊鐵、製鋼、在紡織工廠甚至在製麻工廠中的紡錘和織機的數目以及在火柴工業中都繼續着增加；開始了化學工業及製糖工業的發展，發展了巨大的車站，擴大了鐵道網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在印度和在中國，危機表現為生產機關增長的速度之停滯。這在中國紡織工業方面特別明顯，紡織工業的發展在一九二五年以後幾乎完全停頓了。棉織和絲織工業，煤和鐵的出產之增長的速度也同樣停滯了；減少了鑄鐵的鍛鍊，開始了許多主要的五金企業一般地瓦解。

工業增長的速度之遲滯便是危機的指數之一。而在中國我們看見不僅生產機關增長的速度之

遲滯，就是生產品增加的速度也在遲滯，而在某些工業部門內甚至直接降低。

歐洲及一部份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市場上的恢復，日本帝國主義的更加增大的工業爲爭奪中國市場的劇烈異常地加強了競爭和引起了工業利潤及中國一切其他企業利潤之更加降低。這種情形很有力的打擊了日本在滿州的企業。（註一）特別是在中國企業上表現出破壞的影響。同時如像外國企業，特別是日本企業當着高度的危機之時積聚了大量的後備軍，而中國企業則將戰時及戰後所獲得的不實在的利潤以股息的形式分配了，因而在危急存亡之秋并不會遺留一點後備軍。所以危機的第一次打擊便引起了中國企業之大量的破產，大量的中國企業轉到新的，轉到外國的手裏。大大的停滯了國內工業的積累。工業製造品的價格之急劇的低落便減低了貯積的商品和原料的價值。

特別有力的影響表現於工業企業的命運和那種情況之上，即新工廠和作坊註定了自己在戰時和戰後頭幾年的製造。那時任何製造品的價格是非常之高的。戰後機器和製造品的價格逢上了急劇的低降，并且在利潤同時降低的時候，這種情形便引起了企業的過度資本化。一部份的固定資本發生了流動，或者損失的年代在破產的最後總結中便到來了。

在中國全部經濟上異常不幸的影響會表現於工業製造品與農村生產品的價格之間的「剪刀現象」之上。中國以基本的農村生產品和自己的移民的勞動力償付工業製造品和輸入的原料；後者的物價相對的騰貴便會異常不幸地影響到國家貿易的比差。在國內市場上工業製造品與農村生產品的價格之間的「剪刀現象」更加降低了農村的購買力。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以後，這種關係在世界市場上已有顯著的改善，但在中國這種改善因為許多特殊的原因不能充分地表現出來。而一九二九——三〇年的危機又重新引起「剪刀現象」之急劇的分離，農村生產品價格的下降（橄欖樹的種子、絲、茶）和雜色金屬價格的低落——這些是中國輸出之基本物品。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中國幣制危機之增進。在戰後頭幾年銀價達上了深刻的低落。在一九二六年發生了銀的價格之新的降低。銀子已不視為貨幣，在世界貨幣的資格內已失去了牠的意義，並且許多國家都從銀本位制改為金本位制。最近時期印度的市場只收買很少數的銀子，而英屬印度的政府則將自己貯存的銀子出賣。於是中國代替了印度的地位而為銀子的最大的購買者了。但銀價的低落表示了中國主要的貨幣本位和財貨的價值之低落。中國用銀子彌補了自己的貿易比差的損失和自己的國際借款之全部支付。銀價低落就其對於金子的關係上使得機器和原料輸入國內

異常地困難并且也大大的減少了國家一般的購買力。在此種關係上世界經濟的危機對於中國便成爲國家的災禍。標準的銀兩的價格從一九二九年期到一九三〇年五月從二六、〇〇〇、〇〇〇降落到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即是降落了三二%，而將國家的全部經濟生活引入於完全混亂的狀態之中。

但這對於危機原素的特徵之指出仍然不充分，因爲在那個時候，就如銀子對金子的關係而發生了價值的低落一樣，農村貨幣本位——銅幣對於銀子的關係也呈現了價值的低落。此外，這一時期是中國一切紙幣價值迅速低落的一個時期。所有這些情形有力的打擊農村的購買力并且引起了國內市場之相對的縮小。

中國工業發展了，外國商品的輸入增加了，而國內市場却相對的縮小了。

然而國內市場的破壞和對於工業製造品的國內市場之相對的縮小比之一切幣制的困難還更有力的促進了農業危機的加深。對於此種關係上的危機的特徵充分的指示在下面。在一九〇〇——一九一〇年的時期內輸入中國的米一年平均爲三、九九七、〇〇〇噸，在一九一一——一九一五年的時期內爲三、四五九、〇〇〇噸，在一九一六——一九二〇年的時期內爲三、七五四、〇〇〇

○噸。近年米的入口在下述的數字中表現了出來：

(以千噸為單位)

一九二一.....	六四三	一九二五.....	七六四
一九二二.....	一一五八	一九二六.....	一一三一
一九二三.....	一三五六	一九二七.....	一二七五
一九二四.....	七九八	一九二八.....	七六七

在一九〇二——一九一一年時期內麵粉的輸入平均一年為一四六、〇〇〇、〇〇〇袋；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時期內為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袋。最近的輸入表現於下述的數字

(以千袋為單位)

一九二五.....	二八一	一九二七.....	三八二五
一九二六.....	四二八五	一九二八.....	五九八五

饑饉之後接連饑饉，自發的貧困一再重複，灌溉的建築物被破壞，土地被枯竭，流氓惡棍增加，農民破產，賦稅、徵發的增加，牲畜的減少，——所有這些原素一齊破壞着農村。在這個時

期內發生了軍閥的戰爭、革命和內戰。商業道路的破壞，各省在整整幾年中與工商業中心隔絕，國內稅收的增加、鐵路運輸的破壞、內河船行的混亂也同樣地促進了國內市場之相對的縮小。

在估計這一切過程的時候，還得提出一個極關重要的事情，這事情早爲恩格斯所指出。恩格斯在給丹尼爾梭的信中說道：

「大工業發展的必然結果之一，就是大工業用其創造國內市場的過程來破壞牠原有的國內市場。大工業創造國內市場來破壞農民的家庭工業。但沒有家庭工業農民便不能生活。農民破產了，他們的購買力降到最低限度，當他們在生存的新條件內沒有立下基礎的時候，他們以無產者的資格對於重新發生的工廠和作坊將只是一個很可憐的市場。資本主義的生產，就是經濟基礎的轉換，牠充滿了內部的矛盾，這些矛盾發展着并且只就其本身發展的尺度已是很明顯的。這種傾向——替自己創造市場而就在那個時候破壞牠——正是表示了那些矛盾之一。」（註二）

很顯然，恩格斯這種指示是過渡到大機器工業之一個一般的共通的規律，甚至在舊資本主義國家中亦然。（英國在一八二〇——一八四五年間大工廠的工人人數從一萬增到十五萬，而家庭工業的工人人數則從二十四萬減到六萬。這樣看來工業甚至不會吞沒全部家庭工業的工人，更說

不上英國和愛爾蘭之破產的農民了。)這種指示對於那樣的國家，即工業的發展發生於與其他國家的高度工業競爭的條件中的國家尤其正確。毫無驚奇地，在印度近幾年來營着二二、〇〇〇、〇〇〇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以偶然做日工所得的工資維持生活時便減少了紡織品的消費；毫無驚奇地，在中國當着成千成萬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被拋擲於生產過程之外并且因飢餓而死的時候便縮小了國內市場。

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創造而且也破壞國內市場的這種時期在印度和中國還是很長的。這種情況在這些國家中將為偉大革命震動的源泉，——特別和這些相聯系的，就是國內市場之創造和破壞的過程在這些國家中是發生於帝國主義的時代，那時巨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和印度進行着為爭取銷售市場的鬥爭。

在這裏包含着這些國家工業革命的特點，這些國家很遲滯的、出現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之上。也因此給了中國的危機以獨特的深劇、尖銳和擺動。除此以外還有這種發生於資本輸出時期的危機，這時期外國銀行已經在中國創造了強有力的密網，並且在國內據有重要的財政指揮的高位，結果外國資本可以收買許多中國的企業，或者形式上使牠們依舊屬於中國，而實際上則完完

全全置於自己的管理之下。危機的這種結果主要是爲那個時候所決定的，而當時約有一萬二千個中國工程師得不到工作，中國企業的主要部份處在外國管理和工程師個人指揮之下。在中國工業危機表現於許多企業轉入外國資本手裏和中國企業之非民族化的情形。

這種非民族化的過程在一九二九——三〇年世界經濟危機的時候獲得了巨大的力量之推動。在上海和明島 (Mindao) 許多中國紡織工廠和絲織工廠都轉入到外國資本手裏。入口紙烟的競爭和英美烟公司的製造完全破壞了中國的製烟工業，並且引起了兩個中國極大的企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江盛煙公司的破產和關閉。在這種情形之下傳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轉入於英美烟草公司的手中。同時瑞典的火柴托拉斯以其有力的競爭在中國市場上一箱火柴比中國工廠便宜四元至六元——這使中國本部的中國火柴工廠走向破產的境地并使滿州的中國企業不得不屈服於托拉斯之前，同時南京政府在日本資本前面承認了漢冶萍公司的全部債款，並且在日本的壓迫之下同意在三年內不提高在一九二九年所施行的可憐的關稅。

少數派的殖民地化前期的理論在中國也遭受了極透明的失敗。生活本身打碎了虛偽的機會主義的理論。在中國和印度危機的進程在實踐上嚴格的證明了那種理論是從第二國際對於帝國主義

和殖民地民族改良主義之辯護的武庫中取來的。

二 煤炭工業

我們已經知道，中國煤的開採在一九一四年爲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噸，而在一九二二年爲一九、九〇〇、〇〇〇噸，此外在最新式的礦坑中，在一九一四年採掘出八、〇〇〇、〇〇〇噸，而在一九二二年採掘出一三、九〇〇、〇〇〇噸。輸入國內的煤在一九〇二——一九二二年每年平均爲一、三七〇、〇〇〇噸，而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每年平均爲一、三五〇、〇〇〇噸。

在世界大戰時期中國民族的煤炭工業之發展以極快的速度進行；中國資本家贖回比利時的企業並且沒收了一個德國企業據爲己有，結果這種外國資本據一九一六年所調查的在近代礦坑採掘的有八一%和全部礦坑採掘的有五〇%，據一九二〇年所調查的在近代礦坑採掘的只有六〇%和全部礦坑採掘的只有四六%，內中還包括有舊式的礦坑。民族資本與外國資本的此種相互關係大概維持到一九二五年，那時開始了中國企業衰落的過程。在別的地方我們已經指出過，在一九二

九年在中國煤的採掘已經有七二%握於外國資本的手中。中國資本的部份發生了這種巨大的減少一部份是因爲釜山（註三）日本企業之迅速增加和在唐山（註四）英國企業之迅速的增加的結果，一部份是因爲在山東中國企業轉入於日本手中的結果以及一部份是因爲在中國礦坑內煤的採掘減少的結果。

在一九二三年煤的採掘爲二二、六〇〇、〇〇〇噸。這樣牠超過印度煤的採獲，在印度每年平均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不言而喻，這絕不是說在中國使用於工業方面的煤比印度多。我們不會有關於一九二三——一九二八年這一時期中國煤的採獲之正確的材料。據最近不大正確的材料看來，在一九二七年煤的採掘爲二五、七〇〇、〇〇〇噸。（註五）在這裏我們看見，在開灤（英國的）煤礦煤的採獲在一九二二年爲三、七〇〇、〇〇〇噸，而在一九二七年爲四、五〇〇、〇〇〇噸，在釜山（日本）的煤礦煤的採獲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八年從三、六〇〇、〇〇〇噸增加到七、三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九年增加到七、五〇〇、〇〇〇噸。從這些材料中很顯然地看出許多估計中國礦源的錯誤，照這種估計，中國的資本據一九二七年的調查煤的採獲爲一五、二〇〇、〇〇〇，而外國資本則爲九、一〇〇、〇〇〇噸。（註六）在這種估計之下，并不

曾指出在山東和江西中國的礦坑之採獲的減少，中國企業轉入於日本人的手中，舊式煤礦工業的衰落和外國企業的煤的採獲之巨大的增長。

我們引出一些關於煤業的利潤的材料不是沒有益處的，雖然這些材料已經過時。在一九二〇年開灤礦有資本二四、〇〇〇、〇〇〇元而利潤為八、九〇〇、〇〇〇元。

中原公司有資本八、二〇〇、〇〇〇元而利潤為六八〇、〇〇〇元

保晉公司有資本二、八〇〇、〇〇〇元而利潤為一一〇、〇〇〇元

賈汪公司有資本二、〇〇〇、〇〇〇元而利潤為一八〇、〇〇〇元

同時英國企業的利潤超過三五%，而中國企業的利潤則在四和二〇%之間。

關於一九二三——一九二八年期間煤的入口和出口的數字之對比在下列的表中指示出來：

	煤的出口	煤的入口	出口超過入口(以千噸為單位)
一九二三	三一〇八	一三六六	十一七四二
一九二四	三二〇二	一六一〇	十一五九二
一九二五	三〇〇二	二七五二	十二五〇

一九二六	三〇八四	二八九七	十一八七
一九二七	四〇一四	二三一八	十一六九六
一九二八	三八八五	二四二六	十一四五九

在這六年間出口超過入口爲六、九二六、〇〇〇噸。這種出超約爲採獲全部的5%。

然而事情就在於煤一旦從滿州里出口，那裏工業相對地迅速的發達起來，於是從日本又輸入上海，即是說滿州里的工業和上海的工業在牠們煤的供給的意義上說是依靠着外國資本的。國內煤的消費之主要部份是作燃料，供給鐵路和輪船，而只有小部份供給工業。在印度工業的消費約爲煤的全部消費之一二%。在中國這個百分數老實說還是很低。

註一：照一九二八年出版的“China Food Bulletin”第七期的材料看來，在關東七十七個日本股份公司於一九一〇年曾得到九·七%的股息，在一九一八年爲八·八%，而在一九二一年以後則爲四——五%。在滿州里也有這樣的過程。

註二：馬克思恩格斯通信。p. 291.

註三：在釜山煤的採掘之增加有下列的數字在一九二五年爲五、五三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六年爲六、四一〇、

〇〇〇噸，在一九二七年爲六、八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八年爲七、三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九年爲五、五〇〇、〇〇〇噸。

註四：在開灤煉的採掘在一九二七年爲三、一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〇年爲三、四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二年爲三、七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六——二七年爲三、七九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七——二八年爲四、五一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爲四、六〇〇、〇〇〇噸。

註五：“China Econ. Journa.”，第一期，一九二八年，p. 25.

註六：同上 p. 22.

三 五金工業

我們將中國鐵礦的採掘，出口和入口以及國內的消費列爲以下的數字：（註一）

年 代	採 掘	入 口	出 口	國內的消費（以噸爲單位）
一九二二	七二一、二八〇	一四一	二〇三、一六五	五一八、二五六
一九二三	九五九、七一一	九六	二七一、八一〇	六八七、九九七

一九二四	一、〇〇五、一四〇	一〇、六六二	二九七、〇五九	七一八、七二三
一九二五	一、〇九五、五五五	四、八四六	三〇六、五二一	七九三、八八〇
一九二六	一、一二九、〇五六	二九、七四三	二八〇、七八四	八七八、〇一五
一九二七	一、一三九、八四五	二七、八一二	三〇六、七九一	八六〇、八六六
一九二八	一、四七四、六九八	一五、八四二	三七五、六六四	一、一一四、五一六
一九二九	一、八六一、二三〇	三六、八七一	六三五、三六二	一、二六二、七三九
一九三〇	一、八六五、九八五	一九、九四二	六七七、五四四	一、二〇八、三八三
一九三一	一、四六二、九八八	五、九四七	五一一、〇三〇	九五七、九〇五
一九三二	一、五五九、四一六	一、二七〇	六六七、一八三	八五三、五〇三
一九三三	一、七三三、二六六	三、〇八四	七三三、六〇三	一、〇〇二、七〇七
一九三四	一、七六五、七二五	一、五七四	八四六、八三三	九二〇、四七三
一九三五	一、五一九、〇二一	—	八一五、八一〇	七〇三、一〇八

這些數字指出在一九二二——一九二五年的期間，鐵礦的開採增加了一一〇%，輸出增加了

三〇〇%，而國內的消費則增加了三五%。這些數字指示出口的增加，差不多比開採快三倍，比國內的消費差不多快十倍并且國內的消費在一九二〇年後減少了。海關關於對外貿易的統計指出約有六〇%的生鐵輸出到日本。說到「國內的消費」，那麼所引用的數字極不正確，因為在中國一部份改製的生鐵以鑄鐵的形式輸出去。關於一九二五年以後鐵礦的開採我們沒有統計材料。生鐵的輸出在一九二六年為五二一、二二〇噸，在一九二七年為四九七、八八〇噸，而在一九二二年則為九二〇、八七五噸。沒有任何根據可以假定開採（滿州里除外）增長了，換句話說，却可以肯定此種生產之明顯的衰落。

說到生鐵的鍛煉、鋼的製造、生鐵和鋼的出口和入口以及國內的消費，那麼我們可以列為下面的統計數字：（註二）

年 代	鑄鐵的鍛煉	鑄鐵及鋼的入口	鑄鐵及鋼的出口	國內的消費（以噸為單位）
一九二二	一七七、九八九	一五一、二七六	一一、四九九	三一六、七六六
一九二三	二六七、三一五	二四四、七三九	六七、〇八六	四四五、一六六
一九二四	三〇〇、〇〇〇	二三〇、五五一	六二、〇一一	四六八、五四〇

一九二五	三三六、〇六一	一二五、六五八	一〇二、一二三	三五九、五九六
一九一六	三六九、一六〇	一四五、八四七	一五四、七四五	三六〇、三六二
一九一七	三五七、六三五	一二三、二六八	一六三、二八三	三一七、六二〇
一九一八	三五四、一四四	一四九、一一七	一八九、〇五八	三四四、一七六
一九一九	四四六、五八八	五三二、一五八	一六六、四二四	六三五、三二二
一九二〇	四二七、六四八	三六六、六二二	一九六、八〇七	六二七、四六三
一九二一	四〇二、七八七	二七二、七八二	一六二、六九〇	五四二、八七九
一九二二	三九三、六九四	三六四、八七五	二〇九、六〇九	五七八、九六〇
一九二三	三四三、四四二	三〇九、八一七	二二三、五三九	四六九、七二〇
一九二四	三三〇、五二一	四九三、六二四	二六九、七〇四	五八四、四四一
一九二五	三六九、六一七	四〇五、二六六	一六一、三二九	六四三、五五四

這些數字指出在一九一二——一九二五年的期間鑄鐵的鍛冶增加了一〇八%，鑄鐵和鋼的輸入增加了一六八%，鑄鐵和鋼的輸出增加了一二四一%，而國內的消費則增加了一〇三%。

我們看到輸出以極迅速的速度增加，其速度十倍於製造和國內的消費。這些數字指出一九一九年後鑄鐵的鍛冶減少了而國內使用的鑄鐵和鋼在一九一九年以後總而言之沒有增加。約有四〇——六〇%的鑄鐵從中國輸出到日本。我們沒有列出一九二五年以後生產的統計數字；但人所共知，除滿州里以外鑄鐵和鋼的製造是減少了。更其特異的是在一九二六年鑄鐵的輸出爲一七〇、一〇〇噸，在一九二七年爲二〇二、五五〇噸，在一九二八年爲二二一、〇〇三噸，——總而言之，比較一九二五年是增加了。說到國內的消耗，那麼便有這樣情形，即是約有一七〇、〇〇〇噸鑄鐵是用手工製造和改造的而且大部份鑄鐵和鋼都是用於三五個修理外國輪船的中國造船企業內。

在中國每個人的鑄鐵和鋼的消費爲一五基羅格蘭姆，即是比日本少十倍，比英國和德國少一百倍，比美國少一百八十倍。指出英國在一八二〇年鑄鐵的生產爲四〇〇、〇〇〇噸，而在美國在一八四一——一八五〇年期間每年平均爲四二五、〇〇〇噸，這不是無益的。中國在一九二〇年達到了這程度，即是說比英國晚一百年。

同時得承認生產甚至消費增加的速度超過了英國而與美國相接近。

從中國輸出最有價值的原料表示出中國之殖民地的依靠外國資本，而鐵和鋼之過低的消費則表示出生產力的水平之難於置信的低下。

中國五金企業之處於這樣可憐的破壞和危機的狀態的我們可以這樣來解釋，雖然有巨大的鐵的渴求和現有豐富的鐵礦層，但熔鐵爐以自己的生產方法工作的僅有三〇%。然而也許會錯誤的從這裏作出一個結論，說在共通的條件之下冶金業的恢復和發展將是一個容易解決的任務。

中國很有豐富的鐵礦層。沿揚子江一帶的鐵礦質量極高并且含有六〇——六八%的鐵。而在滿州里安山工廠所經營的生鐵礦僅含有四〇%的鐵。鐵礦層與煤礦層有相當大的距離（山西除外）。平涼的煤距漢陽兵工廠有五〇〇基羅米突，而大冶的生鐵礦距漢陽兵工廠有一二〇基羅米突。在大冶平涼的煤距熔鐵爐有五〇〇基羅米突，在安山的煤距熔鐵爐有一三七基羅米突等等。這種情形說明了一件事實，即在漢冶萍公司生產上的費用約有七〇%是原料的運輸，只有一%是勞動工資。再則，差不多所有的熔鐵爐都設置得非常地沒有智識，一部份破舊了并且以高度的成本費去工作，雖然可變資本在事實上已經成爲最小數量。但主要的苦痛在於所謂中國的冶金業，依據事實的本質說，則是日本在中國的冶金業而已。我們不能離開這個事實。在整理漢冶萍公司

之許多絕望的企圖引起了糾紛的事件之後，南京政府便在日本面前完全承認了漢冶萍公司的債款和日本的資本統治中國的冶金業。我們知道，日本的資本其所以瘋狂努力的爲的是發展牠在滿州的冶金業，我們可以毫無困難地預言，沒有巨大的爭鬥日本帝國主義是不會放棄在牠統治之下的九〇——九五%的中國冶金業。

註一：“China Econ. Journal,” No. 1, 1928, c. 9.

註二：同上。

四 鑛工業

關於其他種類的鑛工業仍然說得很少。這些種類的鑛工業完全是爲國外市場而工作，輸出的統計數字很正確地反映出了這些生產部門的狀況。我們編製出下列的圖表，這個圖表指出了這些生產的狀況及其發展的趨勢的特徵：

(以噸爲單位)

年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	------	------	------	------	------	------	------	------	------

第七章 中國工業發展的指數

五三五

錫的原質	一、六九二	二、二二八	四、五〇〇	二、五八六	一、五九一	二、九四四	一、八七二、七三三、110	二、八〇〇	三、八〇〇		
錫的純質	10、六七五	二、五二二	二、五二二	七、〇〇九	九、六四九	三、五六一〇	六、一六六、八八七、九四〇	一、五、六〇	一、五、八九		
錫	七、八四〇	八、五五五	10、五五五	五、九三三	九、〇六九	七、九三三	七、〇〇一、八、九四〇	六、二四〇	七、一六〇		
鉛	—	—	—	五、五七二	六、三三六	四、九九九	四、八八〇、七、一七五	10、九四六	一、三三三、五、115	四、八五五	
鉛金屬	—	—	—	三、七	三、二二	六、七三	七、四一	一、三三三	一、八	五、五五	
錫 鉛	—	—	—	九、〇四四	二、八三三	六、七五六	六、五八〇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	五、三三〇	八、三三四
亞鉛金屬	—	—	—	九、七	一、〇七	二、一九	三、六	110	二、四	五、四	六、四
錫	九、五九九	二、五九九	四、111	二、三三三	三、四一七	四、〇一六	三、〇一九	五、九七六	七、〇〇〇	四、九八〇	九、五九九
錫	—	—	—	三、三三三	五、四三三	一九、〇八	二、七、四三三	六、二、三三三	二、三三三	二、〇〇〇	四、三三三

讀者無須特別注意關於一九二七年的統計數字。這些數字對於發展的趨勢，並沒有表現什麼特徵，因為在一九二七年正如在我們所編製的表中一樣，各鑛業部門存在了非常尖銳的危機。除去集中於雲南的錫的開採以外，所有其餘的鑛工業都在湖南，而在一九二七年在湖南燃燬了農民革命的火燄，而且吹起了工人罷工的風潮。商業道路同樣被隔斷了，生產和出口（錳的開採除外）

也急劇的減少了。這一切可以說明，如果湖南的工業在戰後陷入了痲痺的狀況，那麼在以後鑛工業表現了一些發展的趨勢。同時如原質的銻，即硫化物的銻的出口仍舊停在原來的水平，而銻的純質，即純粹的銻的出口——這在一九二六年對於鋼的製造是必需的——則已超過了戰時出口的記錄（在一九一六年為一四、九三四噸）。這就是說，銻的熔化在中國已有相當的成功。在一九二八年一般在錫上已經又達到一九二六年的水平。在雲南錫的開採很快地減少了。在一九二八年錫的價格之急劇的低落——不僅引起了中國的企業甚至也引起了在馬來羣島的中國企業之異常尖銳的危機——還要大大地加劇了這種狀況。在鉛和亞鉛的開採方面也一樣沒有改善。鎢的開採之增長是因為電氣工業的發達。在錳的開採的方面中國採獲四五、九六〇噸沒有起着任何嚴重的作用。印度（一、四〇〇、〇〇〇噸）和蘇聯在世界市場上在這方面佔着統治地位。我們已經指出過，世界經濟危機陷入了各種金屬的開採之急劇的衰落的狀況。在這裏我們可以看見，正當各種金屬的價格遭受最厲害的搖動時外國資本便將這些搖動移置到中國工業之上。

在技術的意義上這些鑛業向處在如像幾百年以前的那種水平之上。僅僅銻的改造完成了巨大的勝利。

六 電力的設置及工業化

在一八九九年在中國僅僅在上海和香港有電力的設置；牠們不是用之於工業的目的，而是用之於城市的光照。在一九一三年電站數目達到了三十四個，而在一九一四年已有四十個。但是這些電站不能作為力的泉源，而只是代替了舊式的油燈。在一九〇九年上海電站的力不會超過二、五〇〇基羅瓦特。在一九二五年在中國已經有了二二九個電站，這裏很明顯的，就是這些設置中有一七〇個的力表現為一八一、七二五基羅瓦特。在上海公共租界上僅僅一個電站其力為一二一、〇〇〇基羅瓦特。中國電站的大多數都只作為城市的光照之用，牠們的力不會超過二〇——六〇基羅瓦特。僅僅在天津、北京、廈門、長沙、漢陽、上海、廣州、奉天和唐山電力設置作為工業的原動力。然而我們應當指出，從一九二五年起在中國電站的數目無疑地增加了；在上海、奉天等地電站的力也同樣的增加了。就一些統計數字看來，在一九二八年電站數目增到了四〇〇個。在一九二九年上海公共租界電站的力達到了一六一、〇〇〇基羅瓦特。在十年的期間，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九年，在公共租界內電站的力從二一、二二二基羅瓦特增到一六一、〇〇〇基

羅瓦特。此種很有權威的發展不容易找出和牠類似的發展。電力的大廉價用來使上海成爲中國工業中心之補助的剌激物。公共租界的電站也同樣供給中國城內的工廠的電力。在一九二五年在上海慘案發生以後，在外國企業內就爆發了罷工，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爲報復起見簡單地停止了中國城內的工廠的電流，而中國工廠因此也就停止了工作。工部局用這種方法破壞了一九二七年拒絕納稅的運動。工部局也同樣企圖注意電站上不爆發罷工，這種罷工差不多是可以中止上海全部工業的一個打擊；電站上有三〇八個外國人在重要位置上工作，這些外國人都是精選的工賊，是俄國的白黨。中國工人人數有三、一九一人。電站管理局爲了鼓勵電力的使用便將電動機分租給工業的企業。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工部局以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將租界整個電站賣給英美資本家的團體。工部局恐怕租界遲早會轉到中國手裏，而中國便要獲得除一切開銷之外還產生一二、四三%利潤的這種極完善的力的組織。用不着絲毫懷疑，類似的陰謀詭計，類似的國家生產力的拍賣在其他租界上也有。

外國資本採取這種手段爲的是在偶然改正不平等條約時國家的最高指揮權仍然操之於國際帝國主義的掌握之中。而南京「國民政府」對於這種詭計的動作甚至連一句錯話也不敢說。

雖然上海電力設置的歷史如此，但在以經濟的部分的代替超經濟的地位（租界）的意義上這同樣是中國工業發展的「指數」，我們就回轉到這個極狹隘的論題來說吧。我們必須指出，在中國電力的消費一般的增加着而對於工業的目的則部分的增加着。我們有關於上海方面的正確的統計數字。

上海電力的消費(註二)

(以百萬基羅瓦特爲單位)

年 代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一九二四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私 人 的 燈	二二·四	二四·七	二七·六	二九·六	三二·四	三七·〇	三九·九
街 燈	一·七	一·八	二·一	二·二	二·九	二·八	二·九
燃 料	〇·一	一·六	二·〇	二·四	三·二	四·三	六·九
用於工業目的的	一五四·八	一九八·五	二三四·四	二六七·〇	二五五·六	三六四·〇	三五〇·五

這個表不僅證明了巨大的增長(在七年之間增長一二三%)并且也指出了這種情形，即是例如在一九二七年上海電力的消費爲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基羅瓦特超過了曼徹斯特(三二三、

○○○、○○○基羅瓦特)，伯明罕（二三四、○○○、○○○基羅瓦特）格蘭斯哥（一九一、○○○、○○○基羅瓦特），利物浦（一八六、○○○、○○○基羅瓦特）和雪佛爾德（一七〇、○○○、○○○基羅瓦特）。然而這種統計數字只是上海工業化增長的指數，而絕不是全中國的工業化。孫中山關於在中國將有幾十個上海的那種架空計劃還不會完成。上海電力的設置其力比全中國總合起來的電站的力還是大兩三倍。上海電力的消費比其餘的地方還是大三四倍。大多數的中國城市還是不知道電燈，而大多數中國的農村甚至還點油燈，在上海電站的發達於是創辦了三個製造電燈的工廠。甚至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之間從中國出口了一〇〇、〇〇〇元的電燈。而在一九二八年則為一四〇、〇〇〇元。有幾處（有兩個地方）城市的電站甚至作為灌溉田地的發動機之用。但在中國農村電燈將和在俄國的『依里慈燈』一樣。中國田地的灌溉要想藉助於電力，即中國農村的電氣化，在目前是沒有實現的希望。

註一：『China Econ. Journal』No. 3, 1928, p. 231.

七 紡織工業

關於紡織工業的發展和關於在紡織工業中外國資本的作用我們在別的地方已經連帶地說過。中國工業的這一部門已從各方面研究過和指出過；所以我們在這裏只限以引用一些最關重要的指數來指出這個生產狀況的特徵。我們已經說過，一九二七年從生產範圍的立場說是特別危機的一年，因為「約有四〇%的中國紡錘，三〇%的日本紡錘和三〇%的英國紡錘不會工作」，（註一）這在下列的統計數字中可以表示出來：

一九二七年中國紡織工業的狀況（註二）

	中 國 的	外 國 的	總 計
工廠數	七三	四六	一一九
用於棉紗的紡錘	二、〇三三、一五〇	一、四九八、〇〇〇	五、五三一、五八九
用於絲的紡錘	六五、四七〇	七七、六三二	一四三、一〇二
紡織機	一三、四九九	一六、三二九	二九、七八八
電力的使用（以基羅瓦特為單位）	五八、五三一	四八、〇七二	一〇六、六〇三
馬力的使用	二六、七六五	四、一八〇	三〇、九五四

工人數目

一三八、六一五

九五、九二七

二三四、五四〇

棉花的消費(以擔爲單位)

四、五〇四、五八六

三、一七五、四四一

七、六八〇、〇二七

棉紗的生產(以包爲單位)

一、二六一、五四八

八四一、二九一

二、一〇二、八三九

紡織品的製造(以匹計)

四、二五九、六六六

四、七三九、七〇四

八、九九九、三七〇

在一九二八年紡織工業中的危機已經大大的改善并且生產無疑地增加了。紡織機的數目和棉花的消耗增加了；空閑期間大大的縮小了(在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大概從十七星期到十三星期)。棉花的消費同樣大大的增加了。我們認爲，對於紡織工業的狀況之最明顯的指數正是消費的棉花的數量，因爲牠們顯示了生產的範圍，我們可將棉花的消費之適當的數字引用在下面。(註三)

數一千包計算每包純重四七八磅

一擔爲一三二·三磅

一包爲三·五八擔

一九二三——二四

一、五七一千包或五、六二四千擔

一九二四——二五

一、六一〇千包或五、六二四千擔

一九二五——二六

一、七五五千包或六、二八三千擔

一九二六——二七

一、九二〇千包或六、八七四千擔

一九二七——二八

二、〇一六千包或七、二一七千擔

一九二八——二九

一、九七五千包或七、〇七四千擔

無疑地，紡織工業的增長以異常迅速的速度進行。如果注意到英國在一七九〇——一八五〇年期間棉花消費的增長依照十年而論動搖於四〇至一二〇%之間，而在一八五〇——一八九〇年期間則在一〇與九〇%之間；如果注意到美國在一八〇〇——一八五〇年期間棉花消費的增長依照十年而論動搖於六〇——一五〇%之間，而在一八五〇——一八九〇年期間則在一〇與一一〇%之間，那麼在中國經過二十年期間，棉花的消費增長了三二〇%，其增長的速度是很可令人驚異的。

說到紡織工業，那麼我們可以引用上海交易所出賣的棉織物的數量的統計數字如下：

年 代	出賣的 以千匹為單位	歐洲輸入的 以%計	日本輸入的 以%計	美國輸入的 以%計	本地 (中國的和外國的)生產的
一九一九	一〇、九四四	五八	二二	五	一六
一九二四	一四、一九七	四九	一六	〇·二五	三五

從這些數字中明白指示出，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期間，地方的生產從一六%相對地增加到三八·五%，即從一、七〇五、〇〇〇匹絕對地增加到七、三六三、〇〇〇匹；從歐洲的輸入棉織物從五八%相對地減少到二三·五%，即從六、三六三、〇〇〇匹絕對地減少到四、四六二、〇〇〇匹；而日本的輸入從二一%相對地增加到三八%，即從二、二九九、〇〇〇匹絕對地增加到七、二七三、〇〇〇匹。

在別的地方我們已經說過，在地方的生產方面日本的棉織物生產的比重之增加已將中國和英國的棉織物的地位取而代之了。

中國紡織工業的發展的遠景是怎樣的呢？無疑地，甚至小小的提高關稅的規定便可以給那代替外國的輸入的發展以一些推動。如果紡織工業在一些極嚴格的範圍內很艱辛的發展起來，那麼紡織工業在代替本國手工工業的破壞上尚有巨大的發展可能。

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還得除去下述的情況：

差不多在一切殖民地的和半殖民地的國家內首先隨着礦工業發展起來的正是紡織工業。這一

些生產部門在殖民地的國家內找到最現成的內部市場，并且這一生產部門需要固定資本的費用也相對的小。然而正因如此，在最近期間紡織工業在世界範圍內處於慢性危機的狀況之中。如果說到世界經濟之局部的危機，那麼無疑的，紡織工業、煤炭工業、製皮工業、造船工業在國際範圍內都處於最急劇的生產過剩的危機狀況之中。紡織工業的危機引出了上海和孟買的紡織工人成爲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中的第一支隊伍完全不是偶然的。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世界經濟的危機除農業外更加打擊了紡織工業也完全不是偶然的。全部工業製造品的價格之低落在紡織品方面更容易感覺到。全世界的紡織工業的危機在殖民地的紡織方面當然更有力的反映了出來。在中國表現於交易所的危機最容易感覺到的是在紡織企業的股票低落方面絕不是偶然的。『愛華』股票從二六兩降到一四兩，而『日本紡織工廠』的股票從一〇五降到七四元。一九二八年在短時期的增漲之後，中國的紡織工業又窒息於不幸的危機之中。就是在中國的日本工廠也感覺痛苦。在一九三〇年印度的粗棉織物的稅的提高也是日本企業感受困難的一個次要的原因。許多中國工廠轉到外國資本的手中和其他工廠之依賴外國銀行的加強顯示出中國民族工業之愈益非民族化。

註1]...“Maritime Customs” “Foreign Trade of China” 1927, 第一卷, p. 38.

註2]...J. A. Tudd, *The Cotton World*, London, 1927, p. 168. 和紡織工廠在國際聯會的統計。

八 絲織工業

關於中國的絲織工廠我們沒有確實的統計數字。李國魯在其極惡劣的著作(註2)中——一九二七年出版——關於中國的絲織工業引證了下面的統計數字：

工廠的分佈	工廠數	水絲數
廣東	一九九	八七、二九〇
江蘇	一〇一	二五、一二六
浙江	七	一、七三六
湖北	四	九三〇
四川	二九	三、一九七
山東	四	二一〇

總計

三四四

一一八、四八九

改造生絲的有如下的絲織企業：

工廠的分佈	工廠數	水鉢數
烟台	四二	一、六三八
安東	六六	一四、九三四
梅州	二〇	—
開平	一七	三、八〇〇
奉天	一	五〇〇
總計	一四六	三五、六一九

這些統計數字一部份陳舊了，一部份又不完全，這作者自己也承認。在廣東僅僅汕頭附近統計就有一八〇個絲織工廠，而以全省來說約有三〇〇個大的絲織工廠。在湖北和在滿州里從李國魯搜集材料的那時候起絲織工廠的數目也同樣增加了，李國魯的材料不會說到無錫僅僅在一九二八年便已開設了十個新的絲織工廠。關於上海作者斷定在那裏有八〇個工廠，其中的七二個工廠

有一九、三六四個水鉢。實際上這些統計數字只可說明一九二五年，而在一九二八年已經有九三個絲織工廠有二二、一六八個水鉢和六〇、〇〇〇工人（五萬五千婦女），（註二）而在一九二九年已經有一〇四個工廠。同時根據李國魯的材料看來，在中國有四百九十個絲織工廠，有一五四、一〇八個水鉢，我們便可斷言，工廠的總數當在六百以上。工人的數目，即確實從事於這個生產內的工人必然在二五〇、〇〇〇人以上。此外，在中國大的絲織工廠也開始發展起來。僅僅在杭州大小就有十二個絲織工廠。如果我們注意到在日本有二七五、七六〇個水鉢，在意大利有四七、九九三個水鉢，以及在法蘭西有四、〇三三個水鉢，那麼中國的生產機關在世界範圍內就得認為是很有權威的了。關於中國絲織工業的增長也為這種情形所證明，即繭的出口不斷地減少，（在一九一八年為三二、〇〇〇拾，而在一九二七年為一四、〇〇〇拾，）家庭出產的生絲之出口不會增加，以及工廠出產的生絲之出口的增加。在美國要求的壓迫之下中國的工業須將生絲作兩重的反捲。

中國絲織工業的增長在一九一〇——一九一八年以特別迅速的速度進行，從那時候起曲線的發展消滅了。就在那時候日本的絲織工業的發展更加排擠中國在世界市場上之相對的意義。在一

九二五年日本供給世界市場約有六〇%的生絲，而中國則只是三〇%的生絲。最近以來中國之市場的地位還要更加微弱。

中國的絲織工業存在了嚴重的危機。這種危機的原因很多。中國工廠的設備過於腐敗。中國的工廠主從工廠所有人那裏租借工廠并以工廠租金的形式支付一五%的價值。工廠主通常以少數資本來設置并且不得不在本地的銀行和中國的或外國的絲商方面借貸，利息合成一〇——一五年有時還多。（註三）中國農業所供給的繭質量非常惡劣。稅、厘金、出口稅都加在工業之上。在國外市場上生絲的銷路差不多完全操在外國商號手中。（註四）絲經過上海出口是操在三十七個外國商號手裏，而在廣州則有二十四個外國的商號。這些外國商號往往是一致的戰線而出現。由於異常落後的工廠設備和工人的低度生活致使勞動的生產力亦是很低。中國的工人在一小時內生產出二〇——三〇格蘭姆的生絲，而意大利的或法國的工人則生產出三七——六〇格蘭姆。（註五）中國工業之競爭能力支持在剝削農民（繭的低價）和殘酷的剝削婦女及兒童勞動之上。甚至日本的工人所得的工資比中國的工人多八〇%，而法國的工人則比中國多三倍。事實上危機加劇了。在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取消了在繭的晒乾和在對於繭的出賣的市場地位上之舊的壟斷。南京政府允許

了一、五〇〇、〇〇〇元的絲織工業的補助金。然而法國和意大利恢復了牠們在戰前生絲製造的水平線；波斯、土耳其和印度同樣發展着牠們的蠶蠶業，並且主要的是日本生產的發達。同時意大利、德國、美國、英國等等人造絲的生產品飛快的增長了起來。有兩個幾乎管理了全部生產的巨大的組合公司從一九二八年起開始了競爭的鬥爭。人造絲的價格急劇的低落了，並且也加深了人造絲和天然絲之間的分離。此時在中國人造絲與天然絲混合而進於編織的生產。但絲織工業的危機由於生產過剩，人造絲的競爭和價格低落的結果而加深。在一九二九年初在上海已有七個工廠暫時停工了。而世界經濟的危機使得這個生產受了破壞的打擊。在一九三〇年初在上海一、〇一個工廠中已經有七十多個關閉了。世界的危機急劇的減少了絲的消費，並且最大的和最具有組織的一的昂貴的生產會企圖將危機的打擊轉嫁到中國身上。

這一工業部門的前途誠未可樂觀。

在中國近代礦工業內，在冶金業內，在紡織和絲織工業內的工程師，而也有一部份管理的職員常常是外國人甚至在中國工廠內亦然。像這一類的現象在印度也可看到，在那裏指揮紡織工廠

的不是企業者而是專門管理的代理人。即如爲英國的代理人所監督的九個公司在印度指揮有二十七個企業，一、一二、〇〇〇紡錘，二二、一〇〇紡織機和九八、八〇〇、〇〇〇奴比的資本，而在印度的指揮之下則有五十六個企業，二、三六〇、〇〇〇紡錘五一、五〇〇紡織機和九七、七〇〇、〇〇〇奴比的資本。在中國在絲織工廠內意大利人甚至現出老板的作用，雖然絲織工業形式上握在中國資本家手裏；絲織工業之依賴外國資本以經過外國商號的借款、墊款和契約而實現。於是外國人不僅在外國工廠內甚至在中國工廠內也以資本的代表者資格或老板、馭者、監督者等等形相出現於中國工人之前。而此種情形「將民族的和種族的契機都帶進工業的衝突之內，並且在共同勞作的基礎上使勞工問題的解決成爲更困難，因爲做工的是中國人，而僱主不是中國人。」（註六）很明顯，在工程師和管理人員是中國人的地方，那裏是沒有任何短歌可唱的；在上海中國的監督者和在孟買印度的管理者之往往被謀害便顯示出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黎明的時候，老板們也一樣以高利貸者、受賄者等等資格從事於小的剝削。但是毫無疑義，民族的和種族的契機加劇了工業的競爭。正因如此，外國資本愈其佔有中國的工業，這個契機在階級對抗上則愈其成爲次要的因素。另一方面，這種情形有時使國民黨的職工會容易宣傳資本主義的剝削工人即是

外國人剝削中國人。但在中國企業內的工人對抗看來，則實際上並不是如此的。

註一：Kuhn Li, *Die Seidenindustrie in China*, Berlin 1927, c. 67-68.

註二：“China Econ. Journal” No. 1, 1923, c. 596.

註三：Kohn Li, *Die Seidenindustrie in China*, c. 44.

註四：爲經過上海之絲的出口的第一個中國的組合公司僅僅在一九二九年纔組織成功。在一九二九年上半年牠輸出了八千包絲。

註五：Kohn Li, *Die Seidenindustrie in China*, c. 43.

註六：H. M. Vinacke, *Problem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926, c. 184.

九 幾個間接的指數

這一節的任務不是去將關於中國工業其餘的形態給一個詳盡無遺的敘述。這個工作現時正爲中國科學研究所準備，雖然有莫大的困難，但我們希望牠將會很好地完成出來，這裏的困難是很大的。我們現在預備將從中國年鑑中所引出的一些統計數字加以整理，但那裏僅僅引出了工廠和

作坊的名稱一覽表，那裏既沒有指出生產的範圍，又沒有指出投資的範圍或工人的數量。即是這些記載也已陳舊了而且又不完全，並且其中將工廠和製造所不規則地混雜起來。製造火柴、肥皂、蠟燭、紙烟、蘇打水、酒精飲料、釘子等等隨便那一個企業在中國都高興將自己叫做工廠。而在很切實的考察之下就表現出這種工廠只是小的製造所而已。在各種經濟雜誌，報紙等等中引出許許多多的片段的材料，這些材料也同樣的不完全而且不合我們的期望。實業部（或譯為工商勞動部）的工商業報告局過去和現在只收集了很少有價值的材料，並且我們的研究往往是根據這種統計材料。美國商業部的遠東情報局的指導者謨西爾根據美國領事的報告斷言，在中國總計起來約有一、四〇〇工業企業完全是現代式的，內中有一四個熔鐵爐其生產力一年有一、〇〇〇噸鑄鐵（真正的生產物只有三〇〇——四〇〇千噸）；有一六〇個蒸汽製粉廠每天能製一二〇、〇〇〇袋；有一〇〇個火柴工廠和二一八個絲織工廠。（註二）我們已經引用過這種統計數字，即是在中國有四九〇個絲織企業，而且也或許牠們的數目甚至達到六〇〇個之多。謨西爾的統計數字在一切場合都減少了。要代替那些沒有憑證的而且在一切場合都不會說到的工業企業的數字，我們企圖製定幾個工業狀況的間接的指數。

對於榨油工業的狀況和發展會指出，在一九一一年從中國輸出的有六六五、〇〇〇噸白豆和四三、一〇〇噸豆油，而在一九二六年爲一、三六六、〇〇〇噸白豆和一六一、二〇〇噸豆油。我們要注意到，或多或少的近代的工廠都是爲出口而製造，而舊式的製造主要的是爲國內市場，這便可以證明，榨油工業的生產力在十五年之內幾乎增加了四倍。其次我們要注意到，從一定數量的白豆中僅僅獲得一〇%的豆油，同時如像在一九一一中國出口的六一%的豆都不會改製過，卽是以豆出口的，而豆油僅僅有三九%，在一九二六年白豆出口僅有四五%，而豆油則爲五五%，從此可以斷定，在中國豆料的改製不僅絕對地而且相對地增加了。白豆的出口在一九二七年已經達到一、七六四、〇〇〇噸，而在一九二八年則已達到二、四一七、〇〇〇噸，豆油出口之正確的數字爲一四、九〇〇噸和五七、一〇〇噸。我們已經指出，榨油工業的前途顯現了十分暗淡的形態。日本壓榨器出口的增長更其抵觸了礦物肥料的競爭。對於榨取豆油而採用的水壓機完全陳舊了；蒸滴的方法是最有效能的（從同一數量的豆中可以得出更多的油）和最便宜的。而在中國僅僅大連有一個日本的工廠採取蒸滴的方法。爲要過渡到蒸滴的方法，便必須將在豆類市場上之賤價的條件之下的全部工業進程改造過。滿州里農業的發展和其急劇殖民地化之可能性大部

份依靠這種方法。但滿州里農業生產品的商品部份主要是豆類。世界經濟的危機特別是農業的危機在這中間表現出橄欖種子的價格之急劇的低落，其中特別是白豆的價格之低落。巨大的英國的和荷蘭的托拉斯的聯合，由於橄欖種子的改造而引起了價格之更加低落。這個生產在現時存在了一種劇烈的危機。

蛋白工業在中國會是第一個改造過的工業部門。在九十年代牠很快地發展起來了。最近牠衰落了下去，僅僅在世界大戰時期，纔又開始發展起來。在牠從前發展到如下的統計數字中指示出來：蛋黃和蛋白的出口在一九二三年爲三七七、〇〇〇桶，在一九二四年爲四五七、〇〇〇桶，在一九二五年爲五、七〇四、〇〇〇桶，在一九二六年爲四九一、〇〇〇桶，而在危機的一九二七年爲三四四、〇〇〇桶，在一九二八年美國的資本家已經開始收買製蛋白的工廠。蛋白和蛋黃的出口在一九二八年爲三八三、〇〇〇桶。同時新鮮雞蛋的出口從一、一〇一、〇〇〇擔（在一九二三年）減少到六〇二、〇〇〇擔（在一九二七年）和六二五、〇〇〇擔（在一九二八年），而鹽蛋的出口從三七五、〇〇〇擔（在一九二三年）僅僅增到四一一、〇〇〇擔（在一九二七年）和五六八、〇〇〇擔（在一九二八年）。很顯然的，在中國之蛋料的改製絕對的和相對的都沒有增

加。(註二)

烟草工業從事實的發展之趨勢的觀點看來同樣表現出不是無利的。輸入中國的紙烟一般地說來減少了。在一九二三年入口爲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支，在一九二四年爲九八、〇〇〇、〇〇〇支，在一九二五年爲六四、〇〇〇、〇〇〇支，在一九二六年爲七六、〇〇〇、〇〇〇支，在一九二七年爲四七、〇〇〇、〇〇〇支以及在一九二八年爲九五、〇〇〇、〇〇〇支。同時烟葉的入口，即製烟工業的原料的入口增加了。烟葉的入口在一九二三年爲三〇五、七〇〇袋，在一九二四年爲六七四、二〇〇袋，在一九二五年爲五七四、五〇〇袋，在一九二六年爲七五九、〇〇〇袋，在一九二七年爲六三八、〇〇〇袋，在一九二八年爲一、〇六八、〇〇〇袋。這就是說，紙烟工業製造品的入口減少而原料入口則增加。這種情形指示出，農業不會供給製烟工業以原料，雖然烟草的輸出不是增加，而是迅速地減少。烟草輸出在一九二三年爲二二二、〇〇〇袋，在一九二四年爲二〇八、〇〇〇袋，在一九二五年爲二〇六、〇〇〇袋，在一九二六年二二七、〇〇〇袋，在一九二七年爲二二六、〇〇〇袋以及在一九二八年爲一四七、〇〇〇袋。

類似的現象在棉花的輸入和輸出方面也可看到，下面的統計數字就證明了這種情形：

棉花的入口與出口

年 代	一九二三	一九二四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以千袋爲單位)
棉花的入口	一六〇六	二八四	一一一九	一八〇七	一七四五
棉花的出口	九七四	五七四	一〇八一	八〇〇	八七八

在中國農業之脫離工業的發展尙爲運輸的統系之不十分發達和農業之深刻的危機所加深。農業在供給工業以原料的意義上之過分的和急劇的脫離工業，以及在供給工業以糧食的意義上之過分的和急劇的脫離各個工業中心的發展，對於國家工業的發展其中隱存了極大的困難。運輸發達和農業增長纔能解決這種矛盾。如果在運輸方面未有顯著的發達，那麼在現時國內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之下要想農業的增長直是無稽的幻想。工業的發展與農業過分的落後兩者之間的矛盾更是愈來愈深。如果榨油工業的危機由於荷蘭、馬翰的托拉斯聯合的結果而加劇了，那麼中國的烟草工業便由於大托拉斯——英美烟草公司競爭的結果而受到了破壞的打擊。

對於工業發展的其他間接指數在於中國藍靛和其他染料的輸入。就中國紡織工業的發展和紡

織品生產的發展的規模看來，中國染料的輸入和染料製造所的數目是增加了。雖然我們還須補說一句，即是輸入的紡織品的一部份，也是在中國染的。在一九一二年藍靛的輸入爲二二三、〇〇〇袋，在一九一三年爲三一、〇〇〇袋，在一九一四年爲二五五、〇〇〇袋。大戰時期輸入急劇地縮減了，因爲德國退出了中國市場。在一九二〇年輸入爲二一、四〇〇袋，在一九二一年爲二〇〇、〇〇〇袋，在一九二三年爲二五三、〇〇〇袋，在一九二四年爲四一六、〇〇〇袋，在一九二五年爲四〇六、〇〇〇袋，而在一九二六年爲三一四、〇〇〇袋。在一九二七年製造品和紡織品入口之極度衰落使得藍靛的輸入減少到二八二、〇〇〇袋。在一九二八年藍靛輸入又重新增高到三一八、〇〇〇袋。藍靛的輸入以極大的速度增加。在中國染料製造所的增加却與這種情形相適應。在上海僅僅在法租界大小就有四十個染料作坊，工人的總數爲二千。但是在染料方面這樣大的需要便不能引起國內染料的製造。事實上就我們知道的在上海就已經有兩個，而在大連有一個製造染料的化學工廠。（註三）同時印刷事業和報紙事業的發達在適宜的黑色的顏料方面造成了巨大的需要，在中國最大的印刷局——商務印書館已經創立了一個製造爲牠所必需的顏料工廠，而且還創立了一個工廠來鑄造中國文字和英文字母。

類似的現象我們在鉛的輸入方面也曾指出過。在先輸入鉛的製成品於中國，而未改製的鉛的輸入爲數極小。在一九一九年抵制日貨的運動，在上海就引起了一些大的製造所來製造鉛的製成品。（註四）牠們很快地發展起來，因而鉛的製成品的輸入從二、九一五袋（在一九二四年）減少到二、〇三七袋（在一九二五年），到二、〇三七袋（在一九二六年），以及到一、一四三袋（在一九二七年）。而未改製的鉛的入口則從九三七袋（在一九二四年）增到三、〇一九袋（在一九二五年），增到五、〇〇〇袋（在一九二六年），以及增到五、一七八袋（在一九二七年）。鉛的輸入絕對地增加着，而鉛的原料的輸入較之製成品也絕對地和相對地增加着。這種情形並不爲那種情形所更變，即在一九二八年製成品的輸入增到一、九六九袋而原料的輸入增到五、九一四袋。

在火柴工業方面表現出另一種全然特異的現象。火柴的輸入從二、二一五、〇〇〇箱（在一九二三年）增到六、〇二四、〇〇〇箱（一九二七年）。同時火柴工業用的原料之輸入也將近保持在相同的水平線上，即如減少也不甚大（在一九二三年爲四四〇、〇〇〇箱，在一九二四年爲三五三、〇〇〇箱，在一九二五年爲三三三、〇〇〇箱，在一九二六年爲三一四、〇〇〇箱，在一

九二七年爲三九六、〇〇〇箱。火柴工廠的數目增加了。這一工業部門用的原料的生產在國內也增加着。在滿州里已經有一個火柴托拉斯，牠有十五個工廠。這些「工廠」常常只是些手工工業。但是國內火柴的生產和火柴的輸入却同時增加着。這證明火柴很明顯地從中國農村中排擠了舊式的火的「生產工具」。我們在別的地方已經指出，在一九二九——三〇年瑞典火柴托拉斯方面的劇烈的競爭引起了較小的中國企業之破壞。

那一種情形也是工業增長的指數，即是在中國輸出方面大的機器工業的製造品開始起着一些作用，雖然這作用是很微弱的。大的機器工業生產品的輸出貨幣的表現上在一九二六年爲二六、六〇〇、〇〇〇兩，在一九二七年爲三九、八〇〇、〇〇〇兩，其中紡織品的輸出起着最大的作用。如果在一九二三年原色布和花布的輸出爲八四七、〇〇〇匹，那麼在一九二七年牠增到二、五八二、〇〇〇匹。如果棉紗的輸出在一九二三年爲八九、〇〇〇拾，那麼在一九二七年牠增到三二五、〇〇〇拾。但編織品的輸出却特別猛烈地增加。在一九二六年從中國輸出的有一九七、〇〇〇打棉紗的、絲的、人造絲的襪子，而在一九二七年已經有二八九、〇〇〇打。在一九二六年輸出三三、六〇〇方尺裝窗用的玻璃片，而在一九二七年已經有五十一、六〇〇方尺。在一九二

六年輸出一二、一〇〇箱肥皂，而在一九二七年有一五、三〇〇箱。這些數字指示出，大工業製成品的輸出爲數極大。大工業製成品的輸出很快地指示出，從上海供給紡織品和編織物以及肥皂、玻璃等等到印度比供給到陝西、貴州、甘肅等省還要容易，因爲供給工業製造品到這些交通不便的省份，結果運輸、課稅、厘金以及一切其他的雜稅達到一五〇——二〇〇%，而同樣也正確的就是國內市場極其狹小，遂使商品昂貴。但所有這一切變動都已被指明出來。

九 中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地位

如果搜集中國工業發展的全部指數，那麼便很容易得着關於國家工業發展的階段，關於國內大機器工業的作用、意義和比重以及關於在世界經濟系統中將中國視爲工業國的不確實的概念。所以我們不要混亂了思念，如果我們決定中國的人口僅僅有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人來代替我們見解上的海關之誇大的估計爲四四八、九〇〇、〇〇〇人或中國郵局之更誇大的估計爲四八五、五〇〇、〇〇〇人，（註五）那麼，在那時便可獲得，中國的人口不會比全人類的二〇%少。同時關於工業製造之最重要的指數可以引出以下的統計數字：

世界的生產物

中國的生產物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七年
石炭(以百萬噸計)	一、二一六、三	九六八	一、二七一、四	一四	二〇、三	二五
揮發油(註六) (以百萬噸計)	五三、四	一〇七、四	一七三、七	—	—	—
棉花(註七) (消費以一千包計)	二二、九五	二一、八八〇	二六、一四一	六五〇、五	一三一七	一九二〇
鋼(以百萬噸計)	七五、九	四五、三	一〇〇、五	〇、〇四二	〇、〇七六	〇、〇三〇

從這個表可以看出，在那個時候如像中國的人口約為全世界人口二〇%一樣，中國在石炭的世界生產中的部份約為二%，在鑄鐵的生產中約為〇·三五%，在世界的鋼的生產中約為〇·三%，而在世界之棉花的消費中則為七·四。中國在絲的原料的生產中佔有特殊的地位。中國在全世界絲的原料的生產上大概佔有五〇%，供給到世界市場的約三〇%。這些統計數字可以看得出，如果我們關於中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地位願意有一個正確的概念的話。牠們顯現出國家之悲慘的落後，生產力的低下，以及國家之極度的依靠世界帝國主義。

註一：商業報告(Commerce Report)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註二：美國雞蛋生產品的關稅提高使得中國的生產降低。

註三：“China Econ. Bulletin” No. 1927, c. 93.

註四：同上，No. 2, 1928 c. 17.

註五：在這時期在許多城市中已進行了人口的登記，這種登記的結果可認為多少是確實的。牠表亦出，以前人口的估計是過於誇大。例如武漢（漢陽漢口武昌）的人口被估計為一、五〇〇、〇〇〇人。戶口調查指出武漢的人口計有八一九、〇〇〇人。廣西省的人口被中國郵局決定為一二、二〇〇、〇〇〇人。在一九二八年調查表現出在廣西有一、八五九、〇〇〇戶口住在八四、二五二處地方，內中有六、〇〇〇、〇〇〇男子，四、八〇〇、〇〇〇婦女，合計為一〇、八〇〇、〇〇〇人。

註六：在中國揮發油的採掘幾乎沒有進行。煤油的入口至要是為點燈用的，在一九一三年為一八三、〇〇〇、〇〇〇，在一九二一年為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在一九二六年為一八二、〇〇〇、〇〇〇，在一九二七年為一六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噸。

註七：關於一九二五年的統計數字。

一〇 最近的將來

在現時——一九三〇年五月——在中國經濟的危機最劇烈。這種危機在世界經濟危機的範圍內，在從殖民地制度和從國家的農業制度中發生出來的中國經濟之總危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但同時是一種週期的危機。托爾姆以爲在一八八八——一九二〇年期間，中國存在過五次工業的週期，這種週期的平均繼續性爲六、四年。我們並不熱中於批評托爾姆的斷定和解決關於中國在一八八八年是否是一個工業的國家和捲入於世界經濟而能夠發生出一般的危機的問題。然而毫無疑義，中國在一九一〇年已經有過一次劇烈的週期危機，並且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中國有過三次劇烈的週期危機，即一九二一——二二年，一九二六——二七年以及一九二九——三〇年，在這裏一九二一——二二年的危機與世界經濟的危機相符合，一九二九——三〇年的危機亦然。如果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前半年危機的曲線增高，特別是美洲的「繁榮」連帶着中國隨着內部的原因引起了危機的復活，那麼，世界經濟的危機便以特殊的力量打擊着中國。

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在中國起了最完全的和各方面的反映。中國有自己

的交易所的危機。在一九二九年二月真正的恐慌在上海、天津、香港等地的交易所內爆發了，并且股票在幾天之內降落三〇——四〇%。中國有自己的工業的危機。絲織工廠、烟草工廠、火柴工廠關閉了，暫時停頓或縮小了生產。蒸汽製粉廠、近代的磨米工廠、榨油工業、紡織工業——包括在中國領土內的日本工業——一部份暫時停頓了，一部份縮小了生產。重工業和開採工業的發展暫時停頓了并且減少了生產。有價值的金屬的開採更其減少了并且有色金屬的價格之空前的低落更降低了這些金屬中商品的積蓄的價值。在中國危機爆發成爲大量的破產。在上海、北平、廣州、漢口、奉天等地不僅破壞了大多數的商號，并且倒閉了大多數的手工企業和製造所，不僅破壞了成千成萬的中小企業，并且也破壞了許多大工業企業，在這裏有南洋兄弟的企業和許多舊式的企業，甚至還有近代的當地的銀行。有許多外國商號和企業也破產了。在中國爆發了劇烈的商業危機。在通商口岸貯存的大量商品的價值減低了。國內貿易更其降低了，在這裏軍閥戰爭更其加劇了商業的危機農業危機。國內貿易更其縮小了。中國有自己的農業的危機。農業危機表現於主要的食糧之生產不足，表現於五七、〇〇〇、〇〇〇人困於饑饉，表現於食糧價格騰貴，表現於米、麥、麵粉的輸入之有力的增加，表現於棉花、蠶繭之生產不足（由於價格不高），

一方面表現於重要的技術的和商業的組織之生產過剩，如橄欖種子、茶、白豆等。在這裏生產過剩絕不是在中國有了地方，而是在世界範圍內生產過剩引起了在中國的價格之極端降低。中國有自己的貨幣本位的危機，這種危機表現於基本的貨幣本位和國家財寶——銀子——之價值的低落，因而中國的錢幣的價值更其低落了。而貨幣本位的危機加劇了國外貿易的危機，因為濫發紙幣更縮小了國外貿易，國外貿易從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減少到二〇——三〇%。但貨幣本位的危機加劇了工業原料的危機，因為銀價減低使那幾種原料——煙草、棉花、煤、鐵、銅、錫等——的輸入更感困難，這些原料整個的或部分的從外國輸入到中國來。不言而喻的，危機很有力地打擊了中國的民族工業。因為中國的企業和外國企業比較起來是小的和中等的企業，所以首先破壞的是中國的企業。這種情形說明了許多中國企業之非民族化和其他企業依賴外國資本之加強。

如果危機是市場之極大的騷亂，而在這騷亂中引起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一切矛盾，那麼在中國危機不僅暴露了和引起了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並且也暴露了和引起了殖民地的統治和半殖民地的土地關係之一切矛盾。

然而在中國經濟的危機也引起了深刻的全國的政治危機；軍閥戰爭之新的循環，工人運動之

新的高漲，農民暴動之空前未有的巨浪，工農反對資產階級地主革命的國內戰爭之開始，中國南部和中部許多區域內農民政權之創立。而全國的政治危機在經濟危機上表示出反動的影響，使經濟的加深和加劇。許多殖民地國家中危機的最特徵之一就在：民族解放鬥爭和階級鬥爭成爲危機加劇之最有力的原素。

某種危機的出路將怎樣，只有鬥爭來解決。因而要回答這個問題——中國經濟發展之最近的前途如何——却非常困難。

如果抽取政治的局面而來抽象地觀察問題——這樣的抽象當然是不正確的——那麼便必須說明這個問題，即中國是否有工業發展之自然的先決條件。然而甚至就是回答這個抽象的并且正確的提出的問題也是非常地困難。關於中國工業發展之初步的先決條件的問題甚至也不會十分明顯的說明。關於工業發展之重要的先決條件之一我們此刻沒有也不能有明確的概念，因爲我們不會整理出關於中國煤的儲量之多少正確的統計數字。大家都知道，黎佐芬認爲中國爲產煤最富的一個國家。中國學者所進行的國家地質學的研究斷定，煤的儲量（單算地下的煤層不會超過一、

和木煤，而全國總儲量達到四〇——五〇千萬噸。這就是說，中國煤的需用，根據現時一年消費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從本身的儲量中可夠二千年之用，而根據美國的採掘一年為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則只夠七十年。（註一）如果所有這些統計數字是可靠的話，則中國僅僅有德國煤的儲量的七九%，英國儲量的三三%，美國儲量的一·四%。（註二）美國的地質學家費爾蘭德斷定美國煤的儲量為一二〇〇千萬噸。其他的研究，（註三）根據美國每年平均採掘的煤，於是認為中國的儲量不夠十四年。這些統計數字的矛盾，表示我們還不會有一般確實的統計數字；但這些數字却表示出在最近十年中國總可用自己的煤來保證。在鐵礦的方面國家的儲量中國地質學家估計為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而美國的地質學家奧林庫恩估計為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註四）因此，如果根據第二個假定，那麼國家的儲量為巴西儲量的一四%，美國儲量的一六%，法國儲量的二〇%，而與英國儲量相等。這樣看來，中國有充分的煤鐵儲量來處理自己工業的發展，雖然在以前所進行的探討不會指出煤油有多少大的儲量。礦物原料的其他種類——錫、鎳、亞鉛、錳等等——在中國同樣也有。

但中國工業發展的速度——假定革命在最近期間不能推翻資產階級地主的政權——却要依靠

下面幾個問題來解決：資產階級地主政權是否能夠以改良主義多少實際地改變中國之殖民地的依賴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地主政權是否能夠以改良主義的方法解決土地問題，以及是否能夠以許多戰爭的代價統一國家。三年以來資產階級地主政權的教訓給了這些問題以否定答覆。而一九二九——三〇年的事件證明了資產階級地主政權甚至長期的繼續期間都不能消滅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基
本羣衆之革命的鬥爭。

中國資產階級無法用自己的力量將國家從奄奄一息中解救出來。

我們仍舊根據第二個假定。我們假設資產階級地主政權不被推翻，中國資產階級企圖在外國資本的指揮和幫助之下將中國從奄奄一息中解救出來。那時關於外國資本輸出到中國便成爲嚴重的問題了。

如果假定革命在最近時期不能推翻在中國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地主政權，那麼在目前中國的前面展開了兩種發展之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在於根本本地繼續着國家全部經濟之深長的危機，工業發展速度之遲緩的危機，此時還是民族工業部門之非民族化，即是中國在戰後發展之一般的和全部的景象中輔以在戰後帝國主義第三時期中帝國主義在中國市場上的競爭之加強更有力的使

國工業的發展感受困難。

在這裏可以看到那種異常重要的情況，即在帝國主義時代國家利潤率之平均的趨勢表現出更有力的增加。各國資本的有機構成之差異使其在生產力發展之低度的水平和低度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殖民地國家和一般落後的國家中有獲得巨大的額外利潤之可能。落後的國家中的利潤率，也就是說資本積累的速度比之各先進的國家中相對的高。自然，在各先進國家中利潤之絕對量，資本積累之絕對量比之落後國家中更高。然而落後國家中資本低度的有機構成在農業生產品的價格相對的減低的時候，就形成工業製造品的高價。最後便形成了落後國家的土地制度。小農經濟在地租的壓制下在租金、賦稅、高利貸借款的場合下將自己的生產品按照最低的市場平均價格投到鄉村市場上。但是落後國家中工業製成品之相對高的價格刺激了帝國主義國家輸入商品於這些國家之中。而商品始輸入降低了落後國家中的價格、利潤以及資本積累的速度。這種狀況完全為事實所確定。紅利和利潤當然不符合，但多少總可反映出利潤率的高度，如果取得牠們是在多少長的時期的話。而在印度、滿州里股份公司的紅利，在中國除握有壟斷的以外，在戰後都表現出極端低落的趨勢。不言而喻的，資本輸出於這些落後的國家便異常地加速了這些傾向。外國資本輸入

殖民地加速了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之普通的速度，並且因此也引起了利潤率之降低，當然這絕不是除去，反之是預定資本積累的絕對數之增加。但這些積累的主要部份是從殖民地國家汲出的。

自然，不但理論上可能，而且事實上也有，即是外國資本積累的部份汲取於殖民地國家，而同時在那裏用之於擴大現有的企業或用之於創立新的企業。在一九二九年從荷蘭資本的利潤九六、〇〇〇、〇〇〇荷蘭林中約有四六、〇〇〇、〇〇〇投入在印度連茲的新的企業中擴大在印度連茲地方的舊的企業。所以如果將帝國主義國家投資在殖民地的財富僅僅按照在都市新發行的紙幣總數來估計那便極大的錯誤。應當核算那種投資，這種投資是從首先輸出的資本之其餘部份的利潤所完成。

這種趨勢特別尖銳地表現於中國在戰後頭幾年，並且也表現於中國企業利潤和外國企業利潤一樣的低落之上。一九二八年的獨特的條件引起了紡織工業的利潤極度地增加。抵制日貨的運動引起了中國工廠的生產品之極大的需要，中國紡織品和棉紗的價格之提高，同時如像日本的製成品被抵制日貨委員會課以製造品價值的二〇%的稅。棉花的價格仍舊在原先的水平線上，工資減少了並且實行了生產合理化。這樣看來，每一網棉紗其利潤為一〇至三〇兩，即為五至二〇%。

(註五)然而這樣的機會在現時為市場銷路而鬥爭的條件之下成爲一種例外，比成爲一種正規更快些。一般的都可看到積累之相對的速度之降低，雖然積累的絕對數在增加。正是這種情形說明了在中國印度等處民族工業發展的速度之遲緩。中國的資產階級不能以任何嚴重的尺度加速工業發展的速度。

美國在一九二八——二九年遂行了侵略中國的初步。承認南京政府，派遣美國專家到南京，指定開邁爾 (Kernner) 委員會，第一次美國在中國之投資并甚至企圖奪取中東路都表示出美國的財政資本企圖將中國變爲自己的殖民地。世界的危機特別是美國的危機打斷了中國資產階級求助於美國的希望。中國的危機和國民黨各派的分裂打斷了美國資本侵略中國之可能的希望。

這在我們的見解上絕不是除去美國資本在另一局面下企圖將中國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我們應當觀察到問題的所在，即中國經濟在美國資本的領導下以怎樣的方向發展起來，而將由那種企圖所引起的內外矛盾抽象出去。資本從帝國主義國家輸出一九二八年已經達到戰前水平線的實際購買力。

如果在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資本從英國輸出平均爲九〇〇——一、〇〇〇百萬美金，從

法國輸出爲三〇〇——四〇〇百萬，從德國輸出爲八〇——一〇〇百萬，即是每年平均爲一、二八〇——一、五〇〇美金，那麼在一九二八年從英國輸出爲七五〇百萬，從美國輸出爲一、五七五百萬，從其餘國家輸出約爲二五〇百萬美金，即總共爲二、五七五百萬美金。（註六）甚至如果計算貨幣購買力減少到四〇%，那麼顯然的資本的輸出已經達到了戰前的水平。

誠然，在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從美國輸出的資本大大的減少了，並且在一九二九年的上半年由於世界的信用的危機資本的輸出，不但從美國減少了，甚至從英國、荷蘭、瑞士等國也減少了。世界各國核算的對比之提高便是世界信用危機之明顯的表現，這種危機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特別有力的爆發出來。世界的信用的危機也是極沉重地打擊了中國，停滯并延緩資本之輸出到中國。到現在已經很明顯，世界的信用危機只不過是世界經濟總危機的海燕而已。（海燕每於暴風雨將至之時出現，意即經濟總危機將至之一個信號——譯者）

很顯然，美國帝國主義也同樣企圖利用賠償損失的超銀行組織來使中國市場之更其迅速的開放和擴大。

但最重要的資本過去不認爲并且現在仍不認爲（一九二九年）國內政治地位已十分穩固，南京

政權已十分可靠，中國已統一。

外國資本供給之延緩引起了國民黨統治之深刻的危機。對外政策的失敗（在國際貿易裁判所的會議上之失敗，列強之拒絕取消治外法權和上海的臨時法院機關，中國代表在日內瓦國際聯盟會議的失敗等等）更加深了這種危機。這種情形是與帝國主義之間為資本供給的範圍而鬥爭的劇烈相適應的。

在中國這種鬭爭現時還不能開始，因為關於美、英、法、日銀行間的第二次銀行團的協定在共同利用中國的對象上在資本輸出的範圍之地位上到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五日仍然有效。照第二次銀行團的協定，美、英、法、日的銀行彼此之間約定在許與中國政府的和工業的借款的場合內分配新發行的紙幣數。如果條約延長到一九三〇年，那麼中國將被分割於美、英、法、日銀行間的勢力範圍上。全世界的局面顯示出，條約的更訂是不大可信的。最可靠的是最近期間開始了帝國主義間對中國採礦業之決絕而劇烈的鬭爭。美國迫切的希望在中國有鐵路的建築為的是給自己的冶金業以工作並且為的是擴大自己的工業所需要的中國的銷售市場。美國鼓勵為擴大市場之用的道路的建築為的是汽車大王福特能夠出售自己的汽車。美國的資本還努力於礦工業、養蠶業以及

絲織工業。自然，從市場的擴大中有些東西也許要經過中國的工業，但在根本上擴大市場的目的，是為美國的工業。日本的資本的計劃顯示出，牠同樣努力於運輸業、鐵路建築以及礦工業，而只略略的注意輕工業。不言而喻的，甚至這些方法也能引起中國工業的增長。在中國南部，英國鐵路建築的計劃也就是追隨着這一類的目的。中國當然將比以前更加成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輸入外國資本的手段作成了使中國比以前更加成為外國工業的銷售市場和原料的來源地。

其次，所有的統計數字指示出美國資本企圖在中國創立近代的貨幣本位制，為着這件事也需要很大的投資。中國貨幣制度之目前的狀況是使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困難的障礙。農村主要的是使用銅幣和紙幣，城市則使用銀幣和紙幣；中國同樣也用銀子來實現牠的國際支付。但不僅每一省，甚至每一個經濟區域都有牠自己的銀兩、銀幣、紙幣以及銅幣。（註七）省政府、各個銀行、外國銀行、私人、各個將軍都發行牠的紙幣。沒有集中的紙幣制度。大的外國銀行和中國銀行都靠投機，改變各種貨幣的時價而致富，並且還有那些如像寄生蟲一樣的成千成萬的錢莊，也要在貨幣本位制之極大的紊亂上獲後一點贏餘。整個的貨幣本位制度在國家的經濟中表現牠為資本主義前期的殘餘。南京政府在一九二八年所創設的「中央銀行」并不能回復貨幣的流通。銀行資本二

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對於流通是不夠的。發行了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公債來改善貨幣制度也一樣不能現實地改變那種狀態。無疑的，銀元和一般的銀子在貨幣流通中起着極顯著的作用。造幣廠發行出多量的銀幣。在銀子輸入方面中國使印度退居第二位，並且在一九二八年照香港總督的意見書看來，上海銀行輸入的銀子在一六八、〇〇〇、〇〇〇英兩。同時這種情形指示出帝國主義將世界存儲的銀子投到中國，而銀價之更加低落便取償於中國。差不多世界各國已過渡到或現在正過渡到金本位制。印度也在準備着新的貨幣本位之改良，並且不僅減少銀子的購買，甚至在一九二八年政府將其存儲的約有五八、〇〇〇、〇〇〇英兩的銀子投到市場上去。純粹的銀本位制在現在只存在於拉丁美洲、安南、香港和中國三個國家內。無疑的，就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觀點說，最迫切的任務之一便是創立單一的貨幣本位制並且將牠包括於世界貨幣流通之內。但是這個問題如果沒有製定固定的國家預算案便不能解決，因為在相反的場合之內預算的虧空和因虧空而引起的紙幣之發行便會破壞貨幣本位。現在美國開邁爾出口委員會從事這一問題的解決。美國本身是產銀的國家，美國資本管理墨西哥銀礦在八〇%以上。現在開邁爾委員會關於中國改良幣制的報告已經發表了。這當可希望着委員會建議第一步實行貨幣改革，保存銀本位并確

定此種銀幣對於金本位之固定的金子之標準。最後當然是實行金本位於中國內部的流通方面并逐漸實行於各省。就事實的本質說開邁爾是建議所謂的金標準制。（註八）這樣的制度在印度存在着。但印度的貿易比差是正的，而中國的貿易比差是負的，問題的解決之最大難關就在這裏。但無論如何，對於改革中國的幣制却需要很大的工具。這些工具只有外國的資本，首先是美國的資本纔能許與中國。這就是說，外國資本將管理國家的整個幣制。

運輸、礦工業和貨幣本位制，——這乃是國家之主要的命脈，帝國主義企圖儘可能的扼住這些命脈，爲的是使中國完全屈服於自己之下。

這種計劃之實現或者由世界銀行之間的同意，而這是不大可靠的，或者由美國的一個銀行，但這又難免劇烈的國際衝突。這種計劃之實現現在其第一個階段上已經表現出整千百萬的中國的小手工業者和家庭手工業者之破產，成千成萬的農民破產和貧民化，而沒有一點希望使他們能夠以工人的資格被組織於工業之內。這種計劃之實現其本身表現出一切外部的矛盾之巨大的劇烈，一直到新的世界大戰。牠也會暴露國內一切內部矛盾的劇烈。久經革命鬥爭鍛鍊的中國無產階級和農民在工人階級政黨領導之下將會表現出頑強的反抗中國變爲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這重青衫

乃由以下的條件而發生，即當着蘇聯存在的時候，當着共產國際已經領導工人的革命鬥爭的時候，當着民族解放運動在東方，在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爆發起來的時候。

這種計劃之實現將會引起中國革命之新的爆發。而在革命勝利以後便完全另一個樣的提出中國工業化的問題。

註一：“China Yearbook” 1924, p. 124.

註二：“China Yearbook, 1921—22, p. 165.

註三：H. F. Bain, *Ores and Industry in the Far East*.

註四：“China Econ. Journal” No. 1, p. 7.

註五：“China Econ. Journal” No. 3, 1929, p. 212—213.

註六：這一適當的數字是我們從霍布生的著作資本的輸出（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出版），和斯塔克塔特的世界經濟論的緒言（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出版），兩書中引來的。

註七：我們不去詳細的批評貨幣本位制。斯登在其著作中國財政危機述要中（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出版）已經指出了這一問題之實際方面。

註八：開邁爾委員會的報告用英文發表於 *China Econ. Journal* 內，一九三〇年，第四號。

第八章 世界經濟體系中之中國

一 中國爲一潛伏的市場

爲要獲得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意義之正確的概念，就必需從兩種立場來考察這個問題：（一）中國爲銷售市場，爲原料的源泉，爲投資的目的地和與此相關的大銀行的經濟區域，最後，爲勞動力的供給及（二）外國資本在中國經濟體系中的比重和作用。

我們首先考察中國之爲銷售市場和爲原料源泉究佔何等地位。

中國人口佔世界全人口二〇%，而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部份還不到二%。在一八九六——一八九八年中國的部份爲一·五%，在一九一一——一九一三年爲一·七%，在一九二一年爲全世界貿易的一·九%，在這一方面中國比印度落後，印度在世界貿易中的部份爲三——四%，并且比日本也落後，日本佔的部份爲一·六——二%。（註一）在這裏包含了決定中國爲銷售市場和原

料泉源的地位之最重要的契機之一。中國現時在世界貿易中已經起着極重要的作用；牠強有力的成爲極大的市場。這便說明了爲中國市場之劇烈的鬥爭。此種鬥爭爲下述的原素所加重。

在所有重要的殖民地已經被搶奪完了的時候，帝國主義國家間之爭奪殖民地，便大感困難，因爲任何一個宗主國在政治上已經霸佔了殖民地的國家，而在半殖民地方面其鬥爭條件對於帝國主義則比較有利。如果以印度爲例，英帝國主義有時在鼓勵印度生產時能夠以英國國家法定的稅則、海關稅以及對於英國工業特惠的稅率的手段而將自己的競爭者置於很少有利的地位，那麼在中國——廣大的半殖民地——以及其他半殖民地中各個競爭的列強則處於完全不同的情況之中。

其次應當計算——帝國主義也計算了——并非中國全區域以同一的程度被捲入國際商品流通之內。揚子江一帶、滿州里、西江一帶以及中國北部各區域——這是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基本的所在地。靠近鐵路及可以航行的大河兩岸，帝國主義已經獲得了堅固的地位。帝國主義也將自己的手伸入到中國的其餘各部份。但在那些地方運輸的費用還是很大的影響到商品的價格。「上海價格爲標準的小麥；在陝西小麥以上海價格的三分之一出賣到四川，或者在陝西可以以四分之一

只有將麥子從衛縣一帶（陝西省）供給到漢口（其距離爲六〇〇里）的那個數目的一半。（註二）在中國自然財富極豐的省份內，一般都還沒有近代的運輸工具，苦力的背、馱重的牲畜、小貨車、小木船以及駱駝對於商品的運輸是最『普遍的』工具。帝國主義已經開始影響中國的這些最遼遠的省份之經濟生活。因而近代運輸工具之創設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重要任務之一。因此，不但已經被帝國主義所佔領的中國的區域是巨大的市場；在中國還沒有被帝國主義國家所佔領的區域內存在有巨大的潛伏的市場。

註一：Remer, Foreign Trade of China, p. 233.

註二：J. Arnold,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1, p. 35.

二 中國爲銷售市場與原料泉源

我們不預備停留在這一問題上，即中國如何——大砲、賄誘、邪教、鴉片、暴力——爲國際

商品流通而開放，並且我們也不企圖，在這裏追究中國的對外貿易由於帝國主義所征服而開放的港埠、租界、運輸業的發展、滿州里之捲入國外貿易及一般國內市場關係之加深和擴大是如何發展起來的。我們同樣不能普泛的說到經濟以外的強制制度之創立的問題，這種制度以不平等條約的形式而強制束縛中國。就事情的本質說來，這種制度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存在於一切半殖民地的國家內。過低的稅則，管理關稅的機關，國家收入之移付債款，對於外人的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免稅（在中國還有租界）——這就是在土耳其、波斯存在過的，在埃及、暹羅、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現存的「投降條約」，不平等條約之主要的因素。這種制度在革命運動的壓迫下發生了一些裂痕，但牠之極其長久存在的爲的是使帝國主義霸佔經濟的最高指揮權，並且逐漸地達到非經濟的強迫制度。這當然絕不是說不平等條約無須艱難困苦的鬥爭便可以改變。

如果研究中國最近幾年來的入口貿易，那麼便可以得到以下依各種商品的入口的分配之百分比的情形：（註一）

入口的各個單位對總入口的關係爲%

年 代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紡織品	一五·七六	一三·五一	一四·五〇
棉花	八·——	八·七七	五·六八
米	七·九九	一〇·六〇	五·四四
糖	七·三六	七·四〇	八·二五
煤油	五·〇三	四·二七	五·二二
五金	四·六六	四·九七	五·六五
絲織品	二·六四	二·七四	四·〇五
棉紗	二·五一	一·七五	一·三九
漁獲的產品	二·四七	二·七〇	二·一八
紙製品	二·一六	二·五一	二·四三
煤	二·四〇	二·二〇	二·八九
洋燭	二·三六	二·三一	二·九六
麵粉	二·二一	二·二〇	二·七四

藥物	二·一〇	三·一二	二·四九
烟草	二·三〇	二·二一	二·九〇
化學用品	一·八七	二·三三	二·七三
紙烟	一·八五	一·二六	二·一〇
豆腐製品	一·七七	一·八四	一·九一
小麥	一·六〇		
機器	一·四九	一·七九	一·六三
建築用的木材	一·四四	一·三四	一·五一
絲製品	一·二〇	一·八二	二·四一
牧畜的生產品	一·一七	一·四〇	一·四五
皮	一·一五	一·一〇	一·〇四
人造的印度藍	一·一二	一·〇四	一·一〇
毛織的圍衣	一·〇七		

其他 一三·六八 一五·七八 一五·〇六

如果將輸入的商品分爲工業製造品、原料（這裏煤油也算作原料）和食糧，那麼就指示出，在一九二六年工業製造品爲總入口的四九·八%，食品爲總入口的二七·四%以及原料爲總入口的二四·四%。引起了農業之深刻危機的食糧的入口絕不是和國家經濟之殖民地性質相衝突。埃及、爪哇、馬來羣島、古巴等處也輸入食糧。各個國家之轉變到專門的種植、國際的分工、農業生產之國際的區域這正表現出帝國主義的特徵。農業原料和礦物原料之輸入，很快地表現出中國的特性。農業原料之輸入指示出農業的落後甚至脫離工業之最平庸的增長，而礦物原料之輸入乃由於日本強奪中國的煤和鐵礦所致。但是這種事實，即差不多總入口的五〇%都是工業製造品，而機器的入口在最近時期甚至不到總入口的二·五%，這一方面充分的表現了國家之殖民地性質，另一方面表現了工業化之緩慢的速度。

爲指示從中國輸出的特徵我們引用以下的統計數字。（註二）

出口的各個單位對總出口的關係以%計

年 代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豆	二〇・三四	二〇・七七	二一・五六
絲棉	一八・四〇	一五・二六	一六・二二
鷄蛋	四・四二	三・六五	四・四二
絲製品	三・五七	二・七四	二・四一
落花生	三・四五	二・七九	一・六七
棉花	三・四〇	五・一五	三・四四
皮	三・三四	三・九二	五・二九
穀物	三・三二	四・二六	三・七〇
橄欖子和豆餅	三・〇六	一・八九	二・三〇
煤	〇・〇三	三・二〇	二・八五
茶	三・〇三	三・四九	三・七五
紙烟	一・七八	一・九三	二・〇四
樹油	一・七三	二・三九	二・三五

毛、羽毛、絨毛	一·七二	二·五四	二·七三
紡織品	一·五四	一·九二	一·六五
棉紗	一·二五	二·一五	二·一八
刺毛	一·二一	一·〇一	一·〇二
樹木、建築的木材	一·一九	一·五六	一·七九
錫	一·〇一	—	—
其他	一九·一六	一七·一七	一五·五九
五金	—	二·七六	三·〇四

這個表無需加以註釋。牠完全顯示出中國經濟之殖民地性質。國家的出口八〇%為農業原料和礦物原料以及食糧，一五——一八%為半製品如絲棉之類，二——五%為工業製品，如紡織品、棉紗和紙烟之類。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會看到在豆的出口的意義上中國幾乎是世界市場上的壟斷者（雖然在最近時期，日本礦物肥料排擠豆餅的結果，嚴重的危機威脅滿州里黃豆的種植）。在橄欖子的出口方面中國和印度一齊在世界貿易佔第一位。在茶的出口意義上中國更爲印度、錫

蘭、爪哇和日本排擠。在絲棉的出口方面，雖然牠慢慢的提高，但中國相對的意義在和日本競爭的關係中很快地下降着。完全明顯地，糧食入口之增加與農業生產品的出口不平均。最後我們再說礦物原料出口的意義。

現在我們來看，例如在一九二六年與中國貿易對於主要的帝國主義究有何種意義。

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輸出到中國的比重（一九二六年）。

	輸出的全部	輸出到中國	對總輸出的百分比
美國	四、八〇八百萬美金	一九二百萬美金	二·七
日本	二、〇四四百萬日金	五七四百萬日金	二八·〇
德國	九、七八三百萬馬克	一五一百萬馬克	一·五
英國	七七八百萬金鎊	一九·九百萬金鎊	二·五

只要隨便看一看這個表就使我們相信：中國以銷售市場的資格對於美國、英國、德國盡着相對小的作用。其次日本輸出到中國的為總出口的二八%，這是生死問題。至於中國輸出到這些

「國家去的統計數字也表示着這種情形：

從中國輸出到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比重（一九二六年）

	輸入的全部	從中國輸入的	對總輸入的百分比
美國	四、四三〇百萬美金	一五七·九百萬美金	三·六
日本	二、三七七百萬日金	三九七·八百萬日金	一七·〇
德國	一〇、〇〇〇百萬馬克	一九七·二百萬馬克	二·〇
英國	一、二四一百萬金鎊	一一·二百萬金鎊	一·〇

因此，中國為原料、糧食和殖民地生產品之源泉在與美國、英國、德國貿易上盡着相對小的作用，但牠對於日本却具有完全實際的作用。這些數字說明，為什麼恰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堅持着每一手掌闊的土地。中國對於日本是原料和糧食之主要泉源。

但在視為潛伏的市場這一點上中國對於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具有很大的意義。我們可以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起中國對於世界貿易的國家是希望和解惑之經常的源泉，中國對於國際貿易而「開放」還不會完全被實現。

爭奪中國市場在研究上是最有趣味的一個論題。我們可以引用以下關於從中國的立場認為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之參與中國的國外貿易這一關爭的主要的指數，這些指數指出帝國主義國家參加的百分比。

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之參加中國的入口

	一八九九	一九一三	一九二一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美 國	九·五	七·六	一七·三	一四·六	一四·八	一六·九九
日 本	一一·五	一九·七	二五·〇	二三·七	二五·八	二六·三九
英 國	一一·七	一一·四	一一·八	七·四	六·八	九·四〇

這裏當然會看到，英國的利益完全沒有爲上面的統計數字表現出來，因爲英國輸入的一部份要經過香港，這部份與在美國和日本的輸入比較場合中是更大的一部份。其次，不僅英國，甚至英國的殖民地也和中國進行貿易，特別是印度和中國的貿易爲更大。印度在一九二六年輸入中國爲總入口的六·九二%，在一九二七年爲總入口的四·一%，而在一九二八年爲總入口的三·九

二%。而中國輸出到印度的在一九二七年爲中國總出口的二·四二%。

這個表很顯然地表現出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平衡及各個國家間對中國市場之絕望的鬭爭。日本在一八八五年和中國通商爲三%，在一九一三年日本的部份增至二〇%，在一九一八年增至三八%，在戰後一九二一年就減至二五%。美國在大戰時期也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美國的進攻的行動一直繼續到現在，如果注意到日本輸入中國的一部份是美國的商品，從香港輸入的一部份也是美國出產的話，那麼就可以斷定美國在一九二七年已經佔了對中國國外貿易的第一位。英國和中國貿易的部份實際上絕不和在表中所指出的那一極低的百分數相符合。必須計算到香港輸入的大部份是英國出產的商品。但是甚至還須注意到這種場合，應當考查在大戰時期英國的部份之深劇的減低，戰後之些微的增長，一九二五——二七年之新的低落以及在一九二八年從其他的國家的輸入之些少的增長。戰後鬭爭特別劇烈起來，當時德國、法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和英國一齊回復到中國市場上來。如果在大戰時期日本排斥了牠的一切競爭者——美國除外——那麼在戰後美國便進攻牠的一切競爭者。

在今日，即在戰後帝國主義之「第三時期」爭奪中國更其大大的加劇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可

以看到，紡織品、糖和一般質料既壞價格又低的工業品是從日本輸出到中國的主要物品。英國主要的是輸出高價格的紡織品。美國輸出麵粉、小麥、建築木材、煙草、機器到中國——總而言之，這些商品，除機器外只有加拿大可以和牠們競爭。這些便可說明關稅問題美國佔了最『自由的』地位，英國則跟隨在牠之後而日本則表現出最頑強的反抗。日本的反抗曾表現出充分的力量為要強迫南京政府放棄在一九二九年所採行的在幾年之內關稅的提高。

註一：引自海關報告。

註二：同上。

三 中國為資本輸出的範圍

處於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國不僅是商品的銷售市場和帝國主義宗主國的原料泉源；同時是資本輸出的範圍。「商品的輸出是自由競爭佔完全統治的舊資本主義的特色。資本的輸出是壟斷佔統治的新資本主義的特色。」（註一）

我們知道，資本之輸出到中國正開始於資本主義新基礎之發端的時候，開始於帝國主義發端的時候。但希爾費丁完全正確地指出『在資本輸出之下，我們理解價值的輸出，豫定在國外生產出剩餘價值。』（註二）不是一切供給中國或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資本都可以用希爾費丁這個定義去概括的。並且更應指出，有些同志完全錯誤地認為國際借款的歷史就是資本輸出的歷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國際借款的總數就是輸出到這些國家的資本的總數。『從輸出國的立場說，可以有兩種資本輸出的形式：資本移置到外國或為產生利息的資本或為產生利潤的資本。後一種形式又可用作為工業資本，為商業資本或銀行資本。』（註三）

但是希爾費丁在這裏僅是從輸出資本的國家立場來考察問題。從資本被輸出到的那些國家的立場說，問題就很複雜。產生利潤的資本可以在國內起一種作用，牠被當作工業資本，商業資本或高利貸資本，在這裏在工業資本之下，我們可推察出牠在農業內（大經營，種植園）和在運輸工業內也是起作用的資本。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會看到在許多國家內輸出的資本正是在農業方面起作用。荷蘭的資本在印度連茲地方的甘蔗種植地上，英國的資本在埃及和印度的灌溉的組織內，美國的資本在東古巴的種植地上，英國的資本在印度連茲和馬來羣島的樹膠種植地上，英國

的資本在印度和錫蘭的茶樹種植地上，美國的資本在園藝經營上和拉丁美洲的牧畜業內，英國的資本在南非洲和澳大利的大私有地上等等都作為使用在農業內的工業資本。其次還可以看到，在資本輸出內投入鐵道和一般運輸工業（造船所、港灣、海港、堆棧、輪船）中的資本，一般說來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們可以肯定，資本之從宗主國輸出在其能左右的大多數內都是在運輸工業方面起作用。這個論題不難證明印度、中國以及美國和英國投資在拉丁美洲的例子。但是借貸資本，即產生利息的資本從宗主國的立場說所盡的絕不是生產的作用并且照希爾費丁的術語說從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立場說可以變為『火藥的煙子』。『資本輸出』到中國、印度、土耳其以及許多拉丁亞美利加國家的歷史正是這種事件的最好的解釋。印度對英國的大債款中（六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大部份的資財被耗費在以金錢供給三次反對阿富汗的戰爭，一次反對波斯的戰爭，耗費在以金錢供給印度參加世界大戰（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奴比），耗費在鎮壓西貝的暴動。大部份的資財被耗費在維持軍隊及國家機關，付給大不列顛官吏的薪俸和養老金及耗費在這一類的行政費用上。僅僅國家債款相對小的部份用在鐵道、灌溉方法和港灣的建設上。類似的現象我們在其他殖民地國家的國際借款的歷史中也可看到。

註一：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四七頁。

註二：希爾費丁，財政資本論，一九一八年版，四六〇頁。

註三：同上。

四 中國的國際借款

美國經濟學者威隆布(Willingby)曾完全正確地指出，當時他將中國的債款分爲三個範疇：
(一)戰爭的借款和償付賠款的借款，(二)行政費用的借款，(三)工業借款，即鐵路和礦業的借款。(註一)

以下的借款應歸於戰爭的借款。

一八九五年法俄新提加所供給的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

一八九六年英德新提加供給的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金鎊。

一八九八年英德新提加供給的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金鎊

六七、五〇〇、〇〇〇金鎊（庚子賠款，但是牠的一部已歸還了中國）。

屬於行政借款的：

一九一二年克里斯普銀行所供給的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鎊。

一九一三年銀行業者的國際銀行團供給袁世凱鎮壓革命的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鎊。

日本銀行爲援助政府而供給的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三年澳大利銀行爲援助革命而供給的三、七〇〇、〇〇〇金鎊。

一九一四年滙港銀行所供給袁世凱的六、六〇〇、〇〇〇金鎊。

一九一九年美國銀行供給反革命政府的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鎊。

一九一六年爲彌補行政費美國銀行所供給五、〇〇〇、〇〇〇美金。

名義上爲工業目的實際上爲行政目的的法國銀行所供給的三二、四〇〇、〇〇〇法郎。

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日本銀行爲援助段祺瑞反革命的集團而訂立的西原借款爲一八〇——二〇〇百萬元。

很顯然的，這些借款，這種「資本之輸出」與生產，與生產力的增加並沒有絲毫關係。在上述的場合中，借貸資本僅從輸出的國家立場而言可作爲借貸資本而起作用。從中國的立場而言這些

借貸資本并不曾變爲有作用的資本；牠們不會以工業資本、商業資本、銀行資本的資格而起過作用，即是說牠們沒有產生出化爲利息及企業收入的利潤。這些借款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因爲爲了利息的支付便提高了賦稅、鹽價，徵收了各種稅，因而牠們加速了國家，特別是農民過渡到貨幣經濟的過程。但是戰爭上的耗費、戰爭的賠款，援助反革命政府而并非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國家的工業化。「金錢最後被償還了。如果問題是國家紙幣的話，那麼需要償還的金錢早已非生產地被使用了。」（註二）類似的資本之輸出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中指示出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上的影響就加速了牠們（列甯說的），但不是加強國家生產力，反而還可以使牠們減弱。印度地方的和中國農民的經濟在這些借貸的壓制下更成爲貨幣的經濟，牠不得不在貨幣稅的壓制之下將大部份出賣於市場上，但是工業不是直接從這裏發展出來。

從財政資本的觀點說，從帝國主義的立場說，此種資本是純粹的借貸資本。財政資本在某種場合內利用了國家的利息率的差別。「高度的利潤率處於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反的方面；從這裏應當說在國內高的或低的利息處於與工業發展的高度同一的關係內，如果僅僅是利息大小的差算實際地表現出利潤率的差算的話。」（註三）這裏看來，對於輸出的國家之借貸資本就發生極高的

利息，此外還應當看到這種場合，即「不依靠某一國生產條件的世界市場表現於利息範圍之確定的直接的影響比表現於利潤率上的影響更大。」（註四）

這種情形，一部分說明了這種場合，即財政資本企圖創立國際銀行團來對付中國為的是以自己的壟斷免除競爭并保證自己高額利息及無形地高度流出的利潤、代辦人的利息等等。

除去資本的輸出為軍事的和行政的需要之外，鐵路借款在資本之輸入中國方面起着極重要的作用。我們在別的地方已經引用過關於投入中國鐵路的外國資本之統計數字。

康托羅維赤同志在其論中國的著作中於仔細而周密的分析十分錯綜的鐵路借款之後，他就得出下述關於中國鐵路上外國利益的結論。

在中國鐵路上之外國的利益

蘇	聯（註五）	四〇一（百萬元）	三六·六（百分比）
日	本	三三八	三一·〇
英	國	一三二	一二·二

法 國	九一	八・三
德 國	四七	四・三
比 利 時	三五	三・三
美 國	二九	二・六
荷 蘭	一九	一・七
總 計	一〇九二	一〇〇

他於是斷定在一九二八年未曾還清的全部鐵路借款和墊款爲三六九、八〇〇、〇〇〇元。

「對於輸出資本的國家差不多常有獲得顯著『利益』的可能性，牠們的性質在財政資本及壟斷時代的特徵上放出輝煌之光。」（註六）對於財政本資的這些利益不僅在於大的創業及發行錢幣的利潤之內，而且在於仲介人的利潤之內，在於完全管理鐵路之內，在於從鐵路中吸取不實在的利潤等等之內，此外，中國差不多常常受到那些供給借款的國家之束縛，並且由於資本的輸出也引起了這些國家之商品的輸出。在中國平均值四五〇、〇〇〇美金的一哩鐵路的建築都屬於財政資本的「利益」，同時這些鐵路一哩只要二〇〇、〇〇〇——三〇〇、〇〇〇美金就可建築起來。但

在一切場合之內，外國資本的輸入——因為牠用於鐵路方面——異常地加速了國家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整個奴役的條件之下借款在這個意義上起了積極的作用。

註一：Willaughby *Foreign Right and Interest in China*, p. 484.

註二：希爾費丁，*財政資本*，p. 183.

註三：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一編第一章 p. 344.

註四：同上，p. 353.

註五：自然，中東鐵路在原則上和事實上不可以其他鐵路同等看待。

註六：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p. 50.

五 開採工業中的外國資本

現時資本之輸出實質上是爲了在落後的國家內第一創立運輸的制度，第二發展生產消費資料的工業部門，牠加速了這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當然，這種方法對於落後國也有其不利的地

力；利潤的最大部份流到國外，在國外這大部分利潤當作收入使用了，牠不是用之於擴大債務國的工業，或當作資本積累積來……在資本輸出改變了性質的時候，此種解放（即外國資本之民族的同化）完全成爲不可能，大經營領域的資本家在外國努力創設的並不是生產消費資料的工業部門，而是最關心於保證統治原料用之於自己之更其發展的製造生產工具的工業部門。（註一）

希爾費丁爲了確定自己完全可信的論題於是引申在英國資本統治下的比里中斯山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礦山及礦工廠爲例。英國的和德國的資本從這些國家攫取原料，用於英國和德國的工業，由於這種情形，這些國家之經濟的、政治的以及財政的發展仍舊停滯在極低的水平線之上。能夠給希爾費丁的論題以最後解釋的再沒比中國這樣的國家最好的了。

我們已經指出外國資本將中國重要的礦業屈服於自己。這一問題的較好的認識者之一的汪問鴻君（譯音）在一九二四年關於外國資本在中國礦工業內的作用及其意義引出了以下的統計數字：

所投的資本（百萬元爲單位） 一年採掘的煤量（百萬噸爲單位）

中國的企業 五〇 七

英國的企業 二二 四

日本的企業

二七·五

四·五

德國的企業

〇·二五

〇·三

可是從一九二四年起情形就大大地改變了。北京新增加的礦坑上的採掘增加了。中國的礦坑大大地擴大了。中國礦坑的採掘在一九二八——二九年達到了四、六〇〇、〇〇〇噸。英國的資本在中國礦工業內鞏固了他的地位。撫順的礦坑也大大地擴大了。（在一九二九年採掘的爲七、五〇〇、〇〇〇噸（註二））。同時外國資本的比重大大地增加了。此外在一九二九年日本資本將許多在山東的中國企業附屬於自己之下。一言以蔽之，中國資本的比重減少了。在一九二九年外國資本在中國煤礦工業內已爲總投資的七二%，而在一九二五年的僅五四%。中國資本的部分從四六%（在一九二五年）降到二八%。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會看到撫順的煤大量地輸出到日本，而開灤的煤則輸出到日本、菲律賓羣島和香港。（註三）同時中國不得不從外國輸入煤炭來供給上海的工業。其次可以看到，國內各省大部分都是由舊式的企業來供給，舊式的企業每年採掘六、〇〇〇、〇〇〇噸。此種數字完全是隨意擬的。

對於指出外國資本比重之增加及煤的輸出之增加而引撫順煤礦爲例這不是無益的。（註四）

從撫順煤礦中所輸出的煤(以百萬噸為單位)

	一九二〇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一九二四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在 <u>滿州里</u> 出賣的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七	二·九	二·七	三·〇
用於 <u>南滿鐵道</u> 和輪船的数量	一·五	一·四	一·六	一·七	一·七	一·六	一·九
輸出	〇·七	一·〇	一·〇	一·九	二·四	二·七	三·四
內部採掘中輸出的百分數	二三·四	二七·三	三四·七	三六·七	三六·三	四一·〇	四四·〇

重要煤層之所有主的日本資本最先用煤炭供給自己的企業并且從滿州里輸出煤炭，而在六年之內輸出去的煤從全採量的二三·四%增到四四·%。

日本資本在中國採鐵工業內還佔着更有力的地位。日本異常缺乏鐵礦，在日本鐵的採掘相對的減少，而從高麗和滿州里的輸出則增加。日本的冶金業是拿外國的原料來做。鐵礦的開採在日本國內在一九一七年為二六七、〇〇〇噸，而在一九二七年為一五九、〇〇〇噸；從高麗輸入的在一九一七年為一五二、〇〇〇噸，而在一九二七年為四二二、〇〇〇噸；從滿州里輸入的在一九一七年為一〇三、〇〇〇噸，而在一九二七年為六三〇、〇〇〇噸。(註五)所以日本將資本

投到馬來羣島的鐵礦開採方面，從印度輸入熟鐵和生鐵并且幾乎佔有全部鐵層和在中國所有大大小小的重要的熔爐。我們已經知道，漢冶萍公司完全屈服於日本的資本。在向壁山礦的開採還在中國手裏，但在寶亨（安徽）礦業從中日工業組合得了二、五〇〇、〇〇〇元的借款，因而鐵礦都被輸出到日本國立的洋瓦托工廠。（註六）在津甯江（山東）礦坑於一九二三年為日本資本所佔有，而且在這一企業內正和在安山和在平吉湖的企業內一樣，中國資本僅僅起着掩護的作用。完全與實際相符合的判斷就是「日本耗費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為的是要獲得中國的鐵礦，結果中國鐵的儲量的九〇%都在日本的管理之下。」（註七）

這種情況證明，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經濟獨立發展之巨大的障礙。同時無疑地，日本帝國主義要是沒有堅決的鬭爭是不會放棄對中國鐵的儲量之九〇%的管理權。這就說明了日本之狂熱的企圖發展着滿州里的鐵礦的開採和鑄鐵的鍛練。日本已經投了四五、九〇〇、〇〇〇元到安山工廠內。這個工廠從一九一九年這時候受了二六、七〇〇、〇〇〇元的損失；這個工廠直到一九二八年纔獲得第一次的利潤。關於工廠發展數字如下：

一九一九	三一·六	七三·一	三·二	
一九二三	七二·三	一〇一·四	五·四	一·八
一九二六	一六二·五	二二七·一	八·三	三·二

而鐵路的「損失」則從南滿鐵路和撫順煤礦的收入來彌補。(註八)

湖南和雲南的礦山或熔爐已經為外國資本所佔有的，我們還沒有直接的統計數字。但大家都知道，錒、錫、亞鉛、鎢之類都從國內輸出。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這情形的最好的例證，即是外國資本的輸入可以剝奪國家的原料輸出之獨立發展的前提。

註一：希爾費丁，財政資本，p. 487.

註二：在撫順礦坑內煤的採掘在一九二〇年為三、二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四年為五、六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六年為六、四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七年為六、八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八年為七、三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九年為七、五〇〇、〇〇〇噸。

註三：中國年鑑，一九二五年 p. 127.

註四：滿州通詢，第四期，一九二八年。

註五：遠東評論，No. 1, 1929, p. 19.

註六：同上，p. 21.

註七：同上，No. 11, 1928, p. 500

註八：在一九一九年在安山決然地創立了一個煉鋼工廠，這個工廠在一九三一年已經將安山全部熟鐵改造成鋼。

* * *

六 輕工業中之外國資本

考察外國資本在中國輕工業內的地位的問題，首先就須注意到紡織工業。我們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這個時期的統計數字引用在下面：

中國	工廠數			紡錘數(以千為單位)			織機數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六九	六八	七三	二·〇八一	二·〇四四	二·〇四四	一四·四八一	一四·四八一	一四·四九一	一四·四九一

國家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		紡錘數(以千爲單位)	織機數
	工廠數	紡錘數	工廠數	紡錘數		
日本的	四五	四、三三〇	四五	四、三三〇	七、一〇五	八、三六六
英國的	四	四〇五	四	四〇五	二、三六六	二、三六六
總計	一、二八	三、五三六	一、二七	三、五三六	三、三〇〇	三、三〇〇
中國的	七四	二、〇八七	七三	二、〇八七	一、三三六	一、三三六
日本的	四三	一、三九七	四四	一、三九七	一、六〇八	一、三九八
英國的	三	一五三	三	一五三	一、九〇〇	一、九〇〇
總計	一、一〇	三、六三八	一、一〇	三、六三八	三、八九八	二九、七八八

從這個表中顯然地看出，在最近幾年紡織工廠沒有什麼發展。

紡織工廠發展了，但僅僅是日本工廠發展了。在一九二八年情形有些改變了，因爲有兩個英國工廠轉到日本的手裏，而有一個轉到中國的手裏。隨後在山東有許多中國工廠轉到日本的手裏或陷於財政的依賴外國銀行。如果從發展的趨勢的立場來觀察問題，那麼就表現出，日本在中國

的紡織工業比中國的發展來得更快。如果以上海爲例，那麼就表現出，在一九一七年在上海有十二個中國工廠有二五三、六六六個紡錘和二、五五二架絲織機。在一九二七年在上海二十四個中國工廠有七一、九八六個紡錘和六、〇一四架紡織機。在一九一七年在上海有七個日本工廠有二六三、〇〇〇個紡錘，而在一九二七年有三十個日本工廠有九四八、二六八個紡錘。同時中國工廠的紡錘數增加了一八〇%，日本工廠的紡錘數則增加了二四〇%。說到紡織工業，那麼充分地指示出，在三年內中國工廠中的織機數沒有什麼改變，而日本工廠中的織機數則增加了一〇〇%。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會看到，日本工廠建設完備，在工廠內有最新的機器，而中國工廠設備往往很落後。「中國的紡織工廠普通範圍都不大，僅僅有二〇、〇〇〇個紡錘和二〇〇架織機。在一九二一年有一個上海的富商企圖組織一個有一一〇、〇〇〇個紡錘的大工廠，但這種企圖不曾成功。不久以前有一個普通商店文格奧組織了一個有一三〇、〇〇〇個紡錘和一、五〇〇架織機的工廠……一般地日本的最新的機器開始排擠着舊的機器。」（註二）但是所有的日本工廠不僅僅用自己的範圍，自己的設備以及自己的技術來打擊中國的工廠。此外日本的工廠具有下述的優

花而且照最便宜的價格去購買棉花；三、日本工廠在技術上有最好的受過訓練的工人；四、日本的工廠在棉花轉運上不繳納厘金，而只納棉花價值的二·五%的稅；五、日本的輪船公司許日本工廠照最低的稅率付輪運費。」（註二）

在其餘輕工業及改造的工業部門中中國的企業就其數量言却超過外國的企業，但就固定資本及生產而言牠們比外國的企業落後。這裏有幾個比較的統計數字：

在中國有一八三個中國火柴工廠和十個外國火柴工廠。但同時中國工廠的大多數有固定資本平均爲一五、〇〇〇——二〇、〇〇〇元，日本工廠的固定資本在二〇〇、〇〇〇元以上。

在中國有三十八個中國的製蛋白的企業，有四個美國的，有一個英國的，有六個日本的製蛋白的企業，這裏一些外國的企業改製雞蛋比較所有中國的總和還多。

水門汀工廠計算起來中國的有四十三個，外國的有三十二個，但中國的企業相對地小，同時僅僅在唐山在開灤礦坑的英國工廠內工作的就有四千人，而大連的日本水門汀工廠一般地說在亞細亞可算得最大的工廠。

在其餘生產部門內中國工廠數，與外國工廠數之間的相互關係歸納爲以下的形式：化學工廠

——二十個中國的和十一個外國的；磨粉廠——一百一十個中國的和十八個外國的；玻璃工廠——四十八個中國的和六個日本的；製革工廠——四十五個中國的，三個日本的，製油工廠——一百四十一個中國的和十五個日本的；製糖工廠——十四個中國的和十個外國的；製藥工廠——十個中國的和五個俄國的等等。在這種情形之下差不多在所有工業部門內外國的企業是最大的，設備最好的，資本最充足的。同時中國工業的危機引起了許多中國的民族企業——保持着牠形式的獨立——陷於財政的依賴外國銀行。往往很多場合，當時企業還算是中國的，但牠已經完全在日本資本的手裏，這因為在每次抵制日貨的時候日本資本都願維持着中國的商社。同樣往往有很多場合，當時中國的小工廠用自己的商標出賣外國工廠的生產品。

註一：中國評論週報，No. 10, 1929, p. 98.

註二：China Econ. Journal, No. 5, 1928, p. 917.

七 中國鈞利息率

在這一關係中發生出異常重要的，從理論和實際的觀點說也是同樣有興趣的問題。

我們已經指出過，日本的紡織工廠比中國工廠得到最低利息的信用。類似的現象在經濟活動的各方面都可看得到。與這些現象有關的還有一個問題：在中國是否有利息率的存在，如果有，那麼是那一種？

我們覺得正確的回答這個問題是：在中國已經存在着利息率，但不是一種利息率，而是許多種的利息率。

一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經濟的，特別是中國經濟的特點之一即在於此。

自然，甚至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各種不同的利息率同時存在着。在英國、美國、德國對於銀行存款和借貸，對於工商業的借款同時存在着各種不同的利息率。有極大信用能力的大企業從大銀行得到借款其利息比之信用能力小的企業或私人從小銀行得到借款的利息更低。正如在一九二九年在美國的交易所借款利息到百分之十八至二十，而在同時聯邦銀行的折扣并不超過六%。但是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內，各種形態的借款的利息之離平均利息率而擺動只處於一定而又極狹隘的範圍之內。在中國利息率差異之大竟由數量轉變到質量。

一、在外國銀行與外國商號的相互關係之間存在着一種利息率。這種利息率與其國家民族的利息率相適合或稍高一點。英國、日本、美國及其他國家的銀行其利息率是按照英日美的商號與英日美等國內的利息率的變動相適合而規定的。

二、在外國銀行與中國商號的相互關係之間則存在着完全另一種的利息率。正如一般的規律一樣，中國的商號能夠在外國銀行內得到信用只有經過買辦做仲介人。利息率對於這些中國商號比對於外國商號的高得多，但比中國銀行的利息率稍微低些（最近時期許多大的和最著名的中國商號已經直接的與外國銀行接洽，利息率對於這些商號更加與外國的利息率相近）。

三、在中國銀行對於中國資本主義企業家方面則又存在着完全另一種的利息率。這裏已經規定了「中國的」利息率。如果外國的利息率在四至八%之間，那麼中國的甚至對於資本主義企業家也都在九至二四%之間。

四、最後，對於手工業者和農民以及一般小生產者都不存在任何的利息率。在這方面高利貸還無限地統治着，而被壓制的大多數城鄉居民正是小生產者。

利息率的差異引起中國的工業家，中國的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以借貸資本來經營的——從

利潤中抽出大部分爲利息而以小部分爲企業的所得，外國的資本家則以小部分爲利息而以大部分爲企業的所得。於是甚至在同一利潤率之下，在工業中起作用的外國資本的積累比中國資本的積累也來得迅速。這便說明了外國銀行之巨大的作用、意義和勢力。

我們可以說，借貸資本還在戀戀於牠的以往并從利潤中獲得完全無比的大部分。

八 中國的壟斷

財政資本之獨佔的組織首先在資本主義已經成熟了的國家內或在資本主義尚未成熟的國家內創立起來。在中國我們看見許多這樣的獨佔的關係。

在中國最大的獨佔的組織之一就是南滿鐵路。除鐵道線之外，南滿鐵路配置得有大的貯藏所、鐵路工場，在大連有一個爲全亞洲最大的造船工廠，在大連、旅順、營口及安東有艦隊、港灣，在上海有自己的造船所，在撫順、煙台等處有煤礦，在大連、奉天、長春及安東等處有電站和瓦斯工廠，在許多城市內有旅館，其建築部份佔五五、〇〇〇——六〇、〇〇〇英畝土地，在三十個城內有建築物、醫院、學校、實驗場、研究院、模範的絲織廠、紡織工廠、染料製造廠、

化學工廠、榨油廠、釀酒工廠、模範的經營、農業實驗場、鐵礦、熔爐、煤油工廠、蘇打工廠、鋸木工廠。如果將處於遼遠的租借地上或租界上的一切企業加以計算，將南滿鐵道的一切日本軍事勢力加以計算，那麼很顯然的，南滿鐵道其自身就是國家中之國家。這個「國家」的每年的預算爲二四七、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收入。二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支出和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純利，即是說比東三省總合的預算還多。如果還注意到滿洲當局不得建築競爭的路線，南滿鐵道上的稅率比中國自有的鐵路高一倍半，南滿鐵道不納稅，不屈服於中國當局，那麼很顯然的，這種壟斷的自身就其對於破產的農民經濟，對於中國工人并且如果牠願意甚至對於中國資本家表現出如何巨大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力量。

我們這裏可以引幾個關於南滿鐵道發展的統計數字。在一九〇七年，乘客的人數爲一、五〇〇、〇〇〇人，在一九一七年爲五、八〇〇、〇〇〇人，在一九二六年爲八、二〇〇、〇〇〇人。被轉運的貨物的數量在一九〇七年爲一、四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一七年爲七、三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六年爲一一、五〇〇、〇〇〇噸。純利潤在一九〇七年爲三、六〇〇、〇〇〇元，在一九一二年爲四、九〇〇、〇〇〇元，在一九一七年爲三、六〇〇、〇〇〇元，在一

九二六年爲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殖民地的壟斷之異常有趣的形式表現於英國的商社查爾金、馬吉遜公司。這個商社在中國水面上有許多商船。牠在上海有紡織工廠，在香港牠加入許多製糖工廠內。牠是香港上海銀行的最大股東之一。牠又加入英美煙公司爲最大股東。牠在上海有極大的商店，此外牠又是七十二個英國和美國商社的唯一的代表者，並且在十八個中國的最重要的城市內都有牠的支店。牠已經管理着滬寧鐵路。

另一個大的英國輪船公司——貝特費爾德及斯維爾也設置有許多工業企業並且也參加在銀行內。

英美煙公司也是一個最大的壟斷的組織，牠在英國、美國、中國、高麗等處，都有牠的工廠（在一九二九年這個托辣斯巨壁更與別的煙草托辣斯聯合起來）在上海、香港、漢口、奉天等處公司都有很大的工廠（在上海一個工廠內有八、〇〇〇——九、〇〇〇工人，公司每年的利潤平均約爲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大多數的中國商號以最大的中國企業之一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爲首不得和這些巨靈競爭。（中國的這個商號不僅在中國本國內甚至在中國移民的國家內也

有牠的工廠和分店。牠於一九〇六年創立，其固定資本爲一〇〇、〇〇〇元。在一九一五年牠在中國已經有四個工廠。在一九一八年商號的固定資本達到七百萬元，而在一九一八年達到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公司的利潤：在一九二〇年爲四、八〇〇、〇〇〇，在一九二一年爲四、〇四〇、〇〇〇元，在一九二二年爲四、〇八〇、〇〇〇元，在一九二三年爲三、〇九〇、〇〇〇元，在一九二四年爲四七九、〇〇〇元，在一九二五年爲一、二〇〇、〇〇〇元，在一九二六年爲二、三〇〇、〇〇〇元，在一九二七年爲二、八〇〇、〇〇〇元。公司原料的大部分從美國輸入。我們已經說過，一九二九——三〇年的危機使這一企業瀕於破產。）

日本的紡織工廠在中國是最大的壟斷組織。就事的實質而言所有日本的紡織工廠都在聯合於日本紡織組合內的四個股份公司的手裏。在美國、印度和中國購買原料的方面，在與輪船公司協定的稅率方面，在生產物調節的意義上，在對待工人方面，這些商號常常共同出面，而且日本的輪船公司，銀行和外交以各種方法援助這些巨大的企業，在這些企業中僅僅在上海就有六〇、〇〇〇——七〇、〇〇〇工人工作。

資本家聯盟之世界的瓜分乃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因爲一種種外國的和殖民地的聯繫以及

最大的壟斷的聯盟之「勢力範圍」依照資本輸出增長的比例而擴大了，事情自然而然地使他們之間趨向於全世界的協調，趨向於國際卡特爾之組織。」（列甯）在此種關係上中國是最好的例證。國家被劃分爲幾個在美孚油公司和亞細亞火油公司之間的勢力範圍。從一九二二年起在這兩個托辣斯之間的一切競爭都停止了，甚至最近幾年的煤油戰也不會破壞這種協定。兩個托辣斯有最多船隻用來運輸煤油并有進步的商品生產的組織。而美孚油公司在上海還有製造燈的大工廠。有一個時期，當着爲了在中國普遍這些燈起見曾無代價的奉送給人；但現在已經有一個美國的工廠和一個日本的工廠及一個中國的工廠競爭，他們共同排擠中國舊式的燈。（註一）

然而當我們觀察一般的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國家內而特別是在中國內的壟斷一問題時，我們不應當忘記對於殖民地國家很標本的而又特殊組織之一種特別的形式。我們看到有所謂「管理的代辦處」。

「此種制度在東方商業組織內是十分重要的特點。牠的主要的特點在於在東方國家內經營的企業之事務上的管理不是委託於這些企業方面服務的個人，而是委託於那一國家內從事於生產或商業的大商號。在歐洲，企業在法律上都要受登記，牠們通常發行自己的股票……這些企業與某

一殖民地國家的一個管理代辦處訂立條約，管理代辦處根據這個條約的效力就操有指揮商業的或工業的企業或種植地之權。操有管理代辦處機能的商號通常其本身也在世界範圍內從事商業。牠們通常不僅從事於一種專門的商業部門，而且從事於各種出口和入口的貿易。牠們對於工業生產的許多不同的部門是管理代辦處。他們管理橡皮的，茶和咖啡的種植地，錫礦及其他的礦業，紡織工廠及其他的工廠……此外，管理代辦處供給企業墊款，供給牠們機器、建築物、原料以及各種的材料。』（註三）

這些管理代辦處就宗主國股份公司的委託而言實質上是一種壟斷的組織。牠們在印度、在錫蘭、在馬來羣島、在印度連起着很大的作用并且在中國也起着巨大的作用。牠們的作用和意義從壟斷的立場說，就在於牠們按照帝國主義的宗主國對於殖民地的關係而將許多企業聯合於壟斷的組織之內，甚至也有在這種場合，即當着這些企業的本身在帝國主義國家內彼此進行着競爭的鬭爭的時候。宗主國內這些商社的自由競爭與殖民地內壟斷的搶劫結合起來。在中國、查爾金、馬諦遜公司是最大的管理代辦處。誰都知道，這個商社與滬港銀行是緊密地聯系着。在爭奪殖民地市場方面，美國現在已經認識這些管理代辦處的一切重要性，而且在美國常常有一種呼聲必須

創立像英國和荷蘭一樣的美國管理代辦所。同時這些管理代辦所對於列甯論帝國主義之崩壞及寄生制度的論題是最明顯的解釋。宗主國的資產階級完全離開了殖民地內一切組織者的機能，而將其委託他們的管理代辦處。

這些管理代辦處的巨大意義也還在於本地的民族資本，在於本地的民族股份公司，在於本地的民族企業家將自己的企業管理委託於外國的管理代辦處。無論印度的資產階級關於管理代辦處的浪費而啼泣悲痛，而在印度大部份的印度的紡織工廠并且差不多全部亞蘇工業都在英國管理代辦處的指揮之下，雖然在紡織工業方面已經有印度的管理代辦處，這種制度在中國沒有在印度那樣普遍，但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然而壟斷的組織，不僅使外國的資本并且也不僅使外國銀行的資本與工業的資本相結合。中國的銀行資本與外國的銀行資本比較起來尚處於幼稚的時代，但我們已經能夠看到牠和工業資本結合的過程。交通銀行緊密地和中國北部的鐵道以及和山西的礦工業聯系着。浙江實業銀行在江蘇和浙江的中國紡織工業和絲織工業有很穩固的地位。至於說到壟斷的組織，我們看到在中國工業發展的黎明期已經發生了聯合煤、輪船、冶金業、紡織工業和銀行之縱的聯系。然而，我們覺

得在常常發生於國家干涉的結果中的這些壟斷之間與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帝國主義時代壟斷之間置一等號是不正確的。壟斷發生於未成熟和已成熟的資本主義時代，但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代“Gesellschaftlichen Monopolen”（公司——照牛吉爾的術語就是壟斷）是資本集中之強有力的槓桿，（註三）壟斷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一階段就已存在。「在最近經濟生活中你們不僅發見競爭和壟斷，而且發見牠們的組合，此種組合其本身不是一種公式，而是一種運動」，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寫信給阿林柯夫會這樣說。但在這一點上他在一八四六年密學之貧困（註四）中已經指出過。不過這些壟斷原則上與帝國主義時代的壟斷不同，正如原始積累的時代和帝國主義的時代不同一樣。我們覺得正是原始積累時代壟斷的會社之創立是中國軍閥制度的重要特性之一。以張作霖爲首而最近以張學良爲首的奉天派直接或經過省立銀行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上層指揮之下管理着不僅豆類的貿易，不僅兵工廠，不僅奉天省大多數的鐵道，并且還參加差不多一切的大工業企業，在這種情形之下，管理和參加常常以非經濟的方法來實現。我們在吉林和黑龍江兩省也可看到類似的狀況。在雲南軍閥們不僅把持着鹽、鴉片的壟斷，而且還管理着錫的出賣。閩錫山不僅是山西的大銀行家和大地主，而且在當時還是大工業家。其他的軍閥們也是「他那」一省的大工

業家，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力創立於已有利的各種壟斷。最近浙江派以些許近代的形式在江蘇和浙江兩省內活動。

所以在中國我們看見兩種壟斷形式之結合與并存。

中國勞苦羣衆爲帝國主義時代最大的壟斷的組合與原始積累時代的壟斷——會社所強奪。

註一：“China Econ Bulletin” N. 2, 1921.

註二：Anstey, “The Trade of the Indian Ocean”, London 1929, p. 134—135.

註三：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七四六頁。

註四：馬克思，哲學之貧困，一九二八，馬克思叢書一七七頁。

九 中國的利潤率（論額外利潤的問題）

在未分解中國利潤率的具體問題以前，我們必須先辨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一般落後的國家中額外利潤之源泉的問題。如果仔細地研究馬克思，那麼很顯然，馬克思差不多已經指出額

外利潤之一切重要的來源。

馬克思認對外貿易爲額外利潤重要來源之一。

「投到對外貿易的資本——馬克思說——可以獲得最高的利潤率，因爲第一，此地與其他國家在很少有利的生產條件之下生產出的商品進行着競爭，因爲最先進的國家生產牠的商品雖在其價值以上，但比競爭的國家價廉。因爲最先進的國家的勞動在這種情形之下被估計爲比重最高的勞動，利潤率就被提高，於是勞動——不是當質量最高的勞動支付的——就那樣的出賣了。就是對於這些國家——商品發送到那個國家內和從那個國家內得到商品——也同樣有其地位；正是這樣的國家棄置具體的勞動自然比獲得的多，而且在這種情形之下所得到的商品比自己製造這些商品還廉價些。」（註一）

然而馬克思已經指出，資本的輸出即是額外利潤的來源；「另一方面，說到投於殖民地以及其他地方的地方的資本，那麼牠們能夠獲得更高的利潤率，因爲那裏更低度發展的結果利潤率一般都是很高，而在應用奴役、苦力等等條件下勞動的剝削率更形提高。困難的就是要了解，爲什麼投在某一定部門中的本國資本能夠產生和供給那樣更高的利潤率，爲什麼在這裏這種利潤率

——如果這種利潤率僅僅不違反壟斷——在一般利潤率的平均之下沒有影響，其次而且也不會提高牠。特別困難的就是要了解，如果資本被投到那些屈服於自由競爭規律的部門……國家處於最有利的條件中在交換的場合以少量的勞動而獲得多量的勞動，雖然此種差別，此種過剩，一般說來在勞動與資本間於交換之下而為某一定的階級所擅有。其次，因為利潤率之高，所以一般說來牠們在殖民地國家中都很高，這在有利的自然條件之下能夠與低的商品價格攜手并行。」（註二）

布哈林會完全正確地指出：「馬克思在這裏從勞動價值的理論出發而給了額外利潤以理論的說明。附加的利潤從此種立場說來在其根本上表現出生產品之社會的價值（「社會」這個字在這裏是將全世界的資本主義視為一個整體）超過了生產品之個人的價值（「個人」這個字在某種場合是指「國民經濟」而言）。」（註三）

在別的地方馬克思用以下的形式表示這種意思：「如果將資本輸送到外國，那麼這種情形之發生不是因為牠在國內絕對地找不到應用。這種情形之發生是因為在國外牠在可以達到更高的利潤率。」（註四）

馬克思的這個公式十分明顯的否定盧森堡的理論。資本之輸出不是因為牠國內絕對地不能找

到應用，而是因為牠在國外可以找到更高的利潤率。

這樣看來，額外利潤在商品輸出的場合以及在資本輸出的場合都是為各國的資本有機構成所決定所形成了。在發達的國家高度的資本有機構成形成低度的利潤率，而在落後的國家低度的資本有機構成形成的高度的利潤率。

然而資本的輸出和商品的輸出不僅直接地而且也間接地給予以額外利潤。對外貿易的影響表現於原料和食糧的價格之上，表現於生產成本費的價格之上，其次表現於利潤率之上。馬克思以下述的形式表明這種意思：

「在其他各種不同的條件之下，利潤率的高漲或低落如像我們所看到的一樣，是循着與原料價格的變動相反的道路進行的。從這裏可以明顯地看出，原料的低價對於工業國家那樣重要唯有在這種假定之下，即原料價格的搖擺並不隨着生產品銷售範圍的改變，也就是說不與供求的相互關係相聯系。其次還可以看出，對外貿易之影響利潤率甚至不依靠牠在工資上以減低生存必需資料價格的方法的一切行動。而正是牠影響了應用於工業或農業中的原料以及補助材料的價格……」

「因此容易了解原料稅之取消或降低對於工業表現出怎樣的重大性；原料之可能的自由輸入

就是合理的建立保護制度之基本的論據。這種情形與穀物稅的轉移一齊成爲英國自由貿易的中心點，自由貿易特別妨害了關於穀物稅的取消。」（註五）

然而額外利潤的來源還不會發揮得充分。社會結構的差別，生產方法的差別同樣都可作成額外利潤的來源，這裏在這種關係中國家的農業制度起着巨大的作用。馬克思關於這點有如下的敘述：

「平均利潤與其生產價格的調節是在農村關係以外，在城市貿易和工廠內構成的。支付地租之農民的利潤不應列入平均利潤之內，因爲他對於土地所有者的關係并不是資本主義的關係。他之所以獲得利潤，即是說他實現——用個人的勞動或剝削別人的勞動——他自己生存必需資料以上的剩餘，這種情形是在普通關係以外被完成的，並且在其他相等的條件之下，不是這種利潤的高度決定地租，而是相反，地租本身乃爲地租所決定，如像牠的界限一樣。中世紀高度的利潤率之能夠獲得牠的高度不僅由於資本之低度的構成，並且在資本之低度的組織中強制了可變的，耗費在工資上面的成份。高度的利潤率之能得到牠的高度由於加諸農村的壓迫，由於土地私有者的地租部分及其奴役的收入之擅有。」（註六）

恩格思在這一點上也同樣指出過異常重要的情況。他以為不僅一般農業組織而甚至租稅制度也能在農業生產品的價格上和利潤上表現出一種影響：

「大西洋上的輪船，而同樣南北美洲的和印度的鐵道都給那些完全特殊的國家在西歐的穀物市場上以競爭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北美洲的荒原，阿根廷的大平原，荒原已經脫離了自然而利於耕種，處女地甚至在原始的耕種之下不用肥料而能長年的得到很豐富的收成。另一方面，是俄羅斯和印度的土地公社，牠們必須出賣自己生產品的一部份，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家之無情的專制常常用拷打的方法迫使他們將所有增加的部份——賣成金錢來支付租稅——用來繳納租稅。這些生產品不顧及生產價格而出賣，按照商人定的價格而出賣，因為農民到納稅的時期無論如何也得要拿到金錢。」（註七）

當然，農業生產品的價格——不管這些生產品是原料或者糧食——都影響到利潤率。

在落後的國家內，商業資本起着巨大的作用。「資本——開始照商品的價值決定商品價格的大小——是商業資本，而其範圍，——在牠裏面首先形成共同利潤率——是形成複生產過程的流通範圍。本來商業利潤決定工業利潤。僅僅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根深蒂固和企業家自己成為商人

以後，商業利潤纔附於全剩餘價值之相應的部份，剩餘價值之歸到商業資本部分上，如像用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全部資本之相應的部份一樣。」（註八）

但是從這裏就歸結出，商業資本也一樣能夠獲得額外利潤。

「當商業資本在生產品交換不發達的國家起着仲介人的作用時，商業利潤不僅是錯算和欺騙的結果，而且大部份實際上是從牠們當中發生出來。此外，商業資本利用各國價格之間的差異（也正是在這種關係上牠在商品價值之平衡和確定上表現其影響），上述的生產方法就引起商業資本將剩餘生產品的受壓制的部份據爲己有，——一部以仲介人的資格出現於社會之間，其生產實際上還得具有使用價值并且對於其經濟的組織而將生產品的一部份出賣，一般的出現於流通之中，其次，一般生產品的出賣依其價值祇有次要的意義；一部份因爲在上述的本來的生產方法之下而歸於剩餘生產品之主要的佔有者，與他們有關係的是商人，——奴隸所有主、封建主、帝國（例如東方的暴君）——都是消費財富的代表者，商人對於財富的消費佈置着密網，這正如亞當斯密在其引文中已經正確地依照封建時代的關係所指出的那樣。因此，商業資本，當着牠佔有統治的優勢的時候，到處表現其掠奪的制度，并且依於商人的商業資本之發展并非毫無代價，如像古

代，也如像新時代直接與暴力的強奪、海盜、奴隸的劫取，殖民地的束縛相聯系的商業資本的發展一樣；在加爾番丁、在羅馬、晚近的威尼西亞人、葡萄牙人、荷蘭人等等也都是那樣。」（註九

我們以為，一方面盧森堡及其繼承者的錯誤，另一方面非殖民地化論的擁護者的錯誤，是由於不了解後兩個額外利潤來源而發生的。盧森堡以為，在殖民地內資本活動其方法一如在資本主義最優越的國家一樣。這裏就是盧森堡關於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國家內資本活動的計劃：土地變為私有財產，自然經濟變為貨幣經濟，第三者（農民和手工業者）變為無產者。盧森堡在這裏并不會計及封建的壓迫、資本主義前期的農業關係、專制的租稅制度、奴隸佔有關係之殘餘、強迫勞動、契約上的勞作、強迫的耕種、強迫的訂立契約及其他非經濟壓迫的契機之深入的關係對於資本本都能夠使其體的歷史的在過去成為并且現在仍成為額外利潤的泉源。不了解這個事實便不會了解具體的歷史的政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階級力量之具體的歷史的分野。正是要看到農業組織內資本主義前期的殘餘，正是要看到殖民地內商業的錯算，欺騙對於資本本都能夠成為額外利潤的泉源，建立了殖民地地主和外資之間，落後國家商業高利貸資本和帝國主義之間的聯系。正是在這方面帝國主義在趨於利潤率降低的資本主義發展之要求和與利潤率降低相反而行的傾向而

趨於保存資本主義前期關係之要求之間建立了奇異的矛盾。

各國剩餘價值率之差異，即是說剝削勞動的階級之民族的差異也同樣是額外利潤的來源之一。而爲了要解釋這個問題，「一開始就得考察民族的剩餘價值率之差異，然後，在這些已知的基礎上將剩餘價值率來比較各種民族的利潤率。」（註十）馬克思的這種指示將我們引到關於工資的規律及其在落後國家內的變化問題上面了。因爲勞動力之生產和再生產的價值爲許多歷史的甚至道德的原因所形成，因爲影響於勞動力之生產和再生產的如像：某一國家生產力之發展，社會勞動之生產力，某一國家工人的熟練和敏捷；因爲工業後備軍之縮小或增加影響到勞動力的價值，不言而喻的，落後國家中的工資比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來得低。於是殖民地工人之附加的剝削便成爲資本之額外利潤的泉源。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內工資不僅包含再生產的價值，而且也包含勞動力的生產價值，即是說不僅包括工人，而且也包括他的家庭，那麼在落後國家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破產創造了這樣大的工業後備軍，即資本不得不關心於勞動力之再生產只是很有限的。熟練的工人與工作日的延長及耗費異常高度的勞動力所完成了的高度絕對的剩餘價值率是有差別的。「在這裏同樣應當想像到婦女和兒童勞動之大量的應用，因爲

在這種情形之下全家都要供給資本比以前更多的剩餘勞動，甚至即使這個家庭所獲得的工資總額增加亦是如此，雖然這類情形絕不是代表一般的現象。〔註十二〕所以，一方面，剝削勞動的程度之提高，另一方面，工資比其價值之降低在殖民地國家內作爲與利潤率降低的傾向相反的原因而起的作用比在先進國家內更厲害，在先進國家內，許多歷史的和道德的原因完全阻止了這個理由的活動或限制其活動。

相當的人口過剩，當然與這種額外利潤之來源的範疇有關。以下是馬克思關於這一點的敘述：「相對的人口過剩在某些國家內愈加明確地表現出來，則在那些國家內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亦愈發展。其次，相對的人口過剩一方面是由於許多生產部門內繼續在着多少不完全屈服於資本的勞動——並且在這種情形之下，繼續存在着比第一次適應於發展之一般水平的還要屈折；這是在支配中或解雇工人中之廉價和過剩的結果，而且也是最強烈的反抗的結果，這在某一些生產部門內在依賴牠們的自然界內，可遇到變徒手勞動爲機器勞動。另一方面，新的生產部門，特別是奢侈品的生產部門開創了，對於這些部門的供給，正是那些在其他生產部門中被固定資本佔優勢的

生產部門一樣，只是逐漸地走向發展的道路。在這兩種場合內，可變資本佔總資本的最大部分，而工資則在中等以下，因為在這些生產部門中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異常之高。并且既然特種生產部門利潤率之平均的結果形成了一般的利潤率，那麼就是那種原因——產生利潤率下降的傾向——在這裏引起了這種傾向的相反作用，多少使牠的影響減弱所致。〔註十二〕

考察了中國的具體經濟，我們便獲得馬克思此種論點之明顯的確定。許多手工業生產部門之頑強的反抗，在製造奢侈品的生產部門中大多數手工工廠和手工業作坊的存在，中國絲織工業之命運以及諸如此類的情形都可作為此種論點之解釋。

我們以為將帝國主義在殖民地所獲得的地租——絕對地租，特別是級差地租——歸諸額外利潤的來源應有一定的限度。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的情形：在殖民地國家內，帝國主義佔有很好的土地，并且將這些土地分給帝國主義國家的投機商人、資本家、冒險家、將軍們、官吏、政治活動者。法國殖民地在北非洲、安南，英國殖民地在非洲中部西部和南部，在玻里尼西亞，在馬來羣島；美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菲律賓、古巴；荷蘭殖民地——爪哇和蘇門塔拉；比利時殖民地——剛果，都是在這種關係上之最明顯的例證。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內所霸佔的土地，完全沒有

代價的或名義上的地租而分配給帝國主義宗主國的資本家。如果在這些土地上繼續着舊式的生產方法，那麼土地所有者便獲得各種資本主義前期的地租。但如果在這些土地上應用資本創立大的經濟，如果在那裏創立大的耕種地，那麼在這些土地上農業生產成本費就降低到與資本主義國家內地租相符合的數目。如果這些生產品實現於世界市場之上，那麼這些參加者的分配當然要常常計算到不幸的、巨大的運輸費而必須將其從生產費降低的總數中扣除下來。但一般在殖民地中之土地的搶奪對於帝國主義宗主國的資本家有可能使用其全部資本於農業的生產而不必提出資本的一部份來購買土地或付地租。總之地租之不存在或現有的名義地租實現為這些資本家的額外利潤，雖然地租——以經濟的範疇而論——與利潤不同。

在許多殖民地國家內級差地租在此種關係上有巨大的意義。土地以其地面和氣候的條件之能夠在牠上面種植茶、橡皮樹、棉花、甘蔗、胡椒、金雞納霜、咖啡、可可、芋蔴等等是相當地有限制的。這些植物的種植在其生產品實現於世界市場的時候可以獲得高度的級差地租。但如果這些土地一旦為帝國主義所竊佔，如果這些土地一旦無代價地或在名義地租上分配給帝國主義宗主國的資本家，那麼級差地租最後總是實現為額外利潤。

在殖民地國家內對於礦業也是一樣。由於礦山的財富——礦層、地胎——或無代價地或以名義地租分割給資本家，這些資本家最後便將礦山的地租實現為額外利潤。

如果還要計及在殖民地內被使用於大的農業生產上，種植地上以及礦業上的奴隸和半奴隸，強迫的勞動和契約的勞動，那麼，為什麼外國資本正是努力於這些生產部門之中便不難明瞭了。

農業和工業的發展之過分的不相稱也是殖民地國家內額外利潤重要來源之一。農業在資本有機構成的意義上甚至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亦比工業落後，無論農業是如何的發達。在殖民地國家內大的工業生產就其資本的有機構而言近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生產，雖然在落後的國家中低的工資阻滯了技術的發展。而農業比工業的發展格外落後。所以工業與農業之間的交換成為過分的不相稱。

最後，由於殖民地內股份公司之普遍，以額外利潤性質來源的企業利潤起着極大的作用。「供給了平均利潤率的資本與產生出平均利息的資本之間的差異，也正是這種差異以企業利潤的形態而出現，利益 (Gründungsgewinn) 發生出例外的結果而將產生利潤的資本變為產生利息的資本。」(註十三) 但在帝國主義國家中平均利率相對地低，在殖民地國家中平均利潤相對地高，因

而獲得了異常高的企業利潤，——企業的額外利潤。

所以，以下的場合都是殖民地額外利潤之主要的源泉：

一、各國間資本有機構成之差異——帝國主義國家內高度的資本有機構成與殖民地國家內低度的資本有機構成。

二、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國家間社會組織而特別是農業組織之差異以及從這種差異發生出原料和糧食價格上之差異。

三、民族的剩餘價值率之差異，即是說各個國家剝削勞動者之程度上的差異。這裏也與相對地人口過剩有關。

四、從勞動價值的觀點上說，在工業與殖民地的過分落後的農業間之過分不平均的交換。

五、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國家內搶奪土地的結果，使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以利潤的形式而實現。

六、額外利潤以企業利潤的形式而實現。

所以我們以爲布哈林觀察額外利潤的問題，祇將牠歸之於商業利潤和歸之於民族的資本有權構成之差異是過於狹隘了。所以我們以爲列甯給了這個問題以開展的普遍的公式，他斷定：「不言而喻的，如果資本主義能夠發展在現在到處都比工業落後的農業，如果牠能夠提高民衆的生活水平，——不管那令人眩暈的技術的進步，他們到處仍舊是半飽的和貧困的，——那時關於資本的剩餘便談不到。這種『論點』往往爲資本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批評家所引申。但那時資本主義已不是資本主義，因爲發展之不平衡及民衆之半飽的生活是這種生產方法之根本的和不可避免的條件與前提。當其資本主義仍是資本主義的時候：資本之剩餘不是用之於那一國內民衆生活水平之提高，因爲這是資本家利潤的降低，而是用之於以資本輸出國外，以輸出到殖民地的方法來提高利潤。在這些落後的國家內利潤普通都很高，因爲資本少，地價比較不大，工資低，原料賤。資本輸出之可能性乃於這種情形產生，即是許多落後的國家已經捲入世界資本主義的漩渦敷設或創始鐵道幹線，保證工業發展的基本條件等等。資本輸出之必要乃由於這種情形產生，即是在許多國家內資本『過分的成熟了』，並且使資本缺乏（在農業不發達和民衆貧困的條件下）『利潤競爭的場所』。」（註十四）

在列甯這一公式內可以引出所有的原素：資本的有機構成、利潤率、地價、工資、原料的價格。祇有列甯的普通的公式給了解額外利潤一切來源的鎖鑰，給了解帝國主義剝削殖民地之一切方法的鎖鑰。

我們現在來考察中國經濟中與利潤率有關之具體的例證；不言而喻的，與利息率有區別的利潤率僅僅存在於傾向之內。可是我們以為希爾費丁在某一限度內是正確的，他在分析股份公司上肯定說：「獲取利潤的範圍，以前各個企業家之商業的祕密，現在在紅利的水平線內可找到多少相等的表現。」（註十五）他在這裏也是正確的，他說：「在這裏利潤率的差異在企業利益之不等量中表現了出來。」他的正確是有一定限度的，因為紅利的水平多少相等地反映出利潤率的水平，僅僅在這種場合之內，一、如果我們取一充分地延長的時期，二、如果我們指出店員的報酬及其他管理的費用，牠們都是取費於高度的紅利，三、如果我們指出準備金的高度，牠也是取費於紅利而來，四、如果我們指出新股票按照人為的低的價格分配給舊股東，五、如果我們指出股份公

多少相等地反映出。利潤率的變動。

我們現在首先考查大銀行的紅利：(以百分之百計，特殊的「公司分給股東之公積餘利」包括在紅利以內)

朝鮮銀行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一九二四	一九二五	一九二四	準備金
	一〇	四	七	六	—	—	一一、四二〇、〇〇〇日金
台灣銀行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五	—	一三、七八〇、〇〇〇日金
華比銀行	九	六一三	七	八	八	—	八一、二七九、〇〇〇法郎
麥加利銀行	二〇 $\frac{1}{4}$	二〇 $\frac{1}{4}$	二〇 $\frac{1}{4}$	二〇 $\frac{1}{4}$	二〇 $\frac{1}{4}$	—	二〇 $\frac{1}{4}$ 四、〇〇〇、〇〇〇金鎊
浙江實業銀行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	五八〇、〇〇〇元
交通銀行	一一	九	九	一〇	一〇	—	三八〇、〇〇〇元
中國兌換銀行	一四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	一、五一〇、〇〇〇日金
匯豐銀行	二四	二四	二〇	二〇	二〇	—	二四、五〇〇、〇〇〇金鎊 二六、五〇〇、〇〇〇元
花旗銀行	二四	二四	二〇	二〇	二〇	—	七、六九五、〇〇〇美金
有利銀行	一六	一六	一六	一六	一六	—	一、三五〇、〇〇〇金鎊

三井銀行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二	一二	一二	二八、二四〇、〇〇〇日金
正金銀行	一一	一二	一二	一二	一二	一二	二八八、七八七、〇〇〇日金

這些統計數字的本身已經很明顯。還可看到，準備金常常為支付資本之五〇——一〇〇%，這些銀行的建築物常常表現出很大的價值，除了這些條款之外還有許多秘密的和公開的準備金。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些工業和運輸業的紅利（以%計）

香港及黃埔船塢公司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一九二四	一九二五	
土木工程及造船業	四〇	二四	一八	八	—	
上海造船業及土木工程	二〇	一一	五	一五	—	
中國電力公司	一〇	一〇	一一	一四	一一	
青島柯門特公司	一〇	一〇	一一	一五	七·五	
青島柯門特公司	四六·六	二六·六	二六·六	二三·三	一〇·六六	
香港電氣公司	一五	一五	一一·五	二五	二五	
香港製繩公司	三〇	三〇	三〇	二〇·五	—	

南洋兄弟烟公司	一六	一六	一二	四	—
天津印刷業	二二	一三·五	一六	二〇	一〇
中興煤炭公司	二五	二四	五·五	四	—
鴨州礦公司	三四	三二	三六	三四	—
太古輪船公司	一〇	一二	六	八	—
香港、廣州及澳門輪船公司	一八·三三	二一·六六	二六·六六	一九·九九	—
上海搬場及電燈公司	二四	三一	二八	三四	二四
賽力運輸及貿易公司	二七·五	二二·五	二七·五	二七·五	二二·五
大沽搬場及電燈公司	一五	一六	一四	一四	一四
香港和九龍碼頭及堆棧公司	一二	一八	一八	二二	一六
上海和漢口碼頭公司	一三	一五	一三	一四	一〇

當然，有許多小的甚至大的企業，牠們的經營僅有很小的利潤，比在我們這個表中所引的企業或者還要受損失。但一般地說來，紅利反映出異常高的利潤。如果注意到英國在一九二八年時

二五〇個大企業在其全部資本上平均得出一一·九%的紅利，如果注意到德國紅利平均為企業總資本之六——八%，那麼便可獲得一幅十分嚴厲的情景。如果對於這點還要加上在英國每年平均有二——三%歸到準備的基金，而在中國則有兩三倍之多，那麼所獲得的額外利潤水平線還要更高。此外還可以看到，外國的管理人員，經理人以及股份公司的高等職員在中國獲得了未之前聞的高的花紅和薪俸。

在美國，大銀行，托辣斯的利潤甚至在最興旺的時期也不會超過一二%。而在中國這樣的利潤就被算為細小而不足道的。

商業利潤也是異常之高。為了解釋起見我們這裏來引用一些商業會社的統計數字(以%計)。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
麥根托斯公司(譯音)	一〇	二五	二五	二五	二五
邁克爾公司	一一	一三	一三	一〇	—
威廉包爾爾	二八·五	—	二八·五	一四·五	—
文露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〇	—

我們不引大戰時期關於在中國的銀行、輪船公司以及工業企業的利潤之統計數字了。我們將充分地回憶到，輪船公司獲得了七五——一五〇%的紅利，日本的紡織工廠獲得了三〇——六〇%的紅利。在世界大戰以後利潤極端地減少下去，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時代，利潤更加縮小了，但是甚至在最危機的幾年內仍有額外利潤。我們不會引用關於橡皮種植地利潤的統計數字，因為這些股份公司在中國僅有牠的代理處，而生產，即是說剝削在馬來羣島上有牠的地位，在此場合內中國資本和外國資本一起從外國吸取額外利潤。但是創業利潤完全供給了外國資本。所以，將在中國紅利的水平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紅利的水平加以簡單的比較便表現了在中國現成附加的利潤，額外利潤。如果現在來觀察額外利潤之各種來源的問題，那麼應當指明如下：說到對外貿易，那麼無疑地，額外利潤的大部份供給了外國的資本。這種情形從這種事實中顯示了出來，即中國輸出七〇——七五%的農業品，即是說異常低的資本有機構成的生產部門的生產品；而輸入七〇——七五的工業製造品，即是說高度資本有機構成的生產部門的製造品。

說到在中國起作用的外國資本，那麼牠之獲得額外利潤乃由於在與中國的農業、製造業和手

工業比較中之高度資本有機構成的力量。

在額外利潤之獲得的意義上中國農業組織有很大的意義，在那種農業組織之下農民出賣自己的生產品與生產成本費毫不相關。這就形成了這種事實，而原料和糧食的價格相對地低，雖然在此種關係上運輸和長期的流通費有否定的影響，降低了利潤率。

說到資本之可變的部份，那麼中國是異常高的剩餘價值率，即是說中國是高度的剝削工人之典型的國家。剝削程度之增高，工資之降低到牠的價值以下，相對的人口過剩，過分的使用及過分的剝削婦女和兒童勞動，大量的工業後備軍以及低的生活程度其作用就在利潤率的提高。

說到地租之轉變和實現為額外利潤，那麼我們必須說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直接佔領土地不會起什麼重大的作用。礦山的地租——這個級差地租的形式——常常為外國資本所擅有，牠以政治的壓迫、賄誘等等手段而無代價地獲得了租借地。級差地租，如像在茶、絲等等場合內，自由貿易的手段也同樣較之直接的佔有更落實些。

同時應當指出，商業資本以欺騙、錯算等等手段也獲得額外利潤。

創業利潤主要的供給了外國資本。

註一：馬克恩，資本論，第三卷，二一八頁。

註二：同上，二一八——二一九頁。

註三：布哈林，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七五頁。

註四：馬克恩，資本論，第三卷，第一篇二三七，二三八頁。

註五：同上，八三頁。

註六：同上，第二篇三三七頁。

註七：同上，二六二頁。

註八：同上，第一篇二七〇頁。

註九：同上，三一四——三一五頁。

註十：同上，一一〇頁。

註十一：同上，二一三頁。

註十二：同上，二一七頁。

註十三：希爾費丁，財政資本論，一一二頁。

註十四：列寧·列寧全集，第十九卷，一二〇頁。

註十五：希爾費丁，財政資本論，二二三——二二四頁。

一〇 中國的外國銀行

外國銀行與各個壟斷組織一齊起着巨大的作用。「我們可以說，就字義而言，財政資本已將牠的網伸張到全世界。在這種情形之下，創立殖民地的銀行和分行起着巨大的作用。」（註一）列寧曾指出，在此種關係上，美國資本家很嫉視德國資本家，而德國資本家則嫉視英國資本家。關於財政的權力，關於外國銀行的作用、意義和機能我們在別的地方已經說過。此地我們只引匯豐銀行來作解釋。牠是在一八六七年在香港為英國商人所開辦，銀行的支付資本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金鎊的準備為三九、〇〇〇、〇〇〇元，銀的準備為二五、五〇〇、〇〇〇元；銀行所發行的鈔票在流通中的約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此外存款、流水賬以及海關的收入為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即是說為全比差的八〇%。（註二）此種銀行巨靈是這種情形之典型的例

證，即是甚至無須自己私有資本的輸出，財政資本都能夠操有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國家重要的最高的指揮權。對於估定殖民地銀行的作用而指出以下的情形這不是無益的：

當其匯豐銀行要使銀價低落的時候，牠便將自己有利的銀的準備金之一部分出賣。當其銀行要提高銀價才於自己有利的時候，牠便將準備的金鎊去購買銀子。於是銀行常常能夠影響銀的行情。

匯豐銀行將其大部份的資本置於英國有價值的紙幣之內，而特別是置於英國國家的借款內，即是說銀行從中國輸出資本到英國。類似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在印度看到。英國銀行經過倫敦的交易所從印度輸出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比爲了改用這些貨幣於國家工業之中。（註三）但英國的財政資本甚至那樣的用資本來掠奪波斯。完全操在英國手中的山亨山赫銀行有支付資本一〇、四〇〇、〇〇〇，波斯商人的存款爲三一、一〇〇、〇〇〇，並且由於「愛國的熱誠」購買了英國政府的軍事借款爲九、五〇〇、〇〇〇克郎。（註四）所以外國銀行不僅把持着對外貿易、工業之財政化、貨幣本位的作用等等的管理權，而且同時爲從國家汲取借貸資本形態的工具。如果我們再注意到，在上海英國的股份公司從中國汲取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中國資本轉用於

馬來羣島的橡皮企業之中，中國的交易所也一樣不事生產地緊握着數千百萬元，如果計算到國家一般的缺乏資本，那麼我們便獲得了關於外國銀行在中國之巨大比重的概念。

如果將日本銀行總合起來，那麼牠們的作用和意義將不會比英國銀行的作用和意義小。橫濱正金銀行及朝鮮銀行事實上以金錢供給對外貿易的大部份，管理中日合辦的工業、運輸業及礦山業，從事於紙幣的發行，貨幣本位作用，左右交易所，調劑其利益上的匯兌率，收集中國的存款，收集中國國家收入的一部份，管理許多中國的企業。

在此種關係上，我們以為這種事實的確定在原則上和理論上都非常重要，即特別是英國的銀行從殖民地內工業及運輸業發生的時候起就已同這種工業和包括航行的運輸業很緊密地聯系着和摻合着。這種事實從英國主義之估計和一般財政資本發生的立場說證明有很大的意義。列甯的帝國主義概念及列甯的帝國主義定義之反對者往往是藉口於在最老的、最古典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英國，直到最近時期壟斷的發展最弱，並且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接合表現得最弱。反對列甯的帝國主義的了解之這一類的反駁祇要用列甯的概念之「銳利的限制性」即可說明。如果在英國本國內壟斷的聯合發展得比較遲緩（這一過程在最近幾年進行得異常迅速）是對的話，如果在英國

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接合其速度比美國或德國遲滯（接合的過程在最近幾年以強有力的速度進行并且「工黨」政府使一切都信賴牠，爲的是加速這個過程）是對的話，那麼毫無疑義的，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內英國的資本創立了許多很大的壟斷的聯合，并且毫無疑義的，在殖民地內或半殖民地內英國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接合到十九世紀末就已經有了巨大的成功。正是經過了最大的英國殖民地銀行走向這種過程，并且只有事實之完全不了解或不認識才可說明英國例外的理論之發生。英國的銀行資本在殖民地內與工業資本相接合并且在殖民地內創立了壟斷的組織。并且在這種關係上在中國的滙豐銀行及其作用絕不是表現什麼例外。英國的銀行在其他殖民地內也起着同樣的作用。

法國和比利時的銀行常常管理着城市的運輸業，許多鐵道線，但法國銀行主要是供給貨幣來從事於米的貿易，而特別是在南方管理着絲的貿易。

但這些還不會將財政資本對於國家的剝削敘述詳盡無遺。必須注意到以對外貿易爲前提的許多外國商社、銀行、保險公司、輪船公司等等所產生的作用。雖然指出這些支付之相近數不大可能；但按照許多對於這種事件最熟習的人們的意見，牠當不少於入口與出口總價值之七——八

%。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九卷，p. 123。

註二：斯大，中國財政危機概論，p. 132。

註三：『Economist』，1928。

註四：10克郎—1英金—2盧布。

一一 列強在中國的利益

如果確定輸入中國的資本之多少正確的數額是異常困難的話，那麼要想確定各列強在中國的「利益」之一些近似數則更其困難。在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應當計算到在通商口岸，在租界上建立了許多外國的城市，這裏在租界上房屋與建築的部份非常地昂貴。在房屋、商店及其他建築物上的資本不是從帝國主義宗主國輸出的，而是在中國本國積累起來的。最大的外國企業——匯豐銀行、南滿鐵道、開灤煤礦、英美煙公司、查爾金、馬吉遜公司——發展了，同樣是在中國本國

內的積累發展起來的，而絕不是從帝國主義宗主國輸入資本的方法發展起來的。其次應當計算到國家借款和鐵道借款的一部份已經完全支付了，或者如庚子賠款一樣已歸還了中國。（註二）計算的和殖民地之銀行之資本的範圍是完全不可能，因為牠全依賴經濟的時機。

英國在中國的投资照塔斯的計算在一九一〇年爲：

英國的投资（以金額爲單位）（註二）

政府的借款	二二、四七七
工商業中的投資	一、四〇一
電氣和燈	九
土地中的投資及其他財政的活動	一、八七九
瓦斯及自來水	三七三
礦業	三五〇
電車	三二〇

從此我們知道英國在一九一〇年前輸出到中國的資本總數爲二七、〇〇〇、〇〇〇金鎊，即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是很明顯的少。斯太同志以為英國的投資不會超過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華銀），即約為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註三）二七、〇〇〇、〇〇〇金鎊的這一統計數字多少是可以正確地反映出從英國輸出到中國的資本，但絕不是英國在中國的投資。因為從英國輸出到中國的資本與英國在中國的財產數目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匯豐銀行在中國創立了；在中國的開採企業，查爾金及其他英國商號的企業是用在中國所獲得了的積累發展起來的。外國企業的利潤的一部份被移置到英國，但一部份仍留在中國。這便說明了那種事實，即在一九二五年僅僅在上海英國工業企業的資本計算起來已有二六、六〇〇、〇〇〇鎊，（註四）其中英美煙公司的資本為一九、〇〇〇、〇〇〇鎊。我們沒有整理出正確的數字，但我們敢斷言，如果英國輸出到中國的資本不會超過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那麼在中國起作用的英國資本、建築物的價值、不動產的價值、商業企業的價值、礦山企業的價值、商船的價值以及其他等等達到了，也可說超過了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如果再計算英國在香港的利益，那麼或許我們也會錯誤，假定投在中國的英國資本超過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英國在一九二七年動員全部陸戰隊及全部軍艦不是為保護二

六、〇〇〇、〇〇〇金鎊，——雖然不僅是關於財產的保護，——而是為保護帝國自身的生存。說到美國的投資，那麼就有不同的估計。我們引用最顯著的和最可靠的數字。第一個示數為：

美國的投資(以百萬元為單位)(註五)	二〇
債務及工業的價值	九・三
鐵道債務及借款	三〇・〇
不動產	一〇・〇
對政府的長期借款	六九・三
總計	

照第二個示數而言——在美國上議院委員會報告中所引用的——美國的投資可由下面數字表現出來：

美國的投資(以百萬元為單位)(註六)	110
政府的借款	

鐵路債務

一八

對於私人商號的長期借貸

一〇

銀行、商號及其他的不動產

三〇

傳教師的職業、學校、圖書館、醫院

七〇

總計

一四八

第一和第二兩個示數說明了美國的投資為數極小。如果計算，傳教師職業的一部份是為中國資本所創立（庚子賠款美國部份），那麼還要更其顯出美國投資範圍的狹小。如果再加上美國在中國沒有租界，那麼就可了然美國對待中國之相對的「自由主義」。

至於說到日本的投資，那麼斯太同志根據嚴格的計算估計為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金。自然這裏也應當計及，這些投資的大部分表現出從中國工農榨取的及投入日本企業中的利潤，完全正確的統計數字是沒有的，因為日本的統計「在適合」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需要。我們以為下面的統計數字是比較最可靠的：

日本在中國的利益（以百萬元日金為單位）

紡織工業

二三〇

其他的工業部門

一一〇

航業

五七

不動產

一〇〇

其他

二五

總計

五二二

日本在滿州的利益(以百萬元「日金」爲單位)

運輸業

三三〇

商業

一五

工業

七四

農業

一九

礦工業

八

漁業

一五

銀行的各項投資

六二九

不動產

一、二三〇

總計

二、三二〇

此外，據日本的統計，日本供給中國的國家借款和利息合計爲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後一數字我們認爲是難於相信的誇大。

從日本帝國主義之著名的美國代辦者呂(B. L.)的雜誌中所引的這些數字，就投資方面而言，牠們與實際情形是不符合的。說到日本在滿州里的投資，那麼南滿鐵路曾公佈了下列的統計數字：

(註七)

日本在滿州里的投資(以百萬元爲單位)

運輸業

七一八·九

礦山及森林業

九五·五

電氣業及瓦斯

三七·二

工業

一〇五·六

銀行、貨幣價值

二〇四・三

商業

一一七・七

其他

三九・五

中日合股投資爲七一、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日本的資本爲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元，而中國的資本爲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即是說在合辦的企業內中國的資本僅佔二九%。

如果拿日本資本與英國資本的投資比較，那麼就表現出在中國英國資本之最大部份是用在商業和運輸業方面或用作銀行資本，只有相對的不甚大的一部份才用作工業資本（如在煤炭、烟草、造船、製糖工業內）。英國資本在紡織工業方面除去一個工廠以外就沒有牠的地位。反之，日本資本，除運輸業、銀行業、商業以外大部份用於重工業和輕工業方面。輸出到中國的英國資本大部份是用爲產生利息的資本，從國家（輸出資本的國家）的立場說，這是資本輸出之最有利的形式。固然，這些借款之大部份是非生產的借款（在一九一六年中國非生產的未清償的借款爲六六、八〇〇、〇〇〇鎊，而生產的未清償的借款爲三六、〇〇〇、〇〇〇鎊）。（註八）

輸出到中國的日本資本只有三〇%是借貸資本，而其餘的部份則用作工業資本、商業資本或

銀行資本。但與日本的資本輸出一起的還有將自己的利潤送到日本并且不僅這樣的獲得利息而且還獲得企業收入的資本家。

有些同志正確地斷定了這種有趣的事實，即是日本從一九一六年起輸入到自己的資本和牠輸出到中國的差不多一樣多。事實在於日本輸入到本國的借貸資本是按照相對低的利息，而輸出到中國的資本則產生額外的利潤。產生利息的外國資本之輸入並不是說，日本經濟最高權操在外國資本手裏。而日本資本之輸出到中國，特別是輸出到滿州里便有以日本資本操縱中國經濟最高指揮權之可能。

考察了從中國輸出苦力的問題，希爾費丁在一九〇九年寫道，「在國內引誘苦力來做白種人僱傭勞動的工作在一切場合之內都是危險，當其西歐殖民地政策和日本經常的加強擴大的傾向進於衝突的時候。而中國——希爾費丁繼續說——不久也將追隨在日本之後。」（註九）一言以蔽之，希爾費丁料想中國「在不久時期」不僅不為殖民地，而且會將自己變為帝國主義國家。從那時起經過了長時期，而中國還是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并且在經濟上更加成為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這顯示出，希爾費丁在一九〇九年就已經宣佈了非殖民地化的理論之應用到中國。

我們關於外國資本在中國的地位及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的敘述證明了此種理論應用到中國正如應用到印度一樣是一文不值的。

註一：美國、英國、比利時、法國等等放棄了自己的庚子賠款之某部份并規定出各項用途。

註二：“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1911, p. 183.

註三：斯大，中國財政危機概論 p. 201.

註四：“Papers Respecting Labour Conditions in China”, London 1925, p. 94—95.

註五：“Far Eastern Capital and Trade”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註六：“Far Eastern Review”, 第五期，一九二八年，p. 225.

註七：“The Japa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Monthly”, 1928, p. 6.

註八：“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1, 1926,

註九：希爾費丁，財政資本論 p. 469.

一一 從中國輸出勞動力

我們仍然是來分析中國在供給勞動力於世界市場的資格上之作用的問題。

正因為資本使一切新的國家屈服自己，所以在牠們前面就擺着關於在這些國家內僱傭工人之製造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已經鞏固了的國家內，「資本主義生產之偉大的魔力就在於牠不僅經常地再生產僱傭勞動者做僱傭勞動者，而且永遠產生出——與資本的積累并行——僱傭勞動者之相對的人口過剩。」（註二）但是在這種國家內——這裏農人還佔有土地及自己的生產工具，這裏還常常沒有土地的私有財產并且有很大的自由土地的領域，這裏甚至有可能將僱傭勞動者變為獨立的生產者——工手問題對於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却非常地尖銳。在帝國主義最落後的殖民地內——在這裏落後是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深入以前佔統治的意義——以及在新殖民地化的區域內，在這裏大量土地仍舊是人民的財產并且每個移民都可將牠變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以及變為自己個人的生產工具，關於僱傭勞動者之創造的問題從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迅速發展的立場上說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資本在這些區域內應用各種方法以獲得勞動力。自由的土地之迅速的轉變爲私人的和國家的財產，貨幣租稅之採行，以各種勞役形態的強迫勞動之採行，以前獨立生產者的土地和生產工具之喪失，自由土地之強迫的殖民地化——這就是應用資本於落後的國家內及新殖民地化區域內的一些方法。盧森堡在這一問題上的錯誤（註二）就在於他斷定資本在其殖民地內及新殖民地化的區域內將應用純粹的資本主義的方法去獲得工手。在最後的殖民地內及新殖民地化的區域內資本主義關係發展之實際的歷史證明，對於僱傭勞動者的製造應用了超經濟的強迫方法，也可說是變形的奴隸。種植的經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與奴隸佔有制度之特種的混合物。

非洲對於世界各部份的種植經營及對於殖民地化的區域長時期都是勞動力的供給者。外國資本之深入中國與奴隸買賣廢除的時代相符合，但同時與許多新殖民地和新殖民地化的區域內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擴大相符合。關於對於資本的工手問題已異常尖銳地被提出來了。舊時的中國曾以嚴厲的法律禁止中國人的移殖，但在南京條約（一八四二年）之後，「文明的」世界列強強迫中國承認了牠的公民移住的「法律」。外國資本深入的加強是與從中國輸出勞動力并行的——開始了變形的奴隸買賣，即現時所謂苦力買賣。現在已經不出賣的奴隸，而是與苦力訂立一種「契約」。苦

力——「契約的」勞動者，但是此種勞動者之勞動和生活條件與奴隸之勞動和生活條件沒有絲毫差別。

在一八五〇年和一八七〇年之間苦力輸出到新殖民地化的區域內（美國、澳大利亞）或輸出到資本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內（馬來羣島、印度連茲、菲律賓、暹邏、緬甸、西印度、墨西哥等地）。

在西印度的種植地上苦力代替了黑奴，在馬來羣島上他創立了橡皮種植地并且採掘錫礦，在印度連茲他在種植地上和礦山企業上勞作，在安南和暹邏他就成爲手工業者和工人，在澳大利亞他在金礦上工作，在加利佛尼亞他變爲礦工、農作人，在蘇曼特，他在烟草種植地上做工，在墨西哥和祕魯則在礦坑內做工等等。在許多國家內中國的移民分散得很零碎，從他們當中造成了社會的不同階級層。在馬來羣島——大的和最大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契約的工人；在印度連茲及暹邏——商人，手工業者和工人；在菲律賓——工人和大商業資產階級都是中國僑商的一部份。在許多國家內（印度連茲、馬來羣島、安南、暹邏），中國的資產階級執行着買辦資產階級的作用，并且這些國家內的民族運動立於反對他的地位。我們沒有而且也不能有關於究有若干人

從中國移殖出去之正確的統計數字，從十九世紀中葉起，那時移民已開始採取了大量的範圍，那時中國已成爲勞動力的供給者。（註三）然而對於一般的方向可以充分地指出，在現在既不是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也不是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的中國人過着僑民生活。如果除去台灣——有四百萬中國人密集在那裏生活着——那麼當時中國僑民似乎有六、〇〇〇、〇〇〇到八、〇〇〇、〇〇〇左右之多，也許可以懷疑到，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從中國移殖了幾千萬人出去，因爲要是看到陷於奴隸勞動條件之下的中國僑民勞動力之異常迅速的運出。由於中國農村的破產遂增加了僑民的人數，雖然在許多國家內中國人的移入被禁止（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島、菲律賓、古巴），在其他許多國家內中國的移民受特別法律的制限。（註四）

每年約有五〇〇、〇〇〇中國人從中國南部開放的港埠，主要是從福建和廣東兩省離開故國，約有三〇〇、〇〇〇——三五〇、〇〇〇人回轉到中國來。

除了經常的僑民之外，中國還供給了世界市場以成千成萬的工人的勞動。我們引一些關於中國移民方面的統計數字。（註五）

在一九一八年在菲律賓有四四、二〇〇中國人。在一九二六年來到菲律賓的有一七、五二六

中國人（去的有一三、一五〇）（註六）（這自然是合法的移民。此外無有通行證和以假通行證來到菲律賓的中國人也有數千）。

在暹羅在一九一九——一九二六年照登記的統計數字看來有二六〇、一九四個中國人。（註七）

僅僅經過曼谷的中國人有：

來的 去的

一九二〇——二一 六八、七九七 三三、五六四

一九二一——二三 七三、九七六 四四、九六七

一九二二——二三 八九、三二九 六〇、一六二

一九二三——二四 一〇七、九八七 六〇、三四二

一九二四——二五 八四、六六七 五六、二五八

一九二五——二六 八六、四三四 五三、一一二

一九二六——二七 一〇〇、四一〇 六八、七四四

在十年（一九一八——一九二七）之內，經過曼谷來到暹羅的中國人比從這裏出去的多二八五、〇〇〇人。在暹羅國內中國人的人數馬賴爾斷定爲二、五〇〇、〇〇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如果不僅計算定居於暹羅的中國人而且連一般的中國人也計算在內的話。（註八）在一九二九年在谷曼的中國商會斷定在該國的中國人爲一、二〇〇、〇〇〇。來到暹羅的中國人中九八%是苦力。

一九二五——二六年在安南約有四〇〇、〇〇〇中國人。（註九）

緬甸在一九二一年總計起來有一四九〇六〇個中國人。（註十）

在荷屬印度，在爪哇及馬都爾在一九二〇年總計有三八四、二一八而在外省有四二五、四二九個中國人。在一九二六年在爪哇及馬都爾已經有四六一、一六一個中國人。大多數都是自由的中國人和訂立了契約的苦力。關於每年移入的範圍證明在一九二〇年准許進來的有四九、〇〇〇中國人，在一九二二年有三六、〇〇〇中國人，在一九二三年有三四、〇〇〇中國人，在一九二四年有三〇、〇〇〇中國人，在一九二五年有二四、〇〇〇人。（註十二）現在荷蘭政府已經在研究關於契約勞動之限制或取締的問題。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曾武裝起輪船遣送中國的苦力，而在一九

二八——二九年在印度連茲的種植地及開礦業上曾發生數起與中國工人武裝衝突的事件。這表現了中國軍隊退伍的兵士及中國的工人完全由於中國革命的結果「而受了損害」。

在澳大利亞在禁止移民以後中國的人數逐漸地減少。在一八八一年有三八、〇〇〇人，而在一九二一年只有一七、〇〇〇人。(註十二)

在美國，中國的人數同樣也減少了。在一八七六年中國人有一一七、〇〇〇，(註十三)而在一九二〇只有六一、六三九個中國人。(註十四)

在一九二四年住居在日本的有一六、九〇二個中國人，而在台灣有三、八三八、六三六個中國人。(註十五)

在馬來聯合國內有四九四、五四八個中國人，在馬來國——不在聯合之內的——有一七三、〇三四人，在斯特連特殖民地有三四八、五九三個中國人。(註十六)在這些國家內事實是這樣，即在最近時期中國的人數超過了土人的人數。

在大不列顛的婆羅洲、在費德吉羣島、在南非洲內的加拉伯羣島等處，計算起來也有幾萬中

在許多國家內與中國移民相聯帶地發生了許多極複雜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問題。在馬來羣島、在印度連茲、在安南等處帝國主義極力引導民族運動來反對中國人。另一方面在印度連茲、在馬來諸國、在安南之反帝國主義的工農聯合如不吸引成千成萬的中國苦力便不能實現。在中國移民的國家內中國的資產階級表現出商業高利貸資本之支持者的作用，因此農民及手工業者的貧乏就被引導來反對牠。而中國資產階級將自己的行會的同業組織，自己的同鄉會轉移到新移居的國家內，並且用這些組織的手段努力維持移民的無產階級份子在自己的影響之下。民族問題在此地帶有特別複雜的性質。

從中國的立場說中國勞動力之輸出及在國外中國移民地之組織却有很大的意義。我們已經指出中國貿易比差之負數正是用中國僑民的匯款來彌補，此種匯款每年爲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華僑資本家一般的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上，特別的在工業發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即如政治力量，華僑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一九二八——二九年在中國進行了抵制日貨的運動，牠並不是在中國有特別的效能，而是在馬來諸國，在暹羅和安南牠給了日本商業以極有力的打擊。從帝國主義的立場說勞動力之輸出於中國有很大的意義。正在破產的中國

農村不僅以勞動力供給中國的工業，而且也以勞動力供給帝國主義在遠東殖民地內的工業、大的種植地、建築業。這不是偶然的，當美國的資本突進拉丁美洲，當美國的資本企圖使中國屈服於自己的時候，在這些關係中就發生出中國苦力之輸出到拉丁美洲的問題。（註十七）

在現時中國和印度是帝國主義最大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這兩個國家是殖民地市場勞動力最大的供給者。約有五六百萬中國人，二百萬印度人在帝國主義各處的殖民地內做契約的工人，做手工業者，做自由勞動者。

由於中國和印度資本主義之發展，這兩個國家將極大數量的工人，投到勞動力的世界市場之上。

註一：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七六二頁。

註二：參看在其資本積累中之各章。

註三：有一個著名的法國地理學家雷克祖在一八七九年時認為在中國國外居住的有三百萬僑民，美國教授維良姆斯

在一八九九年認為他們的人數達到了四百萬（在日本吞併台灣以後），有個著名的中國考察者莫爾哲在一九〇四年斷定他們的人數為七百萬。中國統計學者陳某在一九一九年曾假定：華僑的人數為六、三〇〇、〇〇〇

人，而美國人馬克奈爾在一九二四年時則假定在外國的中國人人口數超過八百萬（Mac Nair, The Chinese Abroad, Shanghai, 1924）。

註四：在英國和在大英帝國的中國僑民的歷史在下列著作中曾敘述過：Seward, Chinese Emigration, New-York, 1881及Campbell, Chinese Coolie Emigration, London, 1923。

註五：這些統計數是為國際農學院的共同研究者亞力山大格夫同志所搜集的。

註六：Report of the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London, 1926.

註七：“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Kingdom Siam.”

註八：“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1.

註九：Mac Nair, The Chinese Abroad, p. 47.

註十：“Annuaire General”, 1928.

註十一：“Census of India” V. X. Burma 1921.

註十二：“Statistical Yearbericht van Nederlandsch India”, 1925.

註十三：“Official Yearbook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25.

註十四：Seward, "Chinese Emigration" p. 6.

註十五："Japan Yearbook" 1928.

註十六："Statesmen Yearbook", 1928.

註十七："China Weekly Review" 13—III 1923.

一三 中國貿易及支付的比差

關於貿易比差之正確設定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文獻中一般地都表現得很弱并且從這些文獻中關於中國貿易比差問題之研究更表現出嚴重的困難。而在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國家之相互關係上貿易比差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像一般的規律一樣可以在經驗上確定，在大多數場合下殖民地國家之貿易比差是積極的。例如印度、錫蘭、暹羅、古巴、海地島、埃及、菲律賓濱就是最好的明證。僅僅中國、波斯、土耳其及阿兒吉爾在多少繼續的時期上却有負的貿易比差。完全明顯的，殖民地國家的貿易比差，像一般規律一樣應當是積極的，因為他們應分要付給帝國主義者

所「善於管理」的債款，要付給輸入的資本上的利息以及資本的利潤甚至額外利潤。如果貿易比差是負的，那麼殖民地的國家就得以貴金屬之輸出或以勞動力之輸出來彌補自己的債務或者得到新的借款而將自己的將來出賣給帝國主義。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其本身就是說，各殖民地國家從帝國主義國家方面白白地得到了顯著的大量商品：這是很少有根據的而且是很可笑的假定。在中國的場合下我們便有全然令人驚異的「謎」，這就是在六十年來中國的貿易比差是負的，金子從國內輸出為極小數，而頗有可觀的和繼續增加不已的大量銀子則輸入到國內，一言以蔽之中國不是輸出，而是輸入貴金屬并且中國的國際的債款完全不曾彌補了貿易比差的負數……

中國貿易比差發展的歷史已十分顯然。十八世紀末葉及十九世紀初葉，中國的貿易比差是正的。歐洲需要中國的茶和絲，而中國并不曾購買了相當限度之內的歐洲的商品。歐洲不得不用銀子付給中國。正是因此歐洲以輸入鴉片的兩次戰爭壓迫了中國。而在鴉片戰爭之後，歐洲用鴉片代替銀子來付給中國甚至中國開始用銀子來償付鴉片。將近從一八三〇年起中國的貿易比差是負的。關於國家對外貿易之統計數字我們祇從一八七一年起才有。如果我們拿一八七一——一九二一年期間商品之輸入與輸出來比較，那麼表現出在這一時期商品之輸入超過商品之輸出為三、二

一九、〇〇〇兩。(自然，銀兩的時價在這一時期改變了并且跟着要計及這些變更)。

就在這一時期金子的出口照海關的正式數字看來約爲八二、〇〇〇、〇〇〇——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兩。而在同時期銀的入口超過出口爲四六一、〇〇〇、〇〇〇兩。如果拿海關的這種純粹的數字來說，那麼就表現出在中國與世界市場之間全部商品的交換，包括對貴金屬的貿易結算起來虧負三、五九八、〇〇〇海關兩。甚至如果抽出外國人從中國匯回本國的款，抽出外國企業及銀行的利潤，這些以商品的形態或以貴金屬的形態實現而輸出，甚至如果計及中國之國際債款約爲二千萬元，那麼便可得出明顯的矛盾現象。就得出，帝國主義給與中國值二、二五〇、〇〇〇兩的商品。而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九二二——一九二八年貿易的總結，那麼這幅圖畫成爲更加混亂。照國際聯盟經濟部的統計數字看來在這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的比差有如下的形式：(註二)

中國的貿易比差(以千兩爲單位)

	輸 入	輸 出	比 差	輸出 輸入
一九一三	六六、九六八	五二、五四四	一〇一、三三三	六八·〇%
一九二〇	九六、五五七	六四、八二六	一五五、七六四	六八·五%

一九二一	1,018, 140	702, 380	310, 840	六八・七
一九二二	1,080, 288	696, 693	338, 937	六七・六
一九二五	1,018, 208	755, 878	331, 249	七七・四
一九二四	7, 080, 381	807, 068	268, 158	七五・四
一九二五	1,018, 288	790, 241	338, 005	七七・二
一九二六	1,018, 288	599, 118	305, 533	七四・六
一九二七	1,077, 288	928, 978	128, 267	八五・五
一九二八	(1, 180, 700)	(840, 288)	326, 000	七六・九

對外貿易的指數

價格指數	1918	1919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入	100	170	165	147	151	164	153	151	165	169
出	100	118	126	134	140	—	149	154	168	168

一、輸入之最高指揮權主要的是操在大的外國商號手裏。自然，這些商號爲自己取去了商業利潤之大部份。而此種利潤是從中國購買者身上剝削去的。

二、運輸主要是由外國的輪船轉載，運輸的利潤都落到外國輪船公司的荷包裏面。

三、在運輸的時候需要商品及船隻的保險。這些用費最後當然由中國購買者負擔。

四、對外貿易的活動是以價額的活動爲前提，而此種價額的活動則主要的是爲外國銀行所完成，正如在對外貿易方面大多數銀行的作用一樣。而銀行可以從中國的消費者獲得穩妥的利潤。

五、主要的和最大的儲蓄都屬於外國人。商品保險的費用也同樣落到他們的荷包裏。

六、在輸入方面也完成那樣的活動，也獲得那樣的費用，而只有一點差別，即是從生產所獲得的商品價格中還須抽出船隻在港埠停留的費用以及商品被發送去的國家內所征收的稅。在經驗上可以斷定，在「平常的」時期內這些費用約爲商品全價格之五——八%。英帝國主義相當重要的地位之一就在於在世界市場上所得到的銀行的利潤、商品保險及運輸上的利潤大部份都屬諸英國的資本。如果在航業方面英國的比重繼續減低，那麼在世界貿易的財政化方面和保險方面，英國的地位便十分穩固。單單在保險方面英國一年平均獲得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純利。

然而所有這些總合起來就是說中國的貿易比差其負差比表現於官場的統計數字爲大。此外還必須加上武器和鴉片等違禁品的輸入。很明顯，一般違禁品的輸入，特別是與西藏和蒙古的貿易并不會彌補此種虧負。甚至還可以說，中國資本家依其在馬來羣島、暹羅、安南等地的投資所獲得的某一定的利潤在基本上也不會彌補了這虧負。

中國拿什麼來彌補其貿易比差的負數呢？

我們以爲雷米爾 (Remer) 以華僑的匯款來解決這一問題是完全正確。據完全不正確的和不可靠的統計數字來說，這些匯款在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二一年這個時期爲二、〇五四、〇〇〇兩 (註二) 并且據海關的估計在最近幾年平均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兩。

爲了要指出正確的接近於貿易及支付比差問題之解決，我們以爲必須計及以下的因素。

一、貴金屬的過額的輸入，而在中國特別是銀的輸入，不僅爲商品之輸入與輸出間相互關係所形成，而且牠表明貴金屬本身輸入與輸出之間的相互關係不依賴於牠們的商品貿易。(註三)

二、其次更須理會到下面馬克思的註釋：

「輸入之超過輸出與輸出之超過輸入一般地以各中央銀行的金屬儲量之增減來測量。在何種

階段上此種度量是正確的，當然首先要依賴於銀行業一般地集中如何。因為要依賴於積極在所謂國家銀行中的貴金屬如何表現出國家金屬總儲量。但即使就是這樣，上述的度量也不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在某些條件下附加的輸入乃為國內流通的需要和用金銀製造奢侈品之增長所引起，此外因為沒有附加的輸入金子也能夠被國內流通從銀行中抽出去，其次，金屬儲量就是輸出一時不增加也可被減少下去。」（註四）

但正是從馬克思的此種註釋中成為完全明顯的，就是中國支付比差之確定為不可能，因為在中國銀行業不會集中，因為在中國確定在國內流通中之銀的數量完全不可能，因為在中國除海關的管理外一般說來是不可以確定銀的輸入與輸出之多少的。

三、每個國家之金屬的基金就是用為國際支付的儲蓄基金，或世界貨幣的儲蓄基金，是用為以時機為轉移的擴大和緊縮時期的國內金屬流通的儲蓄基金及用以償付存款及兌換鈔票的儲蓄基金。但在中國無論是國內金屬貨幣的流通，或銀行鈔票和紙幣的數量都是不適於任何計算的。

四、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之輸出在貿易比差上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如果資本以生產工具及運輸工具的形態而被輸出，那麼此種輸入就當作貿易比差，但在這種場合內輸出的國家除從這些生

產工具或運輸工具的收益中取得一年的收入以外便不能希望有任何別的補償了。

五、如果以貨幣形態被輸出的資本作為行政的、軍事的及其他的借款，那麼輸出的國家祇獲得這些資本上的利息并依據借款的條件將這些資本逐漸歸還。

六、在中國貴金屬之輸入乃完成於銀的形態。如果銀對金的關係其價值減低，那麼中國的支付比差甚至在決定支付比差的一切因素仍舊不變的場合之下都要忍受嚴酷的變化。

七、我們以為正確地組成支付比差應計及下面的因素：商品之輸入與輸出，違禁品、貴金屬之輸入與輸出，某些國家之有價紙幣和債券之輸入與輸出，其他國家之有價紙幣和債券之輸入與輸出，匯票和期票之輸入與輸出，用於彌補政府、市區及私人商號的債務的資本之輸入與輸出，外國人所從事的不動產之買賣、借款的利息，外國人從外國獲得的和償付的紅利，航行的運費，鐵道運輸方面的費用及郵電用費之比差，在稅款及船業運輸費方面之用費和收入，在保險方面之委託、用費及收入，僑民和旅行者之金錢的輸入與輸出，外交的及其他代表們的用費和收入，在外國轉移的年金及從國外獲得的年金。雷米爾企圖訂出中國的支付比差，在那裏他不能計及所有這些因素。他根據他的計算得出結論，即是在一八七一一八四年時期支付比差是正的，為二

四、〇〇〇、〇〇〇海關兩，在一八八五——一九八年時期支付比差是負的，爲四三、〇〇〇、〇〇〇海關兩，而在一八九九——一九一三年時期支付比差是負的，爲九〇、〇〇〇、〇〇〇海關兩，而在一九一四——二一年時期支付比差之負數爲二四九、〇〇〇、〇〇〇海關兩。這就可得出，照雷米爾的計算在一八七一——一九二一年時期支付比差的負數爲三五八、〇〇〇、〇〇〇海關兩。（註五）

雷米爾的計算當然有十分的，但是十分可疑的價值。在我們看來他異常地減少了私人公司所輸入的資本。但如果假定，這些計算是可靠的，那麼便表現出帝國主義在三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兩上獲得了中國一切重要的經濟的最高指揮權及有權得到在中國重要企業方面的利潤。

殖民地的中國在三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兩上出賣了自己的將來。

註一：Société Des Nations: *Memorandum Sur Les Balances Des Paiemens et Sur Les Balances du Commerce* Extérieur, Genève, 1928.

註二：雷米爾：“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p. 221.

註三：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二篇，p. 106.

註四：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二篇，p. 106.

註五：雷米爾：『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p. 222—225.

第九章 城市與鄉村

城市與鄉村分離是由於商品交換的勞動分工發展之第一個巨大的結果并且同時是向前發展的勞動分工之最大的因素。在城市與鄉村之經濟分離的基礎上發生了城市與鄉村間極大的矛盾，在各種社會形式之下帶有完全不同的性質。但是社會的全部經濟史根本上是在城市與鄉村間矛盾運動中撮要出來的。

在與資本主義社會立於相反地位的古代社會內，在勞動分工方面「使用價值的觀點佔着統治，如像柏拉圖，他在勞動分工內看出社會分裂為幾個階層的基礎……」。(註一)但勞動分工對於柏拉圖不僅是「國家建立之基本原則」，牠對於柏拉圖不僅表現出「埃及閹割制之雅典的理想化」，并且也為城市之自然的基礎（「城市在希臘看來就是和國家一樣」）。(註二)在古代世界城市就是國家，城市無條件地統治鄉村自然不是一般的城市，而是佔有奴隸的城市。例如在阿芬全盛時代自由民的人數（包括婦女及兒童）在城市內有九萬人；奴隸和奴婢總計有三六五、〇〇〇人，而異

族的人和已解放的奴隸有四萬五千人。（註三）而在波斯戰爭的時候，在哥林多總計有四六〇、〇〇〇奴隸，而在埃田園則有四七〇、〇〇〇奴隸，就中每個自由的居民都有十個奴隸。（註四）奴隸佔有的城市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統治着鄉村。例如雅典國內在梭羅（Solon）雅典的立法者——譯者註）的改革以後自由的農民形式上佔統治。而城市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優越和領導則是無可爭論的。後來情形就改變了。「在羅馬帝國最後時期之內城市失去了牠在鄉村上的統治并且不能征服鄉村回復到日耳曼統治的第一時期」。（註五）

城市與鄉村間的關係在封建社會中有極深刻的變動。「如果在中世紀鄉村在政治上到處都剝奪城市，在那些地方封建制度並不為城市之例外的發展所破壞，如在意大利一樣，那麼城市到處而且無例外地在經濟上——用牠的壟斷價格，用牠的賦稅制度，用牠的行會制度，用牠直接的商人的欺騙及其高利貸來剝奪鄉村。」（註六）

由於生產關係改變了，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社會形式變為建立在一方面鄉村中領主和農奴，另一方面城市中行會老板和學徒的關係上的社會形式；由於這種情形城市與鄉村間的關係也就改變了。在封建制度下鄉村在政治上剝奪城市，而城市則在經濟上剝奪鄉村。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城市與鄉村之間重新創造了另外一些關係。在資本主義下，城市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剝削農村完全不依賴於同一城市所具有的性質。商業和手工業的城市統治着鄉村。

中國的城市在中國歷史上之發生及發展像一般東方的城市一樣。關於東方城市組織的問題佛蘭孫維爾奈給了極明確的評斷。維爾奈在其著作中（註七）說到印度的城市且尼和亞加拉，並且他考察了牠們的特徵就在於「統治者是國家全部土地之唯一的私有者」。「這些城市——就其範圍而言并不比巴黎小——實際上不是別的，而是軍事的堡壘，牠比廣佈在田野間的堡壘建築得更好更便利。」這便是殷周朝代統治時候的中國城市。中國城市的性質和社會經濟的作用無論怎樣改變，那種情形仍舊是牠們的特點，即城市仍舊是地租之獲得者居住的地方。在中國歷史上那個時期——即當國家是土地之最高無上的私有者從農民身上徵收租稅的時候，以及在那個時期——即當發生了封建化的過程有時甚至地租的最大部份爲地主所徵取的時候，城市獲得了地租和租稅。在商業高利貸資本破壞了地主和農民的時候，城市的政權，影響和力量還是壓迫了鄉村。中國的城市在中國歷史上一切嚴重的時期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剝奪了鄉村。地租、租稅、高利貸利息及商業利潤主要的是流入於城市，不言而喻的，這不是抹殺，恰恰相反而是假定中國社會的一切階

級和階層——牠們的收入就是從鄉村中榨取地租、租稅、利潤或商業利潤，——在鄉村中有牠們的觸鬚和代表者。由於交換關係之深入，城市統治鄉村也就增長了。當其外國資本侵入中國開始了的時候，當其大工業開始奪去了鄉村方面工業作用的時候，城市方面之剝削鄉村就更加強了。由於國內資本主義之發展，城市也隨着發展了。香港、上海、大連、哈爾濱，奉天、唐山、南迪州、無錫、濟南、樊城、蚌埠我們眼看到發展爲巨大的城市中心，同時如像其他城市如北京、西安府、蘭州、開封、撫順鎮就衰落下去而且失去了牠的意義。城市中心之配置其變更完全與各個城市在國家之經濟和政治生活中之相對的意義之變更相適應。在中國這些過程是在帝國主義的強迫之下發生的。外國資本在國內爲自己商業的，生產的和政治的需要創立了商埠和租界的網。外國資本決定了鐵路建築的方向。外國資本規定了在何處建立海港和商埠，因爲在牠的手中握有海關的收入，這些收入的一部份用之於建設的目的。在外國資本的強迫之下代替了主要的商路并破壞了舊的馬路。外國資本以其鐵路的建築更加確定了新殖民地化的趨勢。要是外國資本在國內創造了工業，則工業中心之配置也就在牠的影響之下發生了。於是就發生了外國租界和通商口岸以最快的速度而增長。於是就發生了在經濟上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城市成爲帝國主義勢力的中心和買

辦資產階級集聚的地方。

但同時中國的城市的性質也改變了，或更正確些說這些城市化分了。從前城市爲行政中心，如堅固的城堡——地主的宮城所圍繞的商業的中心並且在交換內只給農村以行會手工業的少數生產品。工業的城市并不多。景德鎮是磁器製造所的中心，陶器的製造集中宜興、蒸發業集中在紹興，在二三個山西的城市中有舊式的製造所並且在簡舊有錫的改造。此外，一些臨海和傍河的港口，行政的中心及商業道路決定了城市之發生與發展。外國資本之侵入和一般的資本主義之發展而特別是大工業之發展改變了情況。城市更其以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之敏捷的方法來剝削鄉村。有些城市，牠們自己就是大多數占買人的大商店。盛京城之發展是因爲在牠周圍的鄉村以絲、編織物、蓆、絲線、格子布（註八）供給占買人和零買者。徽州、天津、蕪湖、無錫、南京、汕頭等處部份地也發展成爲家庭工業的中心。有許多城市發生成爲與蒙古牧畜業貿易的中心。阜城在幾年之內發展到有五萬三千人口，有六十五個製油所、及十四個製造皮衣的工場。（註九）包頭鎮在這方面也是最好的一個例證。鐵路和與內蒙古貿易給牠的發展以推動。在一九二二年，當鐵路建築完成的時候，這個城市有六七萬居民，而在一九二六年時城市人口總計已有十五萬人。在這

種情形之下城市保持牠的優越的貿易的性質。(註十)在石家莊城內在一九一四年總計有二百戶；京漢路給了衰落的鄉村之發展以推動，在一九二六年石家莊已經有四萬居民，津浦路和運河發生出的新的城市蚌埠有八萬人口。然而不僅發生了商業的或商業佔優勢的城市。在煤業附近發生了一個城市——唐山有煉化廠、有瓦斯工廠、有電站、有鐵路的停車場、有車輛的工廠、製出可以通行的有七百輛車，並且有四萬四千居民，其中大多數居民都是工人。(註十二)唐山的存在引起了有五千居民在秦皇島海港內生活。萍鄉和大冶也像無錫一樣成爲工業的城市。無錫事實上是被當作上海的郊外一樣發生和發展起來的。上海建築部份上的瘋狂般的高價，——在城市的某些部份已達到倫敦西吉的價格，——引起了紡織工廠和絲織廠開始設立在無錫；在現時在無錫僅僅在這些工廠中工作的已有五萬以上的工人。城市以極迅速的速度發展起來。南通州發展比無錫還要更快。上海的紡織工業就使牠實現了。南通州亨特南村是主要的產棉區之一，以原料供給上海的工廠。在二十年之內南通州從睡夢的縣城中發展成爲商業的和一部份工業的中心有人口一百萬。中國最大資本家之一——張謇在南通州創辦了許多工業的企業。在無錫、萍鄉、唐山、大冶等地的工業在城市生活內較之上海或漢口起着相當大的推動的作用，這些城市——將來國家的最大的工

業中心——也起着很大的商業中心的作用。

甚至在大工業集中的城市內除工業外手工業也起着巨大的作用。很明顯的例就是上海。一般的都認爲上海工人人數在工業企業中做工的達到二五〇至二九〇、〇〇〇人。（註十二）但在手工業生產內有四萬五千人做裁縫、二萬四千人做理髮匠、三萬四千人做鞋匠、一萬人做鐵匠和銅匠、七萬人做木匠、一萬五千人做漆匠，一萬零七百人做毛刷以及二千人製造醬油，即是說總共有二十一萬一千人。（註十三）如果在這裏再加上金銀匠，磁器工人和陶器手工業的工人、麵包師等等，那麼手工業工人的人數確實達到了三十萬人。但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如果舉濟南爲例，那麼景況便完全是另一樣。在九個磨粉廠內做工的有一千人，在兩個火柴工廠內有一千五百人，在紡織工廠內有三千人，在製造毛綢的作坊內有三千人，在製糖、製紙、製肥皂、製皮以及紡織等等作坊和工廠內有一萬多工人。在多少大生產內有一萬八千五百工人。而挑擔夫總計有一萬人，拉車的苦力有五千人，店員有三萬人，家庭僕役和苦力有七萬人，即是說總共有十一萬五千人。（註十四）在較落後的城市內，挑夫、拉車的苦力、運水夫及清道夫總計有成千成萬的人。

一般說來中國城市可以分爲四類，一、舊式的中國城市，主要的牠們還起着行政中心，地主

住在地，對於手工業集中區域和地方的市場以及商業中心的作用。牠們形成了一定的城區或正確些說一定的區域形成了牠們。城市，如像蜘蛛一樣，吸取本區域之經濟生活的汁。不言而喻的，甚至這些城市忍受着變化，並且牠們和附近鄉村的聯系成爲更強有力。就數量而言這些城市是最大的範疇。二、商業城市，牠們由於運輸和對外貿易的發展而擁有極大區域或全省的貿易。蘇湖、九江、岳州、汕頭、蚌埠等是此範疇的標本的城市。三、工商業城市，牠們是工業活動的中心，但同時又是對外和對內貿易之重要的中心。上海、漢口、天津、大連、杭州則屬於這些範疇，就中自然應指出上海的特殊作用，牠佔國家全部對外貿易的四〇%和全部輕工業的二分之一。四、純粹的工業城市，如唐山、萍鄉、撫順。

不言而喻的，各個城市發展得異常地不平衡而且牠們的相對的作用也改變了。舊時的城市破壞了或者改變了牠的性質。高貴的建築擴大了城市經濟和政治影響的區域和範圍。最近幾年在此種關係上是特別的顯著。在許多地方爲城市發展之障礙的城牆都被毀壞了。如東方式的和中世紀式的狹隘的街道被擴大了，牠們已經不能限制城市以內的變動。但更重要的是：在最近三十年間在城市內生長了新的階級——近代的工業無產階級。牠生長於佔國家經濟生活最高指揮權的最大

的工業和商業中心。如果爲帝國主義的專政所引起的城市和工業主要的是在帝國主義的勢力中心發展起來，那麼帝國主義和工業的發展在那些地方也就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如果中國歷史上偉大的農民暴動，甚至在農民革命的打擊破壞了東方專制的政權的時候都是豫定要失敗的，如果在過去甚至在農民暴動勝利以後還能夠重新在被破碎了的農村上增設起東方專制之可厭的制度，那麼在現時在中國城市內農民已經有牠的同盟者和領導者——近代中國的無產階級。

註一：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三四五頁。

註二：同上，三四六頁。

註三：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之起源，一四三頁。（英文版）

註四：恩格斯，反杜林論一四九頁。

註五：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之起源一八七頁。

註六：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二篇三三七頁。

註七：Francis Vernier, Voyages Contenant la Description des Etats du Grand Mogue.

註八：'China Eoons, Journal', 1928, 87—88頁。

註九：China Exoms, Bulletin 第八卷二六五期，一五一頁。

註十：遠東評論第六期，一九二八，二六五頁。

註十一：China Econ. Journal, 第十期，一九二七，八八四頁。

註十二：Tyler Farm and Factory in China 五二頁。

註十三：農商部公報一三一期。

註十四：China Econ. Bulletin 一〇七期，一九二五年。

*

*

*

*

在中國城市與鄉村間的交換是經過十分複雜的商品運送的網而發生的，在這些網內還可以看出中世紀的殘餘。

鄉村的店舖是商品運送的網之下層的鏈環。在這些店舖內不是每天也不是整天的做生意。商品流轉的速度不會使這個成爲必要。在鄉村的店舖內出賣鹽、菜油、棉線、火柴、紙煙、醋、煙草、火油、供燭、紙錢、爆竹，有時出賣紡織物等等。農業工具通常在縣城內可以買得到。商品的名目不多。城市循着不平等的交換給鄉村以相對小的各種商品。在山東每一個鄉村都有牠的店

舖，但這不是在全省都如此。在許多地方一個店舖供給四五個鄉村，而店主推着自己的小車挨次週行於「他的」鄉村。（註一）除賣是很普遍的。在這種場合內價格比一般來得高。納稅都在收獲之後，特別是在專門種植的區域內，不是用貨幣，而是常常用自然物的形式納稅。鄉村的店主幾乎常常又是高利貸者；而借貸是一種緊縛農民於鄉村店舖不僅做一個購買者，而且做一個農業生產品的出賣者的方法。在棉花、茶、繭、甘蔗、煙草，以及類似的專門商業的種植方面此種契約起着特別大的作用。鄉村的小店舖常常執行着貸金者和倉庫的作用。農民將棉花抵押在店主方面，他獲得墊款希望將自己的商品送到城市去。然而主要的商品常常是來自鄉村店舖之外的。貧農在收獲前從地主和富農那裏借米而以收獲後的生產物償還。在租佃佔優勢的區域內主要的商品的剩餘都流到地主家裏。在農民私有財產佔優勢的區域內，富農聚集着商品的剩餘。富農同樣是商人。在滿州里和廣東可以常常遇到這樣的現象；沒有根據假定在別的省份內是另一樣的。商業和農業的結合，特別是商業和高利貸的結合是中國農村的特點。祇要讀過皇家農業委員會的報告就會相信在印度的情形也不曾有例外。然而不僅鄉村的店主，地主和富農實現城市與鄉村間之商業的聯系。城市的商業資本也常常將其觸鬚突入鄉村，創立自己的製造的機關，以避免鄉村商業資

本的伴介作用。此種聯系經過旅行團的代理人而實現。這些代理人一身具有苦力和旅行商的機能。他們推着自己的小車子或簡單地拿着自己的籃子掛在竹桿上遍歷各鄉村。他們絕不是常常以貨幣償付出賣農產品的農民。他們提出少數城市的商品并且拿來和農業生產品交換。甚至在這方面有顯著的專門化。在蕪湖做絨毛生易的大商號旅行代理人他們僅僅搜集絨毛。蓄積主要是由於交換而發生。我們須指出利潤是極有差別的。(註二)產棉區的棉花和拿到城市市場上的大部份雞蛋都被搜集了攏來。現在已經有部份地經過運河而來的蠶繭商。在那些爲和蒙古交換而供給生產品的部門內旅行代辦起着特別大的作用，雖然在這些方面，例如在做絨毛生易方面沿商業道路一帶的客棧、飯館、小旅店也有很大的意義。大商人預先就規定價格并且和飯館、旅店主人或和旅行代辦訂約，給他商品價格之二〇——六〇%做押金。代辦人普通獲得百分之二。(註三)有時手工業者甚至手工業的學徒起着旅行商的作用。旅行代辦人也搜集農民家庭工業的製造品。這些代辦人通常一週轉中獲得二——三%。在鄉村中他們當然努力以各種方法獲得附加的收入。但在道路難行和盜匪出沒的場合這些旅行代辦的生活便不怎樣容易了。在當時這種貿易的方法使城市商人有可能利用於已有利的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異。

在任何國家內交換關係愈發達，則市場亦愈少意義。市場是——如果不是指特定的市場而言，——落後的交換關係之標誌。在中國牠們尚有很大的作用。不僅每個城市，就是每個農村都有其調劑的市場，而很著名的市場吸引距離很遠的其他城市中的商人。各個城市的名稱反映出在某一城市內市場一星期或一月有幾次。（註四）市場的組織和分配聯接着鄰近的鄉村，如果在鄉村之間發生爭執，那麼他們就以壓迫的方法禁止其他鄉村到自己的市場來。市場也同樣專門化了。例如在山西人們就知道有四個不同的市場。有專門買賣牲畜的市場，有買賣紡織物的市場，最後，更大的市場就是買賣舊東西的市場。（註五）這些市場和民家的節日，演戲等等相聯系。牠們是地方政府、僧院、地方的神廟從來到市場上的商人和農民強徵各種稅之最便利的場合。

在農村與城市間的貿易內捐客的生涯，即職業委託的代辦人之仲介的作用在中國有很大的意義。如果不計及行會制度，分工及一切和各種機能之區別在國內植了何等深的根，如果不計及從前社會形態的趨向使手工業及社會內一般機能的區別成了永續的，如果不計及在從前社會形態之下閱閱和行會是在以調劑動植物分爲各種形式的自然過程的影響之下發生的，（註六）那麼這些仲介人的發生直然是不可思議的。在福州貿易要是沒有捐客做仲介人大抵是不可能的。（註七）如果

在南昌農民要賣豬，那麼他就不得不依賴十六七個捐客中之一個，這些捐客便是農民與屠戶間的仲介人。這些捐客都得到政府的特許，爲的是在他們之間不致引起競爭，禁止他提高價格。（註

八）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不能直接賣給屠戶，而屠戶要是沒有捐客也無法向農民購買。在順昌竹子生易和肉生易其組織如下：商人經過捐客拿押金向木材主人預定，而捐客則從商人得到委託的八——九%及從賣主得到八——九%在他使他們「相識」的時候。（註九）一般的慣例，捐客從賣主及購買者得到委託。在南京木材生易如在南昌一樣在同一基礎上組織起來，只有一點差別，就是捐客在此地從兩方面（買者和賣者）得到三%。（註十）以前對於做蠶繭生易會有一定的交易位置的規定甚至經過捐客得到二——八%就發生貿易。而蕪湖的中國穀物交易所，——在那裏穀米買賣達八、〇〇〇、〇〇〇——一〇、〇〇〇、〇〇〇袋，在那裏廣州的、潮州的、烟台的、寧波的商號代表就是購買者，——全部貿易都被壟斷在三十個批發者手中并且買或賣祇有經過他們。（註十一）在寧波做魚生易也要經過捐客。漁夫甚至大企業家只有經過他們才能和魚商訂約。（註十二）仲介制度的採行達到這樣的情況，即在城市附近委託代辦人向農民購買家庭紡織的棉布并經過捐客將紡織物賣給商人。（註十三）茶當其從生產者達到輸出者時須經過一〇——一四個人的手。這些例

子可以無限制的列舉出來。

商業組合出現於城市市場乃是一般的慣例。我們已經說過行會和商業組合爲了免除自己在社會間的競爭還要常常調劑價格。美國教授貝爾蓋斯在一九二九年斷定北平（以前的北京）的一二八個組合中有六十個是商人的，十個組合（五個是手工業的，三個是商人的，兩個是聯合的自由職業）調劑價格，而十個組合（九個手工業的和一個商人的）則調劑工資。（註十四）但他又附帶說：「不言而喻的，習慣在商社社員中有的比重比嚴格的規矩爲大，而且在所有商社內實質上都有權處理價格和工資」。（註十五）在更落後的城市內商社在價格上之管理比在北平還要大。一般說來，商業組合不僅比手工業的更強有力，不僅使後者屈服於自己，而且在當時商業組合之解體還比手工業組合爲小。以前屬於一組合的店舖都在一條街上，並且到現時在北平和其他城市內還可看到整條街道有同一類的店舖。但在這種關係上分解已開始了。中國街道的名稱還反映出此種舊時的習慣而且常常碰到一些街道，其名稱指示出在那裏會有過何種同業組合。但是又常常遇到這樣的現象，就是在米商的街上連一個米商都沒有。此地發展是自然而然的。在這個或那個城市內商業組合中何種有最大的比重，這全賴區域的特殊性如何爲斷。在南方米商及絲茶商人的同業組合有極

大的勢力。如果因輸入商品的路線及大工業的製造品，商人的同業組合迅速地瓦解了。如果在紡織物貿易方面牠們更難維持——因為日本的競爭破壞了牠們的基礎——價格的調劑，那麼在某些輸出貿易方面牠們還是很強有力的。這就是茶商和絲商的同業組合。就全中國而言鹽商特別有力而且有勢。

在此種關係上還應說到各省的俱樂部（同鄉會）或各省的會館。大都表示牠們是住在別省中之某一省同鄉的親愛的聯合。在北平有廣東會館、四川會館等等，在上海有廣東會館、寧波會館、湖北會館、湖南會館等等。這些組織是以慈善的機能來援助同鄉人。我們以為毫無疑義的就是這些省區會館首先是商業資本的組織。在一八九〇——一九〇〇年牠們執行了保護這一省在別省的商業資本的利益的機能。下面就是海關監督如何評斷在浙江的雲、貴會館：

「這兩個會館是這兩省中有產階級和商人的代表設立起來的。」（註十六）

關於在南京的各省會館有如下的說明：

「這些俱樂部的會員當然是從商業階級而來的。」（註十七）

而關於山西的各省俱樂部則認為：

「在山西這些會館的發生特別是由商人方面發起的。」

無足奇怪的，在太平天國暴動的時期內祇要是在暴動者佔領了的城市的地方，如在蘇州（註十九）或南京，這些會館的房屋全部被破壞了，正如在景德鎮皇家磁器廠和在南京絲織廠之破壞一樣。各省間的商品交換似乎在某些專門的種植內有如此的發展，即各區的商業資本組織了起來并在其他省區反對地方同業組合的傾軋。不是無益的，指出省區的同業組合不許自己的會員直接向地方政府起訴，（註二十）并且牠規定價格，折算的條件等等。（註二十一）很顯然的由於各省間商品交換開展了，這些組合的機能也隨着改變了，雖然牠們還起着一些作用。

然而最近時期這些會館內的領導轉到了學生官僚的手中，并且牠們從商業組合更加變為同鄉會。

城市市場以及在某些地方的交易所仍舊是貿易方面之重要的因素。蕪湖的米行甚至在隣省尚可左右米的價格。除去那些傳統的交易所外，在上海不僅有錢莊，而且還有買賣棉紗的交易所和買賣紡織物的拍賣場。

然而若以為在中國商品運輸的網和國外市場之間的結合還是要經過買辦而實現那就錯了。我

們在別的地方已經說過，買辦在其本身發展上也遭受了各種的變化。牠是鴉片戰爭前在廣州十三個商人的壟斷組織。在第二個時期牠變為在各個外國商號內從事買辦代理人的機能。二十世紀初期外國商號的數目在中國迅速地增加起來。特別是日本的商號。日本的商號和工廠已開始創立其商品輸送的網并且和中國商號發生關係而無須買辦的仲介作用。（註二十二）關於語言，市場之地方條件的認識，中國商號之信用能力等問題已失其尖銳性。許許多多的中國人都學會了外國語言，而許多外國人也學會了中國語言。外國的商號已經很知道中國的大商號及其信用能力。舊式的和現代的中國銀行持有對中國商人保證信用的機能。對外貿易及一般的批發生易在舊式的及現代的中國銀行管理之下更加衰落了，如果事實是涉及商品運輸網之中國的部份的話。如果在銀行事業的領域內買辦的作用在外國銀行與中國銀行間的關係上增大了，那麼牠在貿易方面就大大地喪失了先前的影響和勢力。許多買辦自己成為大商人并且利用他的經驗不僅具有對中國市場而且具有對世界市場之真實的知識，他們和英日美等國內的大商號發生直接的關係。在滿州里或上海的中國大商號常常有牠的代理人在日本。一言以蔽之，國外市場和中國市場間之聯系已經不僅為個別買辦所實現，而且也為整個階層的買辦資產階級所實現。在此種關係上新的通商條約起着很大的

作用。如果在此時以前對外貿易的主要場所是在開放的口岸和租界上，如果在此時以前外國商號沒有形式上的權利在對外貿易還不會開放的其他城市內開設牠的支店，那麼根據新條約外國人有權在中國隨便一個區域，隨便一個城市內開設牠的支店了。不言而喻的，一方面對於外國資本之更確實的和廣泛的侵入，另一方面對於中國和外國資產階級間更緊密的和直接的聯系之結縛產生出一種可能性。如果在此時以前帝國主義只有五十處租界和開放的口岸，那麼現在整個國家都在牠們前面開放了。新的通商條約主要的意思就在這裏，而不是在關稅自主之形式上的承認，也不是在許多商品稅收之增高。如果注意到中國的稅在其增加以後超過了暹羅印度連茲和埃及（商品價值的三——八%）的稅，但並不會達到印度（一六——二五%）或土耳其（二〇%）或埃及（一五%）的稅的水平線。

我們此地并不停留於那些決定城市與鄉村間關係的全部重要問題之上，如像關於納稅的問題，關於價格構成的問題，關於一般價格增加的問題，關於貨幣購買力降低的問題等等。很明顯的就是同時如像在中國的重要城市內價格的構成和世界的價格是平行發生的，並且在上海、天津、廣州價格指數之變動大抵與紐約或倫敦指數的變動不相上下，而鄉村的價格則有其自己

的規律。城市與鄉村價格間之巨大的剪刀的差支，鄉村市場上在一年各時期內價格之巨大的跳動已經充分地說明了中國國內市場之特點。研究了中國商品運輸的機關，商業資本的組織之各個鏈環以後，我們主要的企圖在說明這種場合，即中國的鄉村在其與城市的相互關係上在現時還忍受兩重規律之壟斷的組織，即：忍受着資本主義前期社會形式所固有的中世紀行會壟斷之殘餘及忍受着資本主義發展內帝國主義階段所固有的壟斷。

壟斷的財政資本藉助於被組織在同業組合中的商業資本來掠奪國家。

註一：A. H.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New-York, 1899, p. 49.

註二："China Econ. Bulletin", 259號、1926, p. 69.

註三："China Econ. Monthly" 1924, p. 13.

註四：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p. 148.

註五："China Econ. Bulletin" 八八期，一九二五。

註六：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p. 317.

註七："China Econ. Journal" 十一期、1927, p. 944.

註八：“China Econ. Bulletin”第九卷，三〇五期，p. 37A.

註九：同上，第八卷，一一期，p. 131.

註十：同上，第八卷，二五六期，p. 28.

註十一：同上，第八卷，二五六期，p. 26.

註十二：“China Econ. Journal”第九期，1927，p. 788.

註十三：“China Econ. Bulletin”一四〇期，一九二五。

註十四：“China Weekly Review”一三期，p. 520.

註十五：同上，第一期，一九二九，p. 20.

註十六：“Decennial Reports of the Maritime Customs”第一卷，一八九九—一九〇一，p. 176.

註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均同上，p. 559, 558, 127, 525.

註二十二：雷米爾，中國的國外貿易，p. 130—133.

*

*

*

*

我們還要簡括地說一說運輸的問題，牠將城市和鄉村，中國和世界市場聯系起來。在這方面

我們看到了最粗笨的、落後的運輸工具和最新式的運輸工具在一起。人們會看到，在中國南部極大的領域內苦力還是主要的運輸工具。成千百萬的苦力在自己背上背着行李和旅客。在有河流的地方、獨木船、舢板、渡船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中國北部和西部推小車的苦力也起着同樣大的作用。在這些區域內馱載的牲畜在某些限度內代替了用做牲畜的人。在城市內的運輸僅僅在最近步的城市中除人力車外有電車、汽車的運轉。在落後的城市內還有轎子并且甚至人力車都是一種進步。在城市與鄉村間的交通用馬運輸在滿州里，至少在中國北部有很大的意義。用爲轉運工具的人常常排擠其賤價的牲畜。但是在中國南部苦力背上負一噸重的貨物行一個啓羅米突的道路值〇・一〇——〇・二〇——〇・二五馬克。在中國中部苦力背上負一噸重的貨物行一個啓羅米突的道路值〇・一五——〇・二〇馬克，而載重的牲畜則值〇・二五——〇・三〇馬克。（註二）用小船、渡船、舢板的水路運輸是舊式運輸中最廉價的。不管輪船之殘忍的競爭，成千成萬的人（即使不是幾百萬人）還是從事於運輸工業的這一部門。在水路運輸的主要的動脈上特別是在揚子江上此種運輸工具已經是起着完全屈服的作用并且僅僅作爲大輪船補助之用。但是在極小的河流上牠佔貨物運輸的絕大部份。在沿海一帶渡船和舢

板作為沿岸航行的某些部門之用并且差不多完全作為中國的捕魚之用。有私有運輸工具的獨立的船夫更加變為企業者，他將幾十隻幾百隻小船，渡船及舢板合併在他的手中。

鐵道和海洋的以及河流的航行佔近代運輸工具中最重要的位置。

評定這幾種運輸的發展我們引用下面的數字：（註二）

年 代	鐵路網的長 (以啓羅米突為單位)	來往船隻的噸數 (以千噸為單位)	來往船隻之中國船隻的 噸數(以千噸為單位)
一九〇〇	四七〇	四〇、八〇七	七、八六四
一九〇一	一、二三六	四八、四一七	六、四三五
一九〇二	一、五一六	五三、九九〇	九、三四一
一九〇三	一、八九二	五七、二九〇	九、九一一
一九〇四	一、九七六	六三、七七二	一四、七六八
一九〇五	三、六一六	七二、七五六	一六、四〇七
一九〇六	五、九五三	七五、八二〇	一六、一八六
一九〇七	六、六九八	八〇、一〇九	一六、六八七
			一六、九四六

一九〇八 八、〇四二 八六、七七二 一七 八六一

一九〇九 八、五二四 八八、七七七 一九、五九八

一九一〇 八、七二四 八五、九三〇 二四、九五七

一九一一 九、八五四 八七、五六三 二四、一五九

一九一二 九、八五四 九三、三三五 二三、三九七

一九一三 九、九八二 九七、九八四 二四、〇二三

一九一四 | | 九〇、六六三 二一、七八三

一九一五 | | 九〇、六六三 二四、一五九

一九一六 | | 八八、〇二〇 二三、三九八

一九一七 一一、〇〇四 八六、九〇七 二四、〇二三

一九一八 一〇、九一八 八〇、二四八 二一、七八三

一九一九 | | 九五、七二六 二七、〇八九

一九二〇 一〇、九二七 一〇四、二六七 二七、六五三

一九二一	一一、〇〇四	一一四、六二〇	三一、七九一
一九二二	一一、〇〇四	一二四、一三一	三二、八五八
一九二三	一一、五四四	一三一、三〇五	三二、四三四
一九二四	一一、五四四	一四一、四三三	三三、二八九
一九二五	—	一二八、二〇三	三三、〇〇三
一九二六	—	一三四、六六〇	二八、三九三
一九二七	一二、〇〇〇	一二六、二一一	二一、六三六
一九二八	—	一五二、六三〇	三六、五二二

從這個表中很明顯的看出中國鐵路網在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的時期增加了一二五%，而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七年將近增加了一四%。速度之遲緩是很明顯的。

在中國全部鐵道上的管理人、司機和工程師一共在一九二四年約有一二〇、〇〇〇——一二三〇、〇〇〇人，其中約有二八、〇〇〇五金工人散佈在各處機車場（註三）（在印度鐵路職員人數有七八〇、〇〇〇人）。

然而甚至此種可憐的鐵路網的作用在國家經濟上都是很大的。乘客的人數僅僅在中國固有的五條鐵路上在一九一——一九二一年期間從一〇、一〇〇、〇〇〇人增加到一八、一〇〇、〇〇〇人，即是說增加了八一%，而貨物的運輸從五、五〇〇、〇〇〇噸增加到一六、四〇〇、〇〇〇噸，即是說增加了二〇〇%。在新殖民地化的區域內此種過程進行得更快。中東鐵路的貨物運輸在一九〇三——一九二六年期間從六、九〇〇、〇〇〇普特增加到一三九、八〇〇、〇〇〇普特，即是說，差不多增加了二、〇〇〇%。南滿鐵路乘客的人數在一九〇七——一九二六年期間從一、五〇〇、〇〇〇人增加到八、二〇〇、〇〇〇人，即增加了四四七%，而貨物的運輸從一、四〇〇、〇〇〇噸增加到一一、五〇〇、〇〇〇噸，即增加了七二一%。（註四）在國家經濟生活上鐵道的作用和意義在軍閥戰爭時期並沒有多大改變。各個軍閥集團佔據了鐵路，把持了他們的收入，利用牠們來運送軍隊，而不會採用任何方法來補救鐵道線用於鐵道的車輛。車頭和車輛之佔據以爲軍事目的之用，貨物運輸和旅客交通之停頓成爲經常的現象。美國專家施特龍估計，僅僅中國北部的國有鐵道由於軍閥戰爭損失了約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除滿州里和沿揚子江兩條鐵路以外，鐵路運輸的破壞加速度地進行。新的建設只是在滿州里，但在那裏日本

資本與中國資本之間爲各個鐵路而鬥爭便異常地困難。比利時的資本獲得了沿隴海鐵路直達西安一帶的租借權，但軍閥戰爭并不曾讓此種計劃實現。粵漢鐵道建築之終止也不會達到終點，雖然中國資本有許多計劃，雖然英國庚子賠款的某部份英國資本預定爲這個目的之用。南京政府的鐵道部長孫科企圖將鐵路的管理置於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但這種企圖由於軍閥集團的反對而失敗了。而孫中山幻想實現的計劃在鐵路建築的意義上仍舊是一種幻想。中國的資本表明不能在中國本國內着手建築新的鐵道，而外國資本則期待着更有利的政治局面，很顯然地，在最近時期祇是徒然地期待着此種局面。隴海鐵路、平漢鐵路、津浦鐵路在最近幾年來用之於軍事的目的比用之於經濟的目的爲多。現在山西和山東的鐵路更捲入軍閥戰爭漩渦之內。祇有在滿州里的鐵路和上海的鐵路多少總還「經常地」動作着。總之毫無疑義的，在鐵路運輸方面進步是沒有的而有的是顯著的衰落。

說到航業方面，那麼來往船隻的總噸數在一九〇〇——一九一〇年期間增加到一一七%，而中國船隻的噸數則增加了一五二%；在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期間船隻總噸數增加了一七%，而中國的噸數則增加了三六%；而在一九二〇——一九二六年期間總噸數增加了二九%，而中國

的增加了二四%（拿一九二六年作比較的根據，因為在一九二七年給了極嚴厲的，但是一時的降低，此種降低在一九二八年已經被取消了）。在一九〇〇在中國旗幟下的噸數為總噸數的一九%，在一九一〇年為二二%，在一九二〇年為二六%，在一九二六年為二一%及在一九二七年為一八%。在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期間中國的噸數絕對地和相對地增加了，而在一九二〇年後中國的噸數在不大的絕對地增加情形之下就其對外國的噸數而言是減少了。我們在工業生產領域內也可看到類似的過程。然而在航行方面此種過程從一九二七年起就成為特別尖銳，當時軍閥戰爭及隨之而來的封取中國公司的輪船便引起了中國招商局的破產并且許多中國輪船無法建造。第一個中國民族的企業已成為軍人的犧牲品。民族資本的地位在這方面更加減弱了。

關於鐵道運輸和輪船在國家的一般貨物運輸中的比重如何不會有任何正確的統計數字。以前北京政府的美國顧問貝克爾斷言，現時中國的鐵道網做工的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苦力。（註五）誰都不會計算到有多少舢板、渡船和小划子來代替輪船；但計算了噸數及運轉的速度也就可以假定已獲得了假測的數字。

在中國的美國使館商務參贊亞爾勞德肯定說，美國貨物運輸用中國的方法。即在苦力的背上

來完成，那麼「就需要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健康的人，就中每一個人在一天之內運送一担，即一三三，三鎊的貨物行五十里的遠距離，即十五英里，並且他們在一年內要做三〇〇天，就中在美國每年乘鐵路往來的一千萬旅客還不計算在內。（註六）而用中國苦力運輸則比用美國鐵路運輸費十五倍。因此可以完全明瞭，美國資本第一着就努力於鐵路的建築，照亞爾勞德的話看來認為中國鐵路等於「金子的尋覓」。此種趨勢加強了以下類似的場合：「在美國從載重極大的列車舊火車頭都被新的代替了，其結果好的火車頭都棄置不用。於是就可以以新火車頭的半價或三分之一的價值將牠們出賣。這些火車頭對於中國却非常有用。」（註七）總而言之，不僅工業家，就是美國的鐵道大王都注意到要使中國建築新的道路。要怎樣的出賣舊火車頭。所以亞爾勞德向一個美國「三民主義」的中國人提議近代運輸之創立。而摩托車的運輸就是屬於近代的運輸。鐵道建築事業的顧問米太爾也向南京政府提議採用一些方法以保證現有的道路過渡到美國資本手中。可是從財政資本的立場說地主資產階級政權之穩定是實現一切這些計劃的前提。然而此種前提是不夠的。而美國資本要佔據中東路是不會成功的。

我們已經指出，在最近時期，特別是從一九二八年開始摩托車的運輸在中國運輸的體系內開

始起着顯著的作用。正在加速度發生的道路的建筑及汽車的運輸之繼增不已指示出發展的傾向使此種運輸迅速推廣。在此種關係上中國像其他所有落後的國家一樣在這種意義上是處於有利的地位，即可以把握着技術的最後成果，而跨過從前發展的階段。在佛特和摩特斯之間的競爭以及由競爭而引起的汽車和機器腳踏車之廉價使更易於採用摩托車的運輸。此外，應當看到，鐵路建筑需要巨大的投資，並且根據中國的經驗鐵路祇要在建筑以後經過五——一二年就成爲極有利益的了。（註八）一英哩鐵道的建筑甚至在現在極低的價格之下也得費五〇、〇〇〇元，而一英哩馬路的建筑只費一、〇〇〇——二、〇〇〇元。在中國很廣泛的採用農民，退伍軍人和窮人的強迫勞動——總而言之是最賤的勞動——來建筑道路。在一九二八年以全國計建筑了約有一五、〇〇〇——二〇、〇〇〇里碎石舖的路，建筑的速度并不弱；道路的建筑開始進行於遼遠的省份。在計算到汽車運輸的發展佛特在上海已經建立了供給一切必需品的工廠。

最後，在一九二九年在中國已開始採用航空運輸。中國的航空家駕着美國飛機從廣州飛到北平，出現了做女飛行家的第一個中國女子。在南京出征桂系的時候由中國飛行家駕駛的飛機已起着一些作用。在和張發奎及馮玉祥作戰的時候航空術的作用還更大。

當然這只是最初的燕子，但是在當時最初的飛機已經出現於中國不變的天空之下。

註一：Wagner, Die Chinesische Landwirtschaft, p. 166.

註二：中國經濟雜誌第二期，一九二九，p. 189.

註三：根據中國工人年鑑的統計數字。

註四：對於其他鐵道沒有足以比較的統計數字，因為牠們是在建造的過程中或者就沒有什麼材料論及那些鐵道。

註五：Malony, China, Land of Famine, p. 35,

註六：Arnold, Some Bigger Issues in China's Problem, Shanghai 1908, p. 3,

註七：同上，p. 4.

註八：Reiner, Reading in Econ. for China, p. 606,

第十章 中國革命的前途_(註一)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侵入中國，轟毀了舊日社會秩序之基礎，破壞了帝國的統一，雖然結果引起了勝利的資產階級的叛變，但總是偉大的革命。現在提出的問題乃是關於中國社會結構之向前發展的道路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規定如下：中國將來是資本主義的抑是非資本主義——意即「超過」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的發展的道路呢？

爲了答覆這個帶有關鍵的重要性的問題，我們必須考察資本主義前期形態在歷史進程中如何轉變爲資本主義的形態。我們知道的有以下的幾種形態：

一、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法國的道路）：資產階級與全體農民（其內部階級層的分化除外）在城市貧民幫助之下以革命的方法推翻封建秩序，沒收地主的土地分散與農民，以武力開闢資本主義發展的大道，建立資產階級的統治。當革命達到最高點時，城市無產階級企圖爲本階級的利益鬥爭，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立於反抗的地位，但資產階級與農民攜手以武力將其壓制下去。法蘭

西大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之典型的例子。

二、不經過資產階級革命直接過渡到資本主義（普魯士的道路）。封建地主之政治統治未嘗受着武力方法之摧殘；他們本身變成了資本家，（註二）他們的封建土地財產變成了資本主義的財產，他們土地上的封建權利隨着他們的收入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地租；他們與資產階級同化了，成爲一種具有特性的階級——土地的資本家；在這時期，資本主義的關係得到了廣大的傳佈并且成爲國家的統治者。

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概可歸納於這一條道路。

三、由於侵略的結果而過渡到資本主義。當帝國主義的勝利者列強強迫着國家進入資本主義的秩序時，同時便將國家變爲殖民地：殖民地的資本主義道路，例如阿尼亞、荷屬印度、英屬印度。（註三）在這些地方，資本主義前期的秩序還完整的存在於農村經濟中，或者在這些地方發生了類似資產階級之土地的所有權（參看馬克思的印度論）。

四、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遂行資本主義的過渡。這裏顯然隨着政治的依賴性之一定的階段有或多或少的經濟的奴隸：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拉丁美洲）。

五、殖民地革命的道路。過渡到資本主義在於民族之成功的保護或民族依賴性之征服（這裏多少保存着封建制度的成份）。例如：日本、土耳其。

這是帝國主義時期的三條道路，實際上牠們中間并無嚴格的界限：全部階梯從絕對奴隸的北非洲或印度始直到保存着政治的獨立而經濟之完全依賴的阿根廷或土耳其止。

我們知道，中國將不會走這些道路中之任何一條的。其中任何一種形式都不允許頑強的認為資本主義的秩序實現於中國。爲了說明此點，我們必須簡略地考察帝國主義侵入前的中國社會制度之特徵。

一 帝國主義侵入前的中國社會結構之特徵

我們指出帝國主義侵入前中國社會基礎之基本的特點如下：

一、中國勞動者之被禁錮的土地決不是因工手的缺乏。在歐洲由於勞動者之被禁錮於封建主的采邑，結果工手缺乏，直接生產者沒有競賣的機會，反之，在中國由於土地的缺乏迫着直接生產者不能自由的選擇，僅僅有可能耕種一小塊荒地。

歐洲封建制度之經濟基礎是土地的佔有和農奴制。封給王子永久佔有采邑是世代蔭襲的。但收入的大小不是依賴土地的多少，而是依賴農奴的數目。決定的因素不是土地上的統治，而是勞動力的統治。不是計算畝，而是計算「人」。僅僅過渡到資本主義——與人口之有力的增加相應的——視為生產條件的土地其比重才駕乎勞動力之上（英國、普魯士等國之圈地）。

至於中國則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我們考察的是中國本部，而不是人口異常稀少的滿州、蒙古）。決定生產因素的是土地，而不是勞動力的豐足。土地在這裏並不是血族的世襲財產，與封建主的一代傳授一代不同；土地自由買賣，其所有權的交替，完全和在資本主義之下一樣。當然，在中國存在着大農業，但沒有封建的所有權。在那裏存在着專靠地租生活的階級。雖然這些地租純粹以自然物交納，但不是基於統治權利之封建的地租；這是「資本主義的」高利貸的地租，從直接生產者，貧農、佃農、那裏，不僅榨取他的悲慘的「利潤」，并且也榨取他的工資之大部份——除開固有的地租。

與土地買賣相適應的就是在中國沒有單獨的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封建農業者階層，如像那在歐

裏，誰的資本都可投入於土地，任何一種貨幣額都可取得繳納地租的權利，任何一個高利貸者、商人、貪官污吏、暴發的軍人都成爲地主。而因爲工業資本主義不大發展的結果，可以獲得投資利益的僅僅只有土地，因而每一個有錢的人都變成了土地佔有者！發生了資本主義前期之特別的法則：所有一切統治階級事實上都是農業所有者。不是昔日的封建地主同化資產階級，變爲土地資本家，而恰恰相反：高利貸者、商人、佃戶——這些資本主義前期的資產階級之特殊的樣式——購買土地并同化於地主農業所有者；在這種情形之下保留了封建秩序之最明顯的特點是：地方管理和法庭爲農業所有者所壟斷，牠們是國家政權的代表，而與農民處於對抗的地位。

二、帝國主義侵入前之中國社會結構的第二個特點是高利貸資本與商業資本在資本主義前期生產方法的基礎上之異常有力的發展。「中世紀——馬克思說——遺傳下來了兩種不同的資本形式，這種資本形式是在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中達到成熟的，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世紀到來之前，這種資本被認爲 *Quand Memo: 高利貸資本與商人資本*」。（註四）

但在中國這種資本和豐富的勞動力并不會走到資本主義工業生產之獨立的發展。馬克思僅僅指出了資本的兩種形式，還不會從這裏引申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一定不移的發生；甚至這兩種資

本形式之過渡的發展——就字的固有意義說——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成了桎梏。

「凡生產工具分散的地方，亦即高利貸集中貨幣所有權的地方。高利貸不會變更生產方法，但如寄生虫似的吸吮着牠，直到牠完全死亡。高利貸吸吮了生產方法的血液，枯竭了牠，并且強迫着在更惡劣的條件之下遂行再生產」。『在一切的資本主義前期生產方法之下高利貸起的革命的作用只是牠破壞了和消滅了那在其他的基礎和不斷的再生產上窒息了國家政治制度的這一種或那一種的財產所有權的形式。在亞洲形式之下高利貸可以存在了頗久，除經濟的衰亡和政治的腐敗以外並不會引起別的什麼（我加圈——著者）。只有在那個地方和那個時候，在那個地方和那個時候在現實上有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存在的條件，高利貸是建立新生產方法的工具之一，一方面是封建主和小生產者的破產，另一方面是勞動條件及將其變為資本的集中」。〔註五〕

資本主義前期形式之商業資本也可以那樣規定如下「牠（商業資本）的發展，以其本身而論，並不是以引起一種生產方法過渡到另一種生產方法以及給牠以解釋」。〔註六〕

「在商人資本形式中資本之獨立和優越的發展與生產資本的抬頭是平行的，即與資本在外來的基礎上及依賴於其生產的社會形式的發展是平行的。所以，商人資本之獨立的發展對於社會

之一般經濟的發展是處於相反的關係之中」。(註七)

在一切場合之下都可以斷然地確定這種事實，即中國在帝國主義侵入以前已繁盛了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却不曾有過。

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生長於中國并不是自願的，而是外國資本注入國家的結果。資本主義發展的開始就顯示了使中國逐漸屈服於外國資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對於帝國主義的屈服一開始就構成了這樣一個過程。

因為資本主義的注入所以在這裏比較其他獨立地進到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的國家更帶有病態和破壞。舊的，資本主義前期的中國社會瓦解了，并且這瓦解的過程發生了重大的革命力量。

農民經濟也處於慢性的瓦解之中，結果高利貸資本和駭人聽聞的高度的地租除吸盡了原有的地租外，還吸吮農業者大部份的工資；至於現在，受了外國紡織業侵入之賜，資本主義的工業發生了，農民經濟喪失了其惟一的助手——家庭手工藝。農民很快地分化了；其中小部分在廣大羣衆貧窮之下發了財；大部份農民完全從生產過程中被驅逐出來。遭受了此種瓦解與潰崩之類似過程的還有城市手工業。「失去了勞動手」的廣大羣衆給了移民滿洲的殖民地化、僱用軍隊、土匪、

乞丐以人的資料。農民經濟的瓦解與手工業者在城市勞動市場上被過剩的工人所排擠，以至粗工人的工資降到不能糊口的程度。……

在資本主義的工業在本國領域內發展的那些國家中，過剩工人的一部份被工廠所吸收。但在中國這種地方是很有限度的。并且工廠和作坊有些是為外國所設置的。

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資本主義前期形式的土著資本為外國工業資本所屈服。牠們一部份在外國資本幫助之下轉變成了工業資本（中外合資企業），（註八）一部份則在多倍的外資之下起着副作用。

外資注入國家以後，中國商業資本的大部份都被外資所吸收。中國商人依農村之茶、菸葉、黃豆、絲，組成各商業公會。因為他們的資本在數量關係上有外資的參加，因而結果後者如像戰勝者一樣的利用額外的特權使中國商業資本對於外資陷入於最大的依賴關係之中。

中國固有的，即所謂「土著的」銀行（也就是一般的高利貸資本）也發生了與此類似的情形：這些銀行實質上只是外國大銀行的代理店，外資——英國佔有特別的優勢——在中國之代理人。

土著的商業，高利貸，而往往也有工業資本附屬外國資本之政治的和社會的意義就在於中國

資產階級本身成爲外國資產階級之附從的階級；（註九）而因爲中國資產階級——即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與地主密切聯系着組成一個統治階級，所以中國的全部統治階級都是附從外國資產階級的。（註十）

但外國資產階級不僅僅將中國統治階級屈服於自己：牠還要宰割牠們。外國資本并非一致的；帝國主義的列強（英、日、美、法）間有各種不同的鬥爭，并且牠們的矛盾也影響於中國土著資產階級的各派別，使每個派別依從一個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鬥爭持續於中國資產階級的內部，分裂牠并使牠不能統一。

中國軍閥間的戰爭，乃是帝國主義列強之利益的矛盾和依附牠們的中國統治階級之派別的鬥爭。

這二種情況——中國統治階級與外國資產階級的附從，及牠們的分立——對於決定中國可否有「基瑪爾」發展的道路一問題上頗爲重要。

四、軍事技術的落後是固有的資本主義前期形式之一般技術的落後的結果：（註十一）中國軍隊經過了一百多年的變遷，但在數量的優越條件下都不能與任何一個帝國主義的軍隊一決雌雄。

五、有特殊意義的是中國從資本主義前期社會結構過渡到資本主義之崩潰和瓦解的時代中行的；

(A)在帝國主義列強為壟斷的獨佔市場之鬥爭尖銳化之下，有廣大領土和四萬五千萬人口的中國表現其在現時是帝國主義在地球上還不會完全霸佔之惟一的地方。因而，牠便成為帝國主義列強間之鬥爭的主要對象。

(B)資本主義的制度與視為階級的資產階級已經不能是——就世界範圍而論——歷史進步的擔負者。反之，牠成為歷史發展道路的障礙物。資產階級制度的排斥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進步給世界工人顯示出資本主義制度的末日之來臨。很明顯，這些在中國階級的相互關係之發展上都表示了最深刻的影響。

正是這些重要的因素在中國未來的進程中將表示其決定的影響。

現在來觀察中國能否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形成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

對於這個，我們將分別的敘述從資本主義前期形式過渡到資本主義之上述的道路看那一條對於中國適用。

二 資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對於中國無意義

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必得指出「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即法蘭西的過渡到資本主義，過渡到資產階級的制度的道路對於中國是不可能，理由如下：

(A) 全部與土地有血統關係的資產階級層都是地租的獲得者，都與對於農民之奴隸的和高利貸的剝削有利害關係(同樣也依其商業的和貨幣的高利貸之路線)，都多少與地主有連生的關係；所以資產階級領導農民直接反抗地主的革命不可能。與地主階級連生的資產階級當然不能準備反對自己的革命。

(B) 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發生於世界資本主義衰落的時代，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相互關係在革命過程的本身中就已根本改變了。在帝國主義前期之「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時代，資產階級在本質上是一切反封建地主的「勞動者」之共同利益的代表。無產階級是一個單獨的階級，是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立於對抗地位的，在歷史舞台上牠常常是革命的最前鋒。至於在資本主義沒落的現階段，當着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階級矛盾在世界範圍內佔有首要意義的時候，當着蘇聯無產

階級在全世界注視之下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的時候，——在這個時候無產階級再永不會跟在資產階級後面和在其領導之下無條件地支持資產階級的革命了。

中國無產階級在一切羣衆運動中都提出其本階級的目的和本階級的政綱而與資產階級早已在進行無情的階級鬭爭了。資產階級革命在工農民主專政中的一切企圖之蔓延的危險性被資產階級最好的認識了。所以中國資產階級——甚至與地主階級沒有連帶關係的——任何時候都在預防一切取消封建成份之革命的企圖，雖然牠們對於資產階級制度的發展也是障礙。中國資產階級最後終成了反革命。（註十二）所以關於法蘭西發展的道路對於中國是談不到的。而這也就是說，在資產階級的秩序範圍內土地問題是不能得着解決的，這也就是說，廣大的被剝削的農民羣衆將走向非資本主義的革命的道路。

三 普魯士發展的道路在中國不能有地位

中國資產階級與地主既形成了一體統治階級，那麼普魯士發展的道路，即變封建地主階級爲資本家（包含一定的政治的和行政的權利和特權）之可能性已首先失去了可能性。毫無疑義，在地

域上已有那樣形態的發展。張作霖和馮玉祥都是將軍，封建的佔有者和工業資本家。然而就字的意義本身來說——除開地域——這條發展的道路依我們的意見對於中國是不可能的。

(A) 首先就是沒有那種形態發展之物質基礎——普魯士農村經濟生產的特點。中國地主的佔有——仍須除開地域爲無數的自耕農所分割，此外大部份的土地又是那樣的分散，甚至「圍圍」也不會有一點像普魯士的大地主經濟。

(B) 從封建的土地關係過渡到資產階級的土地的資本主義，表示直接生產者的廣大農民羣衆土地「解放了」出來。在普魯士這種農民羣衆的一部份，很快地被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吸收了去，另一部份則浪潮般地湧入美洲。僅僅只有資本主義發展得特別迅速的國家——也須在一般資本主義向上發展的時代——才能走這條發展的道路而不致引起「解放了」的農民羣衆之革命的運動。

所有這些前提在中國是不存在的。中國統治階級在生產工具形式中異常缺乏資本。所有中國資產階級層之立腳點——這不是生產工具，而是土地，即赤裸裸地以法律名義剝削農民，取得地租。在工資異常低的條件下，生產工具之採用壓榨勞動力乃是極普遍的；所以在我們的今日煤炭

還是用苦力從極遠的礦坑搬運。這原因是在於生產力的發展之異常的軟弱及固定資本之異常的低小，與農村人民的文化程度相適應的富人的財產之構成差不多完全是藝術品——寶石、彫刻物、絲織品、古董等等（中國沒有產金子的地方，所以在資本除銀子——主要形式——外便是藝術品）。保存了數千年剩餘勞動之積累的基本形式乃是堤工、運河、萬里長城、無數的寺院和廟堂。在全國中生產資本的數量為最小，而且就中大部份還是在外人手中。（註十三）

由此我們可以說，無論是在土地中或農村經濟中都沒有迅速地進步到資本主義發展之物質基礎，而因此也就沒有吸收從土地「解放了」的農民羣衆之工業，或者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之巨大的、設置完備的地主經濟。

帝國主義列強梗塞了中國工業發展的道路，不允許中國資產階級有其保護關稅的政策（註十四）（在一九二九年施行的新關稅條例不會表示出對中國工業必要的保護，關稅條例不是對於中國工業有利益，而是對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工業品有利益）。

很明顯，在工業發展最高度的國家，牠們在差不多自由競爭的條件下習慣了在中國市場上傾銷，以致中國工業之迅速的發展將無法實現（特別注意的是這在世界市場使競爭的爭鬥更加劇烈）。

起來)。

依據機器輸入的統計，完全明顯地證明中國農業之工業化的速率。因為中國本身沒有機器的生產，所以機器輸入的範圍可以作為工業化速率之測量器。我們列表如下：(註十五)

年 代	百萬美金	美金市價	百萬元	年 代	百萬美金	美國市價	百萬元
一九一三	七·二	七〇	五·五	一九二二	五一·五	八三	四二·八
一九一六				一九二三	二八·六	八〇	一八·九
一九一七	六·五	一〇三	六·七	一九二四	二五·五	八一	一七·七
一九一八	八·三	一二六	一〇·二	一九二五	一七·三	八四	一四·五
一九一九	一五·五	一三九	二一·一五	一九二六	一九·八	七六	一五·〇
一九二〇	二四·六	七六	一八·五	一九二七			一五·〇
一九二一	五八·八	七六	四四·七				

上列數字無疑義地指出中國工業化的速率之遲緩，——這是帝國主義列強在世界市場上為出售而鬭爭之自然結果。由此可以知道，中國在普魯士發展的道路場合下，中國工業永遠不能吸收那被農業經濟的勞動市場——如像在德國一樣——所排擠出來的過剩的工手。(註十六)

此外，中國農民沒有移民於外洋的出路——這個出路當時德國農民是有的。從中國移民於殖民地，在那裏都遭白色的移民的排擠、壓制。餘下的就是氣候寒冷和土地荒涼的滿州和西北，在那裏土地又爲國家所壟斷，限制了殖民地化之可能性。在滿州土地被地主和富農佔有之迅速的進程之下，貧農只能作僱用工人和佃戶。所以滿州之殖民地化只是使存在於中國的土地矛盾重新發生，但在更尖銳的形式之中。

所以普魯士發展的形式在中國是不存在的；這個道路不能解決土地問題，不能實現過渡到資產階級社會之堅固的形式。

因而在帝國主義前期時代的這二個過渡到資產階級制度的道路中之任何一個在中國都不能有地位。

四 基瑪爾的發展道路對於中國不可能

中國不能由其本身從資本主義前期的過渡、到資本主義的獨立國家；要想達到這一步惟有如過去土耳其一樣的與帝國主義鬭爭。然而這個「基瑪爾」的道路對於中國是此路不通，這我們將

兩國的地位和社會條件加以比較便可了然。

(A)土耳其人與現代的歐洲軍隊鬪爭雖然遭受了長期的失敗，然而整個說來，土耳其的軍隊實質上并不弱於那在中國已有地位的歐洲帝國主義的軍隊。所以土耳其能夠乘機發動（直接在世界大戰以後），其爲自己獨立而鬥爭之勝利的機會遠較中國爲多。但那種情形也是異常重要的，即在對於帝國主義的價值上，土耳其不及中國（甚至在土耳其有些區域沒有帝國主義的商業）。

(B)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軍事權威較之過去在土耳其大得多。更可怪的是牠們在中國的一切大都市中都有其駐軍；牠們的軍艦可以停泊於中國的碼頭，航行於中國的內河，直達中國的腹部。個別的區域，如像南滿洲便是處於日本的軍事佔有之下。所以中國與帝國主義鬥爭的戰略遠較土耳其爲困難。

(C)然而更加重要的是社會結構不同。當土耳其與帝國主義進行民族解放戰爭時，其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較之中國低得多。所以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不會起着怎樣的作用；轉變資產階級的民族解放革命爲工農革命的危機異常之少，暴動的土耳其自身有解決土地問題的可能。所以土耳其資產階級的與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能夠推進到勝利的結局，同時如像中國的資產階

級在急劇的轉變民族解放運動爲工農運動之前出賣了革命并獲得了帝國主義勝利者之嘉許——或不嘉許（註十六）如果將來呈現出類似的情形，那麼這種過程也不免重演，不過在更廣大的範圍之中罷了。

殖民地的與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常常是雙重性的。如像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牠在脫離外人的壓迫中與國家的勞動者都有連帶的利害關係。但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牠在保持其階級的制度與階級的統治中又每每會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妥協。牠只能夠在那個時候進行民族解放運動，那時運動帶有資產階級的性質，那時運動不會變爲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中國之基瑪爾的革命是發展於資本主義崩潰的時期，這時關於推翻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問題已放於日程之上了，這時廣大的中國工業羣衆只有在越出資產階級革命範圍的口號之下才能被吸引於民族解放運動之中；所以中國資產階級永遠失去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首領之可能性。

因此，我們可以結論說，中國封建關係之完全肅清和過渡到資本主義以及過渡到資產階級的制度大半不能以勝利的民族革命形式來實現——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完成這個使命。將中國過渡到資本主義，惟有在外資的支配之下才有可能，這裏我們回憶一下在上面所確定的兩個體系之一

個(四——五)：中國資產階級必爲外國資本所屈服，這裏中國或者成爲半殖民地(在政治之形式的獨立下的經濟奴隸)，或者成爲完全的殖民地。如果在這種情形之下實現，那麼，中國資本主義制度前期的封建成份之二個場合便不能廢除：外國資產階級以建築在地主和高利貸之封建的剝削農民及在其雙重的剝削勞動者之上的上層形式實現其殖民地的剝削。

但是直到今日爲止，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仍只是起着我們所說的這些作用。

五 中國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

如果根據我們的觀點去正確地理解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完成資產階級的革命，反之成了反革命的階級，而不能實現其歷史的使命——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那麼，我們可以指出，譬如托洛茨基派認共產國際的中國政策(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對於資產階級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幫助)是錯誤的，那是不正確的，因爲：

(A)中國革命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與被壓迫的殖民地的羣衆反對財政資本統治的總鬥爭之一部份。共產國際必須幫助這一運動，因爲牠帶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雖

然也會很容易地預料到運動必不可免的從民族的狀態轉變到土地革命的狀態，中國資產階級將毫無疑義地叛變這一運動。

(B)雖然中國資產階級的大部份由於外資的深入其內而具有純粹買辦的性質，但仍不失為資產階級的一層，其利益與外資的利益——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是直接的矛盾的。牠與國內市場的擴大大極有利害關係，並且牠是一切工業資產階級，一切生產的資產階級層之利益的基礎，在牠上層的有地租所有者和高利貸的利益。在一切場合之下正是在這裏企圖及時的「獲得羣衆的同盟者，即如這種同盟者暫時的、動搖的、不堅固的、脆弱的、有條件的」。(註十七)(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在數量上不多，但總是「羣衆的同盟者」，跟在牠後面的有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羣衆，學生，知識分子等等)。所以正確的政策是歸結於引導「當中國革命是全民族聯合戰線時，執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到「當中國革命成爲土地革命，而民族資產階級脫離了革命時，則將其變爲與民族資產階級武裝鬥爭的政策」。(註十八)

(C)毫無疑義的，中國共產黨變全民族的解放運動爲土地革命是太晚了，毫無疑義的，也因
此改變了牠對於昨日的同盟者，今日的敵人——資產階級的關係，必須與牠武裝鬥爭，但實行得

太晚、太怯懦、太不堅定、并且也太不徹底，毫無疑義的，中國共產黨不會完全的從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註十九）其主要原因在於領袖們經驗的缺乏，理論的準備不充分，（註二十）以及一部份的變節（譚平山）。但是托洛茨基派說中國共產黨不會注意到歷史的可能性，不會預防民族資產階級的變節，不會開始反對牠的鬥爭和提出土地革命，而希望同牠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將農民羣衆置於首要的地位，這是完全不正確的。

這種思想過程根本上是反列寧主義的。其結論說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沒有任何經驗和在極複雜的情形下的任何國家中都能直接走向勝利。（註二十一）肩上没有固有的經驗，這在任何地方都難於信賴，在中國也是完全不可能。不能忘記中國之特殊的條件。一切文化之最基本的前提——能讀與寫——在中國都為統治階級所壟斷。就是讀中文信也得學習幾年。工農差不多完全是不識字的。（註二十二）所以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差不多壟斷了支配羣衆思想的工作。中國共產黨的首領也都是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的文化有連帶關係，而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文化則相距甚遠。難道可以希望這些首領當資產階級叛變時與資產階級決裂嗎？（註二十三）

中國工農僅僅與資產階級結合一起從事鬥爭，在國民黨隊伍中反對萬惡的軍閥和帝國主義；

這樣如何能夠希望那在革命鬥爭中不會熟練的勞動者，回過頭來反對屠殺工農，而在事實上——雖然口頭上還在說些革命詞句——已走到反革命營壘中去了的資產階級呢？（註二十四）

所以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問題中之戰略的路線毫無疑義是正確的。而共產黨在最錯綜的，千鈞一髮的時機中之不能執行此路線，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六 目下的中國

一切中國資產階級層現在都跑到反革命的營壘中去了。買辦的——就字的確定的意義說——資產階級當革命尙帶純粹的民族性質時就已在反革命的營壘之中。其他的資產階級層的叛變，是當着運動進到土地革命的形態，這一形態是會毀壞中國資產階級之基本收入——高利貸的土地的收入。說到「民族的」工業資產階級，那麼牠的叛變乃是被工業無產階級的經濟運動之迅速地增長所促成。

進到反革命的營壘，便不免要投降於帝國主義之前。情形是那樣的，中國資產階級——不能不動搖，不能不有民族的形態，然而正因此便沒有任何鬥爭之真實的可能性——與帝國主義形成了

一致的戰線，中國資產階級在與帝國主義一致的戰線中成了不能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的階級。這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只有在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工農革命的民主專政形式中才能得到解決。

現在我們提出兩個異常重要的問題：

(A) 反革命的勝利是否已在中國的經濟基礎和全部社會結構中引起了足以將革命運動拉長到遼遠時期的那樣深刻的變化呢？

(B) 「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對於中國將來是否可能呢？

我們對於第一個問題的答覆是否定的：反革命的勝利在中國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中不會引起了將革命運動拉長到遼遠時期的那樣的變化。

經濟基礎如以前一樣。最近二年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略有發展——雖然也是很有限度的。然而其過程是與外資在中國的統治之擴大和加深密切地聯系着。這是說，我們在上面所說的農民經濟和城市手工業將以更快的速率進行。(註二十五) 關於這種情形北中國的大飢荒便是一個極好的證明。農民之不斷地被軍隊掠奪的事件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從此可知無論是社會的階級結構，或者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都不會有實際的改變。資產階級如以前的一樣的軟弱，如以前一樣的附屬於各個集團，依附於在中國相互爲爭奪中國而鬥爭的帝國主義列強，只不過今日的局面比革命前更其複雜而已。革命前，美國在中國不會引用積極的政策。牠只是保持着「門戶開放」的原則，而作爲他日政策之可能的基礎，但同時牠在中國還不會有直接的利益。現在的情形便不是這樣。美國資本開始從各方面投射到中國，并握有經濟的最高權（在上海佔有電氣業）。美國的經濟統治希望廣佈於全中國；所以牠幫助南京在形式上成爲中國全國的政府。但實際上南京不是全國的政府；在日本、英國、法國等帝國主義影響之下的中國資產階級各集團，遍佈於全國各地，她們事實上脫離南京，而受日本、英國政府的幫助。所以美國在中國資產階級當中的積極政策事實上不是統一，而是更大的分裂。開始於一九二九年九月的各派軍閥的混戰實是最好的說明。

帝國主義者在對於中國和中國資產階級的關係上不會買得了漂亮的言詞行動。美國想在其經濟霸權之下和平地變中國爲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同時英國和日本首先在統治階級的封建層方面從事活動，并加深中國的分裂，——急速地承認南京政府。英國和日本不得已追隨美國之後承

認了南京政府。然而美國資產階級口頭上雖然說得漂亮，而事實上在領事裁判權等等放棄上其表現則正如英國和日本一樣。（註二十六）

這樣看來，事實上并不曾減少了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的依賴。

如果帝國主義的矛盾分裂成爲中國資產階級的各部份，那麼，牠在自己的方面便企圖利用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鞏固自己的地位。這種矛盾對於中國資產階級是有利益的，因爲帝國主義列強之相互有力的監督不給任何一個公開地宣佈中國爲自己的殖民地；帝國主義間的相互鬥爭同樣也妨礙了牠們瓜分中國。我們可以相當地自信的斷言，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仍可保持其半殖民地國家的地位——如果革命不先發生。（註二十七）

我們知道，中國資產階級仍是與以前一樣的軟弱并且被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分成了許多單獨的派別。農民經濟與手工業者解體了。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也發展了工業無產階級，增大了基本的革命的力量。（註二十八）固然，中國革命遭受了失敗，但反革命的勝利不可避免的將要使革命的力量向着更大的方面發展，使這一革命突過純民族性質的運動。這使我們確信革命的到來在歷史上已是不遠的將來的事了。觀察一九二九年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高漲，可以成爲新革命波浪

的先兆，而這一個兆的具體的標誌便是屢仆屢起的各地農民的暴動。

中國資產階級得着帝國主義的幫助能夠在這種場合取消革命，如果牠能：A、或用斯托羅賓式的土地改良道路以擴大本階級基礎的目的建立「堅固的經濟的」農民層，B、或以西方的樣式收買和軟化工人階級的大部份。

在中國建立「堅固的」農民層按照一般土地改良的道路的原則是不可能的。中國沒有土地的儲藏和未開墾的土地；所謂「斯托羅賓的農夫」的土地應是從地主方面奪取，即主要的從資產階級本身奪取，這是不存在的。此外，地主的土地分成無數的小塊，而為農民所耕種；這是說斯托羅賓的土地的改良將以人工的加強了和加速了小農經濟的崩潰之自然的過程，使千百萬的貧農在城市勞動市場上找不到工作。這將使土地問題更其尖銳化。

收買大部份工業無產階級的道路，建立工人貴族與工人經濟運動的改良的道路是無意思的：

中國——不是帝國主義的列強有額外利潤的榨取，而是相反——是半殖民地國家，是供給外國資產階級以額外利潤的。固然，我們已看見在中國有建立黃色改良工會的企圖；固然，一部份工業無產階級（機器工人、電氣工人、五金工人、印刷工人）比千百萬的苦力和普通工人的工資高

得多——其實工資還是絕對的低。在一定的形態和共產黨錯誤政策之下——如像廣東暴動所已證明的——這一工人層可以被反革命利用。但牠的數量異常之少，絕不能作為改良主義的，反對革命的工人運動之基礎。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反革命的勝利在中國之經濟的與社會的關係中不會引起了實際的變動；牠不會解決了土地問題，不會減輕了城市和農村勞動者之貧困的狀況。所以很難相信資產階級的統治會穩定，很難相信牠在革命運動中能夠保持攻勢。革命在很快的期間將會再起，並且將以第二——土地革命，工農專政的形態開始，而全民族的任務將如列寧所說「附帶地」解決……

七 中國唯一可能的道路——非資本主義的發展

社會民主黨往往保持着這樣一種成見，認為每一個民族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生產的階段，資本主義應比社會主義先成熟，並且認為資本主義在地球上不會最後完成其葬禮時，社會主義的實現任何一個國家中都不可能。

大家都知道，列寧的觀點是與此恰相反對的。他認為落後的民族在先進國無產階級的幫助之

下能夠直接走向蘇維埃制度，到達共產主義，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形態。（註二十九）共產國際對於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態度是很堅定的立在這種觀點之上，而對於中國亦然。（註三十）

此地有這樣一個問題：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是否已經達到了不允許說「避免資本主義發展形態之可能性」的階段呢？（註三十一）

我們以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雖然最近幾年來擴大了，但中國仍有避免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形態之可能性。如果不計算某些近代樣式之巨大的企業——礦產、紡織業、鐵工廠——那麼可以核定，資本主義主要在流通範圍中發展了：鐵路、輪船、銀行業 對外貿易——這正是中國資本主義的「最高權」。在生產範圍中——對於中國特別重要的是農村經濟——還是剛剛開始。在自已之最大部份的農業、經濟和小手工業還是處於資本主義前期的發展階段之上。

所以中國避免最高發展的資本主義形態是完全可以說的。剝削資本家的工農民主革命的專政可以握住國民經濟的最高權——鐵路、礦產、銀行、土地國有并由無產階級的手而經過蘇維埃迅速地過渡到集體的生產形式。這種可能性即在現在也并非例外。牠能否成爲事實呢？這全賴於新的中國革命開始於何時。

但是如果新的革命高潮不到來，如果資本主義的發展得以繼續完成，那麼這便不能不承認——改良主義者正是這樣說——中國一切革命的前途之取消。延長的結果只能改變革命的性質。革命到來得愈晚，避免資本的發展形態之可能性亦愈少；那時在未來革命的前面放上了推翻資本主義的任務。無產階級領導的策略愈來愈有力，無產階級領導的權力愈可信，野蠻恐怖後的整理愈短：變土地革命為社會主義革命亦愈快。

這樣看來，如果新的革命浪潮到來得遲緩，那麼這只是改變了革命的性質，但不會減少牠勝利的機運。

註一：本章爲伐爾加所作。

註二：「隨着『迷信，愛情與嗜酒』；他們便大做其香品與酒的生意」，這是馬克思尚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關於普魯士的武土地主所說的話。

註三：此地我們不論及隨着資本主義制度移植過剩人口於新的土地相伴而來的土著的消滅（北美合衆國、加拿大、澳大利）。

註四：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七一頁。

註五：同上，第三卷，第二冊，第三十六章，一三四頁。

註六：同上，第三卷，第一冊，第二十章，三〇三頁。

註七：同上，第三卷，第一冊，第二十章，三〇四頁。

註八：中國資產階級獨立發展工業資本的企圖被帝國主義強橫地毀壞了。讀者在論工廠工業一章中可以找到豐富的材料。

註九：正因為整個階級是如此，所以各類派別——特別是工業資本家——在革命之一定的時機能夠出而反對帝國主義。

註十：豪紳和舊官僚貴族也是這一傳達機關的鏈鎖，將外國資本與中國農民——消費者與主要原料的供給者密切地聯繫起來；地方的豪紳與官僚的地位利於和平的發展商業——這樣便可獲得一定的報酬。所以中國全部統治階級，多少總帶有買辦的性質。

註十一：在這裏起着作用的還有數千年來與世界隔絕的歷史思想秩序——武備的缺乏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上層建築（總道的思想）之發展。

註十二：在早來革命的運動中資產階級的作用差不多算完了。

註十三：對於這一點的意義，讀者可參看史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及論反對派，四二四頁。

註十四：一九一九年實行的「關稅自主」並沒有有一點改變了事實。中國與帝國主義協商的稅則不曾給中國工業一點保障（這一點在大資本家的報紙上已公開承認，例如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的 *Satzen*）。新稅則只是增加了國庫的收入而不是保護關稅。

註十五：原料：一九二三年載於中國指南，一九二四——一九二六中國對外貿易，上海海關報告，一九二七年——*Handbuch für die deutsche Maschinenindustrie*（在所舉的數字中缺乏電氣、機器、機車和汽車的人口）。

註十六：中國沒有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農村經濟）人口移動的統計。但我們可以極有把握的說，在最近十年來，在外的惡果中，在外國企業的基本上手工業完全破產了。特別是在有港口的城市中——變「跑到農村」的特點為「跑到城市」之資本主義昌盛時代的特點了。我們完全有把握的說，這與印度頗相類似，在那裏手工業的崩潰遠在資本主義開始發生以前，在那裏有週期的可變的記載，牠們指出在最近五十年來改變了從城市往農村移動的舊觀。

註十七：史大林論反對派（與孫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五七三頁。

註十八：列寧，左派幼稚病。

註十九：史大林論反對派（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的任務）。

註二十：米夫在「緊急關頭的中國共產黨」一書中給了此問題許多有趣的材料。

註二十一：瞿秋白——中國共產黨的首領之一——在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上說：「我們忘記了資產階級這個同盟者時在準備變為敵人的同盟者」（見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打字記錄第三冊）。

他又說：「我們在武漢的時候，我們對於農民的策略以及我們對於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一般的關係都完全是非布爾塞維克的。我們主要的錯誤即在這裏。如果我們以前說，我們必須與民族資產階級聯盟，那麼這并非說，我們應當將自己也變為民族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當我們在武漢的時候，如要與小資產階級聯盟，我們在政治上正是變成了小資產階級」（見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打字記錄第一冊三九三頁）。

註二十二：「認為全世界的歷史自身是一往無阻的進行，而永不會有突越的後退，這是非辯證法的，非科學的，在理論上也是不對的」（列寧，論普尼希，全集第三卷，初版，四三九頁）。

註二十三：中國共產黨的決議和通告之傳播是這樣：由任何一個識字的同志一句一句的讀出來，而有人不懂時則又將每一個字重複一遍。

註二十四：在一九二六年中國共產黨中央七月擴大會議的決議案中選說到「應該幫助反對惡勢力的好地主與紳士」，「不應該改變交納五〇%的地租制度」等等（見米夫來信，六三頁）。

次年，即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命武漢的工人自動的放棄手上的武器。同信，九三頁。

註二十五：可以不考核農民羣衆之認識資產階級的叛變遠較共產黨的首領爲快，并且農民軍的形成與不交地租即是答覆這一叛變。武漢中共中央宣傳部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對此事曾發出以下的通告：

「現在應緊急地覺悟，我們黨在其農民的策略中所執行的反對地主、小資產階級與軍官的路線，是太過火了」（見米夫來信，九二頁。）

註二十六：農民經濟由於天旱和耕的不得法以及堤防和灌溉的失修結果近幾年來不是荒蕪了便是變成了純資本主義的企業；因此廣大的農民羣衆都陷入於飢荒之中。

註二十七：「福蘭克府日報」自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搜出反對麥克唐納的文字。麥氏在國際聯盟九日的常會中有以下的聲明：

「在我們歐洲人看來，就其文明、哲學、宗教與文化說，那裏尙是古代的世界；在外部的物質文明未輸入以

前，牠是睡在那裏的。而現在世界開始驚醒了牠，并使牠懂得獨立的民族發展，這是有巨大的政治的價值的。我們必須尊重牠們人民之民族的希望，我們必須爲牠們創造自由生存的條件，然而這不是讓步或受過逼迫，而是遵守我們世代的民族傳統。我們必須使東方古國相信我們，我們不應使他們相信達到解放之唯一方法在於取消我們之注視的條件」。差不多與此演說同時——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二日——公布了英國「工人」政府答覆南京政府撤廢領事裁判權問題的照會說：「當着中國任何地方之複雜的條件沒有變更，而實際上一如舊觀——雖然改變了形式——時，維持中國人民與住在中國領土內的大不列顛人民之整個世紀的關係的領事裁判權是沒有撤廢之理由的」。

註二十八：在下一一次的世界大戰中中國資產階級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這在理論上不無可能。但在實際上，未來的帝國主義間的世界大戰是毀壞全世界資產階級之統治基礎的，這對於中國資產階級有獲得自由的可能，然而太晚了：革命將要結果牠……

註二十九：視爲階級的無產階級在中國一如在其他輸入大量資本的國家一樣，其發展較之資產階級迅速得多，因爲大部份資產階級的利益不是在於剝削國內，而在國外。

註三十：見列寧在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的演說，記錄一四三頁。

